

零经验！零经费！史上滑雪到南极人数最多、最国际化的女性探险队！

没有不可能
Nothing is impossible!

CALL OF THE WHITE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带着世界去南极

1个面临破产，却自认幸运的女子+1台破电脑+1个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南极之旅
这三者的组合真真切切地实现了，从此改写了8个女人的人生轨迹。

【英】费利西蒂·艾斯顿 (FILICITY ASTON) ■ 著
刘 颖 ■ 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从800多名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最初的团队成员。在挪威的集训是她们将要面对的第一次

P i i α £ 9



巴巴拉，来自加纳，很享受地在暴雪后零下20摄氏度的露营里过夜。（照片由罗伯

£ 9



ψ ă ̈ ă ʋ Ȧ Ȣ ă ‘ Ȧ Ȣ Ȣ Ȣ Ȣ Ȣ

灵沃茨提供)



ă Ȣ Ȣ Ȣ Ȣ Ȣ Ȣ Ȣ Ȣ Ȣ Ȣ Ȣ

利亚，查美乐，索菲亚和史蒂芬。



在去往南极洲海岸出发点的路上，索菲亚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



我们的两顶帐篷是广袤无垠的南极洲冰原上唯一的色彩与活力。我们与世隔绝。



我们在冰原上的家。从左至右分别为：瑞娜，凯莉和海伦。



艾拉的护目镜出了问题。



探险队到达补给站后的合影，你可以在冰雪下隐约看到红色补给袋。从左至右分别为：瑞娜，索菲亚，凯莉，费利西蒂，史蒂芬，海伦和艾拉。



史蒂芬用帐篷里的火炉温暖自己的伤脚。



在冰原上前行。



瑞娜和由自己的呼吸制造出来的冰柱合影。



我们一起向南极点进发，即将到达终点，却忘记先将雪橇从脚上摘掉。



有史以来到达南极点最庞大的女性国际探险队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索菲亚，凯莉，艾拉，费利西蒂，瑞娜，史蒂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6

书名原文：The call of the white

ISBN 978-7-5158-0868-0

I. ①带… II. ①费…②刘… III. ①南极—探险—普及读物 IV. ①N816.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045450 号

CALL OF THE WHITE © 2011 by FELICITY ASTON

Each copy of the Works shall carry the following legend, to appear on the same page as the copyrigh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ummersdale Publishers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Summersdale Publishers Ltd. 授权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2441号

带着世界去南极

CALL OF THE WHITE

作 者：【英】费利西蒂·艾斯顿

译 者：刘 颖

出 品 人：徐 潜

责任编辑：胡小英 邵桃炜

封面设计：周 源

责任审读：郭敬梅

责任印制：迈致红

出版发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1020mm 1/16

字 数：195千字

印 张：16.5

插 页：8面

书 号：ISBN 978—7—5158—0868—0

定 价：45.00元

服务热线：010—58301130

销售热线：010—58302813

地址邮编：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
19—20层，100044

<http://www.chgslcb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010-58302915

序 言

横扫落水

我猛地睁开眼睛，看到头顶上的帐篷已被狂风吹得倾斜不已。脆弱的面料支撑的庇护所就像一叶失去帆的轻舟在飓风中无助地扭动。整个帐篷似乎时刻准备在暴风雨中爆炸，风从各个方向愤怒地撕扯着帐篷，仿佛无法容忍这小小避难所的存在，誓要将其毁灭。我躺在剧烈摇摆的帐篷内无法入眠。风的呼啸声，充满了我的大脑，我只能想到这些，没有其他。

突然，事情发生了变化。帐篷的一边听起来特别嘈杂。仿佛有什么东西变得松散了，我不由自主地拉紧睡袋，紧张地凝视周围，仿佛看到远处帐篷的一角向里鼓起。支撑帐篷的其中一条牵拉绳突然断开，虽然并无大碍，虚惊一场，但我担心其他的绑绳能否支撑帐篷不会倒下。

在南极，一个帐篷不仅是一个避难所，更是一条生命线。没有帐篷的保护，一个人不可能在户外生存下来。我从睡袋中钻出来，希望能找到用来固定帐篷的现成材料。胳膊伸进羽绒夹克的袖子，脚伸进鞋里，当皮肤触到冰冷的衬衣的那一刹那我不自觉地颤抖起



序
言
横
扫
落
水



来。我旁边蜷缩着的同伴们都深深地把自己埋进睡袋里。我能感觉到在这暴风雨的洗礼中大家都醒着，没人能睡着。但是没人愿意动一动，只有我钻出了帐篷。

我强迫自己蹒跚地挪到帐篷外边，在大风中站稳脚步。终于在风中固定好支架，狂风似乎停滞在这里，让我感觉到无比的压抑。我环视着皎洁明亮的南极夜晚，被这刺眼的白雪晃得睁不开眼睛。我被一缕耀眼之光所吸引，那是无瑕的冰雪反射的阳光。南极在夏季是没有黑夜的，反而艳阳高照，太阳绝不会低于地平线。虽然阳光明媚，人却仍然感到相当冷。我用手挡着自己像火烧般刺痛的脸，以保护暴露在外的皮肤。

我们决定把帐篷和一个探险队搭在一起，几百米以外就是他们无数坚固的帐群和用于后勤保障的集装箱。这个探险队将要穿过南极延伸至南美。一个个小帐篷排成长长的队列，好似用自身在丈量大地的长度。我扫视着这支长长的“队伍”，远远望去，这些帐篷似乎变成了云。

我们是提前一天从智利出发，乘坐一架没有窗户的大型货机，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到达这个营地的。我打算待在营地先适应几天，然后通过一个小型滑雪机飞到南极海岸，并在那里开始我们远征南极的计划。

不断翻卷回旋的云好似白色的沙尘暴一般汹涌着，风贪婪地吸食着越来越多的冰雪，透过帐篷，海啸般地朝我翻涌过来。

汹涌的风夹带着冰砸向我的后背，后背顿时肿了几个大包。就在“海啸”临近我的最后一秒，我迅速转过身蹲下来，趴在地上。肆虐的飓风平息后，我站起来，看到远处另一轮夹杂着冰的飓风正以几十米的速度上升着，冰在飓风的作用下发出了好似低空盘旋的

军事喷气机般的轰鸣。我的身体对噪声做出了本能反应，所有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每一个感官都充满警觉，这使我感到万分痛苦。短短几分钟之内，风暴就又降临到我的身旁，我再一次蹲在雪地中，迷失在猛烈的暴风和喷射着冰块的旋涡之中，仅仅几秒钟，我就感到呼吸困难，仿佛置身于水底。

我们的两顶轻型帐篷已经被南极的暴风轻而易举地掀翻了。我发现牵拉绳和锚栓也被深深地埋在雪中，在狂风的冲击下，靴子周围的雪沫坚硬如冰。刚刚修复好的帐篷就像被激怒的狂风，嘶吼着，更加戏剧性的是，它的怒吼似乎不是来自外面，而是从帐篷之内发出的。在风暴的间歇，我把积雪铲到帐篷的一边，不一会儿就堆起了高高的雪堆，尽管如此，我们的帐篷依然受到风雪的威胁。帐篷的震动使覆盖在上面的积雪掉落下来，当我拼命地把雪铲到一块空地时，另一块又掉了下来，使我应接不暇。我召唤帐篷里的队友前来帮忙。一个体态丰满的队友刚刚站在门口，另一阵风暴就像冲击波一般横扫而来，我来不及解释，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在风中打了个旋，逆风蹲在雪地上，随后，雪块愤怒地向我们席卷而来。

阵风过后，我走进帐内，向其他队员发出警告，我们已经看到风暴即将包围我们的帐篷，帐篷很快就会从两边向中间塌陷，所有材料将会像降落伞一样落下来。我们抓着帐杆仓促地爬出帐外，试图在暴风雪中寻找吹落的支撑物，但是已经太晚了，一阵风将帐篷撕开一个锯齿状的伤口，眼前满是断裂的帐杆，散落的扳手，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的避难所就这样被撕得粉碎。

我们很快分拣出破碎的帐杆，以防任何进一步的损失，但即便我们如此挣扎，依然可以看到帐篷破坏的程度，没有人敢想象后果的严重性。我们不能没有帐篷，因此必须修理好损坏的地方。然而修复材料是有限的，我怀疑我们能否拼凑齐所有破损的面料和断





*T*带着世界去南极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杆。即使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找到足够的胶和零件，还是需要足够可靠而且精力充沛的修理工，才能恢复我们赖以依靠的帐篷。毫无疑问，在探险之初，设备的损坏很可能会让我们置身危险之中。我觉得自己的内脏在收紧，面无血色，我充分意识到，在我们的帐篷倒塌后而没有一个合适的替换帐篷之前，探险不可能开始。甚至可以说，在开始之前，探险就已经结束。

CONTENTS 目录

第1章
招兵买马
/ 001 /

第2章
什么是滑雪
/ 021 /

第3章
宠物长臂猿
/ 043 /

第4章
筹经费，办签证，难于上青天
/ 059 /

第5章
背包和雪地靴
/ 075 /

第 6 章
第九名队员

/ 095 /

第 7 章
试 炼

/ 115 /

第 8 章
大风暴

/ 135 /

第 9 章
路易·威登“方便包”

/ 159 /

第 10 章
互相指责

/ 183 /

第 11 章
雪脊之地

/ 205 /

第 12 章
最后的征途

/ 229 /

尾 声
雪波的涟漪

/ 249 /

招兵买马

第 1 章

我站在伦敦市中心交通岛中部的人行横道上，人们从我身边穿行而过。在这下着小雨的清晨，我穿上漂亮的西装赶往办公室。没有人知道，就在前一天，我还在挪威中部，挤在潮湿的军用帐篷的冰冷角落里。简直不能相信，之前两周我的世界完全就是漫天飞雪，却还在教别人如何忍受刺骨的寒冷。

我沿着格洛斯特路走进了位于温斯顿·丘吉尔纪念碑旁的大厦，我坐在四个非常严肃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想带领一支八名妇女组成的队伍穿越整个英联邦，到南极去。

在这个团队里没有经验丰富的探险者，也没有老练的极地探险专家，有的只是平凡的女性，她们希望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去考察的志愿者们。但我的探险计划却不太符合他们的要求，因为，我们的南极洲探险并非主要的资助项目。然而，我还是提出希望他们负担我到8个联邦成员国面试的费用，以便物色到合适的探险队员，组成探险队。在找到主要的赞助商之前，我需要一笔能在初





期助我一臂之力的投资。

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通常我都是信心满满的，但这次我感到很紧张，毕竟我要让这么多陌生的审议员都支持我这个疯狂的想法，确实是太难了。其中有一个小组成员对我说，他是英联邦问题事务方面的专家，然后就陷入了沉默。他认为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审议小组支持我。审议小组的主席们也这么认为，他们的问题让我难以回答。他们很担心我的探险计划将无法给赞助商或其他赞助组织带来他们希望得到的成果。我的计划中必须要涉及一些能够给赞助商带去实际利益的探险项目。我尽力打消他们的疑虑，这在初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使一切变成可能。

20分钟后，我坐在附近的咖啡店里，努力平复我的沮丧。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我参加过很多申请赠款的面试答辩。但这次，出于本能，我已经能预料到结果了。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却没有从她那里得到我想要的同情。“你总是做这样的事情，”她在电话中叹了口气，“再过几周，问题就会解决的。”我放下电话，心情备感失落，这都是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别人才是真正的掌控者。

那天晚上我飞回挪威，重新做回教练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沉浸于练习拉雪橇、钻研如何使用帐篷、运用破冰钻。不幸的是，开放的旷野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幽闭恐怖的地方。鹅毛般的大雪向我袭来，我不得不时刻戴着护目镜，穿上带领帽的夹克，整个人看上去就像被一个大茧包裹着。在那段日子里，我努力提高自己的滑雪技巧，仔细考虑着我的计划。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来自赞助方的拒绝很可能是我的远征计划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我必须战胜。如果这次远征真的是我的理想，那它就是值得追求的，我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敢于接受所有的挫折。即使没有得到宝贵的资



金支援，我也要奋勇向前。

探险是我脑海中孕育很久的一个想法，起源于我的滑雪之旅。当我置身于雪白之间时，很多的奇思妙想总是将我围绕，有的甚至会在我的脑海中存在数周或是数月，虽然最后它们大都消失殆尽了，但有些好的想法却不曾离开。

成立英联邦女性南极探险队，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而像早已经形成似的。我们做好所有计划，让它慢慢成长，逐渐呈现出它的与众不同。早在五年前我开始旅行时，就幻想着总有一天要实现远征的目标。如今展望世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在21世纪，大多数女性也无法对自己想过的生活做出选择。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文化或宗教方面的何种原因，许多妇女仍然被认为是社会阶层中较低一级的成员。这种认知让我感到悲伤和沮丧。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种不可动摇的责任感。我是一个幸运的女性，可以选择我想过的生活。难道我不应该做些事来帮助世界各地的其他女性吗？成立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到南极去滑雪，似乎是一种奇特的反抗社会待遇不平等的方式。它不仅是一趟单纯的旅行，更是一种团结的力量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克服艰难险阻，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我突然想到，这个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所要完成的旅程，其实充斥着男性的英雄气概，这将具有多么振奋人心的意义啊！她们将克服重重障碍，去挑战南极那令人难以忍受的低温。

我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这个计划包括哪些国家的女性，并且一定要找到共同的主题，把彼此联系在一起。我思考着所有可能的组合：联合国似乎太模糊；北约过于军事化和政治化；欧盟缺乏创新的精神；那么，英国呢？我读着50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列表，这是一个有趣的名单，更有利的一点是，2009年正值英联邦成立60周年，



这是推动英联邦探险事业非常有利的时机。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理由：我不得不相信联邦。60年以来，大英帝国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和新兴的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系。对一些人来说，虽然他生存在21世纪，但有些过去尴尬的殖民统治经历一直提醒着人们，我需要撇开无休止的辩论，不去理会什么联邦应该有的政治影响，事情就会变得清晰、简单。

我还要关注其他的国家，但要尽量避免正在经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国家。显而易见，我应该选择相对富裕的地区，如发达的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英联邦国家。

牙买加似乎是唯一一个可以为探险队提供支持的加勒比海国家，那里的侨民非常热情，在牙买加可以看到挂着各国国旗的探险队，尽管探险运动在牙买加并不是很普及，但是那儿却有一个滑雪联盟、一支狗拉雪橇队，他们的雪橇队曾参加过一些国际竞赛和奥林匹克竞赛，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我希望。他们都可能为我们的探险提供支持。

在非洲，我要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加纳以其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稳定的经济和强劲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西非脱颖而出。此外，它是第一个加入英联邦的非洲国家，这一特殊性使其似乎更有优势，加纳将代表非洲，列入选项。

同样，印度是一个对登山运动抱有狂热态度的国家，它参与南极洲的探险由来已久，早在1983年就已经在欧洲大陆建立了研究工作站。

南极洲的一个社团促使我选择了新西兰。新西兰人认为南极洲就是他们自己的“后院”，而且很多人认为，无论参与探险的队伍由谁组成，第一个滑着雪橇到南极的女人都将是新西兰的女人。再

来看亚洲，文莱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三个君主专制国家中的一个（其他两个是斯威士兰和汤加），坚决反对加入英联邦，它也是探险队里唯一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代表。

作为文莱的近邻，新加坡是一个小而富有的多文化交融的国家，代表了共和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多样性。

最后，我们的注意力回到欧洲。欧洲有两个共和国从曾经的大英帝国分离出来，它们就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如果从国家的大小、文化和复杂的政治历史来看，我选择塞浦路斯。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成了彻底的混合体，涉及的国家包括文莱、塞浦路斯、加纳、印度、牙买加、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

我从挪威回到家后，并未对门垫上印有温斯顿·丘吉尔纪念馆标志的薄薄的信封感到惊奇。我很淡定，因为信封里不过是不到一页纸的商业信件。过往的经历教会了我，薄薄的信件代表公式化的回复，因为积极的回复会与带有信心的传单和文件一同到来的。把信封放在一边，我控制着自己的沮丧情绪。我想这就是最后的结果，甚至认为这已经被证实了。我必须找到另外的途径实施我的项目，但是我已经身心俱疲，并且认为没有可能摆脱现在的挫败。我麻木地呆坐在桌旁，打开信封，读着信的第一行，并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非常欣喜地告知你，你被授予2008年温斯顿·丘吉尔旅行奖学金，并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我必须再读一遍信以确认自己已经理解了，事实上我读了三遍才完全理解。我扔下信，像傻瓜一样围着屋子跳跃，嘲笑自己刚才沉浸于好几个小时不能自拔的痛苦中。刚刚那样的痛苦就到此为





止，伴着大笑和跳跃如期而至的是另一个想法，是一种从心底产生的恐慌——现在，我必须把这个天大的想法变成现实了，没有退路了。

我已经赢得了四位审议团成员的信任，同样，压力也随之而来。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已经做完的工作，并且开始列出详细的工作清单，以保持工作可以长久而有序地进行下去。当工作项目的架构逐渐变得清晰时，我感到有些不自信。我总担心还会有什么影响工作：接下来我要花十周时间参加一个北极的探险活动，这个探险活动的意义超过了利用互联网和闲暇时间去做计划。于是我暂时搁置了我的任务列表，不过我清楚，5月份我还会再一次拿起它。

如果我可以随着时间的流转回到18岁，我就会明白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经常这样认为。我在学校认真学习，而且对此得心应手，我从未在某一科目上有真正的偏好。我讨厌决定选修的学科，因为选修让我觉得我的选择范围被人为缩小了。强迫自己选择某一科目是很糟糕的体验，我记得我曾坐在教室里从后往前翻开一本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课程手册。都快把整本手册翻完，我才看到了天体物理学这门课（它是字母A开头）——它是研究星体、理解宇宙的一般规则、了解除我们自身以外的生命存在的学科，是我能想象到的、唯一能在今后的三年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学科。

后来，我去了位于首都中心的伦敦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学生是一件让人感到欣喜的事情，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选择何种职业生涯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回到教室，我思索着一切可能。我喜欢天文学，当我临近毕业时，这种喜欢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我所了解的知识已经到达了极限。我参加各式各样的讲座，深入了解宇宙学和量子力学，这使我的大脑感到崩溃，是该退出的时候了，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兴趣点。多年来，我对英国的南极考察队一直有



一些模糊的认识。我一直认为，到南极洲去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恰逢此时，我得知有一位这一领域的博士需要找一位毕业生担当助理，我异常兴奋，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直寻找的人生新方向。

毕业后我花了两年半时间，在南极半岛上的罗瑟拉站与英国南极调查局一起工作，中间没有间断或休息。罗瑟拉站本身占地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却是英国最大的南极基地，这个站点包含几十间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建筑物。在1985年夏天，这里还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大的基站，直到这年冬天，才成为一个有着20名永久机组成员的固定站点。我负责臭氧和基础气候的监测，这比其他科学更吸引我。虽然和外界切断联系对于我来说很难过，但我依然没有失去对周围景观的敬畏。南极，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庆幸我拥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南极，不仅仅是简单的访问游览，而是真切地住在这里，真正近距离地了解这片土地，虽然它和一切富有魅力的事物一样，美丽与危险并存。

在南极洲，从理论知识到实际操作，我学会了一整套全新的技能。在心怀敬畏的同时，也学会了怎样应对寒冷。我还学会了给飞机补充燃料，通过无线电与外界联系，以及让被水泡过的发动机重新启动。最重要的是，我看懂了人性，理解了领导力和团队的意义。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团队的形成以及解散，看到人身攻击如何在整个事件中蔓延并最终导致大家的离开。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现在，我认为这些经历可以让我自己更有经验来组织和领导团队。

从南极洲返回以后，我一度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能够确定的是，这次我心中的问题依然不会在办公室中找到答案。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我渴望抓住眼前的一切机会。我在英国皇家地理学



会找到了一份工作，组织大批16~19岁的年轻人去探险，并说服两个同事跟我一起参加穿越北极圈的比赛。我们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完成500公里探险的女性团队，活动结束后，我们在16支队伍中排名第六，我们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一年后，我组织了自己的探险队伍，成为第一支穿越格陵兰岛冰原的英国女性团队。我们在16天里行进了560公里，而这段路程通常需要30天才能完成。当到达遥远的海岸时，我们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我们决定滑雪从原路返回，而这段返程路仅用了15天。

从那时起，我结合自己探险的经历，开始指导大家如何在寒冷的天气里生活，包括培训新手参加一年一度的穿越北极比赛。这份艰难的工作有时给我很大压力。尽管脱离了传统的办公室环境，但我发现自己仍然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对着笔记本电脑，来完成日常管理工作。虽然我在一些令人惊叹的地方度过一些时光，但是在这些探险期间，有时一整周都见不到一个人影，还有就是资金的问题。有时候，我会做任何工作，只要能安心地期待每个月月末时可以领到薪水。我曾经多次浏览报纸招聘广告，打算放弃这一切，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不出自己还能做探险之外的什么事情。

5月中旬，我从北极区返回英国时，就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我应该在8月中旬着手组建探险队了。为了组建这个团队，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创建了一个网站，通过宣传，吸纳更多人来申请加入。我还设计了选拔流程，在七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费的面试场地，包括英联邦在内的各个国家的高层也给予了支持。网站开始创建时，我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电子邮件发给网站设计公司，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很高兴地接到了他们的电话。西蒙·米克是一家由两个设计师经营的公司，我的邮件打动了他们。他说：“我很想

去南极洲，但我知道这永远不可能。”他觉得这应该成为人们很熟知的项目：南极洲，一个复杂多变的地方，很多人没有去过，而且永远也不打算去，也正因为如此，那儿会一直吸引着他们。南极洲的存在会给人们些许安慰，因为它总比我们身处的环境更糟。于是，西蒙免费帮我创建了这个网站。

准备网页的内容是实施探险计划的第一项。总体来说，就是把我脑子里的想法落实在文字上。我开始思考网站上要设置哪一类的申请，需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的团队需要哪一种人。我决定尽可能让更多的女性朋友参与到这次探险中来。如果是在旅行者、探险家、运动员、喜好滑雪的人，以及具备极地旅行技能和经历的人中挑选参加者，应该会更简单，可我觉得，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一个把最普通的妇女吸纳进来的机会。而我的初衷是将来让每一个读到我们探险经历的人都明白：这些参与者不过是跟自己一样的平凡人，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实现自己看似大胆或野心勃勃的计划。我把这次去南极探险的活动视为考验我们如上信念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也必须面对现实，因为同时也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首先，团队中每一个成员都要会说英语，因为在这个由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组成的团队里，人们隔着三层面纱，还有狂啸不止的南极暴风雪，多用一种外语去交流将是非常困难的。好在大多数共和国仍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多数人在填写申请时把英语当作首选语言，或者至少他们经常会使用英语。其次，每一个成员都需要保持网络沟通的畅通，因为在去探险之前的数月，我们进行经常性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面沟通不太现实，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效节约沟通成本。探险团队中的女性要有足够坚毅的决心去克服所有不可避免的挫折。同时，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我可以很快地了解团队中成员的情绪。





最后，我选定了申请表格的格式，申请表只有五个问题：

1. 你为什么想参与探险活动？
2. 如果有的话，请简要说出你的户外运动或探险活动的经历。
3. 在团队中，你还有什么其他技能？
4. 你怎样描述自己？
5. 想要添加到申请表中的其他内容。

表格中，并没有对人们的年龄和样貌做出任何要求。我特意在表格中设置了开放性问题，以便给大家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写下她们想要说的。在网页试运行期间，西蒙本人通过网络给我发送了一份申请。奇怪的是，这并不是我收到的唯一一份来自男性的申请。

2008年6月30日，网站开始正式运营。在剩下要做的事情中，建立播客是第一要务。通过自我介绍、对这次探险活动的介绍，以及对这个项目所蕴含的意义的阐述，播客可以帮我定下整体的基调。我清楚什么是自己想要去传达的，我所需要的就是把它们用文字表述出来。我在屏幕前坐了数小时，在快要忘记内容时，偶尔疯狂地快速敲打几分钟键盘。最终，我获得了一些令我欣喜的东西，但又不是十分肯定。

对于申请表中提出的五个问题，仅有一个人的答案令我很欣慰，他就是保罗·迪根。保罗是一位登山家，曾经三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同时，他也是一位探险队长和备受赞誉的旅行作家。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我还是个为准备一次穿越北极的比赛而辞职，同时又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26岁女孩儿。保罗耐心地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话里跟我谈论我的计划，并且给我提供建议，帮我建立信心。他对我要做的事情从来不表示怀疑。保罗会问我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挑战我的想法，豪不留情地指出我的优柔寡断。即使这样，在第一次通话后的五年里，我一直和保罗保持着

联系。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我提出的问题和想法，从来没有吝惜过他的时间。保罗总是迅速地回复我的播客。“这种精神是我一直期望在探险书上读到的，而不是在探险播客中。”保罗回复道。

“这不是潜在的探险申请者需要听到的。”保罗一定是正确的，同时，他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意见。为了提高这个探险计划的水准，我必须清楚地了解人们对我有怎样的期待。不管我是怎样认识自己的，我必须拿出人们需要的、能够领导这样大型项目的姿态，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对我有信心。我删除了自己在播客上已经写好的东西，从头重新写：

八个人滑雪穿过冰冷的无人居住的大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相信，答案是：很多。

虽然只有8名从英联邦国家挑选出来的妇女参加这次南极之旅，但是我们代表了2亿人，代表更多的人会理解我们的团队精神，会支持我们，并且会关注我们在南极洲的全部进展。如果让我们去和别人分享经验的话，那就是灵感，以及敢于追随自己梦想的勇气。英联邦妇女组成的南极探险队的意义将远远超过一次单纯的冒险，它将成为一种力量——变革的力量，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的徒步探险不能解决世界饥荒或全球贫困，也不能扭转全球变暖或防止气候恶化，但它可能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转变人们的生活态度。

我面试英联邦女子南极探险队员时，不会寻找最有运动能力的，不会寻找最有成就的、最有广泛游历经验的，我将寻找最能给我启发，最能始终如一地走自己的路，并超越别人期望的人。你是我要找的人吗？也许之前你从来没有想过前往南极，或者，这一直是一个梦想，但你从来没有为实现它做出任





T 带着世界去南极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何尝试。无论哪种方式，希望这个机会已经引起了你的注意，所以你必须做的就是在网上填写申请表。我期待着您的来信，也许，新年的某一天，我们将站在一起，在南极，在南极洲的中心。

我按下按钮保存了邮件，随即出现了这样的提示：全部的设置已经呈现在网络，并对任何人都是可见的。这是个很奇妙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掏空了，如同我允许全世界窥视我的秘密一样。我有种想法，想把刚才所有上传到网络上的东西都撤回来，那样它们就还是我自己的，不会受到任何批评与质疑。但是我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并且因此异常兴奋，那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可以读到我的计划了。一想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浏览我的网页，我就感到很兴奋，但是我还要做的是让人们知道这个网页的存在。于是我写了一份新闻稿，并把它放到七个目标国家的大型媒体和报纸上。通过在网上搜罗新闻编辑室的电子邮件地址，我发送了几百条信息，每天早上我都满怀期待地打开电子邮箱的收件箱看看有没有收到申请，结果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我收到唯一的一个回复，是来自于塞浦路斯的一个国家广播台，他们想在一个早间脱口秀节目通过电话连线采访我。几天后，我等待着广播直播的电话连线，传入我耳朵里的声音像冰一样冷。在播放了一曲合唱之后，一个漫长的访问开始了，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解释我的探险计划：我所寻找的队友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听众应该怎样申请。这个访谈起作用了！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收件箱，发现里面有四条新消息，而且都是等待加入探险队的女性！我像孩子般尖叫：我等到了自己的首批申请者！我打开列表顶部的信息，上面写着：

姓名：尼基

国籍：塞浦路斯人，新西兰人

职业：作家

请解释为何你想参加探险队：

这是星期日早上11点30分，我拿起报纸，开始了漫长的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一篇报道完全由女性组成的探险队将穿越南极洲的文章，我感到自己的胸口在不断地起伏。是的，就是它！我完全肯定地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跳到电脑前，快速地浏览着网页，最后终于看到了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下子涌入我的大脑。从我在塞浦路斯一个寸草不生的山上跟从祖父一起生活的最初记忆，到我五岁时前往新西兰的一次航海旅行，再到一段充斥着旅行、探险、美好、艺术的激昂生活。虽然，出于爱和责任，我最终回到了塞浦路斯，但是我领悟到：人生的旅程绝不是直线的，而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一直前行。我想要跟随内心的声音，这就是我。

你是怎样描述自己的？

是高兴的，也是充满信心的。在所有人眼里，是充满幽默感而且富有同情心的。

你有想添加到申请表中的其他内容要补充吗？

见见我。

尼基听起来很棒。有一秒钟我甚至怀疑，这第一位申请者会不会就是我将选中的第一个队友。在随后的日子里，各种申请信件接踵而来。我仔细地阅读着，很显然，申请者们都把她们自己写得有些夸大，而且资金雄厚。她们不知道，这一切的背后，只是一个平凡女人所拥有的一个宏大想法而已。





环视一下我的办公室，这空气混浊的房间里，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电脑放在杂乱不堪的电脑桌上。我无法摆脱罪恶感，仿佛一切只是我设下的一个大骗局。我生活和工作在北海岸的肯特，与我的男朋友彼得共享一个两室一厅的房间，我占用了一间卧室作为工作区域。我的办公室已经褪了色，墙上木片脱落，周围的边边角角布满了蜘蛛网，宠物的尿迹随处可见。我就坐在这样的工作区里，上瘾地阅读着每一封申请书，原来偷窥一位未曾谋面的女人的生活和内心是很令人着迷的事情。我带着满腔的诚意，去揭晓她们的答案。

一位来自印度的律师在文章里写道：在我争取女性权利的工作中，我发现，女性根本没有机会做探险家或是旅行者的梦，她们也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走的路。这将是十分富有成果的一次探险，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使女人们去看清她们自己，干出一番作为来。

另外一份同样来自印度的申请函则写得很简单：这次探险也将提醒所有父母，和儿子一样，他们同样可以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

申请人和她们的故事让我觉得自己很惭愧无能。我要选择的人会是谁呢？我想向她们所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但这却是不可能的。有的申请函的书写方式近乎于作诗，我经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到目前为止，这次探险是我自认为最有动力的探险，现在我有新的灵感：我不得不为了这些女人们而发起这次远行。虽然可能只有少数的申请者能加入团队，但事实上很显然，这个远征队将发生的一切对于每个人都极为重要。这些申请者现在变成了我的动力之源。

在学校里，我是一名杰出的足球和排球运动员，不过，



我并没有得到过财政上的津贴，我也从不幻想别人对我有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我下定决心要与这不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不平衡发展的教育事业抗争到底。我领导着一个女生跑步俱乐部，由14~18岁的混龄少女组成，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去上学，因为她们的经济状况不好。我想教育的重要性莫过于健康教育和体育教育，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愿意实现你的梦想，我的俱乐部就可以帮助女孩点燃激情，为她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艾玛，加纳

我是乳腺癌患者，并接受了手术治疗、化疗和放疗，一切都很成功。我现在是自由的，我比以前更健康，体力更充沛。我在塞浦路斯探险时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就被这一令世人惊讶的想法所吸引，我彻底被折服了，这将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罗西，塞浦路斯

我生活在印度东北部美丽迷人的梅加拉亚邦西隆市卡西部落（属于母系社会），这里紧邻孟加拉国。这里是印度东北部最偏远的角落，经常发生叛乱，主要是有人认为印度是个落后的地区，从不正视我们，因此，我很想向世界证明，我们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都是友好的，渴盼和平的，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是善良的人。

——莎拉，印度

随着信件的纷至沓来，我开始给各国的大使写信，希望能细化



我的队伍，并请求召开一个会议。我希望各国的媒体能够参加，这样可以得到对我们有用的信息。不过，各国的反应差异很大。

印度大使给我留下了很有趣的印象（他的名片上只有一个印着“部长”头衔的大写黄金钢印），当我告诉他，在远征之前我已经辞职了，他摇摇头，对我说抱歉。我又会见了新加坡的第一书记，但是他似乎觉得这次探险是一个阴谋，是批评新加坡政府的，他也没有支持我。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也没有收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回复，我打电话过去询问，总机处的一个高级事务专员告诉我，信件已经收到了，我有点吃惊，但是他并没有读，我通过他的新闻官知道了几个媒体，以及几个部长的联系方式，他对我说他们有可能对我的项目感兴趣。在同一个礼拜内，我收到了新西兰的回复，虽然新西兰大使认同现代英联邦的生活价值，但仍遗憾地告诉我，新西兰政府在这个阶段不可能给予我的探险队以支持。

经历过各国不同的反应后，我不再指望什么了。突然，有一天我在伦敦收到了牙买加高级委员会专员伯切尔·怀特曼的邀请。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工作过，而那里与我在同一条街上。他一天联系了我两次，在工作时，我经常可以看到牙买加的国旗在砖红楼梯上飘扬。我感到既吃惊又兴奋，我高兴地去了大使馆和高级专员公署。一个留着花白胡须长着大眼袋的负责人坐在茶几前边吃饼干边对我说，如果我们可以为他们国家提供更多的文字宣传，他们愿意和我合作。于是，我们谈论了我的计划。有时，他感到惊奇，有时，又不相信地摇摇头，始终面带微笑，最后，他指出南极的海拔超过牙买加两千英尺，牙买加人更习惯于零上30℃，而不是零下30℃。当我讲完后，他端起他的牙买加杯子和碟子，抿了一口。我忍住起身的冲动，继续解释。



“牙买加人是喜欢冒险的人。”他最后说：“我记得有一个人来见我，说服我参与一个运送医疗物资到偏远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项目，他们开车到达了那里的一个小诊所，惊讶地发现，那里只有一个牙买加护士在工作。所以可以看出，牙买加人随处可见。”这位负责人给了我一张单子，并把我介绍给他的新闻专员，答应我在牙买加媒体上为我的探险队做宣传。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我可以证明伯切尔·怀特曼是我们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

而直到此时，我却没有得到英联邦的任何回复消息。最后，我写信给英联邦秘书长卡姆莱什·夏尔马，他的回复是令人鼓舞的。他写道：“对于你为这项远征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谨向你表示支持和衷心的感谢。”

到7月末8月初之际，我唯一的真正的问题是，网站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从网络上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这让我感到很吃惊，甚至让我怀疑它的可行性。我一直相信我会找到一些有足够精神力量和决心的妇女，难道我错了吗？于是我加大了宣传力度，而且在接受两个重大媒体采访时得到了回报。首先是在凌晨播放的新加坡电台节目，这个节目的主要听众是那些上班族，我希望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但这意味着我必须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接起电台打来的直播电话。我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起来准备，所以将闹钟定在了凌晨2点50分，这样我的声音听起来就不会像是刚起床的样子。当闹钟响起的时候，我起来冲了一杯茶，希望它能欺骗我的大脑相信现在已经是早上了。

我凝视着外面黑暗、安静的大街，一边喝茶一边等着电话。当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甚至笑了出来，我接起电话，似乎看到主持人就站在我的面前。当她采访我的时候，从她的声音我可以听



出来，虽然故事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她仍然不敢相信竟然真的有人想要去南极探险。显然，我才是这一天最“古怪”的故事。在广播中，我被问到在一望无际的地方连续几天滑冰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开始回答，在漫长的探险活动中，找一些东西去想是很困难的，有时候我甚至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脑子里该想点什么。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是在闲聊，于是，我停止了谈话。这时候，主持人开始插话进来以填补这突如其来的沉默：“哦……除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外，你还在寻找哪类人呢？”

对于她的提问，我试着给出一个巧妙而有趣的回答，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令人费解而语无伦次的话语。“毕竟，我从来没有领导过像这样的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开始胡言乱语。我难以想象这些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的话听上去是那么地愚蠢。当主持人全神贯注于此次访问时，我正双手抱头坐在那里。我估计听了这次访谈，哪怕这世界上还有唯一一个想要让我领导的人，无论她身在何处，也会逃之夭夭的。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国家广播电台宣布：我将乘坐一个由烟花点燃的水壶向月球出发，还有人愿意加入我的团队吗？

第二个访谈受邀于总部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家报纸。我坐火车到伦敦市中心，去南方银行街的一个很多人很多的咖啡馆与报社记者见面。他把一个小麦克风夹在我的衬衫上，然后问我为什么决定组织这次探险活动。我觉得在接受采访的紧张和压力下，自己可以说出一些睿智而意味深长的话语。但实际上，组织探险活动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我只是把几个枯燥无味的句子堆放在一起。我感觉报纸记者怀着失望和迷惑的情绪离去了。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明显不相信坐在他面前这个做着白日梦的、野心勃勃的女人可以组



织探险活动。“你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做后盾吗？你有一个宣传人员和网页管理者吗？有可以与英联邦秘书处、英国理事会和海外政府联络的高水平联络员吗？”“哦，没有。”这里只有我和我一天24小时在线的电脑。

我离开咖啡馆，穿过了亨格福德镇桥，踏上了回家的路。半路上我停下来，面朝伦敦的方向，感到了深深的失落。当我站在泰晤士河畔看着一幢幢摩天大楼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下周要处理的事情。在随后的六天中，我如期踏上了去七个国家面试的旅途。目标国家一个一个进行，每个国家只有一周的时间。

塞浦路斯是我的第一个目的地，但是在那里我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地方举办一次访谈。我从塞浦路斯到了加纳，但是那里仅有三个申请。印度和新加坡是下一站，我已经做好了大部分安排，在飞行途中，我还接受了关于南极洲的几次访谈。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要去文莱，在那里我同样没有住的地方，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在新西兰，我没有集聚地去举办访谈。在牙买加我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申请，而且也没有地方待。关键是，我没有钱了。我已经透支了两张信用卡，而且也没想出任何好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我最后结束旅行回来时，我要怎样维持生计？为了组织探险计划和招募有意愿参与这次探险的人，我没有时间去赚钱谋生。生计是个大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懒懒地待在旅馆里无事可做。正当我准备喝杯咖啡来打发无聊时光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寄来了一个邮包。邮包里面是罗伯特·斯万写的一本记录他在1989年带领一支8人组成的国际探险队前往北极探险经历的书——《冰川前行》。虽然没有留下发件人的姓名，但我已经猜到一定是我的精神导师保罗·迪根寄来的。这本书对我而言来得正是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读了起来。



T 带着世界去南极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罗伯特·斯万的探险之旅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首先便是资金的严重短缺，使得他不得不先去寻找更多的资金赞助。另外，尽管罗伯特的探险队由一些有丰富经验的队员组成，但是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时他们已经到达冰川，有一个队员总是在不断地挑战他的领导权威。看到这些关于领导一个探险队将遇到的重重困难和险阻，我似乎明白了保罗·迪根寄给我这本书的真正意图。尽管事后我回忆起来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对我的警示，但在当时，我却只会把它当作对我的一种激励。既然罗伯特在20年前都可以克服诸多困难，带领探险队进行北极探险，那么20年后的我一样可以做到。于是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翻看工作备忘清单，我记得上面有这样一段被我着重记录的话：“这似乎会重燃我的兴趣，用实例去展现，在我们的星球上用高科技手段去探索自然只是一个方面，我们人类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去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挑战自我，去探索自然的奥秘！”

什么是滑雪

第2章

塞浦路斯

抵达了塞浦路斯，我刚迈出机场就被一股热浪击倒。坐在开往首都的公交车上，看着窗外炽热的地中海景色飞驰而过，我努力想保持清醒。公交车被太阳的炙热包裹着，车辆颠簸着，同伴们纷纷睡去，使得我也困意朦胧。安全抵达预订的酒店，傍晚的时候我决定出去，迎着清凉的微风跑跑步。太阳映射着白色的天空，蟋蟀的叫声回荡在空中。我们住在尼科西亚郊区深处一家很小的家庭式酒店里。被父亲管制的儿子坐在柜台后面，我问他哪条路适合跑步。

“嗯，如果不太过分的话，”他指向右边，“否则，你需要用到护照。”此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因为他又加了一句，“土耳其就在那边，所以不用跳过任何的铁丝网。”

跑到这条路的尽头，我终于明白了他这话的意思。高高的白墙，布满了卷刀片似的刺网，走过的路边两侧草坪被整洁的石块点





缀着。左边矗立着瞭望塔，更远处则是一幢竖着天线、貌似属于官方的建筑物。我转向右边，沿着白墙一直跑。终于，被缓冲区内的护栏挡住。大片的瓦砾散落在灌木丛里，生锈的碎片和废弃的房屋，这是塞浦路斯复杂的政治历史的实物证据。

1974年，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塞浦路斯北部三分之一的岛屿，战争持续了几乎一个月，但留下约20万人流离失所。虽然政客们数月都在争论土耳其行动的有效性，随后几年时间，一条绿线划过首都尼科西亚中心，切割权问题变得根深蒂固。尼科西亚至今依然是欧洲唯一被分裂的首都，一条绿线把一堵墙和一片无人地带一分为二。这件事在塞族人心灵上留下的疤痕比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更深。你不必在尼科西亚待很久，就能听到底层人民发出的怨恨声，并且把这种无尽的愤怒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如果这一战斗是30多年前已经停止而不是在上个星期，该有多好。

我的第一次会议安排在塞浦路斯的外交事务部，英联邦事务主管干事在接待处与我相遇，当我们穿过办公大楼时他就开始对他的办公室环境连声道歉。“我始终在道歉，”他坦言，“因为这里一直很凌乱。”他把我领进一间比我的工作室更像垃圾房的房间，我在一张小小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环视四周，固定在墙上的告示文书随风飘动。我开始向他描述这次探险。他倒是很热情，但也比较困惑，不知道能帮到我什么。我想知道的是，从他那里是否有获得资金的机会，但首先我需从塞浦路斯总统那里得到支持。

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公务员说他可以亲自写这封致总统信。如果总统喜欢这样的探险活动，他就会在上面签字，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我不是说我有太多工作，”他开始说，（尽管我怀疑他所说的意思是他有太多工作要做）“并且，我没有说这件事不重要”

（也许他的意思是他有太多重要的事情去做），“但是英联邦在我

们的优先权名单中并不是排名靠前的。”我正在思考，作为负责英联邦事务的公务员，他的表述很有讽刺意味。他透过眼镜凝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叹息着表示要放弃，把这堆材料从桌子的一端移到另一端，好像在寻找什么。我猜想，他肯定为了腾出地方来工作而花费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去移动他办公桌周围成堆的材料。“我需要知道你选择的候选者的名字，”他说道，继续移动着材料，“并非因为他们是赛岛土族人，”他匆忙说道，“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你写一封推荐信。”在移动了好几摞材料之后，他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一个记事手册，然后，他开始起草给总统的信。当我们遣词造句时，我觉得有些许的欺骗性，而这并不是我希望的情况。在这次会见就要结束时，这个公务员承诺道，只要有可以利用的资金就会通知我。我还能奢求什么呢？他很年轻、忙碌，而且有工作压力。

如此的会面让我觉得心里很没底，我回到旅馆，开始准备接下来的面谈。尽管在塞浦路斯采访开始得比较慢，但媒体针对这次探险活动所报道的内容还是很充实的。最终的结果是，我在塞浦路斯收到了85份申请。我计划的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包括十位候选者的名单以备面试之用，但是我发现，决定谁入选这个名单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大部分申请者都表示她是多么想获得这次机会。我非常内疚，因为自己不得不让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离开。第一轮挑选是比较主观的，她们在申请表中必须有能打动我的内容，必须有一些观点让我认为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我认为的热忱和追求。第二轮面试是很残酷的。我要寻找有明确动机的人，不是为了名利或一时头脑发热而想去南极洲的人（比如非常渴望去看企鹅），我非常肯定的是，有很多申请表中明确表示想去南极滑雪。但是面试只是困难开始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数月的训练、书写建议书以及媒体的电





话采访。我需要的是对于平凡工作不退缩的、有实际能力的人，她们要有强大的内心，能够克服不可避免的艰难险阻，并且不觉得这工作单调乏味。我非常感激在作出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不是孤单一个人，我已经招募到了一群朋友来帮助我，他们拥有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探险知识，因此，我对他们的观点非常信服。我能通过网络来与每一个国家的成员沟通，分享他们的想法。在塞浦路斯我最终确定的候选人名单里，包括一位希望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滑冰冠军，一位负责清理海岛的志愿者团队的领导者，一位塞浦路斯国家青年管弦乐团的成员，和一位塞浦路斯世界拉力赛冠军协会的经理。

我打印出每一份申请表，为了方便查询，在我的记事本上用大写字母排序列出一份清单。她们的身体条件是否能够完成远征？她们有足够的信心来完成我们的筹款吗？她们有能力完成最后的宣传吗？其他女性能对她们有所认同吗？我能跟她们同住在一个帐篷里六个星期吗（最后这一点被称为“帐篷测试”，它是最重要的标准）？可是不论我怎么想，这个日子还是来到了。不管我有多少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在每一个人接受完采访之后，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候选者们终于聚在了一起。

于是，我决定在春天的时候在挪威组织一次培训活动，从每个国家各选择两名女性。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可以看出她们是否能够很好地协同作战。这样，我就可以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最好的一队人马。

塞浦路斯大学很热情地答应借给我一个会议室用于采访。我准备用45分钟的时间来对每一个受访者进行测试。然后在一天的采访结束后，决定让哪两名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加入这个队伍。

第二天是一个重大的全国性的节日，城里显得很冷清。首都



尼科西亚的人们收拾行装前往海边或山上享受清凉的空气。我乘坐出租车到达一个用玻璃和钢筋建筑的现代化的空旷停车场。塞浦路斯大学的门是锁上的，里面看起来没有人。我往里看了看，发现了一个小的办公室，我敲了敲窗户，里面的人吓了一跳，惊讶地看着我。他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想告诉我这里已经关闭了。然后他又跑过来，隔着玻璃对我说：“封闭，封闭。”我对他解释说：“我是来用这里的会议室的。”“关门了，全都关了，里面没人。”他还是坚定地重复着。他是一个肥胖的老人，因为我觉得男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有一个华丽凸起的肚子。他脚上穿着凉鞋，露着脚趾头，下面穿着一条皱巴巴的裤子。虽然天气很热，可他还是在蓝衬衫里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很明显，他一心只想让我赶紧离开。我把邀请函递给他，然后看到他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看样子他十分不愿意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的大节日里给我这个既陌生又麻烦的英国人开门。

很奇怪，我并没有强迫自己做什么事，我在大学会议室里准备面对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史蒂芬，她是第一个抵达的候选人，她很随意地穿着一件马球衫，深色的长头发挽成一个马尾辫并且不施粉黛，就像她刚参加完曲棍球比赛。我觉察到她是鼓足勇气来的，我被她的旺盛精力和热情所吸引。她说话时很夸张，很开放，就像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很快就发现我被她的幽默和笑容所感染。

在史蒂芬之后，雅典娜进来了，她穿着得体，说话轻声细语，明显感到很紧张，她一直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入围了。她被审议通过的应用写得特别周全，更重要的是，她是卫星通信专家。在一个探险团队里，这是非常有用的技能。在筹备这个远征队的时候，她正是我一直想要找的女人。她可以为整个团队提供许多东西，可她自己却看不到这一点。我知道要她加入远征队就要增强她的信心。然



而，她的动机是出于爱国主义情结而不是关于个人的发展。听到塞浦路斯播报的新闻，她解释道：“你会觉得每个人都认识了我們，但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们不会真正地了解到这里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这里已经被占领了。这次探险将是让他们都知道塞浦路斯岛屿的机会。”

下一位面试者是桑德兰，她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申请的提交者。对我来说，她的申请尤为突出，不仅因为她来自塞浦路斯。我们的谈话很轻松，她对于这次探险的想法很合我意，我能想象得出她在团队里的表现，我和她将成为知己，她也会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我不确定塞浦路斯的女人是否能够和在其他地方长大的人一样被认同。虽然桑德兰家世代代都是塞浦路斯人，但她听起来就像一名新西兰人，因为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新西兰生活。

莱尔是十位候选人的最后一位。她是塞浦路斯搜索和营救队的发起者，但是她发现，要想说服人们加入塞浦路斯搜索和营救队并非易事。“塞浦路斯的人们喜欢舒适的生活，”她说道，“要想让塞浦路斯人的目光从他们的房子、家庭和车移开，是很困难的。塞浦路斯需要一些像这次探险活动一样的事情来唤醒他们！年轻人不独立，他们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结婚。一些年轻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公寓，但他们还需要父母出一定的生活费。女性结婚生子后，就要做全职太太。状况就是这样！”

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惫。这一天非常漫长，但是最难熬的时刻还是来了。在这一天快结束时，我必须给每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方面因为我不想给候选者带来没有必要的拖延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因为候选者的挑选都是凭我的直觉，而直觉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我经过多久的深思熟虑。现在我手上有了四个清晰的竞争者，她们是史蒂芬、阿西娜、莱尔



和尼基。尼基是她们四个中我最喜欢的人，但我担心她的国籍问题——这个担心非常必要，却看起来很怪诞。随后，我去拜见外交部的主管干事，他问我是否所有女士都必须是塞浦路斯人。当我肯定地告诉他所有女士都要是塞浦路斯人的时候，他似乎很吃惊。

“这个人就是新西兰人！”他说。我发现他指的是尼基。我试着向他解释，尼基是塞浦路斯人，只不过她在新西兰住过一段时间。他摇着头，同时向我摇着手指，好似节拍器一般。我耸耸肩，只能认同他的观点，不过他的反应也正是我最害怕出现的。尽管我还没有承认这一点，但是在我心里，已经明确地知道不能选择尼基了。

回到旅馆，在太阳余晖的映照下我享受着习习清风和冰镇啤酒，重新读着其余三位候选人的申请。我肩负着挑选候选人的重大责任，而能否挑出合适的人选关系到这个探险项目能否最终成功。从见到史蒂芬的那一刻起，我就对她很有信心。阿西娜是很有责任心的、细心的，并且考虑问题很深入，但我认为她对这次探险活动缺乏决心，对这次探险无可预知的非生理的极端情况，她不一定有足够的决心去面对，尽管我对她能够在极地滑冰这件事毫不怀疑。我对每一位来面试的候选人承诺过，我会打电话通知她我的决定。当我拿着电话坐下来时，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承诺她们的是通过邮件通知而不是电话。当时考虑到她们因为面试而遇到的麻烦，我觉得一个亲自打去的电话也许能让她们得到些许安慰。我把容易的事情放在前面，先打电话给入选的候选人，告诉她们已经入选的好消息。阿西娜试探性地接起了电话，她一直在盼望着我的电话。

“我认为你将会是一位非常卓越的队友，因此我真心地希望你明年能来挪威，”我解释着对她说，“你想来吗？”电话的另一头充满迷惑，并且陷入了一阵沉默。“你是选择我了吗？”她最后问道。



“是的。你和另一位来自塞浦路斯的女士。我希望你们两个来挪威，参加这个团队的竞争选拔。”“我简直不能相信你能选我。你确定吗？”我忍不住大笑，但是我能听到她声音里流露出的情感。我非常肯定她已经泪流满面，与阿西娜的不敢肯定形成对比，史蒂芬的反应没有任何犹豫。她充满兴奋的尖叫声瞬间爆发出来，充斥着我的耳膜。史蒂芬欣喜万分，得到消息后马上挂断了电话，我知道她是去跟家人分享这个好消息了。

现在，阿西娜和史蒂芬两人都同意来挪威，我会从这两个人中选择一个。第二天我在这个城市的咖啡厅里见到了她俩，这两个女孩一到那儿，就开始接受西格玛电视台的采访，之前我已经安排好了。另外还有《塞浦路斯周报》——岛上最大的报纸之一派来的记者为她们拍照。我能看到所有这一切带给她们的惊喜。当她们坐在那里等待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懂得她们脸上的表情，我知道她们是怎样的心情，媒体是令人兴奋又令人生畏的。相机焦点对准你的时候，你是很孤独的。虽然这时候你有逃跑和躲藏的冲动，但你要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可紧张的。记者走了以后，我们坐下来谈了谈下一步的计划。我很有兴趣去了解她们要做什么，那样我就能直接解决问题。“你们在竞争中相互影响着，但我希望你们别只看到这方面。在到挪威前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你们需要彼此支持才能到达那里。”

即便如此，我还是察觉到她们之间有轻微的摩擦。当然她们的性格完全不同，我认为虽然阿西娜并不认同史蒂芬的博学，但史蒂芬可是随时会与其展开竞争的。在我们等待吃晚饭的这段时间里，我给她们讲了我在外交部与主管干事的会面。当她们两个说那天早上接到他的电话，要求她们把护照副本送过去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看来他在候选人国籍方面显然是不会冒任何风险的。

我们的谈话被她俩的手机来电打断了，她们接到一封邮件和一个电话。“这次采访必须作为新闻播报。”史蒂芬说。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电话的内容，闲聊很快勾起了她俩的兴趣和联想。

“我表弟和他的家人都坐在花园里看着大电视，”在两通电话的间隙阿西娜说，“突然，我出现在电视中，我都能想象得到他们的尖叫声！”两个女人异常兴奋，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我真不愿打破这种和谐，因为将来她们中只有一个能前往南极。

我们三个人互相分享着更多关于这次探险的信息，但信息太多，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个晚上，直到午夜我才回到酒店。一小时以后，我又坐上了开往机场的出租车。这个出租车司机是个英国人，我们聊起了这个探险队。“你已经找到了两名塞浦路斯女孩儿吗？”他问道。当我很确定地点了点头时，“真的？”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又问了一遍。“我很惊讶她们是否真有那么优秀，”他说，“塞浦路斯人更喜欢她们舒适的家，我不相信她们会喜欢去那么艰苦而寒冷的地方。”“我希望我找到例外者了。”我回答。当我到达机场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尼基打来的。我对她感到非常抱歉，她原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队员。我知道我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但我还是很遗憾没有机会去更多地了解尼基。

加 纳

无尽的房屋及房顶在我眼前一扫而过，我们的飞机在非洲落日猩红色的余晖下，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我坐在出租车上（开着窗，音乐大声放着），驶离机场。大街上，拥挤的行人在攒动，成排的车密密麻麻。我看着加纳，难掩微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天色很暗，我很疲惫，但是这里的空气很温暖，也很柔软，这里的一切都





让我感觉没有压力。我一直对加纳充满了不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每一个听我提及这次旅行的人都疑惑地问，“你要自己去吗？去非洲？”

那些曾经真正到过加纳的人告诉我，我一定会爱上这里的，这让我对这次旅行的一切充满信心，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出入境的官员热情地与我握手并代表个人欢迎我的到来，机场的搬运人员帮助我穿过人群到达外面的大厅，并拒收小费，还友好地轻拍我的后背。出租车司机也会亲切地和我聊天。

我的酒店就在岸边，一踏出出租车，就听到了大海的咆哮声。第二天，我追随海浪的声音到了岸边。放眼望去，沿海的公寓楼和沙滩一起延长到雾气蒙蒙的远方。所有的地方都模糊不清地笼着一层薄雾，模糊的地平线，隐约可见的海岸线。两个男孩跑过来向我打招呼，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在海水里玩儿起来。一个女人坐在干净的树桩上分着盘子里的面包，在她的指引下，我随意地漫步着。在水天相接的地方，许多颜色鲜艳的渔船互相紧随。我独自站在岸边，美景尽收眼底，一种情绪涌现上来。眼前的事情让我确信，我身在非洲。

在漫长的午夜航班上，加纳的一切让我无眠。在加纳我只收到六份申请，其中两个是住在英国的女性（尽管她们后来没有入选），还有一个则完全不清楚她所申请的是什么。我已经邀请了剩下的三人进行面试，但只有一个人回复我。仅有一名候选人，这让我觉得很尴尬。也许所有的坏的打算都是对的，探险的计划对加纳人来说有些遥远。或许我应该忘掉这些面试，把时间放在找到更多应征者上，我应该离开这儿或者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不打算放弃加纳。早餐后，我装好笔记本电脑、手机、笔记本前往阿克拉，那是英国领事馆所在地。



在短暂的等待后，我被带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去见戴安娜，她是通信科的管理人，以及朱丽叶，她是财政科的主管。她们都很优雅，我向她们描述了我将进行的探险，以及我想要找到合格的参与者，我还告诉她俩我在加纳的媒体宣传失败了，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朱丽叶表示出些许的怀疑，说：“你认为你会找到愿意去那里的加纳女性吗？”在我回答之前，戴安娜说：“当然有人愿意去，我就愿意加入。”朱丽叶睁大了眼睛说：“你愿意？”

我必须承认，看着戴安娜修剪完美的指甲和精心打理过的头发，我感到有些惊讶。她说道：“我真的不是一个辛苦生活的人，但我十分喜欢这个想法。我觉得如果有更多女性听说这件事，都会想去的。”

这是在加纳获得新闻关注的一个关键机会。戴安娜给了我一份媒体联系人名单，并且给我许多她私人拥有的在其他文化机构领域里的新闻稿。朱丽叶提醒我说这很难吸引她们的注意，现在阿克拉的政治局势十分严峻，我们必须在两个月内找到合适的候选人，而且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今天就要开始了。我认为时间上还有富余，但朱丽叶却很不乐观。

朱丽叶与戴安娜之间的意见分歧是我能想到的典型反应。首先，人们对极地旅行的看法是两个极端——要么去做，要么认为这完全是一件疯狂的事。此外，人们似乎都怀有一个很强大的观念，就是女人做这种事情显然不能胜任。在塞浦路斯，每个人都很惊讶我能够收到多达85份来自这个国家女人们的申请书。在加纳，人们似乎同样怀疑加纳的女人们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我开始照着戴安娜给我的名单打电话，但是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预约面谈被安排在两天后，但今天已经星期四了。即使记者想刊登我的故事，它也不会当周被及时发表出来。我只有希望



《加纳时报》能在星期五把访谈内容公开发表出来，这将意味着说服记者在他们的报刊截稿日前的那个下午把文章写出来。《加纳时报》可是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报纸，我得试一试。在尝试了几次拨打编辑部电话毫无结果后，我决定亲自去往报社。我跳上一辆知道《加纳时报》办公地址的出租车，司机把我放在一个破旧的大门前，周围有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在闲逛。我犹豫了片刻，特别有跳回车里从所有盯着我的人们眼前逃离的冲动。但我还是尽可能自信地走到大门前要求见编辑。我预想到守卫会让我离开，所以在脑海里想了很多理由。然而他很随意地叫来正在院内徘徊的小男孩，让他领着我穿过被低矮水泥建筑物包围的昏暗的院子，来到了编辑办公室。徒有四壁的房间内摆放了几个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这里的空气厚重得难以呼吸。四个穿衬衫的人坐在他们的办公桌后：一个正在很大声地讲电话，另一个正在办公室内唯一的一台计算机前轻轻敲击，其余两个人正在激烈地讨论着他们手里的抄本。看起来他们当中没有人注意到我。靠近墙边的一排塑料椅子上，两个看似很无聊的人正看着我，好像等着看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一样。我走到在计算机前办公的人面前，询问是否可以见编辑，他点头并几乎不带任何手势地示意我坐到那一排塑料椅子上。我感到了瞬间的沮丧。这时，刚才激烈讨论的两个人之一停下来问我有什么事，我敏捷地猜想到他就是编辑。我介绍了自己，继而开始阐述我的需求。他一直听我讲完。“所以你想找一些女人们加入到你的探险队，是吗？”“是的，我是这个想法。”他马上想到了主意，“但你要使它更像是个故事，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

我迅速地想出一百种方式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个有趣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广告；而且我不得不把它诠释为一个看起来有明显报道价值的故事，这让我有些许的挫败感。“这是一个关于运动的故事



事。”他用一种听上去毫无疑义的语气说着。随后，穿过庭院，我被引领到一个建筑物前面。这个男人在那里一边听我描述这次探险活动，一边敲击着电脑。然后他把打印稿的复印件递给了引领我来此地的男孩，这个男孩迅速地冲出了门口。“打印稿上的内容今晚就会刊登。”记者背对着电脑转过来，朝庭院前面的我点头。

我为自己的成功而欣喜万分，离开那里后，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充满自信地对司机说去乔伊FM广播电台。得到一个在报纸上刊登故事的机会是非常棒的，但这是在一个以广播为主的国家，如果我想要接触到阿拉克大量的女性，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广播。而乔伊FM是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广播电台之一。到达那里后，我要求与亚历克斯见面，亚历克斯是一位非常友好的年轻记者，我们几天前就在电话里约好了。他对我的故事非常感兴趣，而且想要在中午段的广播节目里对我做一期访谈。

我们爬了几级台阶，上到顶楼的一个小演播室里，开始录制采访。直到这时，在采访中问到我的问题才变得清晰起来。我的回答很坦诚，绝不是排练过的。“你可以向各位听众非常精准地解释，究竟什么是极地滑冰吗？”

一两秒的停顿，我对于如何解释滑冰茫然不知。“这是一种穿越雪地的旅行方法，滑冰的时候会用到又长又薄的木片。”我试图用最通俗易懂的、不加任何修饰的词语形容。“滑行时，你得捆住双脚，这样才不会在行进中陷到雪里去。”在一个简单的开始后，我觉得我说得也没想象中那么差了。

“那什么是南极呢？”亚历克斯继续问道。这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全神贯注而又笔直地坐在我的座位上，不像刚才那样紧张畏惧了。

尽管有些问题稍显幼稚，但我对于这次访问所提出的问题都很



重视。然而亚历克斯所提出的问题也让我意识到，为什么加纳的申请率那么低。一个几乎接近赤道的国家，既没有山也没有雪，他们为什么必须要知道滑冰是什么呢？如果你对南极洲、南极或者滑冰没有概念，那么一个要你申请去南极滑冰的广告是不会让你的想象力迸发出任何火花的，那看上去就好像写出来的废话而已。回到旅馆后，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沮丧。也许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对的，也许我太过雄心勃勃，并且有一点不切实际了。

那天晚上，我战战兢兢地登录邮箱，想看看乔伊FM的访谈能不能在申请截止的最后时刻为我们带来一些加纳的申请者。当我看到邮箱里有17封新邮件时，我高兴得尖叫起来。这使加纳总的申请者总数达到了23人。我兴奋地阅读着这些新的申请，发现申请者中的一些人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妇女权益发展协会的工作者；一位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创作歌手，而放弃自己富裕生活的银行投资者；一位来自北部的护士和一位来自阿克尔顶级饭店的大厨。我选出了十名最强的候选人并邀请她们来面试，之后，我安心地睡觉去了。我再一次峰回路转了。

在进行面试的那天清晨，我坐在宾馆里望着外面的海喝着咖啡。当我查看邮箱时，感到有些沮丧。在我发出面试邀请的十位候选人中，只有六人有所回复。我试着给没有回复的四位候选人打电话，但却无人接听。我自我安慰道，现在有六位候选人，总比一个都没有强。那天早上，我的第一位面试者是艾玛，当我到时，艾玛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了。艾玛是我到达加纳两天以来的第一位面试者。她为一个民间组织工作，这个民间组织寻找来自英国并且到加纳参与学校建筑项目的志愿者。艾玛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但是她过于谦逊，以至于我会担心，当她站在众人面前时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去跟大家交流关于探险活动的信息。这次面试让我感到有些挫



败：我真的要对这位非常优秀的妇女进行培训，让她对探险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所准备吗？她看起来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坚韧，但是南极探险活动的艰险程度肯定远远超出她所经历的或者她可以想象的任何活动。这次面试又让我再次感到了之前对我所做的事情产生的疑惑。我所关注和疑惑的这些东西仍旧徘徊在我的脑海，巨大的责任感此刻压得我直想呕吐。我能让妇女们从田园一般的加纳走出来，去参与探险活动吗？这些妇女从没有离开过她们的国家，从没有见过雪，从没有感受过严寒冰冻。

我并没有从下一个面试者中看到希望。舍拉23岁，尽管她的表格书写工整，但她的天真幼稚还是让我很受打击。舍拉太过腼腆，以至于她都不能与我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面试，她坚持要坐在屋里门后的一把椅子上。当她不那么羞怯时，我马上与她进行对话。“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她告诉我，“当然啦，我的父母想要一个男孩儿。但是因为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所以父母给了我一个儿子才能享受到的自由。因此，我有权利去做我想做的任何事……”

就在这时，她把我们所在的办公室里的空调突然流出的水打断。我把一个桶推到空调的底部以便能接住流出的水，而舍拉立马像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一样走到接待处，迅速地叫了一名接待员，那个接待员很不情愿地用拖把拖着地，而舍拉就站在他的旁边看着。现在，我可以想象得出，这个穿着西装的23岁的舍拉在工作时有一个多么可怕的、具有权威的形象。同时，舍拉雄心勃勃地说：“在探险活动结束后，任何队员都会有一个平台，我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成立我自己的协会，这个协会可以让压力变为动力，鼓励正在休假的年轻人参与到志愿者活动中来，而且我可以为自己正在做的工作想出好点子。”



芭芭拉是下午到的。她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刚刚结束了在美国为期三年的学习。她很好相处，而且充满自信，但是她的肢体语言出卖了她这种自信，因为她的外形不是太好。她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她认为不佳的外形会影响她的面试结果，但事实上，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我知道，如果有足够的决心和动力去做一件事，你就会快速地将身体状态调整过来，这就是人非常重要的特性。”在芭芭拉之后，汉娜来了，这是一位攀爬专业绳梯的妇女。她在加纳通讯社工作，而且看上去似乎比其他候选者更加具有洞察力，但同时，我能明显地发现她工作很辛苦，努力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她应该得到的休息。“如果想得到一个机会，他们必须离开加纳，他们必须去开拓新的世界。人们甚至应该徒步穿越沙地去利比亚。徒步！只要你去寻找，加纳是有很多机会的。这就是我想对人们说的。”

我再一次告诉所有的候选者，晚上我就会作出决定。我坐在宾馆外的海滩上，把双脚埋在沙子里，试着去做出选择。舍拉的活力和坚定给我留下了印象，但在芭芭拉和汉娜之间选谁，就很困难。在随后的帐篷测试中，我看到了芭芭拉在探险情景中表现出比汉娜有更清醒的头脑后，便决定选择芭芭拉。我给芭芭拉和舍拉打电话告知她们这个好消息，当芭芭拉对着电话大叫并且兴奋地跳起来时，舍拉对待这个消息就好像我告诉了她天气预报一样稀松平常。我知道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印 度

在飞机客舱狭窄的过道里，我找到座位坐了下来，闭上眼，感到眼睛周围有一种紧绷的疼痛感，肯定是受伤了。我觉得我忍不到这一天结束了，但我却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不去印度，那



里会有太多人感到失望。就在这时，由于飞机故障，我将要晚几个小时到达德里，这也就意味着，我会错过一整个早上的面试。当一些候选者已经准备开始面试的时候，时间却要调整为下午进行。

英国驻德里的理事会已经同意主持这次面试，他们可以做出安排。我乘坐的飞机将在上午九点着陆，我中午就可以看到第一位申请者。当天晚上，我还要在英国理事会能容纳150位观众的大礼堂里做一个演讲。门票已经派发出去了，因此我别无选择。英国理事会非常好，他们给我派了一辆车，把我从机场接回面试地点，并且给了我一个熏烤三明治和一壶热腾腾、香甜的咖啡。我由衷地感谢工作人员如此贴心和尽职尽责，随后我在一小间玻璃墙的办公室里开始了第一个面试。与我一起参与面试的是一位水坝的指挥官，也是印第安海军的登山运动员和探险队长，他参与过去南极和北极的军事探险活动。与以往独自与其他国家的申请者见面不同，我想这次两个人一起面试，可能会让我换个视角看问题，也许会对我更有帮助。这位指挥官身材瘦长，留着利落的小胡子，笑容可掬，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皮肤非常透亮，完全看不出他已经43岁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冻伤或者皱纹。

第一位候选者是斯莫西。我能看出斯莫西很紧张，但是当我问她一些关于她生活的问题时，她开始平静下来，开始充满热情地讲述她所从事的有关拯救穿山甲的工作。她给我看了一张看起来很奇怪的穿山甲照片，这是一种好像食蚁兽一样的生物，身体表面覆盖着大而锋利的鳞片，这些鳞片使它们即使在印度村野的小山洞里也可以得以生存，穿山甲正受到灭绝的威胁。我邀请指挥官接着问问题，指挥官问了几个斯莫西在申请表中所描述的关于工作经历的问题。他的语气比我更加坚韧有力。很明显，指挥官更加正式一些，而我相比之下则显得不够专业。随着候选者的进进出出，我开始感



到我和指挥官主持的面试就好像一个好警察和一个坏警察在巡逻。例如，我们会见了一位非常热情的医生，但她很紧张，因此我总是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可指挥官会马上打断她的话：“是的，是的，是的，你已经告诉我们的了，但是请问在你做过的事情里，哪一件是最挑战生理极限的？”

下一个进来的是拉塔，她非常谦逊低调，以至于我难以想象她会在一个团队中怎样来支持自己。面试后，指挥官很推荐她，还强调了她的攀登能力和探险经历，但我对她没有任何感觉。下一位候选者是阿帕玛，她的申请表看起来非常棒，而且她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她是一位受过培训的律师，而且受理了一个改善监狱中女性囚犯居住条件的项目。很显然，阿帕玛是一位很有决心而且专注的人，对于项目的方方面面，她都非常严谨专注。但指挥官不是非常确信阿帕玛可以加入此次探险活动。由于阿帕玛要开展一项新的工作，而且是政府关于外交事务的工作，因此指挥官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是不会让她走的。因为你们探险的时间太长了。”

在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变得有些绝望。一部分来源于阿帕玛，没有比她更合适加入这个团队的印度候选者了。我也可以看到指挥官很关心我。“你希望现在会见其他的候选者吗？”他问道。我正要回答“是”，瑞娜进来了，朝我们愉快地微笑着。无论是身体上还是个性上，瑞娜都仪态翩翩。当我们问她问题的时候，她都专心地看着我们。在回答问题前，她会先思考，此时她与人的眼神交流让人感到些许不安；当她讲笑话时，她的笑声太突然而且出乎意料，以至于就要让我跳起来了。虽然她看上去似乎有点古怪，但是她个性中温暖的一面是很讨人喜欢的。在她离开房间前，我知道她就是我的第二位印度的候选者。

“你能像宣布奥斯卡奖得主一样宣布胜利者吗？”来自英国理



事会的维嘉伊问道，他是我晚上演讲的组织者。我被要求在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宣布候选者的名单，我没有料到这次选拔会受到这样的重视。我看了一下表，距离观众到场还有15分钟，可观众已经聚集在门厅，等候排队进入礼堂了。我不得不对公布流程做出调整，现在我必须用奥斯卡风格为十位候选者的每一位写份介绍。我的头摇晃着，但我不能拒绝，我觉得我需要先审视一下自己。于是我去了趟洗手间，检查自己的妆容。这时，有一个妇女进来说：“你看起来真棒！”

我向她投去了感谢的目光——此时这样一个评价会让人觉得多么舒适啊。我回到楼上开始写候选者的介绍，顺便继续理一理思路。我现在觉得，如果我把头放到桌子上，只要几秒钟就可以睡着。我几乎不能集中精神，而且对即将进行的演讲感到异常的焦虑，这种紧张让我微微地发抖。在谈话中，我很少使用注释或者稿件，我不喜欢提前演练太多的东西。太过圆滑的谈话让人听起来觉得无趣，所以我更喜欢依赖自己的头脑。不幸的是，从加纳坐飞机到印度来的行程当中我基本没怎么睡觉，缺乏睡眠让我的思路不是很连贯。

当我进入礼堂的时候，那里已经座无虚席了。我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人开始介绍我，可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已经被宣判的人。然后我接到了主持人的示意，开始演讲，我渐渐地从自己的声音中感到了非常奇妙的东西。我看着暗暗的礼堂里观众的脸，他们表现得都很沉默。从这无情的沉默中，我不得不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正在接受着一场多么死气沉沉的讲话啊。通常，我会从观众的反应里接收到一些信息，诸如同意或者震惊。如果我讲的故事很有趣，我都能感受到坐在后排观众的反应，我虽然看不清观众的脸，但我可以听到他们和我一起笑的声音。我留意了一会儿礼堂里观众



的反应，这让我平静下来。我开始进入自己的节奏，当讲话进入到关键时刻时，礼堂里响起了观众自发的掌声。我感到了极大的安慰，这次演讲进行得不错。演讲的尾声，到了介绍我们的“奥斯卡得奖者”的环节了。当维嘉依拿着一个用硬纸板制作的巨型贺词板缓缓走上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贺词板就像个乐透中奖的支票，要发到被抽中的中奖者手中一样。我期待地听着他的贺词，他的语气并不十分有激情，这可不是我期待的，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争论了。我宣读候选者的介绍，并且开始注意坐在礼堂前两排候选者的反应。维嘉伊在台上带领大家鼓掌，请大家关注候选者的名字。瑞娜和阿帕玛来到了舞台上，阿帕玛穿了一件柠檬黄的纱裙，看上去很漂亮。瑞娜穿着亮亮的蓝色和绿色的衣服，看上去同样很漂亮。我一边介绍她们，一边把证书递到她们手中。她们看上去对于这样的举动很茫然，这让我忍不住想笑。

在一片闪光灯后，今晚的活动就要结束了。对于这次讲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那就是：“要小心，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突然被一圈圈的观众包围时，“要小心”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要小心谨慎地应付那些已经提问过的人们和还想继续对话的记者、支持者，还有候选者。我试着将关注点投向他们而不是其他地方，那么我就不会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了。一位记者采访我，让我谈谈关于气候变化的话题——“你能谈谈关于南极洲气候变暖的情况吗？”同时一位摄影师要我坐在座位上向他那边看，显得轻松一点。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新闻采访，当我得知赞助者和支持者是多么重要时，我非常感激媒体们的关注，但是这里有这么多人，以至于我无法与某一个人进行一个完整的谈话。

深夜里，我躺在酒店的床上。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我激动万分，久久不能入睡。我听到外面一阵轰鸣，几分钟后，意识到原



来是下雨了。我走出房间，去到走廊的另一边，这里好像是一个阳台。雨下得非常大，我无法看清周围的摩天大楼。这时，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是一只长着嫩粉色脸的棕色大猴子正坐在我头顶方向的地方，那里距离阳台就几米远。我凝视着这只大猴子，它也慢慢地转过来看着我。我们互相对视了几秒后，大猴子转过身去看雨，我也望向雨中，我们都沉默地坐着。过了好久，当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惫时，就回到房间休息了。

在离开德里的前一晚，指挥官邀请我去他家与他的夫人纳米塔共进晚餐。他打开门，穿着一件从南极站考察回来时穿的T恤衫。他比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放松多了，所有刻板的礼节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魅力。我们在他们家一个贴有过去他参与探险活动的海报的房间里坐下来，煮着印度奶酪和辣蔬菜，这些战利品都是指挥官去南极考察的纪念。我突然开始喜欢起这对指挥官夫妇来。在一顿美好轻松的晚餐过后，我被指挥官的一本书深深吸引住了，这本书是关于他去珠穆朗玛峰探险的故事，里面的题词是这样写的：

“站在山脚下，你永远不知道山顶有什么。只有站在高处才能一览众山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攀登。只有从真正的高处，处在冰天雪地里，你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己。”

直到我要离开指挥官家，我才不舍地将书放下。这次南极的探险活动就是属于我自己要去攀登的山峰。我觉得我现在正处于这座“山峰”的低处。指挥官给了我及时的暗示，他提醒我，自己为什么做这些。我知道，只有当我登上“顶峰”时，我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宠物长臂猿

第3章

新加坡

在跨越印度洋之后，我看到新加坡的天空竟呈现出一番如此平静的景色。不久，飞机开始滑行并在一片空旷的机场降落。在玻璃装饰的大教堂式的空间里，等待检验护照的队伍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我们在一个服务台停下填写入境登记卡，上面准备了签字笔方便我们使用。过了关，我把行李放在推车上交由机场工人推出，很快，行李放到了传送带上。我按照通关指示牌来到一个办公桌前，一位微笑的服务员卖给我一张巴士车票。就在我买杯咖啡的工夫，司机已经帮我把行李安置妥当了。坐上巴士穿梭在城市之间，我感觉自己就是个过客。

清晨，太阳通过窗户照进来，我喝着咖啡，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公路边开满了杜鹃花。我们到达新加坡市中心的基督教青年会，绿化带逐步被石块的建筑取代了。我在大厅见到了英国文化协会的





桑德拉。她是一位娇小的女士，穿着黑色宽大的服装，戴着面纱。我们已经通过邮件在关于我的旅行问题和洽谈场所上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我在新加坡逗留的这段时间里，她给我安排了几场讲座。桑德拉似乎已经接受了英国安理会的建议，与新加坡的年轻人进行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我俩都很兴奋，我们穿过一条安静的小路来到附近的咖啡厅，我要了金枪鱼法式面包和一大杯拿铁。桑德拉没有点吃的东西，因为她说她准备过后大吃一顿，但谈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是很饿的。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现在是斋月，伊斯兰斋戒月。桑德拉自从早餐后就没有吃任何东西，甚至没喝太多的水。我立刻为在她前面吃了东西而道歉，并把我的食物推到了一边。桑德拉看上去仿佛并不在意，但我对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疏忽还是觉得有些负罪感。她递给我一个信封和一份她准备的未来五天的时间计划表。她安排了我要做什么，要去哪和要见谁。我不需要独自思考什么，桑德拉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全了。第二天在新加坡的面试早早地在英国理事会课堂开始了。第一位候选人是一位军官，她雄辩的申请书里说，她相信在新加坡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应被唤醒，那就是以积极的女性为榜样。面试中，她说话很温柔，我几乎听不见她说什么。她的工作是每天与士兵打交道，似乎完全与我面前这个矛盾又胆怯的女人形象不符，她仿佛在挣扎着使她的神经还能受自己控制。

后面一位曾是新加坡女性珠穆朗玛峰团队的成员，从她坐下的那一刻起，给人的印象就是她已经预备好了她胜券在握。她似乎认为眼前进行的不是面试，而是一段令人生厌的烦琐手续。她热心地随手递给我一份资料，是以前远征队的队友写的。根据这份资料来看，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我想知道，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傲慢还是因为有足够的信心。不幸的是，我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她。在她离开屋子前我必须按

照自己的想法作出决定。

那天晚上，当我正要给她打电话感谢她来参加面试时，被一条她很生气自己没有录取的信息所打断，“我要求成为最佳候选人”。我试图给她一个适当的回复，但她的态度惹怒了我，我不想再帮她了。这时，我被一封新邮件吸引住了，这是一位没有被邀请参加面试的申请者发来的邮件，内容大致为：我深感失望，我被忽视了。我到底因为什么没能入围呢？我到底哪儿做“错”了呢？我认真看了你关于成功女士的评论，我有理由相信或许你的探险队要寻找的不完全是普通的妇女。

她说的没错，我这么努力地挑选队员，就是为了使这次探险能尽可能地成行。我不喜欢在背后搞阴谋的人，新加坡问题中我选择的两个女人确实没有任何问题。第一个是索菲娅，她内心的自信像霓虹灯一样在闪烁。她是一位忙碌的母亲，有两份工作，很明显她没有时间搞小动作。她穿了一身休闲运动服来面试，给我的印象是这一天是她专门挤出的时间，面试只是她待办事项中的一项。她很娇小、瘦削，却能看到她胳膊上的肌肉。有人解释说她兼职教跆拳道和健美操。当我问索菲娅离开她的孩子两三个月会感觉如何时，她对这个问题挥了挥手：“当我填申请表时，我的大女儿说：‘妈妈，如果你被录取，这将成为一个奇迹。’我想通过这次远征来告诉我的女儿这样一件事：奇迹和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去尝试。”她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像刚才她讲的是一个笑话似的，但我可以告诉她她说的每个字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入选的新加坡女人是丽娜，一位工程师和冒险赛车手。她曾在 2000 年的生态挑战中带领过一支新加坡队伍（这支队伍因参加最严酷的冒险赛事之一而闻名世界）。从我读到她的申请和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她已经成为一名强有力的竞争者，我也从未改变过





我的主意。丽娜是讨人喜爱的，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决心，她的优点在于不管她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上，她都是谦虚的、忘我的。我可以很容易想象到丽娜是一个既招人喜欢又很可靠的队员，我也很幸运能够找到她。

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英国理事会主任的家里吃饭，受邀在座的其他宾客中有冒险家、学者和社区工作者。冒险家是一名男子，他带领第一支新加坡团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顶。当我们开始谈论时他详细地询问我的计划，并告诉我他自己的领导经验。他说道：“我以前也完全像你这样，直到有一天我在帐篷里醒来，闻到了咖啡的味道。”我开始对宴会中那些人的炫耀感到厌恶。这时候他突然从桌子对面问我：“你解雇过你的团队成员吗？”这个问题是以一种指责的形式问的，好像在说我没有过，我承认我对此缺乏经验（在他的团队动身去珠穆朗玛峰前，他把一个有争议的成员开掉了）。显然他问我这个问题，是觉得我不可能解决好将面临的问题，完成这次探险。他当着这么多人提问，似乎是想确定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结论。我的人生常常被人小看，可能是因为我选择给自己制造状况，而不会循规蹈矩。不管什么原因，我学会了在大家的回应中去感受失败。晚餐结束时这位客人送给我一本签名的新书作为礼物。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要不是他已经在封面上写了送给我的字样，他压根不会有兴趣送。我保存它是为了提醒自己，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而不要去怀疑。然而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确实应该好好想想他在那天晚宴上提出的问题，并后悔地自嘲我领导团队的体验还真和他描述的类似。

文 莱

到达文莱后，我开始意识到现在正是斋月期间，在伊斯兰国家做任何事都比较困难。我在市中心徘徊着，想给我的移动电话找张本地的SIM卡。我发现所有的店铺都在下午很早的时候就关门了。早早闭店的不只是店铺，办公楼、博物馆、访客接待中心和渡轮也都一样。在温度将近40℃的中午，大多数人都昏昏欲睡，直到傍晚结束斋戒后他们才回家休息。这时的街道空旷而寂静。

班达尔斯里巴加湾是文莱的首都，但却不是一个大城市，市区更像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和清真寺。河对面有一座庞大的下沉式的实木建筑，被一条狭窄的桥梁相互连接，用来过路。绝大多数建筑物是住宅，但也有商铺、清真寺、学校，还有蓝白相间的警察局。船都停靠在岸上，消防局被涂成红色。

凯伦在宾馆的大厅见我。她在文莱是一个知名的教育慈善协会负责人，她为我提供了她的办公室，用来面试文莱的申请者。在我们开车到那儿的途中，一起聊了聊她在文莱的生活。“文莱是一个能够抚养孩子快乐成长的地方，”她说，“住在这里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安心做家务，并照顾孩子。”

该慈善机构的办事处明亮、通风，货架上摆满了儿童书籍和教育玩具，墙上贴满了绘图和跳跃的卡通字海报。凯伦介绍我认识了前台西蒂，她对于这次探险的面试很兴奋，很显然她为那天的到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她在办事处外边的黑板上挂了一幅大海报，上面写着：志愿者妇女英联邦南极探险面试。西蒂有条不紊地问我有关每个要来面试的候选人的问题。有50多份申请来自文莱，入围名





单里包括一个体育记者翻译、一个助产师和一个女商人。但我第一个要面试的是个文莱的社会名流。在几个星期前的典礼上，诺哈雅迪刚刚被提名为文莱第一女探险家，她与她的丈夫经历了从非洲到文莱历时十个月的陆上旅程。她的旅行纪录片已经在文莱电视台播出，并在新闻报纸上刊登。当我第一次就南极探险与文莱政府部门联系相关事宜时，他们立即向我强烈推荐诺哈雅迪为候选人，她应该我的选择。我希望见一下诺哈雅迪，而不是只听到她的名声。我更想证明任何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诺哈雅迪已经实现了。她来的时候穿了一件马来式的连衣裙，没有蒙头。很明显，她不是来参加面试的，她是来告诉我关于她的经历的。我几乎很快就确认她不适合参加这个团队，但我还是想见她。作为一个领队，她克服了许多关于性别和宗教信仰的偏见。“许多人加入了我的旅行，特别是男人，”她告诉我，“当我们背上背包出发时，他们才意识到我是领队，唯一的领队。那时候他们变得很担心，开始问这问那。但几天后，他们精疲力竭，我还是充满活力，他们那时才接受我这个领队。”

到了下午我开始感到焦虑，我还没见到一个真正有潜力的团队成员。这时候安尼塔来了，她是一个说话温柔的空姐，有着杏仁状的大眼睛和耀眼的笑容。她雄辩地陈述着她想得到的东西：文莱这样一个国家，会给文莱人民带来什么。他们需要参与国际事务，由此产生更多的民族自豪感。当她透露她只有19岁时，我很惊讶，如此年轻就有如此观点。我一直怀疑是否有人这么年轻就可以背负起重整家园的角色。但安尼塔的信心使我放下心来。“你会怎么说服我，同意选你去南极呢？”我问。安尼塔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愿意给你讲讲我的宠物长臂猿。”她往上拉了拉袖子让我看她的上臂，上面满是纵横交错的长疤痕。“我每天早晨都要喂它，它每次都抓我，但



我不放弃。”我们俩都笑了，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回答。

我在面试完安尼塔不久后，见到了艾拉。她一走进房间我就对她不抱希望。娇小的身体显得似乎很胆小，可是她回答问题时却充满了信念和激情，一点儿都不像她的外表。“我会用我探险中的经验激励文莱的青年人去做伟大的事情。”她告诉我。“我们在文莱有着优越的生活，但大多数年轻人很懒惰，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不到一年前她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在过去三年中她作为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搞起了体育。艾拉对于自己“在生活中想要得到什么”这一点想法很明确，似乎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一个好的伊斯兰氛围对我很重要，我想要继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伊斯兰。”她解释道。即便如此，艾拉描述说她在海外与家人生活数年后，回到自己国家后还是受到了文化冲击。“在我离开期间，文莱变得更加保守。”她犹豫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喜欢踢足球，但文莱却禁止女孩子去踢。这很让人困扰。”尽管事实上，我比艾拉大5岁，但她在感情上的成熟让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懵懂的少女。我能看出艾拉很有自信去实现她的想法，我已经感觉到我将依赖于她。

第二天我在宾馆又见到了艾拉和安尼塔，她们彼此似乎相处得很好。当我们讨论到挪威的计划和这次探险时，艾拉提出要与她的宗教领袖商议一下，看看在她离开的日子里还需要遵循什么规则，例如在哪种情况下必须祈祷和禁食；伊斯兰教需要每日五次的礼拜时间，但是在旅程中要是错过了纪念活动是否可以以后弥补。我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但我却没有找到宗教权威咨询这样小到个人生活细节的想法。这些决定对我来说似乎很陌生。她们谈论关于资金的筹集和能得到谁的支持时很是兴奋，我在大厅跟她俩分手，看到她们如此重视将要走的路，也提前使我的兴奋点猛然引爆。我曾虚构很长时间的乐观的团队，逐渐在我眼前成形了。我不再是孤军作



战，很快就会有一个世界性的妇女联盟，帮我实现这个国际极地科学考察的梦想。走进宾馆的电梯，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我放纵自己沉溺于胜利和兴奋的感觉中。

新西兰

惠灵顿阳光明媚，但却很冷。9月是新西兰的冬季，我走在街上，一阵阵卷着沙粒的寒风刮到脸上。不一会儿我就开始在寒风中流鼻涕，淌眼泪。我赶紧跑到一个市中心由混凝土和玻璃筑成的现代摩天大楼里，那里有我预约好面试的房间。保安给我一套钥匙，并向我介绍了复杂的报警系统。

回到青年旅舍后我倒头就睡了，我累极了。醒来时发现情况不妙，我睡过头了。我掀开被从床上跳起来，抓起表一看，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我迟到了一个小时。我快速地把申请表塞进包里，赶到面试地点。

梅兰妮，第一位面试者已经等在外面了，正琢磨要干些什么。我与等在那里的梅兰妮一起快速地布置了会议室，在门外的白板上写了新的面试时间，限制每个人的面试时间为30分钟。因为我的迟到，我很内疚，但幸运的是我见到了每个面试者。梅兰妮很悠闲，她已经回到祖国了，这天以前她一直在国外，在截止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提出了申请，很感谢她突然决定回来。一切似乎都是注定的，作为一名护士和前滑雪射击手，她将是非常有用的团队成员，在危机中有她在就能起到镇静的作用。我能想象她虽是一个经验较少的团队成员，却可以让人感到放心。

下一个候选人是海伦，她给我拿来一杯咖啡，我拥抱了她。早上来得匆忙我都没来得及吃早餐，我感激地接过温暖的纸杯放在手



边，我们开始闲聊。海伦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她想去南极洲。她清楚她的决定，对该项目富有激情。

下一个是夏尔曼，我很快就喜欢上她。她是一个军队的医生，与我看到的像梅兰妮这样的其他缺少经验的团队成员相比，她更加冷静自信。她还是一个营养和体能训练方面的专家，她的知识将在我们筹备南极洲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下一个进来的候选人也很出色，她是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女士，很明显，她有给探险队带来很多益处的能力。我开始意识到，在新西兰选择候选人是很有难度的。我很想要她们每个人，但最终的选择会令我和很多候选者心碎。

在最后一个面试结束后，我慢慢地走回旅社，回想着我见到的每一个候选者。我几乎马上就选择了梅兰妮，但是选择拉尼——一个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和社区工作者，还是选择夏尔曼这样的军医，我就犹豫了。拉尼是我喜欢的那种人，她是积极的、自信的、有创造性的、有原则性的。但当我拨打她申请表上的电话号码时才注意到，她填的国籍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啊，我想起来了，当我问她的时候她解释过，即使她在新西兰永久居住，她仍然是澳大利亚的公民，想到这里我的心沉了下来。我不得不对拉尼大打折扣，就像在塞浦路斯决定放弃尼基一样。我可以想象出拉尼入选如果被新西兰媒体发现后所引起的争议——第一位滑雪到南极的新西兰女子其实是澳大利亚的居民。拉尼很不安：“我为我的社区做了许多事，我不算是一个十足的新西兰人吗？”她尝试争取。在旅程中我亲眼见过对国籍非常看重的市民，我还没来得及做过多的解释，她就面冲着墙放声大哭起来。也许是这两个月的旅程压力积累在一起的结果，但是新西兰之行确实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花费了一天的时间和这些充满热情的女人们在一起，但现在，她们是痛苦和失



望的，和拉尼的紧张谈话又在我面前上演了。这个鼓舞人心的女人，她关心自己社区的安危，而我和我的规则使她愤怒。

第二天，我在等待夏尔曼和梅兰妮抵达会面时，感觉自己都有点神经质了。我担心她们可能不是我印象中的人，我可能会面对犯下错误的现实。梅兰妮是第一个到的，金黄色的卷发，带着大大的笑容。夏尔曼不久后也到了，在许多方面，她和梅兰妮是完全相反的。一头黑发，娇小苗条，但我倒感觉和她气味相投。我和她们坐下的同时注意到，她们彼此打量了一下，好像试图看出为什么她们俩被选出来。很明显她们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但她们似乎彼此很容易相处。通常我都是用自己的工作方式获得大量的信息。我把她们俩留在咖啡厅去消化一下我说的话。我沿着海边走回旅社，还像往常一样吹着海风，想象我现在要选什么样的候选人来组成这个团队。我确定不管是梅兰妮还是夏尔曼都将是巨大的财富。我尝试用足以应付其他女人的经验来逐个分析这两个陌生人，但却没有信心。我已经走得相当快了，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牙买加

有一部关于金斯敦（牙买加首都）暴力团伙的纪录片，其中提到比起去其他旅游地，飞往牙买加绝不是最佳的选择，关于那里的警告声音则更多。多年以来，每当父亲看到我计划去牙买加旅游时，都会替我担心，总会在电话里说：“你不会自己小心点吗？这是在赌博。”他那低沉的声音充满了担忧，这也让我感到紧张。

当我到达牙买加第二大城蒙特哥湾时，海关官员仔细查看了护照，问我：“你住哪？”“维克骑士简易旅馆。”我回答。他不解地看着我：“简易旅馆吗？”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去和他的同

事交谈，笑着回来说：“维克骑士不是简单的旅馆，”他解释说，“它是男人把女朋友带去的地方。”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通常他们只在那待一两个小时。”到了外面，我在提前租来的车上拿出备忘录，然后标出这座城市。我把旅行手册地图作为导航，但是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维克骑士旅店的图标。最后，我把车停下来，想仔细地看看地图，这时一个蓬发的男人向我的汽车跑来，我立即锁上所有的车门——我得提高警惕。“你不知道去哪儿吧，大姐？”他问。我告诉他，我正在寻找的道路名称，但是他也不知道。我们挥手告别，然后他又说：“你想要烟吗？”他把手指放到嘴里，我知道他说的可不是普通香烟。我失望地离去。我在牙买加待了不到一个小时，但是已经有人要提供大麻给我了。

第二天早上，我动身去海边，我有5天的时间在岛上面试。但一路上电话不断。在加纳时，我接到的牙买加申请只有少数几个，我需要迅速地把探险的消息传播开。我给伦敦的牙买加高级委员会新闻专员发了一封更新信息的电子邮件。英国文化协会提出要在金斯敦主持这次面试访谈，所以我找到了导演波林，他给了我一长串要用到的广播电台和报纸记者的名字。我决心从他们那里有所突破。我给一名记者打了电话，虽然他很友好，但他还是对探险的故事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广告吗？”他反复问我。我试图说服他，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是广告，但很显然，他已经认定了他的想法。我在岛上开车时，听到当地的广播电台有一档谈话节目似乎非常受欢迎，所以我在晚间的广播脱口秀节目中安排了第一个受访者。制片人已经提前告诉我，他们只给我三分钟，但对我来说足够了，三分钟可以提到我的探险网站和主要信息，主持人又在接下来的七分钟里讨论了这一古怪计划的优点，无线电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到达金斯敦之后的五天里，我收到了30





份申请。我松了一口气，到金斯敦后的第一站就会见了伦敦牙买加高级委员会的一名代理人，他深刻地向我分析道：“牙买加社会每一件正在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基层社区层面，都是有妇女参与完成的。妇女是组织者、实干者、改善者，但牙买加仍是一个男子气概浓郁的社会。你绝不会看到女性涉及暴力，这源于大男子主义的社会文化，而且在到达一定高度的社会阶层时，女性就难觅踪影了。比如，很少有女性部长。”他和他的新闻发布官非常热衷于探险，并提供给我几条赞助以及媒体帮助方面的线索。

我和波林说好和他共进午餐，吃饭时，我向他描述了我的远征计划，他既怀疑又兴奋，我感觉自己突然间备受欢迎。波林已经在和媒体周旋时尽力帮助我了，现在，他又慷慨同意让我在他的办公室进行面试。当我按时到达时，他已经等在那儿了，不过他告诉我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我努力寻找的十名申请者已经有两人打电话过来告知退出：一个车坏了，另一个已经忘记了她申请过。至于剩下的八个候选者则是来了又去，她们在接待处排队，波林一一跟她们聊天。他没有和我一起进行面试，但是面试完最后的人选后，我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与他谈论对每个女人的意见。我喜欢有意见可以参考，特别是有人用良好的洞察力去观察后，提供的意见更加宝贵。

我的第一个申请人是金姆·玛丽，她使人印象深刻。她穿着黑色紧身套裙，拎着与之相配的手包，还有一头瀑布般的齐肩发，在办公室她的笑声很大。不需要过多的提示，她就开始谈论她自己，我发现别人很难打断她，不过没关系，我被她的话语所迷住，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姆花了很多时间和印第安部落的人们一起在巴勒斯坦为保护妇女权利而工作。她没有任何的探险经验，但她非常活跃，坚持定期锻炼，这种生活方式使她觉得自己很自信，她会在

探险队中发挥她的优势。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人选，牙买加是可以给探险队提供金钱支持的。同样令人欣赏的是艾莉西亚。她在面试之初就递给我很多材料以支持她的申请，从简历、学历证明到推荐信，虽然这些无关紧要，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找到赞助并为探险做准备都需要专业的途径，艾莉西亚在这些方面展示了她的能力，虽然她很年轻，只是一个刚毕业的21岁女孩。艾莉西亚和金姆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她们之间也有明显的摩擦，金姆是外向型的，这加重了她的唠叨，而我看到艾莉西亚插不上话时会显得很沮丧，金姆却越说越多。当分开时，她们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不知道她们是否都在潜意识里关注对方。我只能做好我该做的，我观望和等待着，希望她们能自己解决。

英 国

三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我不想动，感觉全身没劲，我知道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但我实在没精力去关注这些了。我坐在床上，喝了口咖啡，写下一个待办事项列表，但接下来思考这一切实在是件很疲惫的事情，于是我决定，喝完咖啡后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一封来自温斯顿·丘吉尔纪念馆的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欢迎我回家，因为他们相信我的项目实施的可能性。正是这封信促使我有了向他们报告我旅程的动力。我坐在床上打开电脑，全神贯注于未来三四天将要上交的报告。当我敲击键盘时，发现一切计划都仿佛自动成形，变成一个个行动方案，而我对于完成那份长长的待办事项清单的热情，也回来了。

在此期间，申请英国贷款的事情已经结束，我成为英国队的





代表，但是我还需要一个预备团队，以防有人中途退出、染病或受伤。初始的计划是把来自每个国家未入选的申请人作为后备人员，但把她们训练到我们需要的水准是不可能的。英国对我们探险的投资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我果断决定只从英国选取后备人员。我已经收到了超过50个来自英国的女性的申请，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丰富的经验。作为后备人员也很尴尬，需要大家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最后她们很有可能不能参与其中。面试的关键问题是要申请者确定她们参与其中的动力是什么。

我邀请了十位申请者来面试，但是很快就收到两名未入选的申请者邮件，希望能再次考虑她们的申请。因为之前在新加坡和新西兰我没有考虑这样的要求，于是这次我让步了，我把她们的名字重新加到入选名单中。随后我安排所有的申请者在伦敦的查令十字车站旁的咖啡馆面试。

三年前，我曾在这个地方组织过一个女性探险团的面试。回想起来，当时酒吧工作人员都认为我有些女同性恋倾向，但这次他们就能清楚地了解我的意图了。“你面试什么工作？”女服务生在端上拿铁时问我。

当我解释探险细节时，咖啡馆的服务生对刚进来的女性好奇起来，甚至让我注意到那些很早就进来的女性。置身咖啡馆中，就好像拥有我自己的太平洋天文学会一样。当我给咖啡续杯时，服务生们交换了对这些参与面试的女性的看法。“我觉得，她不看重这个工作。”一个服务生在观察一个面试者后说。“真的吗？为什么这么说？”“看她进来的样子，”他继续说，“她好像有一点犹豫，而且在门口徘徊。其他人可都是直接进来的。”一开始我认为他的挑选方式值得商榷，但随后我发现他很可能是对的，因为这个申请者的确对整个探险不是很热衷。

最后一个面试者是海伦，她是我最后选入后备人员的女性之一。她的幽默很有感染力，整个面试让我感觉更像是与老友闲谈。虽然她已经完成了三次自己领导的极地探险，但是她的探险欲望并没有因此减弱，反而更强烈了。

我很小心地解释对后备人员的限制以及她们不一定能去南极的残酷事实，她说自己探险的动力是获得更多关于组织探险队的经验。我们聊得很晚，也越来越投机。我知道从海伦进入咖啡馆那刻起，我就有了自己的选择。如果拒绝她，我就是个笨蛋。在选择海伦后，我的1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申请者最终名单（七个国家，每国两人，以及来自英国的一个保留职位）最终完成了。

当我浏览被选中的申请者名单时，我特别高兴地看到她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范围从19岁的艾妮扎到43岁的海伦。在她们中有一位老师，一位医生，一位卫星通信专家，一位工程师，一位空中小姐，一位健美操老师，一位公务员，一位秘书，一位记者和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些人单身，一些人已婚；有的人已经有了丰富的户外体验，有的人什么经验都没有。所有人都想证明她们是多么符合要求，不仅仅用她们的个性，而是以女性的身份来展示。所有人对于为什么加入队伍都有不同的理由：瑞娜想要鼓励更多的印度女性去寻求家庭以外的职业成功；而索菲娅想向她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儿证明奇迹能够被创造出来……而所有人现在共同的目标是：成功到达南极。



筹经费，办签证，
难于上青天

我还沉浸在睡眠中，就听到手机在响。等手机铃声停了，屋里的座机又响了起来，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醒来。电话是文莱的艾瑞打来的。我看了看表，现在是凌晨两点钟。“可是我应该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呢？”她不耐烦地问。“你说格林威治时间十点是早晨，十点是你们那边的时间，不是格林威治时间。文莱的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八个小时。”我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试着跟她解释。“所以我到底应该几点打给你？格林威治十点还是我们当地十点？”我的头昏昏沉沉的，一堆数字在我头上绕。“艾瑞，现在是凌晨两点，我现在没法告诉你。这的确是错误的来电时间，我会在大约八个小时后打给你。”

自开始面试挑选成员以来已经三个多月了，现在我已经选好了一支由来自不同地方的女性组成的团队。她们彼此没有见过面，只是用Facebook和探险网站来交流。今天我们第一次试着通过互联





网举行会议。这次会议跨越六个时区，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方便每一个人的时区，所以我就成了大家交流的纽带，早上八点重新新西兰开始，晚上十点在牙买加结束。我让团队成员在互联网上工作，这使得大家磨合得更容易些，尽管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认同，我们还需要进行不断的交流。来自新西兰的女孩们早上八点上线，但早上九点新加坡方面还没有消息。文莱的艾妮扎突然提早出现，但一位印度成员却使她下线。

我和一位塞浦路斯人聊天，却被加纳的芭芭拉的提早上线中断了连接。我在接近午夜的时候和牙买加的成员结束了聊天。这是难熬的一天，混乱的一天，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这仅仅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我确定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其实，在最终完成与每个人的电话会议前，我们有过交流的尝试。至少现在我终于可以免受在午夜接电话的困扰了。自从选拔成员结束后，我已经忙于计划下一阶段：为15名申请者提供在挪威举行的为期两周的选拔和培训。

她们中大多数人只有很少的在零度以下生存的体验，还有个别人从没见过雪，所以我担心对于大多数队员来说，对南极探险并没有最真实的了解。对申请人来说，南极之旅是在地球最不好客的地带滑行900千米，并且时间长达至少40天。曾有人在加纳的办公室和我谈心，告诉我她们是如何热切盼望得到去探险的机会，但她们将会发现，期待和现实是有差别的。

我需要让她们在这几天里体会到真正的寒冷和疲惫。挪威南部的心脏地带哈当厄，是高山地形的高原，这里的冬天连平原都被积雪所覆盖，这里因恶劣的天气而“臭名昭著”，是极具挑战性的地方。我从未在南极圈以外见过比这儿更像南极的地方。我记得在南极洲，皑皑白雪、烟波浩淼的感觉甚至会让人感到无助。而这里同



样浩瀚无边，除极少数零星分布的小屋外，哈当厄高原几乎完全无人居住。我的计划是在哈当厄高原上组织一组有经验的志愿者对女士们进行培训。培训团队将教会她们一切，她们要了解在南极如何滑雪，如何避免在寒冷的天气里受伤，学会使用帐篷和使用液体燃料炉。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学会这么多新的技能，并要能在温度低于零下20℃的帐篷里睡觉，这些女士要承受怎样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她们将如何在南极洲展示自己，如何相互帮助，是培养团队协作能力的关键，这也将最终确定谁能入选探险队。在最后一周结束时将有七名女士离开，而剩下的八个人则会继续进行下一个星期的培训。我不希望这变成一种较量，不希望淘汰是残酷的，我安慰自己，尽可能确保选拔的灵活性。第一个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预算。除了在哈当厄高原的旅游成本外，还需要食品、住宿和设备。我估计至少需要八个有经验的志愿者来帮助我训练候选人，虽然他们是免费提供帮助的，但是我也要支付他们旅费。我有信心可以通过赞助和申请一些补助来覆盖部分成本，我已经收到了来自温斯顿·丘吉尔纪念馆的信托基金，但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强调我需要候选人的帮助来筹集资金，到目前为止，她们已经以饱满的热情接受了自己的任务。印度的候选人从印度登山基金会（IMF）带来了资金支持，而新加坡候选人获得了新加坡体育理事会（SSC）提供的资金。牙买加人决定举行一个盛大的“冷锋”派对，通过门票销售来筹集资金。我曾经警告她们不要完全依赖于某个事件，但她们是如此信心十足，于是我决定支持她们。“整个群岛都会沸腾的！”金姆再次向我保证，这是在牙买加，每个人都喜欢派对。

而谈到加纳，我并不奇怪只接到了芭芭拉的电话，“舍拉和你



在一起吗？”我问。芭芭拉平淡地说：“一分钟前我打电话给她，她正在从单位回来的公交车上，她想去一个可以上网的咖啡馆。”她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我恐怕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舍拉很少参加探险团队的电话会议，这次关于筹款情况也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看来她很缺乏沟通技巧。这可能会给团队带来困难，直到最后她也没有接我的电话，我给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对她说，她必须和远征队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让我看到她的进步，这样她才能够融入到这个团队中。

另一方面，芭芭拉真的工作得很辛苦，但却已经被挫折感严重打击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加纳进行总统选举，全国陷入瘫痪状态。大家对政治以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更糟糕的是，几家公司曾指责她是这个“大骗局”中的一员，他们怀疑我们是打着远征的旗号诈骗骗取钱财。甚至当芭芭拉向怀疑的人展示我的来信时，英联邦秘书长的反应是：“那又怎么样？任何人都可以写一封信。”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来说服他们。

芭芭拉似乎快失去信心了，但我尽我所能为她打气。“芭芭拉，我会想办法让你来挪威。”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帮到她。

塞浦路斯的候选人之一史蒂芬送我到安全的地方，那是曾在伦敦办事处工作的一个支持我的朋友。他是塞浦路斯石油大亨和地质学家，所以我带了几张南极洲地图去见他，希望像大多数地质学家那样，在他打开第一张地图时很兴奋。“我想见西蒙博士。”我对玻璃幕墙建筑里的接待员说。她看上去很疑惑地问：“哦，你的意思是想见卡波？”当她带我来到办公室时，她突然理解了，会意地笑了。我被介绍给一个看起来更像宽容的大叔而不像是一个富有的石油大亨的人。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我们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攀



谈。我向他介绍起这次远征，但几分钟后，卡波礼貌地打断了我，“你有南极洲的路线图吗？”当我从书包里拿出这叠纸铺在桌上时，我感到很欢喜。我们用剩下的会议时间来钻研冰原岛峰和冰流。第二天，我接到史蒂芬的电话，卡波和他的公司已经给这次远征提供了我们在挪威需要的大部分费用，一万美元。

至少现在我们可以保证，挪威行程将继续进行。我的工作确实是确保它成功。我们需要大量的设备。我需要为15个人提供服装、滑雪板、雪橇、急救包。接下来的几天，我拿着一份庞大的物品清单和供应商名单，坐在办公桌前，请求他们提供帮助。我不要求得到免费的产品，但坚持该项目要有实在的东西来作为回报。即便如此，拨打这些电话也消耗了我身体里的很多细胞。我讨厌在拨打每个新的电话号码前都要花费一两分钟的时间重拾信心。拒绝往往是残酷的，这使得下一个电话更艰难。我充分认识到，我接触的所有公司可能都要提几十个类似的要求，我不对这些小的供应商抱任何幻想了，提供免费产品将是一个重大的投资。我对否定的答复并不沮丧，摇摆不定的答复最招人烦。而且我索要的产品价值越小，我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多。为了要来16双袜子，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给一个符合团队各方面需求的主流公司提供大量关于此次远征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对数十个产品的要求，在与他们长达几小时的电话中讨论交易细节，但最终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这真使人精疲力竭。我在这么大的压力下给一个商场的营销女士打电话，可她用即将崩溃的声音尖叫说：“我没有预算！我没有多余的钱！”我决定不再次尝试接近她，因为怕她再推托。

圣诞节很快到了，但是我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赞助商。挪威方面在上周已经决定培训将在2月举行。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提醒自己，要庆祝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的所有



积极的成功，但我却又感觉像是我教大家用纸牌做房子，一切都依赖于别的东西。如果一张牌倒下，整个事情就垮了。因此我陷入了满怀信心的期待和焦虑担心的恐惧中，这一切就像幽灵一般使我精神崩溃。在新年夜到来的时候，我坐在公寓的阳台上裹着毯子，吃着斯蒂尔顿奶酪，喝着汽水和葡萄酒，看别人放烟花。我在为2010年的元旦提前做着打算。我真的要计划和另外七名探险队员一起站在南极吗？这是深深地烙在我头脑中的想法，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又不允许自己看到那么遥远的未来。相反，我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挪威。如果挪威的训练能顺利的话，我才会对去南极更加期待。

我最近遇到两个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北极战争中经过了数十年的训练，也看到许多从热带国家像特立尼达和牙买加过来的男人们经历这个过程。“他们真正的问题在北极，”其中一个解释道，“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喜欢寒冷，而是他们的身体不能习惯，有些人对寒冷有过敏反应，因此什么也做不了。”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意见，但是并没有在意，现在我考虑的是，万一这些女孩们真的无法适应环境，怎么办？因此，我要在挪威设计一个时间表，为大家循序渐进地介绍一下南极的气候、风速等知识，最好可以在短时间内让我们对南极的现实性有个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但这还不够，我曾经见过身体非常健康而又很有经验的探险者，经过数月的准备和筹款，从英国抵达北极后只待了短短几天就要回家。他们不是不能应付身体的不适，而是他们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不能思考了。这个转换空间后的效应还会引发休克，而且这种情况看上去只发生在最初几天。我告诉自己，你需要的人无论是来自热带国家、温带国家，还是零下20℃的地方，能够适应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错了，这个项目就可能失败。因此，我要找个南极洲附近的地方，我想，挪威将是女士们可以适应寒冷和学习技能的地

方，我要对她们的平安负责。

我们2009年的第一次小组电话会议进行得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充满希望，钱仍是最大的问题。媒体上全是关于信贷紧缩、全球银行危机、经济衰退的疯狂消息。这是20年来全球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而我们却要在这时寻找赞助，整个团队士气低落。艾拉收到了来自文莱文艺体育部的信，说她在11月向文莱当局发送请求为探险队募捐的信已经遗失。“我有一个副本，但他们不接受复制。它必须是原件。”她解释说。“你能送另一封信给他们吗？”我问。

“不行。他们说必须是原来的那封。”

“所以，你不能在铁道部门找到筹款的原信。他们已经弄丢了吗？”

“是的。”艾拉证实。

“真是愚蠢。那么，有人找它吗？”我问。

“不知道。他们说，他们正在寻找。”

我期待着牙买加人的消息。几天前，他们已经举行了大型募款活动——“冷锋”派对，我迫切想要知道它筹集了多少资金。当听到金姆的声音时，我感觉到一丝不安。“我们做了什么？”她说：“事实上我想我可能欠了钱。”我默默地把自己的前额贴在桌子上。这是一场灾难。显然这个事件已经失败了，许多当地的艺术家已经表演完毕，但在最后一分钟照明人员向她索要演出费。金姆别无选择，只能支付，但是当乐队听说这事时他们也开始要钱。虽然有一些门票收入，但看起来很难达到收支平衡。金姆听起来很沮丧，就像她已经放弃了。“我感觉很对不起……”她承认。我被她的消息激怒了，毕竟，我曾告诉过她，不要过于依赖某件事，让她首先搞清楚自己的动机并捋清一个思路，我说：“忘记面前的困难吧，你没有时间去分析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你必须集中精力去寻找





每一个人需要的700美元，你有什么想法吗？”

“卖蛋糕！”艾莉西亚马上热情地说：“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大学里卖。”我停顿了一下，婉转地问：“你能卖出价值1400美元的蛋糕吗？”艾莉西亚想了一下说：“我和妈妈烤了很多蛋糕。”我又把额头放在桌上。

来自加纳的消息同样令人失望。舍拉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在给的最新电子邮件中，她写道：“上帝将提供资金。”但你得给上帝战斗的机会！我再也忍受不了了。神的介入是一个不可能的筹资战略。而之后我没有再看到舍拉写来一个字母，想出一个方法来推举保荐人或是出个主意。她让我失去了耐心。加纳是迄今为止我们团队里最贫穷的国家，我预想到舍拉和芭芭拉无法找到赞助，所以在财政预算中已经加入了资助加纳参与者的计划。这不是什么问题，但我现在觉得，资助舍拉的行程将是给她免费的午餐，这也将是对所有其他女士工作的侮辱。如果在挪威的培训只有一个加纳人那将是一种对加纳的侮辱，但是留下舍拉又似乎没什么意义，因为我已经知道，她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没有办法，我不可能让她加入到南极探险队中。

芭芭拉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她真的很努力工作，即使处处受挫，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但钱还不是她唯一的问题。几个月来，尽管我不断地唠叨，芭芭拉还没有申请签证，但我却觉得是有些事情阻止了芭芭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她不想告诉我。“我去了大使馆，但卫兵在大门口把我带走，”她终于承认，“他们说我的材料不完整。”芭芭拉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遇到的尴尬事情。这不是来自队员的唯一的签证问题，艾莉西亚和金姆在牙买加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她们才申请到签证。

又是一个令人难以入眠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早早醒来，



坐在床上，盯着墙边。几个星期前，我们离开挪威，我思考着所有的事情。我知道我不得不这样做，但我感到空虚，无法找到行动的力量。我一直没想清楚，没能睡上几个好觉或放松自己，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远征的事情。我的眼中满是压力，脸色苍白，我似乎病了，而且睡眠不足，身心疲惫。我只想让这一切停止。我希望有短暂的时间让我爬进黑暗的地方休息。但我知道我不能停止。因为，许多人都在指望我能带去希望。唯一让我开心的就是知识，没有其他。我必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不得不做这个工作。

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英联邦基金会的补助金分公司，他们致力于支持民间社会组织。我曾跟基金会申请过资金资助，但远征不符合任何基础标准，我毫不气馁（很快想出了应对方案），我解释了我们目前的问题和要求，坚持应当得到资金资助，让牙买加人和加纳人参加在挪威的培训主要目的是从英联邦各处会集人，“这就是我的解释”，“这基本上是你正在尝试做的，即使严格来说，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我屏住呼吸，慢慢地思考着，当我要放下电话的时候，听到“让我看看我们能做什么”。

我的下一个举动是会见在伦敦的牙买加高级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伯切尔·怀特曼。在去年夏天，我们曾见过，而且他一直都很支持我。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帮助金姆和艾莉西亚，但我还是决定对他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的问题，看他是否能表明他的态度。他很快答复了电子邮件。“我可以提供帮助，我只需要知道申请人就行。”我长长舒了口气，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我按响了处理芭芭拉签证的加纳驻挪威大使馆的门铃，向大使解释芭芭拉的一些情况。“对不起。”领事说，“但我认为您的团队成员在撒谎，我们在大使馆门口有支认真负责的团队，说他们没有正确检查这位女士的材料是不可能的。”我惊呆了，假设芭芭拉



在说谎，这是一个多么无情的假设。尽管领事一再指责，大使还是让我安排芭芭拉亲自来一下。我告诉芭芭拉所有的细节并指示她在门口要站稳脚根。

“如果有人让你离开，你一定要要求见领事。你知道她的名字，一定要找她。不要离开，直到你见到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给我打电话，我会一直开机。”我正准备再去找签证官理论一番时，收到了芭芭拉的好消息。她已经收到了道歉信并得到了大使馆的承诺，在几天之内会办好签证。

然而，我的好心情却被金姆的一封电子邮件给破坏了。“今天，我不能去大使馆递交我的文件了，今天的交通太糟糕了。”她写道。我冲着电脑屏幕大叫起来。一周前，我就要她起程前往挪威了，更不用说我为她做了多少艰苦的工作，写了多少文字，难以置信地去和相关的官员交涉，我不能相信她怎么会这么没有紧迫感。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我确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爬也会爬去大使馆。我的沮丧变成了绝望。

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打击。我坐在床上决定回复完更多的邮件再去睡觉。彼得已经处在半睡眠状态了，他坐在我旁边，听见我对着电脑屏幕叹息，问我：“这是什么？怎么了？”“这是芭芭拉发来的一封邮件，她抄送给了所有候选者。”我大声地念给他听。

亲爱的：

由于我没有得到任何的赞助，所以我不能参加你们在挪威的训练了，我被迫退出。我已从挪威和英国大使馆撤回了我的申请，我也不会用它们去旅游。这是改变不了的，也许我能拿到签证，但是我没有钱，或者我可以拿到钱，但却不可能及时得到签证。

我付出了很多艰辛去准备这次行程，我责怪自己没有计划好而导致失败。这是个不幸的结果。我希望舍拉能作出更多的贡献，能为团队找到赞助、积极写作、好好参与培训，等等。我知道两个人总比一个好，但是在此，我希望我做不到的她可以补上。嗯，应该，可能，或许吧。如果不参加挪威的训练，很显然这意味着我不能成为最终探险队中的一员，这不符合选拔过程的要求。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但我无法掌控。

此致！

芭芭拉

这封电子邮件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挫折，我真想放声大哭，但我太累了，累得都有些木讷了。这种感觉就像整个计划都落在我头上一样。彼得努力安慰着我：“这不是世界末日。即使牙买加人和加纳人都不来，但你仍然有一个很好的项目。”我努力让头脑适应这种想法。我因为这种挫折又感到了愤怒，我给整个团队回复了电子邮件：“为什么芭芭拉不先跟我谈？就连小小的礼貌都没有吗？”

这封信有巨大的破坏力，它影响到整个团队脆弱的信心。我给芭芭拉回了一封电子邮件：“你应该第一个告诉我，芭芭拉。”

“我想我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她解释说。

“我可以看到一封发泄情绪的信件，但不应该不是你写的那样。”我强压下我的愤怒，还是安慰了她。“我们都有像这样的时刻，芭芭拉，你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心血来潮地写电子邮件。”她立刻回复我一个解释：“费利西蒂，你给了我安慰，我觉得好多了。”她写道。

我还给芭芭拉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我已经和联邦基金会在接触





中，我要求基金会支持她和牙买加人的飞行，让她可以到挪威来，现在她要做的就是搞定她的签证。

现在我觉得我已经为金姆、艾莉西亚和芭芭拉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我需要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向。还有三天时间，我将飞往挪威，我还需要准备能用一个星期的袜子、水瓶、滑雪杖、滑雪靴、雪橇以及提供给24个人两周的食物。我还要处理几篇过期的新闻稿，把它们提供给记者以便让他们及时发布我们在挪威的训练信息；我还要驾车去赛伦塞斯特收集滑雪装备，向谢菲尔德借每个人需要的睡袋和羽绒服；我还需要抽时间打印文件、更新网站；也许，如果我很幸运，我还得自己收拾行李。

每天早上，我都会收到新的电子邮件，似乎每一条消息都需要我耗费时间去立即处理。我们在Skype上交流，我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这并不稀奇，有时当我接电话时，家里的电话和手机会同时响起。那情形可真是滑稽。

很多人帮我做了很多事，我们一起努力，没有人想逃开，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中有所收获。这些日子，我都是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午夜，但时间还是不够用，还有很多其他的压力。我突然间觉得，时间就像一群狂吠的狗要将我一块一块地撕裂。我精疲力尽地为探险全职工作了六个月，没有领取任何薪水，我身无分文。

我以前从来没有如此谦卑过，这让我很担心。我的情绪时常会出现两极分化。有时，我的感觉真是激动而又自豪，有时，又会因为一点小事感到绝望和沮丧。很多人都对我们的远征寄予了厚望，因此批评在所难免。如果大家不给予我莫大的信任，那我们的探险将是虚无缥缈的。

当我正要去见彼得时，保罗·迪根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开着借来的路虎，带着我们所需的设备，自愿和我们一起去挪威。我

又对他发了整整一小时的牢骚，他告诉我，一个著名的游泳教练曾经说过：“一旦你站在出发台上，你就必须带着坚持下去的信念站着。”他的意思是说，此刻你就要开始比赛了，不管你有没有参加过训练，选没选好参赛服装，你都没有选择，重要的是，你要继续比赛。

这个建议让我冷静下来，我们把路虎和拖车装好，拖车是我父亲在临行前最后一刻答应提供给我们的。它很早就已经罢工了，后来被改造成一个旧的拖车帐篷。它看起来像一个老式的商队用车，前半部分被切了下来，还配有橱柜、地毯和一个功能门。虽然让人看了很难克制住发笑，但是我很兴奋，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父亲甚至沿着车的边线骄傲地贴上了显示探险队网站地址的大红字母。

我做了一个完美的手势。路虎终于要向渡口出发了，我也回到了家。新西兰的夏尔曼告诉我，她即将登上飞机，飞到挪威。这个行为有些古怪，有一部分人已经在路上了，这就好像有人把一枚硬币放在一个老式游戏街机里，一旦你投进硬币，动力机制就不能停止，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你无法控制和预料的。我感觉我刚刚就放入了这枚硬币。

在挪威，我不确定谁会影响到我们的训练。芭芭拉到那里了吗？金姆拿到她的签证了吗？她们现在能胜任吗？我抵达斯坦斯特德机场之后，找到了摄影师罗伯、影片摄制组成员艾尔和艾略特；他们站在一堆引人注目的行李旁，我注意到他们有些焦虑。我是不久前才认识的艾尔，他和他的生意伙伴艾略特都是登山爱好者，他们的专长是在艰苦的地方拍摄影片。罗伯是一个摄影师，他曾和我一起参加过之前的探险。这人的背景很有戏剧性，他有时很爱炫耀自己，这很让人担忧，但他是个可靠的人，乐于助人，而且能拍出很棒的照片。我们相互问候。他们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





帮助我，我很感激。

接下来抵达的是海伦，她从自己在德比郡的家出发经长途旅行到这儿，紧随其后的是两个志愿训练员——莎拉和马克。我是在第一次海外探险时认识莎拉的。她是一位格陵兰岛的专家，现在经营着自己的旅游公司，专门从事极地旅游。马克是一个认识他几分钟就会让你觉得已经认识他很多年的人。一年前，我培训的团队和他所在的团队曾是竞争对手，我们曾比赛穿越北极圈。这是马克第一次扮演教练的角色，虽然我知道他肯定会很棒，但我觉得他还是有点紧张。

机场验票领取登机牌的设备出现了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着短裙、脚踩高跟鞋的年轻女孩站在航空公司的柜台旁，用手持扩音器大声地喊着下一班将要离开英国的飞机。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同时试图减少行李的重量和包裹的数量。我把沉重的雪地靴递给面前的队员，让他们穿着它们上飞机，而把他们自己的鞋放在手提箱里。雪地靴就像超大雨靴，有着厚厚的橡胶鞋底和衬垫，每个都重达一公斤。

准备登机了，终于叫我们上前检查了。我没有时间去争论超额行李费的问题，总共费用超过500英镑。我刷了信用卡，眼泪在我的眼睛里打转。这都是我自己的钱啊，现在探险队经费紧张，这种错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通过安检时，我们和机场发生了冲突，安全门突然关闭了，艾尔和艾略特不得不脱下沉重的雪地靴露出袜子。那种场面非常尴尬，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到达机舱门口，递上我们的登机牌。最后一个艾略特，他还没到，我回到登机口去找他。艾略特站在登机口旁，手里拿着靴子。“这是我的护照。”他结结巴巴地说，看上去好像他就要大哭起来，“它1月份到期。”“对不起，”门口的乘务员退还了护照，“你不能旅行了，

你的行李也将被送离飞机。”艾略特和我恐慌地看着彼此。在等待托运时，我收拾了两三个包放在他的行李中，结果，现在一个都带不走了。这已经够糟糕了，现在看来，没有艾略特，也就没有了摄影设备，艾尔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拍摄的。

我们旅行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就已经有两个重大的灾难发生了，超重行李和艾略特的护照问题。虽然不是我的错，但不知何故，我的信心备受打击，是不是我终究不能胜任呢？登上飞机，我给艾略特打电话。艾略特已经前往伦敦了，他试图在去挪威前得到一个新的护照。他在机场买了一双雪地靴，把他的鞋留在机场了。更糟糕的是，飞机返送的袋子里还包括工具箱。离开艾略特，设备严重缺乏，但艾尔仍然可以使用照相机进行拍摄。它的效果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摄像并不是探险项目的关键，但是我用信用卡支付的500英镑超额行李费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从哪儿能找到钱来偿还账单呢？我决定不让自己再去想它了。这只是整个关键而又复杂的培训活动的第一天，我要集中注意力期待未来的两周。



第十章

{

,

ω

背包和雪地靴

第5章

我带着挪威的培训人员和摄制组在其他女性到达的前一天抵达了挪威，彼得开了辆路虎从英国赶过来，中途他还在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小火车站里收集了一些设备。等到整个训练团队的成员都到齐后，我们便开始缓慢地爬上这座高原。车头灯照在窄窄的堆着积雪的马路上，黑暗中的我们只能看到前面一点点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停在一个已经被雪掩埋了一半的黑暗小屋旁。我们已经处在哈当厄高原最高的地方了。小屋是一个家族性质的招待所，在严冬时节它通常是不对外营业的。但业主已被我们说服，可以让我们在这里住上两个星期。这里没有我们预期的一些特别待遇，但主人家显然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窗户上的雪已经扫去，门口的雪堆也被清理干净了，主人的态度也很亲切，还为我们准备了晚餐，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深受感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我是第一个醒来的人。透过清晨灰色的光线，我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小屋周围排列着松树制作的舒适的毛绒动物挂件和彩绘的哈达普水库，从窗口看出去的景观就大不一样了，小屋中间是一个能够控温





的大餐厅，有一个带石壁炉的大厨房，还有一个会议室可以当作训练场地，还有一间小办公室、一个卫生间和几间卧室。艾尔占据了最大的卧室，作为临时的编辑工作室之用。

候选者们住在被几百米的积雪从主屋隔开的一幢长条形建筑里，小屋里自带独立的卫生间。我对自己微笑了一下，小屋的规模和布局令我感到非常满意。

昨夜起就在旺盛燃烧的火苗仍在餐桌旁不停地闪烁，我又往栅栏里扔了几块木头，捧起一杯香浓的热咖啡，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笼罩着大地，我印象中的哈当厄高原是那样狂野，放眼望去，在目力所及的地方，除了一个六米高的木罐坐在对面山顶的小屋上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文明的标志。雪云遮住了远方的地平线，于是很难分清楚哪里是阴沉天空的尽头，哪里是被积雪覆盖的群山的起点，就好似一碗奶油浇灌在了水果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雪花依旧扬扬洒洒地飘落着。光线慢慢地转移到光滑的、完美无瑕的地平面上，这种毫无瑕疵的空旷使大脑不得不费劲地运转，才能找到一点透视感。

你一言我一语的阵阵骚动过后，大家很快在用餐区的一个长桌前坐下，各自端着杯热茶，落实每个人的工作，为候选人到来的那天做准备。傍晚时分，我开着路虎，去接从奥斯陆开来的列车。两位教员——吉姆和乔已经在奥斯陆机场见到了候选女士们，并同她们一起坐上了火车。乔是全能女子队的一员，两年前，我和她们一起携手穿越了格陵兰岛。她也是一位中学教师，所以非常善于进行团队管理和处理意外事件。吉姆是莎拉的丈夫，我们很早前就认识了，我们俩做了近十年的英国南极调查。吉姆曾发来短信说，他们遇见了这些女士并赶上了列车，但他没提有多少人和他在一起。所以我和彼得、罗布紧张地等在站台，直到那时，我们仍旧不知道到



底谁会下火车。金姆能及时拿到她的签证吗？芭芭拉会在那里吗？我在站台上踱来踱去，煎熬地度过每一分钟。我盼望这一刻的到来已经太久了，它怎么可能无法实现呢。我眯起眼睛看着铁路的方向，希望能看到迎面而来的火车灯。我站不住了，部分原因是我的外套透着冷气，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兴奋。

轨道那边开始传来呜呜声，我从站台边缘退了回来，看着渐渐逼近的车头灯。火车进站了，缓慢的速度足以让我看清每一扇窗户。我在寻找一群熟悉的女人们的面孔，但什么也没有看到。火车停了下来，人们纷纷往车门外涌。我抬起头走下站台，寻找我熟悉的人，却没有看到她们的影子。我开始沿着火车往前走，感觉身后出现了相机的闪光灯。我转身一看，火车头的门口有一群把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缩成一团的人。她们在这里！我跑向女孩们，开始挨个跟她们拥抱。起初很难分清楚谁是谁，我所能看到的是她们大大的帽子、皮毛头巾和羊毛围巾下灿烂的微笑。现在有丽娜和梅兰妮，艾莉西亚和雅典娜，金姆，还有芭芭拉。所有人都在这儿。看着她们在冰雪覆盖的站台上拖动手提箱，肩上挎着背包，我感觉这个团队充满了希望。当这些皮箱被粗暴地扔到路虎的车顶上，我顿时沉默了。在这个冬天，这样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女人聚在挪威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这里虽然不是南极，但感觉和那里不相上下。

“她们是一群令人敬畏的女士！”乔喃喃自语着，走到我身边，“你已经选好了。”我微笑着默认了。经过四个月的训练，芭芭拉看起来很好，文莱的安尼塔和印度的瑞娜聊得眉飞色舞。夏尔曼跳到路虎的车顶上帮助保护所有的行李。她们看上去都很轻松，好像彼此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哈当厄高原正以它特有的方式欢迎这群女人，高原上的暴风雪就要来临了，因此从山谷通往我们小屋的唯一道路被封闭了。彼得



跟经常在哈当厄高原上行驶的扫雪机司机交谈，他们同意尽可能把我们带到小屋。但一些女士不得不坐在扫雪机的驾驶室里。三个女人在扫雪机的驾驶室里带路，路虎在后边跟着，第二台扫雪机带着另外三个女人。挪威的司机带着这些外来的女人和背包，感到既惊讶又欣喜。这个扫雪机是个巨大的、像大货车一样大小的机器。比人还高的椭圆形推铲带着锋利的刀片焊接在前边，刀片穿过堆在路边的雪堆。黑暗中羽毛状的雪片漫天飞舞。路虎紧紧地跟在领队的扫雪机后面，但即便如此，在暴风雪完全挡住视线前我们也没走多远。我们能看到的都是扫雪机上闪烁的灯光，以至于把路虎前面的雪都映成了橘色，看上去我们像正驾驶着一个大火球，这样的景色很富有戏剧性。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焦虑的，寂静笼罩了车子。我转过身看着她们的脸，安尼塔离我最近，她的眼里透露着恐惧，她的嘴半张着。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雪。

一到小屋，大家就迅速往屋里跑。当有人偶然陷进厚厚的积雪时，她们就相互帮助，还要防止雪刮到脸上。终于，大家高兴地关上门，把暴风雪挡在了门外，享受着温暖的火炉。当候选者们开始进餐时，莎拉和马克已经准备给他们讲讲今后一周的计划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警告她们要早点开始，不能拖得太晚，并且强调训练会一步步地进行。我知道哈当厄高原相当可怕，当早上醒来发现我们是个完全孤立的群体的时候，我有点担心这些女人的反应。坐着越野车到小屋这段短短的距离就足以让几个女人紧张了。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更恶劣的环境将出现在这个周末，非常可怕。“这是一个选择，但绝不是竞争。”我告诉她们。“不是说要挑选谁最适应或者谁最快，而是要创建一个最佳的组合，一个团队。所以你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做你们自己。我知道这样很难，但请尽量忘掉你们所面临的挑选，只要享受在这里的时光就好。”



第二天早上，当看到这些候选者们从小屋穿过雪堆在宿舍区前出现的时候，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们都穿着大夹克和前一天晚上新赶制的雪地靴，有几个仍然紧紧地抓住手提包来帮助自己抵挡风雪。一些人在中途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们周围的环境，在这么严峻的状况下，她们低下了头，决定继续坚持。我想，集训第一天早上，走到距离小屋50米的地方就算是一个迷你的远征了。

早饭后，大家聚集在会议室里，守在一个温暖的大火炉旁，第一课要讲的内容就是关于寒冷天气的伤害。这么早安排这次演讲是为了吓唬一下这些女人们，但我不能冒险让她们在外面待太长的时间，得让她们尽早知道寒冷的危险性。我们借鉴了所有人的经验，譬如发生冻伤、体温过低、雪盲症之类的损伤该怎么办。其他症状都不明显，但更常见的是危险的水疱、不良卫生和脱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寒冷的天气中，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过热。运动后出汗或穿太多层导致衣服湿了，在寒冷天气下，那些水分就会冻结，这可能会导致严重冻伤或体温过低。在0℃以下穿得过多时，候选者就要运用与大自然战斗的人类本能。她们还要意识到，要保持自己的袜子和手套干爽，这样可以保护手指和脚趾不被冻伤。教员要确保女孩们有备用手套和袜子，并检查她们的穿着是不是干的。但教员不能确保每样都照看得周全，大家必须每晚把自己的衣服烘干。如果她们要去南极，女孩们就需要学习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

讲座过后，我们把椅子拉到一边，让大家离开。女孩们翻出用于训练的服装。房间里很快就充满了半裸的女人，羞涩地换上热乎的内衣裤和防风外衣。我曾试图通过候选者发送给我的电子邮件中的尺寸来准备服装，但女人总是很难按小号、中号和大号来分类，这些人也不例外。每个人都穿好衣服，戴上护目镜、手套，穿上雪地靴，然后一起到外边雪地里转了一圈。



其中两名候选者在来挪威之前从未见过雪，大多数人都是在度假中或者短暂经历过一场反常的降雪。对于她们来说，哈当厄高原简直是令人窒息的，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上落下来，我让她们分组堆雪人。我无意中听到来自牙买加的艾莉西亚的叹气声，觉得很好笑。“雪不会粘在一起！”她怒气冲冲地一次又一次把她手里的白色粉末扔出去。她注意到我正在看她，“我想做个雪人头，但总是滑下来。”她告诉我，“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雪人变成了富有艺术感的雪天使，许多女孩停下来，像是接到命令似的向后倒在雪地上。在冰冷的雪地里故意挣扎着，可能这样给她们带来很多乐趣。但是一个接一个地，整个队伍很快就扑进了雪堆里，打着、笑着，大家都像孩子般嬉戏着，留下了天使般的背影。培训演变成了一场不可避免的雪球大战。女人们相互把雪扔到对方的脸上，追打着，沉重的雪地靴阻碍着她们。最后大家玩累了，也热了，红着脸回到小屋。在寒冷的早晨，她们呼出的热气缓缓上升。她们要开始上第一堂课，在零下20℃的情况下怎样取暖。

第二天晚上，艾略特到来了。带着新护照，他在飞往挪威的航班起飞的最后一分钟从伦敦冲了过去，制造了一个奇迹。当他走进这间装满了超过20个兴奋又吵闹的女人的小屋时，看上去有些晕眩，但很快就平静下来。

第二天是让候选者滑雪的时间。吉姆在小屋里进行了一场与滑雪相关的理论知识讲座。我们来到外面，准备将理论付诸行动。我们使用的越野滑雪板是较典型的下坡式样。越野滑雪板是专为步行设计的，虽然脚趾被固定，但脚跟是自由的。绑带使用简单的塑料制品固定住一只女孩们穿的雪地靴，问题是，大部分候选人的脚很小，而雪地靴太大，许多女孩发现她们绑的地方是空的。以艾莉西亚为例，我看见她的脚从靴子里滑出来好几次，以至于她直接穿着



袜子站在雪里，而这样对滑雪显然是很不理想的。

其实，越野滑雪比滑降滑雪要好学得多，因为越野滑雪就像我们在平地上走（越野滑雪的姿势有点儿像穿着袜子在光滑的地面上滑行），但滑冰是需要时间去习惯的，而且对人的平衡性也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在上下坡的时候。尽管困难重重，而且大多数候选者是第一次滑雪，但候选者们大都做得非常好，可以很清楚地在她们的脸上看出专心致志和雄心勃勃的样子。尽管跌倒了很多次，但是发生的跌倒远没有我预想的多。特别是金姆，我感觉她学习滑雪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因为多次跌倒，金姆的头发已经被厚厚的雪糊住了，羊毛帽搭在她的脑袋上，她每跌倒一次，帽子就有掉下来的可能。“我的腿完全不听我使唤了！”她抱怨道。当我正在安慰金姆的时候，芭芭拉重重地摔在我的旁边。我把芭芭拉扶了起来。她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我冲着她大笑。“只要我一开始滑雪，我就感觉这雪也立马跟着动起来，是我哪里做得不对吗？”芭芭拉说，“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能控制了。”芭芭拉又坚定地点着头，认同了自己的观点后，她又开始了一次新的滑行，抵达了几米外的雪堆里。

我们的第一次滑雪学习实践活动虽然很短，但回顾这一天，我们在外面的练习和交流还是让大家收获很大的。渐渐地，大家在户外穿得越来越少，当大风卷着地面的雪盘旋而上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女孩儿们跌倒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哈当厄高原的三天时间里，她们可以分小组在营地附近进行短距离的滑雪了。同时，她们也一直练习着上山的滑坡滑雪。

下午时分，天再一次变得阴沉。当雪花开始飘落的时候，我们慢慢地蜷缩起身体。

候选者们需要学习怎样搭建探险的帐篷，没有比在挪威的大风



雪中更好的学习机会了。我以往探险活动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计划把同样的帐篷带到南极洲去。这些帐篷可以容纳四个人，有四个点可以固定在地上。这种帐篷在设计上考虑得很周到，帐篷里有为睡觉设计的大的隔离区，而且在帐篷的前后还分别有用于做饭和储藏的大空间。

在南极，这些帐篷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帐篷，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待这么长时间，暴露在冰寒地冻的环境中，我们有可能受伤甚至死亡。快速搭建帐篷是很紧张的，站在南极恶劣的环境下讨论问题也是非常残酷的，呼呼的大风，夹杂着雪片在脸上飕飕地划过，使得任何沟通方式都变得异常困难。因此，预先设定一个搭建帐篷的计划，从而确保每个队员都同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好的方式。乔是我们原来穿越格陵兰岛队伍中的一员，因此，乔和我一起为候选者们演示我们的搭建帐篷计划。在被分成四个小组之前，那些女孩儿们看得非常仔细，并且尝试着自己搭建帐篷。当我们与不断猛烈呼啸的大风对抗时，所有被训练的人员都得能帮上手，但前提是，她们做的是正确的，特别是当她们所有人得知今晚我们要第一次在帐篷里睡觉的时候。

夜幕降临，狂风继续呼啸着，气温已骤然下降，临时营房外面挂着的温度计显示，已经降到了零下27℃。吃晚饭的时候，女孩们都显得格外安静，可能是对即将在帐篷里度过的黑夜感到紧张。我们已经为她们准备了在夜里做好保暖措施的相关物品，分享了培训人员基于实际经验已经学到的技巧，同时提醒她们如何避免错误再次发生。队员们携带好甜食、热水壶、顶头灯和暖和的帽子后，不情愿地走了出去，开始探险活动的实践。大家离开临时营房，分成各小组去找她们的睡袋，这些睡袋是早已安放在帐篷里的。



所有的候选者都已经在帐篷外面了，而在临时营房里面是一个安静的夜晚，也是一个计划未来几天安排的好机会。我想要带她们进行一次临时帐篷外的小型探险活动实践，以便让她们能找到真实的探险活动的感觉。我展开一张本地区域的地图，愉快地看着金姆和彼得。每一个夜晚，我们都想在临近公路的地方安营扎寨，因为在山洞里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在白天，我们要把候选者们送到哈当厄高原的深处。每一位受训人员都被分到三到四名女性组成的小组里，以便以小组形式分开进行滑雪活动，虽然所有人都沿着相同的路线行进。女孩儿们也会轮流拖动一个雪橇，这个雪橇上承载着一个小组三天的物资供给，包括燃料、食品、睡袋和帐篷。雪橇不能承载太重的东西，因为拖着雪橇滑冰是需要万分小心的（这也是通过我自己的雪橇实践得来的经验）。而且考虑到候选者们接触滑冰只有两天时间，所以对她们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了。当她们到达南极时，女孩们在帐篷里要用到燃烧固体燃料的炉子。艾尔已经在外面对炉子进行了全面检查，直到每个人都认为炉子是万无一失的。当然，在帐篷里用炉子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我就看到过用炉子取暖的帐篷不小心被烧得一干二净。我对在帐篷里使用炉子这件事感到很不安，但我必须让女孩们尝试一下。在南极洲，她们需要掌握使用炉子的方法。所以，如果现在不相信她们能够掌握使用炉子的技巧，是很愚蠢的。

为了赶上需要完成的宣传工作的进度，我在临时营地后部的小办公室里彻夜工作。八个国家的媒体时刻跟进着候选者们的表现，并且非常热切地想知道她们现在在做什么，怎样去做这些事。虽然感到很疲惫，但我觉得只要能让我一个人单独待上一会儿就很好。办公室在灯光映照下让人备感温暖惬意。萨莎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师，瞬间变出一个巧克力布丁，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我在撰



写探险活动播客的间隙，拿着大勺子吃布丁。我要求每个女孩把对探险活动的想法写下来，我再把她们写的一些东西转载到网络上。

“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划木舟。”重新加坡来的琳达在她第一天的滑冰体验日志上写道，“当我滑冰的时候，尽管雪花无情地吹到我的脸上，但是一旦专心致志并且掌握好前进的节奏，那一切都不成问题，你会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释放。”

网页的点击率每天都超过了两万两千次，我从未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正在关注我们计划的进展。不久，挪威的媒体也对我们的计划表示了兴趣。当我们的小组准备在第二天继续小型探险活动的时候，一个来自挪威国家网络的摄制组抵达了，同时还有来自当地报纸的记者们。在帐篷中安然度过一晚的候选者们非常渴望去进行一次真正的探险活动。雪橇又被装载上物资，并且被捆绑好。候选者们有的已经站在了滑雪板上，有的在临时营地前进行爬上爬下的短途滑雪练习。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出发了。每一位受训人员跟着各自的小组离开临时营地，向临时营地的北边出发，所有小组同时出发。很快，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障碍物——一个很长但是相对平缓的下坡。这个下坡没有之前候选者们训练过的坡度难，但是她们开始得太匆忙，再加上摄像机给她们带来的额外压力，还有第一次带着雪橇滑雪，因此对她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几分钟后，远远望去，斜坡上到处散乱着候选者们和她们所带的雪橇。候选者们在深深的雪地里望着天空，艰难踉跄地前行着，其他人已经把腿从滑雪板上松下来了。当我看到摄制组忙着拍摄这次“灾难”的时候，我的脸抽搐了一下。现在我意识到，应该让摄制组改天再来。而候选者们对此却并不介意：她们始终微笑着面对摄像机，尽管摄像机记录下了她们摔跤的各种窘态。好在没有人受伤。她们突然意识到，要想到达山脚，每一个人都必须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前行。这是个阴霾



天，大风夹杂着雪花，每样东西都被冰雪包裹着，我们的视线变得模糊。所有队伍都向着同一个目的地进发，每个小组在受训者的带领下，不时停下来休息，以确认是否有人会因为长时间滑雪而变得太热，或者是否有人因为长时间停留而变得太冷。进程于是显得很慢，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抵达计划的野营地点，而这个野营地点距离临时营地只不过4000米。下午的天气变得更加恶劣，大风拖拽着物资，以至于女孩们只能挣扎着搭建起帐篷，又冷又湿的雪不断划着她们的脸庞。当进入到帐篷里生起炉子做晚餐时，大家都欢呼雀跃起来。

第二天早上，女孩们吃完了早餐，准备出发，我围着营地转了一圈，看看周围的情况。我看到从塞浦路斯来的雅典娜正倒着走路。营地临时的洗手间嵌到了雪地里。“如果一周前有人问我是否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会说‘你疯了吗？’”她故作夸张地摇着头，笑着说。在严寒中生存对雅典娜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表达出她所有的兴奋，她经常会在探险活动的途中发表自己对恐惧和所畏惧的事情的看法。这里不是雅典娜的世界，但是我知道她为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和从未放弃的决心感到骄傲与自豪。

我钻进了一个帐篷里，跟来自印度的阿帕玛聊天。一整晚，阿帕玛一直在跟我讲故事。“当外面呼啸着大雪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还有鼻子，因为我的鼻子撞到了帐篷的墙上！”她笑着说，“我一直以为我的鼻子已经被冻掉了！还好，它还在。”她耸了一下鼻子，我只在帐篷里待了几分钟。但是当阿帕玛的队伍在她周围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她看起来似乎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我决定跟着阿帕玛的队伍一起滑冰，以便我有机会可以看看她的队伍是怎样行进的。

我们是最后一个出发的队伍。当来自塞浦路斯的史蒂芬和来自文莱的安妮塔先行出发后，我和阿帕玛一起跟在她们后面，其他



队伍都在我们前面绵延行进。阿帕玛带着雪橇转了第一个弯，当我在她旁边的時候，阿帕玛愉快地跟我聊着天。“雪橇并不是个问题。”她自信地说道，“我很高兴这是靠我自己的力量，这条路是我为团队开拓的，同时，我知道我并不比其他的队友强多少。”她朝离我们最近的营地目标兴奋地挥舞手臂。“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不认为你该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角色里，只承担一项任务，无论何时，都要学会角色调整。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团队中有人特别擅长生炉子，以至于团队里所有人都靠她一个来生炉子，那么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人受伤了，需要其他人来生炉子，可其他人都已经忘了如何去操作该怎么办。所以，你可以有一项专长，但你还需要有能力做其他的事情。”沉默片刻后，阿帕玛说：“我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会经常祈祷，可现在，这里的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很难。但是，我必须多听，多尝试。”

她的回答充满了智慧和诚实，这让我感到很惊讶，这也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她的原因。白雪映衬下的天空变得格外蓝，夹杂着稀疏的云朵，阳光从各个方向照来，闪闪发光。在平缓的山坡上，我可以把队员们尽收眼底，还能看到宽阔的山谷与悬垂的巨石上镶嵌在冰岩中的厚如帽子般的白雪，那山谷的尽头突然急剧下降，使我们可以俯视到一个巨大的碗，并绵延数英里。而其他组现在那么远，只是微小的多彩的圆点。

自从离开营地起，我曾试图改变这种散兵游勇的队伍状况，但因为每人之间的差距，进展很缓慢，不得不无数次地停下来调整服装、雪橇，以确保安全。我试图强行规定每40分钟停止一次，但五分钟后我们便再次停止，调整滑雪姿势。我反复强调：“我知道这很难，但我们需要减少停止。如果事情的确错了，也不要立即停下来，要学会等待，直到我们的下一次休息时间。我们只需要保持40



分钟。如果你提前做好准备穿着合适的服装，就不应该有任何需要休息的时间。”

阿帕玛是最糟糕的，多次停下来换服装。尽管我们曾经有过坦诚的对话，但她还是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不耐烦地说：“但应该怎么办？你说我能不出汗吗？我必须换衣服。否则我根本无法滑雪。”我试图用前置的思维向她解释，开始穿得少就不会出汗。我再三拒绝让她们停止休息和调整服装。阿帕玛在这个过程中摔倒了，坐在地上怒视着我，好像在说“看你做了什么？”我不理她。延长每次停止之间的时间是任何一个想去南极的队员必须学会的技能。

天空开始布满球状的、像一个个大碗一样光洁的云朵，天空和雪的颜色连到一起，一望无际的白色笼罩着大地，风追逐着飘在地面上的雪。我帮助女孩们遮盖住她们的脸，让她们在严寒中保护好自己的皮肤，我们开始攀升另一侧像碗一样的缓坡，一点一点地升高，直到广阔的视野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它仿佛在说，它知道我们一定会来。

在宽阔的山顶休息时，我们遇到了其他组员，史蒂芬已经接管了拉雪橇的工作，她工作很负责。下山时，每次摔倒后她都会反复检查。太阳重新出现在雪地里，映出雪的涟漪，金黄色的光和柔嫩的雪交融在一起。偶尔遇到的狂风在我们的脚面上吹动着，雪在飘舞，犹如鬼魅般的幽灵。

我们决定四人一组滑过山峰，然后再寻找下坡的路，我们看到其他小组已经下去了，并且支好了帐篷。天渐渐黑了，我们都在打冷战，任何一个简单的滑动动作都会让我们很快倾斜，我们四个人一起下了山，我注意到阿帕玛回来了，但她遇到了麻烦，下坡滑行时，她无法控制好自己的速度，致使她的雪橇已经呈现一个V形，她



又开始加速，可她的雪橇已经越过安全线，于是她猛地摔在了雪地上。

我决定给她一些建议，和她一起滑下去，但她拒绝了。我能够理解她的恐惧，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克服恐惧需要很长的时间。我试图说服她换另一个雪橇，但她还是拒绝。“阿帕玛，如果你继续努力你会变得更好。”但没有用，其他队员还在严寒中等待，所以我让她们先走了，我看着她们到达营地搭好帐篷，而我们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阿帕玛继续拒绝任何使她下山更快的技术上的帮助，我放弃了说服她。那天晚上，我发现史蒂芬在营地周围使劲跺脚、挖雪时还恶狠狠地推搡着帐篷周围的锚。“她是不可能做到的！”史蒂芬怒气冲冲地来回走。“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她却只是坐在那里！”她指的是阿帕玛，我理解她的无奈。在南极，所有队员们都有可能在某件事情上被触动焦躁的神经，我们必须学会克制。我问自己，史蒂芬在未来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来自牙买加的金姆也是一个隐忧。我费了很多工夫帮助她梳理生活中的杂乱无章。我跟她进行了多次重要的谈话，告诉她要看好她的背包和服装。有很多美好的日子通常都是在寻找衣服中开始和结束的。

“我认为在这里最困难的事情是滑雪。”她说，“实际上最困难的事情是搜寻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在家里我只穿一层必须穿的衣服，而在这里我必须三层一起穿。”那天晚上，她找不到她的帽子。第二天早晨，当其他队员进入她的帐篷时，发现帽子就被她睡在身体下面。

探险的最后一天，我们觉得应该庆祝一番。风停了，太阳也出来了，喜怒无常的白色世界变得宁静了许多，我们慢慢被这呈现出原始景观的闪闪发光的白色晶体迷住了。我们回到冰冻的小湖旁的木屋边，搭好帐篷，吃午餐。我们划定了跑道，准备进行小组拉



雪橇比赛。候选者分列左右轮流拉雪橇。当然，马克和吉姆负责装货。女孩们欢呼着束好背带，为她们的小组加油打气。

来自牙买加的艾莉西亚非常值得关注。毫无疑问她有足够的决心，她脸上的皱纹显示了她坚强的意志力，但是她却不会拉雪橇。她不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来自文莱的艾拉比她更小），这里的问题似乎是她太灵活柔韧了，每次拉起雪橇或是准备推动它向前时，她都会像稻草对折一样弯曲臀部，而雪橇却不会因此移动。我们让对侧的伙伴放慢速度再给她一次机会，但即使这样她依旧快不起来。她的问题令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最初更担心艾拉，作为团队里最小的队员，我担心她是否拉得动和探险队中其他队员相同重量的雪橇，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她显然期待我的关心，并告诉我她能做到。另外，教练在谈论对她们的印象时，也注意到艾拉的耐力很让人钦佩。

时至下午，我们靠近了小屋。太阳落山了，大家的脸蛋就像浸泡在天空中被染色的雪，红里透着紫，我们放缓了速度，没人希望旅行结束，队员们在门边卸下滑雪板，谁都无法猜测彼此的想法。但选拔还没结束，每个人都在想：明天，谁会离开？

晚饭后，我来到候选者的小屋，把她们彼此分开，这样我就可以和她们进行私密性的谈话。教练员们也都花了尽可能多的时间了解我的女孩们，所以我很愿意征询他们的意见，我要知道谁能更好地完成团队的任务。我们围着火炉坐着，享受着一瓶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威士忌。我环顾四周，面前的教练员们看起来都很失落。一周相处下来，大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对于大家的辛勤工作，我很感动：彼得每天数次驾驶路虎奔波在变化莫测的道路上；艾尔和艾略特曾踏在没膝的雪地中，扛着沉重的相机和设备冒着暴风雪反复拍摄；我在办公室更新着网站信息；莎拉为我们的小商店制作了



很多蛋糕和饼干；马克、吉姆和乔曾长时间站在严寒中鼓励大家。没有他们的热心工作，挪威之行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一致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候选人们都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胆量，每一天，我们都在她们身上增加了额外的复杂训练。我想知道，这样的训练能否进行得更长远。看到女孩们脸庞上的裂纹，我知道如果今天有人想回家，我很理解。事实上，一些候选者也正做着自我挣扎，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接近南极并向南极冲击的机会，她们充分地享受着自我。过去，我曾领导过经验丰富的北极探险队，那些女孩们的适应力和她们显然差不多。我精心挑选出来的教练员向我表示，他们不希望我淘汰任何一个人，因为所有候选者都尽了全力，而这种淘汰近乎残酷。

我们首先谈到塞浦路斯。教练员们肯定了我的直觉，史蒂芬是正确的选择，而失去雅典娜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虽然她显示出了极大的勇气，通过了所有的训练，但残酷的事实是：对于远征南极，她仍然没有信心。她需要得到更多安慰，而这对于其他团队成员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新西兰的候选人，大家的选择基本一致，我们也很喜欢梅兰妮和夏尔曼，特别是夏尔曼，是更强健的一名候选者。文莱的艾拉已经用她超人的耐力和实用性给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样明显的是新加坡的选择，索菲娅已经在她的小组中脱颖而出，她的冷静、高效率影响了我们，而丽娜却显得冷漠。没有任何教练员担心芭芭拉，她的身体很棒，而且总能给大家带来欢笑，她总是很自然地第一个鼓励其他遇到困难的人。牙买加的选择已经是决定性的了，在雪橇比赛中艾莉西亚的表现很糟糕。她无力拉动雪橇行进，然而对于这一点，虽然她表示很喜欢这项运动，但通过讨论，我们认为金姆将是更合适的人选。大部分导师会说她不合适，



虽然她很有优势而且很健谈。后来，我们发现尽管金姆很努力，但她滑雪时还是有些困难。而我们在本周注意到一个显著的变化，她努力练习而且提高很快，“也许她已经鼓足勇气，显示出了她的优势，在团队中她变得更适应、更自然了。”

我们决定，应该为金姆留下一个机会，但我还需要更多地了解金姆的想法。最困难的是对来自印度的候选者的选择，无论是瑞娜还是阿帕玛，显然都不太合适。阿帕玛很有意思，她擅长拉雪橇，而且精力旺盛，但在某些情况下，她和她的队员们又容易产生小摩擦，我们考虑留下瑞娜，她同样很坚强，但是因为今年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带队跋涉在喜马拉雅山上，因此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大家都觉得，她没有为团队做出太多的贡献。我想回到印度去采访其他的申请者，或者重新公平地考虑一下，再给瑞娜一个机会。

如果我决定不选择她并向她解释清楚，那么她还有很多机会和其他团队接洽，以便得到其他工作机会。我们谈完话后，大家都渐渐进入梦乡，而我却无法入睡。明天的谈话将会更难。面谈之后，我将电话通知不合适的申请者，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人。

早餐过后，我召集所有的候选人，并告诉她们：“今天我们将有一个艰难的选择，你们中的七个人将要离开我们，今天我要和你们进行一对一的面谈，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能带着所有美好的回忆离开挪威。”我要求候选人们待在住宿区，一旦叫到她们的名字，她们就要进入我的房间和我单独交谈，而教练员们则陪伴其他女孩在外面等候，我不希望有人把坏消息告诉给与自己来自同一国家的伙伴，我希望她们都能听到我的心声。

我第一个见了雅典娜，因为她告诉我她很担心，我知道她很紧张。她走进来，坐在我面前，突然间，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尴尬让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在这一刻我需要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一边，



“其实你是很值得我们信赖的，”这的确是我对雅典娜的感受，当我告诉她这个消息时，我看到了她脸上的变化。我不知道我的选择是不是让她很意外，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当我们结束谈话时，她开始大哭起来，我试图擦去她的眼泪，不忍看到她如此伤心，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她抽泣着趴在我的肩膀上，“谢谢你的探险。我多么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乔也过来给了她一个拥抱，雅典娜还在抽泣，她被引导着走出小屋。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正如预期的一样，这样的选择真的很难，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

把消息告诉史蒂芬时我又一次哭了，这次她睁大眼睛看着我们，片刻后她跳起来，拥抱面前的每一个人，泪流满面。在她离开时，我提醒她，放弃雅典娜也是无奈之举。史蒂芬明白了，我知道我可以依靠她，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艾莉西亚的反应也令人心碎。我解释说：“其实到最后，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拉雪橇的同伴。”她恳求我重新考虑一下并向我许诺她一定能够拉动雪橇，她努力让自己忍住泪水，但泪水最终还是不争气地涌了下来。当明白了这一决定时，她还是擦了擦眼睛，面带微笑，起身离开。“好吧，我学到了很多，我将永远心怀感激。”我们再次拥抱在一起。

不久后，金姆进来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次艰难的谈话，我告诉了她好消息，但我也需要让她知道，她能有今天的位置取决于她向团队所展示出的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的个人能力。“在一开始时，你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我对她解释着，“我们看到，你这周一直在努力。你的滑雪变得越来越好了，你认真学习了系统的知识，但是，你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相信，你一旦适应了那里的工作将会非常出色。”金姆平静地听着。我担心她会感到不舒服，毕竟我是如此直率地坦诚相告，而她只是很认真地点



着头。“我将不惜一切代价进步！”她严肃地说，我相信她。而索菲娅得到被选定的消息后显得很随意，她的反应令我困惑不解，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我的用意。我知道，她认为她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新加坡候选人，她也以为从一开始，丽娜就做得很好，但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或喜悦的神情。我想知道我是否犯了错，但在离开前，她向我解释说：“我必须跟我的丈夫和孩子好好谈谈。在新加坡，成功会有很大的压力。”索菲娅比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更显得激动，即使在参加选拔的早期阶段，她都担负着她们国家的期望。她的心没有停止对庆祝胜利的向往，她知道，她将面临新的挑战。

丽娜是唯一一个有些抵触情绪的候选人。她以为她会被选中，我想知道这是否就是她没有参与小组活动的原因。她认为要用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同伴们之后再提出加入探险队：“你很健康，很专注，这些都是很优秀的品质，毫无疑问我希望你能去南极。”丽娜点头沉默了，然后起身打开门走出去。

我一直担心如何把坏消息告诉阿帕玛，她其实非常亲切，以至于我担心她心里已经知道她不会被选中，而她不愿接受被拒绝的事情，反而和我聊的都是她喜欢的事情。要和阿帕玛说再见时，我感到非常对不住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员。瑞娜知道她能入选显得很激动，只是我要告诉她，阿帕玛要离开她了。她感到很苦恼，我们不担心她能为团队做出多少贡献而是担心她的健康。我建议她有些身体状况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她专心地听着。“我真的会很努力工作的。”她对我说，“请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你会为我骄傲的，我向你保证。”当她离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内疚。我没想让她感觉有压力，我只想让我需要的所有的队员都知道她们需要做什么。

我可能只需要给她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她们，她们是最棒的，然而这不会帮助我们走到最后。即使选出的团队很好，但我们



也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为去南极做准备。面谈结束了，我慢慢地走出小屋，把所有候选者都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泪水与兴奋交织在一起，丽娜依然是冷若冰霜般地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而艾莉西亚和雅典娜已经泪流满面，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

每个人都很支持入选者，更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负责运输的路虎，它很快就能带着我们赶到下一站——奥斯陆，到时候我们再腾出时间来好好庆祝一番，现在，我需要把精力集中到整合新团队上。最后，在无数次的道别和更多的泪水中，我们上路了。

我的新团队站在小屋外的雪地里，和路虎挥手道别，直到我们看不到它。我知道我不得不说点什么，我把大家组织在一起，我们的头彼此紧密地挨在一起。“这是一个真正艰难的日子，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无畏地前进。好好看看你们的周围，这些熟悉的面孔将陪伴你们滑雪去南极，现在，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团队，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自己。”女孩们环视着彼此，我能感觉到兴奋在向外辐射。这就是我的团队：艾拉，从文莱来的公务员；史蒂芬，从塞浦路斯来的工人；芭芭拉，一位来自加纳的记者；瑞娜，一位来自印度的徒步旅行家；金姆，来自牙买加的政治顾问；夏尔曼，一名新西兰的军医；索菲娅，来自新加坡的三个孩子的母亲；我自己，代表英国和我们的基金会；海伦，一个来自英国德比郡的户外活动教练。

第6章 第九名队员

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他们的工作方式让我惊叹。管风琴的音乐回荡在四周。我抬头向上望，旗帜和鲜花布满了石头和玻璃。气势雄伟的修道院显得庄严而肃穆。我走在我的新团队后面，她们每个人都穿上了自己的民族服装：芭芭拉令人惊艳地穿着紧身的加纳图纹连衣裙，五颜六色的裙摆拖到地板上。瑞娜将自己用一块华丽的红布包裹起来，当她走动的时候，金色纱丽就在她身后飘舞。艾拉戴着花朵图案的粉红色真丝头巾，仔细地包裹住她的脸。我们被邀请到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出席英联邦日的庆祝活动。酒会之后，在英联邦秘书处总部的马尔堡大厦，我们被介绍给了女王。一直的努力和艰难的争论就是为了使除我以外的所有七位女士得到从挪威到伦敦的培训机会（包括在挪威英国领事馆面试的最后一分钟拿到芭芭拉的签证），但是当我们在马尔堡大厦的一个小套房等待女王到来时，看着团队里的每张面孔，我确定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这些女人们安静地等待着，所有眼睛都盯着门口。女王驾到，在爱丁堡公爵的陪同下，女王与团队的每位成员握手。公爵





听我们解释我们的计划。“你们都疯了！”他惊讶地说。

女人们坐飞机回了家，显然，作为一个团队，我们需要在前往南极洲之前再见一面。我决定在我们计划前往南极洲的前几个月另外安排培训。我们将前往新西兰似乎也有道理。因为夏尔曼有信心，她能让她的军事团队来帮助我们。除了我自己，夏尔曼是到目前为止团队里最有经验的队员。我非常喜欢她，我希望她能在团队中发挥救生筏的作用。当乔作出棘手的决定时，我会选择信赖她，她也可以信任我。我经常跟队员说，我一般愿意和其中最有经验的人交谈，我很担心，夏尔曼可能会因此而感到被低估。所以在离开挪威前我和她谈了谈，对她的付出给予了鼓励。“有你在这个毫无经验的团队里，真的让我感到很放心，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对队员们说这么多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好。我不是故意打击你。”夏尔曼在变得严肃之前就笑了：“如果您需要一个探测板，一个倾诉的对象，我很高兴倾听。”她接受了关于新西兰培训的任务安排，我很赞赏她的提议并偷偷地松了一口气。这就意味着我能集中精力用剩下的时间合理安排好团队。

团队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地离开了挪威，在去往南极洲的筹备中，她们在自己的体能训练方面需要投入很多的努力。极地探险培训可以使用计数器——许多数据都可以直观地表现出来。极地探险更多的是要增加耐力，而不是一般的只为了心血管保持健康。我花了一早上的时间制订团队训练计划，我们一起把训练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强度，使用阻力与重量训练建立关键的肌肉群；第二是间隔培训，通过瞬间的能量爆发来保证心血管的健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耐力训练来延长行走的时间。队员们做了大量的笔记，并且开始把她们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让我欣慰的是，她们做得很认真，而且很高兴。每个人都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教练



来帮助她们一起按照具体计划执行。已经在挪威崭露头角的芭芭拉继续在加纳做着可怕的工作，她跑到一个被称为“身体掠夺者”的新兵训练营里坚持着锻炼。在牙买加，金姆得到了牙买加防御部门的支持，专门为她安排的军官会帮助她做一些激烈的耐力训练。文莱的艾拉在国家体操中心与在体育运动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的丹麦博士联手。此外，她十分渴望能尽可能多地完成特定的远征训练。我们经常会看到拉汽车轮胎以模拟极地探险家拉雪橇的训练，但艾拉选了一个更好的方式：她把旧的手推车后腿离地，沿着文莱的沙质海滩拉它，这几乎完全模仿了雪地上拉雪橇。

索菲娅则是在新加坡樟宜运动医学中心主任本谭博士强有力的指导下训练。索菲娅拉雪橇的地方——从她张贴在网站上的远征图片判断，像是个废弃的停车场。索菲娅虔诚地记录着每次训练的结果。几个月内我们团队的网站上记载的都是可怕的重量级训练：用她的临时雪橇可以拉动180公斤（至少是她体重的三倍）。我开始越来越担心她做得太过。“不需要你拉动超过100公斤。”我写道，“我们在远征队不会拉这种重量，你真的不能冒险伤害自己，那将是最不幸的。”

瑞娜可能拥有最好的训练场，从挪威回去后由于工作原因，她又前往了喜马拉雅山，一天又一天在高海拔的环境下背着重物徒步。这样做对于训练耐力是非常好的，但她仍然需要进入一个健身房去进行增加力量和维护心血管的健康。一个沉闷的早晨，我的办公室被瑞娜的一封电子邮件点亮了，里面描述了她第一次到健身房的经历。而大多数人都准备了至少有十几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何从不去附近健身房。瑞娜描述道：“健身房就像是去迪斯科舞厅，里面满是嘈杂的音乐和美丽的人们。”

有了训练方案和支持，我相信团队成员们将在身体上做好充分



的准备。我们完成在新西兰的培训后，她们也会拥有更好的技能。但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我们的前景很不乐观。前往南极洲可能是地球上最昂贵的旅行，从任意一个地方飞到南极洲可不只是买一张票、一个席位那么简单的事情。它涉及整架飞机人员的招聘，购买油箱中的燃料。我们需要超过40万美元来支付我们的航班和必要的救援。这是一笔巨额的开支。

印度的瑞娜终于成功约见了一位高级部长，她以为自己会直接见到部长，但取而代之的是得到了一张票，而房间里还有几十个请愿者也在等。当终于轮到她时，她被带进了一个房间里。她猜想这次将亲眼见到部长了，但事实上只见到了桌上的一部电话。瑞娜对我转述道：“他热情很高，他说可以提供一些资金，只是说有必要成立一个小的委员会。”

“委员会？”我怀疑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在印度，如果你想得到国家的支持，那么你就得付钱给委员会。”

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们正谈论的是贿赂。尽管瑞娜一再坚持在印度“佣金”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坚持认为我们会找到另一条路。同时，艾拉在文莱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文化部的宝贵信件。青年部和体育部承诺她可以为远征筹集资金，虽然金融危机没有对筹款造成致命的障碍，但现在整个世界都陷入H1N1病毒的恐慌中。在文莱已经有66人病倒了。政府回应：停止所有的聚会，包括体育赛事和资金筹集活动。艾拉计划进行募捐的体育比赛将被取消，更糟的是，没人知道这种禁止公共集会的措施要持续多久。金姆在牙买加已经决定举行一次募捐，并命名为“冰冻”。

实际上，因为上次活动金钱上的损失，在她申述她的计划的时候，我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但是她向我保证这次的计划会成功。我



并不是很肯定，但我想她这一次不会改变她的主意。

为了敲定这次探险活动的飞机支持，我们必须在临近截止日期时，付费给物流公司、南极后勤和探险队。我们计划11月动身去南极洲。当我接到来自索菲娅打来的确认电话的时候，已经是8月了。新加坡一个电脑软件的运营商提到，他们的合作伙伴卡巴斯基实验室正在寻找有意思的项目去赞助。卡巴斯基实验室是一个网络安全公司，他们的领导者尤金·卡巴斯基是杀毒软件的专业先驱。他们的贸易从美国到日本，遍布全球。我们之间的联络工作一直都是通过亚洲卡巴斯基实验室来完成的，在印度、新加坡、文莱和新西兰，这些地区都在它们的销售覆盖范围之内，同时，这些地区也代表着我们的探险队。作为卡巴斯基对我们探险队资金支持的回报，我们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提交赞助提议的一周内，我们接到了一名妇女的电话，她来自马来西亚，名字叫萨克玲。当她解释道，她是卡巴斯基东南亚工作室的负责人时，我能够感受到心脏在我的胸腔中剧烈地跳动。如此高级别的人亲自打电话给探险队，这表明了他们很重视我们的提议，并且，我意识到这次通话对于整个南极洲探险计划来说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推销这次探险活动的一个好机会，同时，对于卡巴斯基实验室来说，也是看萨克玲是否认可，我们是他们理想的探险活动的大好机会。当她说到卡巴斯基实验室只对成为唯一指定的赞助商感兴趣时，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在那一刻，我感到了自己承载着希望、八名妇女的梦想、我的团队，以及所有坚持的压力。就这样，每一个词都被郑重地记录下来。我们讨论起程的日期、后勤保障、媒体覆盖和我们在新西兰的训练计划。萨克玲询问，我们的探险团队能否到新加坡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我立刻同意，签证允许）。当萨克玲与我谈论的问题越来越详细时，我的希



望也升起得越来越高。萨克玲让我准备一个财政付款预算，给她一个草拟稿。最后，我们在电话里竟然开始讨论起备选的标题名称，比如“卡巴斯基实验室共和国探险队”，或者“卡巴斯基实验室妇女南极洲探险队”。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左右，萨克玲似乎很满意，她已经得到了她所需要的信息。“在这周五前，我们将会把最终的决定告诉你。”她承诺道。

我放下了电话，把手压在桌子上。我的心脏仍旧在激动地、剧烈跳动着。我是如此兴奋，以至于我想绕着屋子跳跃，站在屋顶上大叫，但我还没有，因为直到我被告知可以签约了，我才能相信这是真的。与萨克玲的谈话具有如此积极的意义，并且如此详尽，以至于我担心卡巴斯基实验室成为我们的唯一赞助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开始犹豫是否与其他公司和探险队合作，让它们成为我们的赞助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我决定放弃这条路。我不能，也不会让我自己再这样想。

我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决定，大气都不敢喘。我试着做其他工作以分散注意力，但是没办法做下去，我坐在电脑屏幕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字，等着卡巴斯基实验室回复的到来。当这周一一天天地过去时，我收到了来自萨克玲的几封电子邮件，这几封邮件都是让我详述一些小细节的。回复每一封邮件对我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煎熬。我感到好像我的每一个回复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破坏这次合作的危险，好像一个不恰当的措辞、一个不合适的表述就会毁掉所有的事。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在两周后的支付截止日期前，再次得到全额赞助的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次探险计划能否成功的每一件事都依赖于卡巴斯基实验室是否能成为我们的固定赞助商。

周五到来了。当我打开我的电子邮箱去寻找来自萨克玲的邮件



时，因为焦虑，我接近崩溃。邮件说得很简单：“好消息。我的老板已经认可了这次赞助活动。”我马上感谢她，并告诉探险队里的女孩们，告诉她们这个好消息。我可以想象得出她们的尖叫声，以及每个女孩一个接一个打开邮箱回复的场景——每个人的回复都比上一个人回复使用了更多的惊叹号。

“耶！！！！我现在终于可以舒口气啦！”索菲娅写道。

“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这是来自史蒂芬的电邮。

“哇，哇，哇！！！！！！！！！！！”瑞娜打字道，“我太开心啦！！！！！！！！！”

“太好啦，现在我知道我们的上帝一直在眷顾着他的孩子们了！我们的眼泪、汗水、努力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都不是徒劳的。”芭芭拉又加上了一点：“摆在我眼前的现状是，我就要因为控制不住的尖叫声从网络咖啡屋里被踢出去啦！”

一如往常，金姆在几天后看到了这封电子邮件：“我还在转着圈不停地跳跃，”她说，“必须要好好回味！”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细想我们的胜利。很快，我们就要在新西兰会合了。夏尔曼被安排为带队者，但细节方面还没有最终确定。就好像我相信夏尔曼可以很好地完成工作一样，我需要知道我们应该待在哪儿，以及她应该在当地取得什么样的资源。我对她的缺乏沟通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她是有意将我一直置于黑暗中一样。我意识到了麻烦，但是我把问题归结于自己潜意识的忧虑。芭芭拉是一个没什么紧迫感的人。上个月，我一直整天跟她唠叨关于办理去新西兰签证的事，为的是避免拒签后重复申请。她没有跟我在网络电话中谈，而是采用了电子邮件的方式，然而她的电子邮件表意却是含糊不清的。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信号：这里有些事情不对头了。



果真，在我们动身出发的前三周，我收到了来自芭芭拉的一封邮件，邮件告知我她不想去新西兰了。

我可能不能参加之前计划好的新西兰培训了，因为我支付不起这个费用……但是我尝试着展望更好的未来。我需要到南极洲去实现它，尽管这意味着我要有一个非常大的牺牲，比如新西兰的培训。我只是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为了实现自己去南极洲的梦想不断地去赚钱，我的生活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富裕的……不管这会花费什么代价。

我已经给芭芭拉解释过很多次，我们正在增加团队的经费，所以她不用自己去负担全部的费用。我理解她的自尊心。实际上，她也不想如此消沉，但事实是，我们都会存在消沉的时刻，只不过方式可能不同。只要芭芭拉不停地像其他队员一样继续努力地为团队寻找支持（这一点，我一直相信她），探险计划的经费就可以为她所用。探险队可以为芭芭拉买去新西兰的机票，但探险队却无法为芭芭拉魔术般地变出一个签证——好吧，如果我们那么做了，也许会使芭芭拉感到尴尬，但是，那时她再离开团队就已经为时过晚啦。

新西兰的培训是去南极洲探险的必经之路，队员们不能自行选择略过它。芭芭拉已经在挪威很轻松地掌握了所有的新技能，但是在去南极洲之前，所有的女性队员还需要做许多常规训练。我在想是否我对这个团队太温和了，也许对于南极的危险我并没有给大家充分的认识。这个团队需要很好的培训，否则她们可能会受伤，冻疮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果我们的训练不到位，我们会因为长时间暴露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而死去。

我再一次打电话给加纳的英国大使馆和高级使节，他们挑选出



芭芭拉的签证。当我在昂贵的国际长途电话中听着等待的音乐时，不禁绝望地想，我怎么能够容许我自己再在这个职位上待着呢，我什么都没有学到吗？有时候我担心，我对待探险队中的女孩们太像对待孩子了；其他时候，我则为没有紧紧握住她们的手而感到懊悔。我不能责备我们的团队，因为是我告诉她们，她们有能力完成南极洲的探险活动；因此也是我，必须要去接受信奉这个信条带来的一切后果。

我在9月抵达了新西兰，期盼着那里的冬天。但是当我走向去往大广场的路时，我感到克莱斯特切奇（新西兰的一个城市）看起来像春天。我们的团队一天中分几批乘坐飞机出发，除了芭芭拉，因为芭芭拉刚刚收到她的签证，现在她还需要一张机票。我走进一个大大的、空荡荡的旅行社，向坐在电脑前的两位女士解释着我的问题。她们越听我解释就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她们快速地敲击着键盘，偶尔停下来用听起来很奇怪的航班专业用语相互讨论一下。经查询，芭芭拉可以乘坐的第一班航班的抵达时间为我们的新西兰培训结束前两天。这太晚了，让芭芭拉花费承担高额的费用穿行半个世界，却只在新西兰待两天，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但那两位女士并没有放弃，在查询了三个小时之后，我还是果断叫停，因为我必须去机场见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不能再拖延了。

我们在三辆汽车的护送下，从克莱斯特切奇去我们的新营地，这个新营地是夏尔曼为我们在推泽尔提前安排的。女孩们再次相聚都非常兴奋，在汽车里高兴地聊着天。我在行驶的汽车中凝视窗外流动的风景，想着芭芭拉是否有转机。芭芭拉可能来不了新西兰，但是除非经过这次额外的训练，芭芭拉想去南极洲别无他法。这对我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接受我们的队伍可能失去芭芭拉这件事，或者找到一个方式能让芭芭拉得到参加这次训练所需要的东西。没



有芭芭拉，我们还是一个包含多种文化的联合团队，但是这看上去好像是因为芭芭拉做得不好而失去了这次机会。芭芭拉和我都如此努力地取得了现在这样的进展，以至于她的离开让我感觉难以取舍。我想这是因为，在很多方面，芭芭拉代表了这次探险活动中的一类队员所需要的一切特质：一位妇女有能力做大事，但她却没有机会去证明自己。在挪威，芭芭拉已经向我们显示出了：只要接受适当的训练和充分的准备，她去南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现在，她似乎因为缺乏资金和自己的那份自尊心而要失去这次机会了。尽管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而且我脑子里所有常规的思维都向我叫喊着在名单上把芭芭拉划去，但我还是准备不放弃芭芭拉。

接下来，还要考虑海伦的问题。她可能要尴尬地面临成为备选队员的事实。海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站在她的角度进行评估：她和其他人训练得一样努力；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我处理后勤问题和做计划；她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而她所有这些努力的唯一回报就是，她会被选入去南极洲的队伍。我用如此长的时间在这些成员间挑选去南极洲的最佳成员，最后，却不让海伦加入南极探险队，这是否是公平的呢？

我们在维泽尔的基地是一个被粉刷成柔和粉色的木质小别墅，这个小别墅属于一位叫查梅恩的朋友。我们散开来，在位于小别墅后面的长长的、长满绿草的场院里查看所有的设施。一家英国的制衣公司芒泰恩已经答应提供给我们去南极洲需要的所有的服装，而且他们给我们发了用于训练穿着的服装小样到新西兰，根据这些小样，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想要的款式，也可以知道我们需要的型号。我和海伦从英国乘坐飞机来的时候把所有样衣都带上了，并且很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免去了超重行李托运费。现在所有行李都已经办理妥当，这简直难以置信，我竟然带着它们过关了。



当我们试穿衣服的时候，我们也要试一下食物。在探险活动期间，我们一天主要的食物供给是脱水膳食，在吃的时候加入煮沸的开水，并依照说明煮就可以了。作为信仰伊斯兰的队员，艾拉只能食用伊斯兰教允许的食物（她所食用的动物的肉必须遵循她的宗教信仰，以特殊的屠宰方式屠宰），但是我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为探险队提供符合伊斯兰教教规的肉食提供厂商。为了避免一位探险队的成员因为食物的原因与大家分开（这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成为一个食素的探险队，尽管这会影响我们探险队员的营养摄入。探险队的膳食来自于各个供应商，我为各种各样的素食分别准备了一份样本，队员们可以进行试吃。队员们对这些食物的反应很平淡。“这些食物吃起来好像婴儿尿布一样。”金姆评价道。

“闻起来也像婴儿尿布一样。”史蒂芬回应。

“哦，这比那个看起来绿色的像鼻涕一样的食物好多了。”海伦说道。

“我觉得这些食物更像是给鱼吃的。”索菲娅评论道。

当这些食物没有被吃完就被扔掉时，很明显，我要再去寻找别的选择了。

下周的计划是离开小别墅，开车去彼撒山脉，新西兰南部一个稍远一点的地方，临近瓦纳卡，我们将去那里进行一次探险训练。彼撒山脉是新西兰唯一一个越野滑冰公园，这将会是我们进行小型探险活动很理想的训练场地。当我们呈“之”字形滑雪登上陡峭的山路，并最终看到一些雪时，内心感觉到了一种释放——这是我们抵达后攀登的第一个地点。现在，冬天已经快结束了，山顶的雪逐渐退去，与我们所在地点同一水平线的地方，不协调地袒露出了岩土。我和夏尔曼从上面俯视地形，思考在这样的雪况下，我们必须



挑选一条山脊线，沿着这条山脊线到达彼撒山脉更高的地点——山顶狭窄的平原地区。我们都同意这个方案，但是夏尔曼一直显得比较小心谨慎。她好像一直准备着要从我们的团队离开，她总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多过参与到我们中间。我们在别墅的那段日子里，夏尔曼总是在团队会议时迟到，而当我们开会进行讨论的时候，她总是在放在膝盖上的电脑上敲击着什么。肯定出现了一些很难去定义的事情，我说不清。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得了妄想症，但我越来越觉得这里潜在着隐患，也许作为团队的领导者，这种感觉是潜在的、下意识的。

当我们第一次在满是雪的山沟里（在越野滑雪旅馆视线范围之外的地方）搭建营地时，我找了个机会跟夏尔曼谈话。我们在帐篷外面徘徊而行，沉重而缓慢地在大大的风雪中走着，直到我们因为风雪而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夏尔曼，女孩们都很尊敬你。而且对我来说，团队里有你这样一位实践经验丰富的队友，也对团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必须一起工作才行，否则只会使事情变得混乱。这个团队需要明晰、简单的领导阶层，才能给大家信心。”夏尔曼认真地倾听着，但回答得却很随意：“很幸运的是，你是这个团队的领导。我同意你的观点，而且对于你作为我们的领导这件事完全没有任何异议。但你不能让任何人都依照你自己的决定行事，我们的团队不是愚蠢的，大家的意见也应该被考虑。”她的反应让我觉得很吃惊，我觉得我并没有不听取或者拒绝采纳大家的意见，而真正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人回应我。我很认真地听着夏尔曼的评价，但又禁不住在想，与其说夏尔曼是在阐明大家的意见，倒不如说更多是在阐述她自己的意见。尽管我的支持使夏尔曼觉得自己更加有价值，然而她无疑也感觉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没有任何决策权。我向她承诺我会做出改变，



但是同时，也希望她跟我一样做出改变——她需要更好地与我沟通。

“夏尔曼，我并没有自命不凡。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处事方式，你可以与我沟通——私下的沟通好过在团队的面前把这些表现出来。”尽管我们的谈话有些尴尬，但这是一次很友好的谈话。当我们走向帐篷的时候，我感到空气都变得透亮了。当许久以来困扰我的摩擦解决之后，我从未感到如此的放松。

第一天是很艰难的。我们花了整个早上进行当地的环形滑雪，以便能够在雪橇夹道行进前熟悉和了解滑雪板。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像自己在南极洲一样拉拽着雪橇。雪橇并不算沉重，但相比我们第一天预想的情况，地形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女孩们不得不去挑战冰冷的斜坡，穿越困难重重的山，而且还得做一些非常明显的记号。最终，我们抵达了山脊脚下，这条山脊可以把我们引领至山顶的平原。置身南阿尔卑斯山脉令人难以想象的美丽景色中，我们晚上在这里露营。

我们清晨就出发了，看上去前面的路途很遥远，但中午我们就到达了充满冰雪和危险的斜坡的中间。坡度变得越来越陡峭，我担心万一有人跌倒，就会一下跌到谷底。然而，大家对能够顺利抵达山谷完成剩余的训练计划都充满信心。记住了夏尔曼对我的建议，在出发的前一晚，我在布满冰雪的斜坡周围的空地上把大家召集起来，跟大家说明了在我看来现在的处境，询问团队中大家对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时出现了令人窘迫的沉默，我耐心地等待着有人打破这样的沉默。

最终，索菲娅说：“我认为我们不是特别值得去继续冒这样的风险。我们应该回去。”每一个人都表示同意。我为征询意见的决定感到很高兴。事实上，我们没有更多选择，但是女性的犹豫对我们的探险提供下一步建议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女孩们并不愚蠢，



我非常尊重她们的观点，但是当问题来临时，她们必须具备作出恰当决定的能力。很多次，我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去作决定，在那些情况下，女孩们不得不相信我的判断。我并不十分肯定夏尔曼也会那样做，现实让我很担忧。如果夏尔曼在滑冰这件事上对我不认同，就会使整个团队出现不同的派别，而对于团队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在别的团队中，我见过这样情况的发生，我也看到了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团队是多么的混乱。大多数探险活动的失败都是由于团队的凝聚力不强，这个原因远远超过别的任何原因。

随着光线变暗，我们在远离滑道的地方挑选了一个地点安营扎寨。雪非常湿，弄得帐篷里面也很湿。我想着如何按照四人的帐篷来划分团队。金姆十分刻苦认真地练习着她的滑雪技能。但她仍然是团队中自信心最少的，需要给予更大的鼓励。为了帮助她，我把她和三名很有经验的成员安排在一起，共同搭建帐篷，她们是海伦、夏尔曼和瑞娜。我和史蒂芬、艾拉和索菲娅共用一个帐篷，她们都是新手，但是头脑很灵活。

夏尔曼和金姆最初看上去不像能产生什么友谊。夏尔曼给人的印象很有城府，她有敏锐和务实的态度，同时，她有很好的自我培训能力。相反，金姆看起来比较沮丧，性格有些古怪，而且很容易心烦意乱。然而，她们之间相互沟通很顺畅。当我劝说不成功时，夏尔曼有能力劝说金姆听取她的建议，而每次金姆最终都会取得很大的进步。看到她们相处得如此融洽我非常高兴。但是晚上当我坐在她们的帐篷里时，我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区域划分。夏尔曼在帐篷的末端掌管着“厨房”区域，金姆坐在她的旁边，她们两个人都背对着海伦和瑞娜，海伦和瑞娜看起来都沮丧地坐在帐篷的另一端。金姆和夏尔曼小声地相互聊天，笑着对方的笑话，瑞娜却安静地坐着。我一边跟海伦和瑞娜谈论接下来的一天，一边反复试图把

夏尔曼和金姆拉入我们的谈话中去，但是当我离开时，她们又立刻恢复到了两人一起的情况。在接下来的一天，当我们都在滑冰时，夏尔曼和金姆，海伦和瑞娜，这两对两人的组合又呈现出来了。金姆越来越依赖于夏尔曼对她的帮助，而拒绝来自于其他人的帮助。当史蒂芬帮助金姆再一次绑紧雪橇上背包的带子时，我听到金姆拒绝她说：“不，不，不，夏尔曼已经帮我做过这些了。”报警的钟声顿时在我的脑畔响起。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非常痛苦。对于狭窄的山谷，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沿着一个两公里的悠长的小径反复地滑雪，在小径的旁边是蜿蜒曲折的部分被冰冻住的小河。我们周围的景色着实很美，但是经过不断重复，这样的景色也会变得令人有点厌烦。从早上开始下着湿湿的雨夹雪，天空呈现出铅银色，雨夹雪浸湿了我们的衣服和装备。极地的环境通常是非常干燥的，因此，处在极地中的设备要耐冻，这比耐湿更重要。结果是，一场倾盆大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最悲催的结果。我们在雨夹雪中挣扎着前行。我为自己欢呼，在很多方面，这已经是我经历的一次最好的培训了。就像在南极洲行进一样，现在是非常单调乏味的，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甚至没有机会相互聊两句。团队的成员们很快感受到了寒冷、痛苦和沮丧，就好像我们已经身处南极了一样。对于队员们而言，这次训练不仅对于身体，同时对精神也是一次考验，这是事先无法预计的。

我曾经暗地里希望，我们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去南极也能够完成旅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带着雪橇出发，把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放在雪橇上。为了做到这些，我估计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有能力拉着承载80公斤重量的雪橇步行。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些，我们必须安排一个提供再补给物资的地点。在我们旅程的中途，飞机要在事先确定好的冰面上降落。为了更明确团队中的每





一名成员究竟能在她们的雪橇上装载多少重量，我们在一天中逐渐加大雪橇上的载重量。我们使用装满雪的袋子，同时也使用设备去增加雪橇的载重，以便使雪橇达到80公斤的满负荷状态。我们甚至用罗波（他是跟随我们去新西兰的随行摄影师）作为我们的“沙袋”，他好像皇室贵族一般坐在雪橇上，被我们沿着山路拖拽着。我们还有两个相对小一些、轻一些的雪橇，一个连接另一个，以便重量加在一起也达到80公斤。

金姆选择拖车装置，但是“铰接式的雪橇”成为她额外的负担。当队员们掠过下边的拐角时，我向身后瞥了一眼看到金姆，她有一个雪橇掉到岸边。重重的雪橇掉进河里，拉着她向后退。直到她左手拉紧一侧拴着她的腰另一侧拴着雪橇的那根绳索。她大声哭着求救，尖叫、呼喊。斯蒂芬第一个到达金姆身边，但却无法阻止她的雪橇从岸边掉下去。她们俩最后都被别人拽了回来，在雪地里躺了好一会儿，大口喘着气。

被安排得满满的十个小时终于结束了，我让每个人都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是否有信心一路拖着相同的重量到南极去，那意味着今天这么累的状态重复40次。纸条是匿名的，以鼓励大家讲实话，不过老实说，我其实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把纸条与人一一对上号。艾拉是我们团队最小的成员，她就写了一个词“简单”，而其他人员则不是那么肯定，大家非常怀疑如果拉这种负荷那么多天会是什么样子——就算随着对食物和燃料的消耗，负重可能会逐渐减轻。即使队员们现在看起来很强壮，但我知道这样下去，身体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此用力，会导致过后每一块肌肉都感到酸痛。我想到了史蒂夫·琼斯。我认识他已经数年，非常重视他的意见，他自己也积累了几十次极地探险的领队经验。他曾指导着来自热带国家的5英尺高的新手去南极，这很具有挑战性而且对新手本人要求也很苛刻。我



明白他的观点，但我不知道如何帮助队员们真正展示她们的能力。

探险的最后一夜，我们在靠近滑雪小屋的地方宿营，准备第二天早上能坐早班车离开。夜里我和海伦、瑞娜、金姆和夏尔曼单独地谈了谈，想了解一下她们的动态。我能感受到在海伦和夏尔曼的交谈中流露出来的火药味儿，她们对彼此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是紧绷着。“任何事情都不得不按照夏尔曼的方式去做，”海伦告诉我，“她非常保护自己在帐篷里的个人空间，而且很没有团队精神。”

另一方面，对于我的担心，瑞娜则表示很惊讶。“夏尔曼真是帮了金姆，我们都很开心。”她说。我在这一周多的时间里真的是对瑞娜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她显然把我们在挪威的谈话放在了心上，到新西兰时整个人变得健康而强壮了。她在团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只看到别人的好，并且总是准备好随时去表扬和鼓励别人。瑞娜是安静而有着坚定决心的，她散发的凝聚力把我们的团队成员绑在一起。瑞娜积极的态度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不确定如果有问题她是否会告诉我，不确定金姆和夏尔曼的亲密友谊是不是使瑞娜感到被排斥。尽管瑞娜与我的意见相反，但我不能忽略我在帐篷中所见到的。

我与金姆谈了谈，对她的进步表示祝贺。她真的一直在努力，严于律己，但也仍然有问题。不过看到她在新西兰的表现，在团队其他成员的支持下我又增长了信心。她一定能抵达南极。没提到名字，但我善意地提醒金姆，太依赖一个人是很危险的，并建议她，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团体可能会使别人感到被排斥。“我之前没站在这样的角度考虑过，”她说，“不过我讨厌给其他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她若有所思地向帐篷走去。

后来我赶上夏尔曼，外面漆黑一片，我们俩站在那里仰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在最后几天，我有意地做了努力对她打开心扉，分



享自己对摆在眼前的这些问题的想法，在不得不做的决定上寻求她的意见。我真的很喜欢夏尔曼，所以与她聊天不是很难。在我们滑雪时还分享了一个笑话。但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还是很明显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她在团队成员面前，经常公然反对我的行动和决定的方式，最终几乎都会把我激怒。我可以看出，其他的团员也已经注意到一些隔阂。我把周一说的话重申了一下，“夏尔曼，我知道你不太赞同我做事情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一起亲密合作，因为我们是个团队，要一起保证南极洲行动顺利进行。”

“嗯，我希望你知道你可以依靠我。”她回答。我微笑着表示感谢，但我想知道的是当遇到事情时，你究竟会与我合作，还是会反对我？

在新西兰培训结束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继续到新加坡参加与卡巴斯基预定好的会议。瑞娜、史蒂芬、艾拉、索菲娅和我在去我们第一次和萨克玲见面的酒店的路上，我们很紧张。萨克玲是一个完美而优雅的女人，她像老朋友一样招呼了我们。但是她走到哪都带着文件夹和笔记本，我们知道这暗示着她是个无情的监工。她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团队还有她的老板——哈里，这个人是批准远征队赞助的最后关键人物。哈里是极有影响力的，同时也是卡巴斯基实验室亚洲董事总经理和董事会的成员。他曾作为营销天才名声显赫。他说得很少，很多时候是在笑，但显然哈里是一个有着非常精明的头脑、做事严谨的商人。我确定探险队给他的回报将超过他在我身上投资所期望得到的回报。

萨克玲在新加坡的国家地理商店安排了新闻发布会，是关于宣布卡巴斯基实验室对探险队进行赞助这一重大消息的。我们到商店时发现，那地方已经被装扮成了南极的样子。在显示着南极那被白雪覆盖着的大地的大屏幕前，设置了一个堆满人造雪的舞台，我



他与哈里坐在新闻记者和观众的面前，接受一位假扮著名极地探险家的主持人采访。Ψ' , - T η α £ №
¶ £ Ω × 、 ~ Î 、 ^ Ä √
极的人，但斯科特是公认的名嘴。当被问到我的意见时，我指出，斯科特已经死了，连同和他一起前往南极探险的同伴，因此选择冒充他对于我们的探险活动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兆头。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选择阿蒙森。）

记者们陆续都来了，我们五个代表与哈里在舞台上就位。主持人身着从商店里借来的极地夹克，介绍 he 自己是罗尔德·阿蒙森，我不知道底下有多少观众、记者会觉得他们看到了真正的罗尔德·阿蒙森。

在活动结束后，萨克玲似乎对于这次报道感到很高兴，但问答环节总是围绕钱来进行还是让她很困扰。我之前承诺她不对媒体提及具体的数额，并且要求团队成员们在这一点上与我保持一致。因为一旦信息不准确，就会引来各种各样的误解。在具体金额上采取回避的态度似乎是一种安全的选择。

然而，困难出现了，当我们被问及是否我们已经获得了我们需要的所有的资金支持时，真正的答案是没有。从卡巴斯基实验室得到的钱能够支付物流成本，但我们还需要设备。而由于卡巴斯基实验室是我们独家冠名的赞助商，所以我们不能去找其他赞助商来支付这些额外的费用。于是，我们希望通过筹款活动来筹集资金，或说服其他供应商提供一些探险设备。这件事困扰着萨克玲，她把哈里叫到一边，和他商量这件事。我说不出来具体的原因，但这一情况让我感到担心和莫名的忧虑。

那天下午，我们召开了另一场新闻发布会，这次是向四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播放的视频会议：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和中



国台湾。有很多记者出席，他们也对探险活动很感兴趣，但是同样的，对于资金问题的讨论成了发布会的主题。哈里回答了所有关于钱的问题，但萨克玲看起来很不舒服。记者会后，他们两个又开始讨论，而我们团队则在外面等待。当我们再被叫进屋的时候，尽管没什么征兆，我还是让自己准备好在接到坏消息时为我自己和我组织的探险活动奋起辩护。然而，我等到的却是一个惊喜。

“卡巴斯基实验室真的很佩服你的这次冒险活动和这些勇敢的女士们，我们在这次探险中投入了很多钱，但我们真正想要见到的是你和你团队取得成功。我们希望你接受我们作为第九名团队成员。但对我们来说，因为它是如此大的投资，我们不想与任何其他公司共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成为你的独家赞助商。”我点了点头，笑了。萨克玲继续说：“而对于我们来说，看着你继续到其他地方筹钱，也是很痛苦的。”她停顿了一下，我看了看哈里，他正静静地坐着。萨克玲接着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哈里已决定支付给你其余的费用。”所有惊讶的目光都落到了哈里身上，“哈里会再给你五万美金，尽管他需要自己掏腰包。”

我知道我应该说点什么，但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当听到这消息时，我感动得想哭。我自己背负了一年的财务压力重担终于可以卸下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真的梦想成真了。哈里简直是穿着闪亮的盔甲带给我们意外惊喜的骑士。史蒂芬高兴地呐喊起来，飞奔过去和哈里拥抱。我们其余的人都笑了，哈里也笑了。但遗憾的是，哈里和卡巴斯基实验室团队不得不在不久后离开。我们说了再见，看着他们离开，然后把脸扑进冰冷的皮面沙发。大家很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瑞娜犹豫着打破了沉默，“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找更多的钱了吗？”

“是的，我们已经万事俱备了，”我回答，“我们要去南极洲了。”

试 炼

第 7 章

卡巴斯基实验室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比我希望的更成功，但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责任。从9月中旬团队返回英国到现在，还不到六个星期，我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卡巴斯基实验室团队至少十几封电子邮件，很明显，他们盼望的结果是——快。我不只要安排团队的服装和装备，现在还要管理一个远征网站，我需要拟定出发和返回的时间，把详细的媒体计划放在网站上面，并要撰写八个国家的新闻稿。卡巴斯基实验室促使我在远征事宜的各个方面加快了速度，特别是我们计划到达南极的详细信息。我自己心甘情愿地投入工作，然而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萨克玲有一个五六人的远征工作小组在卡巴斯基实验室工作，但目前只有我一个发言人来回答他们所有的查询和要求。我很快就被这些问题淹没了。

我感觉我的抗压水平已经达到新的高度，于是找了个借口逃避了几天——英国的一家杂志委托我就一条从英格兰北部到东部的线路写一篇文章，我没有拒绝这份差事。我一大早就向大山进发了，清晨的山谷中透着淡蓝色的雾霭，一个巨石林立的峡谷藏于连绵起





伏的半圆形切维厄特丘陵之间，岩石争先恐后地沿着溪流和隐蔽的瀑布不规则地排列着。我神清气爽地迈着大步，穿过沼泽，这真是个完美的秋日。我享受着寂寞，感受着太阳的温暖，独自往返。我心中反复考虑着探险队面临的所有问题和困难，但有一个情况引起了我更多的担忧和焦虑，不是赞助或物流问题，也不是冰隙或寒冷，而是夏尔曼。她的问题我在新西兰就感觉到了。她不同意我以我的方式进行这次探险，我怀疑她是想要担任更多的领导工作。她总是有意识或不自然地发泄出她的挫折感，致使我们之间越来越尴尬。就在前一周，夏尔曼告诉我，她会晚一个星期到达我们去南极洲的出发点，并且还抱怨了几个关键的安排不理想。我想，在冰雪之上是很难作出决定的，我要用我的行动回答夏尔曼的质疑，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处理好团队中对抗的危机。我记得罗伯特·斯万的书中提到他遇到的一个团队成员不支持他的做事方式而产生的麻烦。我不想有同样的经历。

忽视夏尔曼的态度很容易，但是我告诉自己，这一问题如不解决，将跟随我们一起到达南极，而且在我心里，我知道她的态度不会凭空消失。如果团队在出发之前不能统一思想，一旦遇到压力，这个团队是不会凝聚在一起的。我必须想办法来改善目前的处境。我认为我应该和她谈谈这些问题，但我已经在新西兰试过了并且收效甚微。直到离开的前一个月，我们也没能修复彼此之间的隔阂。那么现在，我要考虑：夏尔曼是否要离开团队？这种想法吓了我一跳，是的，没有夏尔曼，我要另外寻一个新的新西兰的队员。之前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可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到了南极，还会有更大的风险等着我们。我被这个问题搞乱了，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我不能赌博，我不得不请她退出。我很难过，还记得在新加



坡时，我曾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曾经解雇过某一个团队成员吗？”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场景，然而现在，它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我想，一旦其他队员知道了夏尔曼离开的消息，尤其是金姆，会怎么想呢？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包括我自己。我要怎样告诉别人？我剥夺了她们的梦想吗？我坚决地收起自己的疑虑：我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团队领导者，很多决定可能是不情愿的或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在必要的时刻必须要有强硬的态度。一旦决定要做就不允许自己躲避，尽管解决它仍然让我感到有些不真实。我特意安排了时间，拨通夏尔曼的号码，她一直不愿与我对话，但我告诉她事情很紧急。我确信我将说的话对她会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夏尔曼，接下来的谈话很严肃，”我停了下来，做了一个深呼吸，“我需要跟你谈谈咱们的探险。”

“好吧。”她回答，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感兴趣，显然，她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我打电话是希望你能退出探险队。”

对方沉默了。

“当你加入我的团队时，我希望你会成为我的一个红颜知己，一个无所不能的副指挥官，因为你的经验很丰富，但你似乎并没有在这方面尽全力。我们之间没有最起码的信任，我知道这会让我们在南极出现问题。这看起来可能有些戏剧性，但我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我不能忽视它，因为一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将会很后悔，因此我不能冒这个险。”

停顿了一段时间，我又重申。

“我不能冒这个险。”

“但是你在新西兰时并没有提到，你至少应该给我改正的机



会啊。”

我想我们的交谈就是在考察彼此，我看不到她有任何改变，这样的指责与推卸在我的预料之中。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证实了我的担忧，毫无疑问地说——对于这次探险，我们的心已经分道扬镳了。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盯着眼前的绿色植物，感到有些朦胧，好像是在拍电影，但这又是真实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仿佛正在演戏，比起之前的口吻我表现得更加固执和不友善。“夏尔曼，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恐怕这是最终决定。”我向她说明，我会在恰当的时候向团队公开她离开的消息。电话快挂断的时候，她说：“请别这样，费利西蒂。”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怜，这动摇了我的决心。这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不管什么原因，是我作了这个决定，虽然我很内疚，但我不后悔，我知道这么做是正确的。

大家好，我恐怕有个不愉快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刚刚和夏尔曼通完电话，请她离开了探险队，这可能会对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思想上带来冲击，但也给我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还要找到一个新的来自新西兰的队员。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作了这样的决定。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很危险的。因此，我希望大家都有信心，我需要你们完全信任我。这是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如果有谁想和我讨论有关夏尔曼这个问题，可以来找我，但让她离开是我的决定，而且是最终的决定。我希望大家把重点放在未来上，为此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有你们在，我充满信心。

费利西蒂

队员们的反应格外安静，虽然她们很同情夏尔曼。也许她们私



下交流过，我猜。我一共收到了来自新西兰妇女的200多封申请参加探险队的邮件，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有经验的滑雪者、登山者，有许多人已在南极洲训练了一段时期。我需要的人不仅要有培训经验，让我用最少的时间来完成远征的训练，而且能很快很轻松地融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

我看了看准备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新西兰的候选人名单。其中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凯莉·维克琳，我和凯莉初次见面还是在2001年。那年夏天，她和我在同一个南极研究基站，两个女人在一个非常男性化的环境中很快成为了朋友。后来我们曾经联系过彼此，但是一直没有再见面。在以前挑选候选人时，我想到过凯莉，但是那时我担心在面试过程中会有人质疑面试的客观性。而现在，我再一次关注到她，因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是有很大风险的。我可以问问凯莉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她是最可靠的。作为一个狂热的登山者和滑雪者，她有着丰富的户外运动经历，她已经去过南极，而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十年来，凯莉已经在库克山国家公园创立了她自己的公司，为游客提供游览冰川、冰湖的船只。最近她出售了该公司，又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她刚刚获得了商用驾驶员执照，我就给她发了邮件邀请她参加我的探险队。

我们在电话里谈到此事时，她很高兴地接受了，但我劝她再好好想想，想好了给我发一个电子邮件确认一下，我期待她的回复。我在第二天早上收到了她的回复。我把具体细节、日程安排和航班信息等相关文件发给凯莉之后，思绪又转向海伦。作为团队的候补，她还抱着会被邀请参加探险队的希望，我否定了这个机会，取代夏尔曼的是别的新西兰人。不过，我也不希望浪费我的候补，因为在团队成员陆续到达在新西兰的训练场时，仍然有另一个未解决的情况，那就是芭芭拉还没来。我们在前往南极洲之前一定要进行



额外的训练，她必须来。两个星期以来，我想了很多种办法和她联系，包括打她的手机，可一直没得到回复，也没有人听到过关于她的任何消息，尽管队员们给她发了一连串的电子邮件。最终，当芭芭拉的电子邮件到来了，却不是个好消息。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她一直在床上抵抗疟疾。“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更别提能否参加即将到来的远征了，”她写道，“很抱歉，我令你 and 探险队失望了，但我会为你们祈祷的，关注你们在南极走的每一步。”她还写下：“谢谢你做的一切。我爱你，上帝保佑你。”我彻底绝望了，但我又出奇地平静。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这一次，它不是靠打几个疯狂的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没有芭芭拉，其他人也能做到。但疟疾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致人衰弱的疾病，即使她最终完全康复并及时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南极洲，即使她的身体能够支撑她在南极滑雪，那也有可能因身体疲惫而引发生命危险。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远征队中除了芭芭拉再没有一个非洲代表了，这不像新西兰，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替代芭芭拉的加纳人。我写信给海伦，问她是否愿意代替芭芭拉在队中的位置。可那时她已经放弃了希望，加入了另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在纳米比亚海岸徒步行进的探险，并且已经跋涉了一个多星期。现在，她无法返回到英国。这正是我担心的。几个月前，她告诉过我她的计划，但当时，探险队并没有给她任何的承诺和任何的权利，我也没有反对她加入其他探险。而现在，我又给海伦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告诉她，我非常信任她，请她仔细考虑并做出最终的决定，如果她觉得合适，可以从纳米比亚回来后，再来南极。

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虽然我很遗憾芭芭拉不能来，但是海伦能来，也令我欣慰。我放下心来，第二个麻烦被海伦解决了，我希



望当我不在那里时，她就像我的眼睛一样。

我很担心，探险队在最后一分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有可能会使我们的赞助商感到紧张。但令人感到宽慰的是，我向萨克玲解释了这件事之后，她愿意相信我，并且也很关心我。建立卡巴斯基实验室新征程网站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该网站将成为探险队的主力平台，通过它，我们要向全球观众播发我们在南极洲的活动。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预算，但我下定决心要拥有最棒的技术装备——远征中，我们将携带两部卫星电话，这将使我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活动自如。我们还需要设置一个语音信箱以便记录播客，再上传到我们的网站，好让任何人都可以听到我们从南极洲直接传来的声音，我们也可以注册一个卫星电话的Twitter账户，显示在我们的微博上。我们的网站在真实地记录南极时间（也可以命名为南极微博，据我们所知，这是别人没有尝试过的），最令我兴奋的还是，我确信我们可以坐在南极的帐篷前给伦敦的观众们举行一个鲜活的讲座（当然以前也没有人做过），通过分享我们生动的经验来吸引更多的人，通过传递我们的消息，制造更多的机会，激励更多的人去思考。10月底，我等待团队成员抵达英国。我们计划要一起准备三到四天，然后前往彭塔阿雷纳斯（智利港口城市），在那里，我们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检查和准备我们的设备。我们的班机将在11月12日到达南极洲。

凯莉是第一个到达的。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至今已经有六年了，时间仿佛在瞬间消失，她没有任何改变，但我感觉她就像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年轻人，她是一个向往南极的理想主义女孩。当我们拥抱彼此时，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我的变化。

我的公寓不是很大，不能容纳整个团队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装备，还好我的父母把他们的家提供给我放这些设备。我的童年是在



西肯特度过的。在我出生的几个月前，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搬进了现在这个带有大窗户的房子，从此，我们就住在那里。那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我慢慢长大。那里被9英亩的森林包围着。我和我的妹妹用木头花了无数个夏天设计改造了一个能够工作的地方。我的父母都是热情好客的人，所以家里总是聚满了朋友。我和凯莉开车到达后，就着手整理堆积如山的盒子和包裹，把里面的物品放在我父母家的客厅。

第二天一大早，瑞娜和索菲娅就到了，然后是艾拉和史蒂芬。我把她们介绍给凯莉并让她们相互了解。探险用的服装随后也到了，我从一个箱子中拿出一套看了看，感到非常骄傲。明亮的红色绝缘罩衫上印上了白绿相间的卡巴斯基探险队的标志。袖子和帽子都是用貂皮做的，感觉很厚。它看起来就像一件夹克，一件像是在孩提时做白日梦探险时才会穿的那种夹克，它是真正的极地探险服。

现在我知道我们一定能远征了，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两年前，探险队只是一个梦想，现在我们有了一套制服、设备，以及队员。摄影师到了，带来了从当地媒体和广播电视台找到的车用桅杆。我的好朋友给我们做了最后的急救培训，他教给队员们一旦发现身体上出现水疱怎样才能确保它不被感染；如何使用治疗扭伤的银色胶带；如何应对骨折，以及如何止住主要部位的出血，还为我们培训了所有药物的使用，如如果我们有任何过敏情况发生应该使用哪些药物等。索菲娅认为她可能是布洛芬过敏，但不确定。

“那好吧，只有一种方法能帮到她。”我的好朋友说完从手掌中拿出一个白色小药丸。索菲娅看起来不太相信，问道：“这能行吗？”我也表示疑惑，问道：“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团队成员住进医院。”这个男人看着我严肃地说：“如果它有任何问题，索菲娅可以立即获得医疗帮助，你愿意看到她在南极发生过敏状况吗？”索

菲娅眨了眨睫毛，把药丸收好，“好吧，至少现在我知道了。”她说。那家伙还教会了我们不太麻烦的心肺复苏术，使我们明确了心脏复苏的位置。“一旦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就需要马上得到医疗帮助。”他解释道：“可你不会在南极洲得到帮助，我很不愿意这样说，但是，如果你的心脏确实停止了，你就会死，我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教你。”他说的是对的，但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某一天我和凯莉的谈话。她曾问我，在这次探险中会有怎样的风险。深深的冰隙裂缝可能发生在南极洲的任何地方，通常地表会覆盖着一层雪，但它可以使一个人陷入足够深的冰隙中。这让我感到浑身冰冷和恐惧，我已经和那些以前滑雪去过南极的队员讨论过了，也知道那些风险经常发生在冰隙，冰会突然改变地形，比如一座小山或一个冰流。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遇到这样的风险。我们会在滑雪时注意我们的载重，确保不会落入任何一个积雪覆盖的冰隙，在初冬季节雪层裂隙最强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吊带和绳索把队员们绑在一起，如果有人下跌，其余的人会及时施救，从理论上讲，这是滑雪，用绳子把他们绑在一起是不切实际的，但这是我们唯一的保护措施，如果我们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可以及时采取行动来避免。

这个决定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理的。几个月前我们假设的危险离我们很遥远，但现在看来，它是那么的真实和直接。我无法摆脱恐惧的感觉，我有种预感，我的恐惧支配了我的情绪，甚至使我的推断力下降了。和父母说再见的时候到了，我不再害怕，我尽量让自己清醒过来。父亲是很理智的人，告别时，我注意到他对我格外亲密，他伸手搂着我，拥抱我，我们照了很多照片，多次道别，当我们开车驶向机场时，他甚至跟我抛了个飞吻。我小时候，他从未这样做过。父母告诉我他们为我自豪，这在过去也从没有过。





我们的飞机从蓬塔阿雷纳斯（智利）起飞了，我看到人马座的红白星光闪耀在夜空，我在窗上用指尖轻轻地描着星图的样子，我一定会回来的，为了那些我所爱的人。在那一刻，我多想成为那些返途汽车中的一辆啊，那比什么都重要。通常远征时，我带着将要去冒险的兴奋，也经受着离别的悲伤，这一次，却是不同的。似乎有人在向我大喊，留下来吧，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向家跑去，不要离开——仿佛有一根磁铁在牵引着我。我兴奋地告诉自己，我来了——这可怕的思乡之情会把我的计划和准备全部抛弃。我觉得很可笑，我得冷静下来。我在脑海中不停地思考着：不用担心，一切准备都已就绪。

蓬塔阿雷纳斯是一个小城市，人口超过15万，但保留了一个边境小镇的感觉。小城沿海而建，仿佛立在一个庞大的山坡上，它看起来正对麦哲伦海峡，这里有清晰的视角，可以从地平线上看到海面上刮过来的风暴。十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一次，我只记得关于它的两件事情：永远不停的风和大批的流浪狗。我的脸布满灰尘，眼睛被风吹得睁不开，我们的行李就堆在街上，不远之外有很多流浪狗，我感觉这里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住的旅馆就像其他城市的一样，没有什么特别，这里是背包客们经常聚集的场所，它有一点旧但很朴素。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很棒。我们还征用了这家旅馆的厨房和会议室，楼上放满了登陆服和各种装备，饭店经理看上去有些困惑。我把队员们聚集在一起，制订了一个六天的行动计划。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准备探险队所有的口粮。为了节省运输成本，我们只从英国带了部分食物，因此还要再采购些食物，此外，为了符合智利海关的规定，所有食物都保持其原始包装。这意味着，在旅馆里，我们要重新安排每个人的日常食物。我比前一个月花了更长的时间来规划粮食问

题的每一个细节，一直精确到克。使用运动科学家发明的公式根据每个人的体重来确定每个人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不巧的是，队员们的身材不同，变化也大，最瘦弱的艾拉只有50公斤重；瑞娜体重却超过70公斤。我是最重的（也是探险队中最高的——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一个探险队中的巨怪），所以我决定用我的重量作为标准计算。这将意味着，一些女孩会得到比她们需要的多至少三分之一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但我想多总比少好。

我还要考虑我们的脂肪和热量的摄入。除了食物的考虑，雪橇也一直是我想考虑的问题。我订下目标，每人每天的食物量不能超过一公斤。我们要获得必要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热量都在这一公斤的食物里面，这令我感到沮丧。通过营养信息分析，我们把数百种不同的食品分好类，有一些含有非常高的碳水化合物，但没有脂肪或蛋白质；还有一些含有高蛋白质和脂肪，但是非常重。还有更复杂的事情，我还要重视八名妇女的喜好问题，她们平时喜欢的食物都不同。金姆喜欢香蕉片和干芒果，瑞娜不吃虾片，索菲娅不喜欢太甜的食物，当然，也要确保不含酒精或猪肉制品（除非我确定它们是清真的），特别是瑞娜的食物不能是牛肉的（瑞娜信仰印度教）或猪肉（艾拉和金姆的要求）。

经过几天的试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令我满意的组合，而且几乎能满足大家所有的要求。早饭，我们用糖和强化奶粉作为稀饭，配有巧克力。一天中，在我们的休息时间，每个人都有一包小吃，包含花生、芝麻、奶糖、爆米花、香蕉片、巧克力和硬糖，我们的矿泉水中还要添加两袋碳水化合物运动饮料。晚上，我们会配一个脱水餐，包括蛋白饮料、热巧克力、汤和面条。按照这份食品单，除了从英国带来的食品外，探险队迅速到城市的各个商店扫荡货架上的巧克力、花生和硬糖，我们好像是购物狂。在选择汤料时





出现了一个问题，蓬塔阿雷纳斯人似乎只喜欢芦笋汤，因为我们在采购的汤料中发现只有这一种味道。连续40天都要喝芦笋汤很不可思议，但至少每个人都喜欢它的味道。最难找的是香蕉片，我们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在小镇对面找到一个刷着明亮油漆的大超市。透过这家商店的玻璃我们看到大箱的干果，从无花果到木瓜，品种齐全，还有香蕉片，而且这里有两种：甜的和咸的，这就引发了整个探险队最激烈的讨论。

“谁会愚蠢到吃咸香蕉片？”金姆惊叫着。“如果它不是甜的，它就不是香蕉片了。”

“不，”索菲娅坚定地说，“我希望是咸的，我们有太多甜的东西，香蕉片应该是咸的。”

最后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在香蕉片的选择问题上，可以两种都买，每个队员有不同的喜好。很显然，妥协的结果是两者的混合。大家都拿出了解决国际领土争端的劲头去争论甜与咸的确切比例。

回到旅馆，我们就像流水线一样开始准备大约460袋口粮。每个人负责一种。金姆负责太妃糖和爆米花；瑞娜和史蒂芬负责花生；海伦来处理硬糖；凯莉负责巧克力；索菲娅负责香蕉片。起初我们规定在工作的时候不能吃，但这对于大家来说是很困难的，尤其当糖果气味充满了整个旅店时，我们恨不得马上吃掉它。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ALE“南极航空公司”旗下专门负责探险人士南极活动的分支公司的医生来拜访我们。我曾在圣地亚哥机场见到过他。他过来向我们做自我介绍，我们穿着统一的极地服装，很容易引起注意。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每年都会看到有探险队过来，但是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举例列出了一些最常见的错误，我很高兴我们没有犯任何一条，但他的意见我还是很在意。我日以继夜地准备了两年的时间，尽量让自己得到尽可能多的

建议，包括ALE的医生，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探险万无一失，但医生似乎觉得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对我们不抱太大希望。我意识到，在ALE的眼里，我们简直是一支危险的队伍。南极洲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我竟然带着一队刚刚经过培训不到一年的新手去完成这样的旅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多少比我们更强的、有经验、身体又好的探险队都未能安全完成任务。

我们是一支私人探险队，如果我们受了伤，ALE会为我们提供后勤支持。但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被调用。为此，他们会严格地审查每一支要去南极的探险队，一旦他们认为这支队伍是不安全的或毫无准备的，他们有权拒绝任何一支探险队，我不想给ALE任何怀疑我们的理由。临行前，医生来到我们的宿舍查看我们的急救包，他看了看，一下就发现我们准备的食物中营养不太符合标准。在苛刻的极地科考经验法则中，基本标准为每人每天需要至少4500卡路里的热量，旅程结束时，每天还要增加到约5000卡路里。而我们的口粮仅提供了4300~4600卡路里的热量。我之前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们队员的需求量明显比平均水平要小。

在挪威和新西兰的训练中，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一些队员的摄入量不会超过这个值。虽然医生已经离开了，但我还要好好想想，我们的粮食是否需要改变一下。我得非常小心，不能有任何闪失，我要用最引以为傲的方式作出最正确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客观地重新审视我的计算，我相信，我们的食品配比是最好的，完全能满足我们队员的需要。

第二天我们去了ALE办公室讨论我们的探险。史蒂夫·琼斯，我在ALE的主要联系人将要主持这场会议，我知道在过去的一年，他非常支持我。他需要知道我们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从装备到给养。为了配合他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把所有的文件





都递给他，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经历一次考试。史蒂夫将严格地、彻底地审查我们的材料，而我需要证明我的团队已经准备就绪。我们排着队，被引领着走进ALE的一间通风明亮的休息室，女孩们被安排坐在沙发上等待，她们就像十来岁的孩子，而史蒂夫则坐在中间的一把椅子上。他会从探险队的各个方面去考察这次探险，从准备到培训，从炉灶到卫星电话。史蒂夫最关注的是我们在整个探险中打算如何处理人类的废弃物。去年，ALE一直在致力于倡导人们在南极周围清理废弃物，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对于在探险过程中，收集废弃物会增加我们的负荷量，史蒂夫对我们表达了他的疑虑：“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也不愿意看到你们有其他的不必要的负担。”“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废弃物，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额外的重量，这个决定会增加我们的负荷。”我试图用相同的理由来安抚史蒂夫，“如果它太重的话我们就得停止收集。如果在它变重之前，我们仅仅要处理在途中的废弃物的话，那确实比不做强。至少我们会了解将有多少废弃物在增加，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史蒂夫看上去不为所动，他显然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行动。

另一个话题是，再补给的食品和燃料放在哪儿。ALE自己组织的探险，都是把额外的补给放在接近南极的地方，史蒂夫也希望我们这样做，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困难，如果这样，补给离我们会很远，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我确信如此，因此我们决定把物资放在航空站，收集的垃圾也可以放在那儿。与史蒂夫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ALE告诫我，这么大规模的女性旅行团队会困难重重，我认真地听取了这些建议，但仍不由得感到沮丧。

我并没有感觉我得到了多少赞誉，我曾经在一个团队中接受过系统的规避危险的训练。分离是最令我感到恐惧的，因此我和团队成员总是在一起滑雪而去，驾着雪橇而回，绝不和队伍分开。我相

信我们的团队已经准备充分，我们集大众的智慧于一体，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直到我们起飞的那一天，我们在车库后面的招待所里安排好要一起带到南极的所有设备，因为我们要减轻负重。我确定，我们必须轻装上阵，我们只能通过减少设备，去掉任何不必要的物件或奢侈品来达到目的，而不是减少每个队员自己的小刀、杂志、铅笔、GPS、指南针、相机、保湿霜、湿巾和牙膏这些东西，我们作为一个集体要共享这些物品。而个人的奢侈品如书籍、好运的吉祥物和圣诞用品是被禁止作为任何善意的“惊喜礼物”送给其他队员的。大多数的女人都很赞同我的减负规则。但当我筛选每个队员的个人物品时，也遇到了一些抵抗。索菲娅和瑞娜每人有一个包和两顶帽子不愿放下；当我让史蒂芬放下湿巾和卫生毛巾时，她也有些抱怨；凯莉失望的是我不让她带小圣诞礼物，她偷偷地对大家说我就是个令人扫兴的人。但是如果我允许凯莉带礼物，其他人也会把藏在我们的行李下的冷冻火鸡片和假的圣诞树带上，那样就会大大地加重我们的负载。

我知道女孩们都觉得我没必要因负重问题而担心，也不理解我那些硬性规定的意义，但我知道，我们要拉着雪橇度过六个星期，我知道我们将要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雪橇上，因此，我必须严格地不顾一切地执行规定，即使有些东西是非常小的，也不被允许。我想等到探险结束，她们就能明白我的顾虑了。每个晚上，我们都要花很多时间用来缝纫。楼上的平台就像聚集着一个缝纫妇女会，我们围坐在电暖气旁，拿出准备好的盒子、针和线等材料。我们每个人的衣服几乎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要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缝在衣服上作为编码，当然也要适应个人的需求和偏好。还有一些套头帽，我们也要在脸部剪出一个洞，这样可以更方便呼吸，使它更合体。有些





人把袖口做了一个小洞以便能让拇指穿过，这样可以使手腕保持暖和，还有人提出可以用羊毛料子或旧袜子把袖口加厚。我们边聊边缝，往往一直持续到凌晨，缝纫是我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光。

我要确保队员们不只会工作，还要有足够的睡眠和食物，以便于当她们抵达南极时，能够适应那里，不会感到紧张和疲惫。但是队员们不免还是会有紧张情绪，而人一旦紧张起来，就会犯错误。金姆来见我，她在宿舍弄坏了一个炉子。她在调试火炉的时候，因过于紧张致使炉子的发热泵噼啪作响，我们没有可用的炉子了。我因她的粗心大意而感到生气，但平静之后，我想我们很可能在蓬塔阿雷纳斯再找到一个的。不久，史蒂芬穿着她的探险防风衣去了市区，在距离旅馆100米的地方——她把衣服丢了。

“对不起，费利西蒂。我到处都找了，但是没有找到。”她向我道歉。我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她没有防风衣怎么可能去南极滑雪呢，我们没有后备的衣物。每个队员都穿着相同品牌的装备，就算我们在别处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外套，那也会影响到团队的形象，我们找个赞助是多么宝贵啊。“好了，没有它你可以不用去南极了，”我厉声说道，“所以，你最好出去找到它。”

她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沮丧地踱步在街头、在宿舍，寻找任何身着红色夹克的身影。她询问咖啡馆和商店的员工，是否看到有穿着红色外套的人路过。我注意到其他队员都很同情她，她们认为我没有必要那么严厉地对待史蒂芬，显然，衣服丢了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队伍中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每个成员毫无疑问都很关心我们的探险而且也很努力，但如果有东西丢失了，我严厉地批评她，队员们又会反感。对她们来说，这仍然像一个游戏，而不是真的，我觉得我得对这种态度负责。在挪威，我注意到每个人都好像是去参加一次学校组织的旅行。有人丢了东西，



她们就会立即补上。我不能让她们把这种习惯带到南极去，我要马上解决掉它。因为在南极，我没有时间照顾到每个人，女孩子们必须为她们自己负责。

灯光暗下去了，我派人去找史蒂芬并把她带回旅馆。当她到达时，我把队员们聚集在起居室。我暗自叹了口气，感觉自己像一个女校长。我们谈论了坏了炉子的后果和失去夹克的意义。我还补充道：“我知道你们认为我很严厉，但在南极，我将不会对大家宽容，如果我们让这些类似错误屡次发生在探险过程中，那就会有危险。在南极洲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我知道你也不想这样——但为时已晚，悲剧已经出现了。我希望你记住现在这种后悔的感觉，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南极探险中犯了错误，就会被发送回家。我们的探险就要停止，你会感到多糟啊。用这种想法来提醒自己，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会比你以前的生活更认真。每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寒冷和疲惫，你就会受到诱惑——还记得可怕的感觉吗？现在，用它来让自己清醒一下。我需要你在犯了错误时感觉到歉意，而不是之后觉得无所谓。我也很想让大家放松心情。但是战斗的本能告诉我，我们必须打起精神。”

医生打来电话，他提议要给探险队做个如何应对严寒伤害的讲座。他要通过一系列不同专家的讲座来教授妇女们相关的症状和预防伤害的办法，但我不能保证听完它大家就能不受到伤害了。吃完早饭，女孩们坐在医生的电脑前，医生向大家展示了受伤后可怕的照片，我看到女孩们几乎要晕厥了，她们的脸上布满了惊恐。她们开始问问题，我知道她们已经有了答案，但问出来还是感觉很害怕。

大家问了医生很多基本的问题，我感到有些担忧。医生给了我焦虑的一瞥，我想我得报告给史蒂夫。最后我打断了医生的话，



“姐妹们，这些内容都很有价值，但是你们不能让自己恐慌。这些知识你们在挪威的第一天就已经了解了。你们不仅知道这些情况，还把它付诸在挪威和新西兰的实践中了，因此你们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现在做的事情做好。”

“是的，大家没有必要恐慌，”医生赞同地说，“但南极洲和挪威或新西兰是截然不同的。队员们有谁去过格陵兰？你们对那里了解吗？南极洲是危险的，你不能让你的警惕有一秒钟的松懈。”

在这一刻，他确实把队员们给吓住了。这样，她们就会更加谨慎，当然也会感到恐慌。我不想显得没礼貌，但也不想看到我的队员们一个个都吓得目瞪口呆地离开帐篷。那天晚上，她们每个人都穿上南极的装备，我用军事化的标准检查了每个人，以确保万无一失。我检查了她们服装底部缝制的保暖羊毛、保护鼻子的护目镜、连指手套、衣服的标签和拉链。还有最重要的不同颜色的编码。这些小细节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在南极洲，我知道它们将承担至关重要的作用。

瑞娜回到宿舍时，每个人都很吃惊。她的头发原本是很长的，一直垂到腰际。而现在，她却是一头短发，只是略微过了耳朵。她露齿而笑，但热泪盈眶，很显然，这是一种情感的折磨。为了这次探险，队员们已经决定剪短头发。我们都知道，两个月里，我们都将无法清洗头发，因此必须把它们塞进贴身的帽子里。长头发很难打理，还可能会打结和干枯，它必须被剪掉。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对于瑞娜来说，它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她解释：“在印度，长头发被视为美德的象征。比如在电影中，如果女人有短的头发和过分浓的妆容，她就不是个好女人。”这是她第一次剪短头发。虽然我们再三向她保证，它看起来很不错——确实如此，不过，她还是很担心家人的反应。她不让我们把她的照片给她

的丈夫看。“头发会很快长起来的，到时候再看吧。”她说道。

我们的航班定于11月12日从蓬塔阿雷纳斯到南极洲。航班从南美出发到南极洲的大本营爱国者山，因为天气原因，飞机延误了，但安全是最重要的。它不像一般的行程，在这儿，一等就要等几天，有时甚至几个星期，就为了有一个合适起飞的日子。就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离开时，我突然希望第二天早上会取消飞行。我有一个想法，能完全放松一天，这是多么诱人啊。我们早早起身，坐在一起吃早餐、喝咖啡、等电话。我让自己去思考一下在这样自由的一天，我能做些什么？我想我会回到床上或找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坐下来，享受我的读书时间或者在蓬塔阿雷纳斯热咖啡和蛋糕的邀请中放纵一下自己。

这时，厨房的电话响了，所有的期待都集中在那里，房间一下子安静下来。旅馆老板接听了电话，说是ALE打来的。在电话里我对飞行员说：“今天早上爱国者山有点风，但下午的天气条件看上去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按计划在今天离开。”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哦，好吧。我服从安排。那么，你可以让你的伙计们准备了，我们会在45分钟后来接你们。”我意识到女孩们在房间里等消息，我微微一笑，伸出大拇指，像小丑一样挂了电话，大多数人马上在楼梯消失了。我听到金姆喋喋不休地大声兴奋地叫着，瑞娜豪爽地大笑，史蒂芬则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凯莉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大声欢呼着。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听着大家混乱地上楼。我喝完咖啡，深吸了一口气。就这样，我们终于要上路了。



第8章

大风暴

俄制伊留申飞机内部充分体现了它的俄罗斯特色：铺着厚毯子的座位、小小的凹透的舷窗，还有内墙上满满的工业布线。而那位装卸长官长着一圈灰色浓密的胡子，围绕着他有点下垂的眼睛。他高踞在座位上，旁边是抖动不停的仪表盘，目光尖锐地瞪着我们。我们被安排在他面前的座位上坐成一排，好像要观看一场即将开始的演出，而他是唯一的演员。飞机向前滑行，轰鸣声和发动机的振动声笼罩着我们，这使得我们无法进行交流。当噪声达到顶峰时，飞机起飞了，所有人跟着向后倾斜。在飞机起飞时我透过身边的窗户瞥了一眼，看到棕色的田地，然后就全都看不见了——我们在几周内是看不到绿色了。

大约六个小时后，在确定我们到达要着陆的地方之前，我叫醒了队员们，她们要做好准备，马上就要进入零下20℃的地方了。

这听起来自相矛盾，我们需要温暖的夹克、围脖、绑腿以抵御寒冷，也需要防晒霜和太阳镜的保护，以免受太阳的照射。在南极洲，这样的温度可能远低于冰点，但太阳光又极强，只有薄薄一层





天然的臭氧，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照射的伤害。所以在南极是非常容易被严重晒伤或者患上雪盲症的。随着一声雷鸣般的引擎声，飞机降落了。推开门的一刹那，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南极洲。

迎面扑来的不是寒冷的空气，而是刺眼的阳光。我躲在墨镜背后的眼睛眯了起来，当踏上硬邦邦的跑道时，我试着躲过这耀眼的光芒。这架飞机的背后，在我们左侧延伸的长长曲线的尽头就是埃尔斯沃思山，角峰像被厚重的雪覆盖着的一堵墙，有些地方的冰不知不觉慢慢地从高处流下来，这样看上去像是长年累月留下来的。无瑕的白与下方水蓝色的裂缝有着天壤之别。陡峭的平面，充足的冰和岩石反射出的太阳光似乎泛着金色的光芒。山下是大面积的积年裸冰，有着引人注目的粉蓝色。干净的雪被风吹下山坡，这个冰带被当作一条跑道。强烈的太阳光把冰照射得潮湿，凸显出数以百计的纹理，在其表面有拳头大小的“酒窝”。冰层外一千米处似乎是一个小营地，在这个中心下方是一小方墩冰，上面用钢丝绳绑着一个高大的金属桅杆。这是建在冰上的通信箱和ALE的操作枢纽。周围有一些小型的帐篷和几行更小的测地线，用于安排工作人员住宿的帐篷。大型机械隆隆地从飞机上往营地运载货物，工作人员挤在多彩的雪上摩托上。

自我上次去南极洲至今已经六年了，但当我呼吸到这片大陆的那种奇特的熟悉的气味时——航空燃料和防晒霜的混合味，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看了看队员们，我发现她们正围在飞机机翼的窗户前。穿着红色相同外套的她们看起来就像一群曾经迷惘的学生在寒冷的郊外徜徉。她们看上去又小又幼稚。我能听见金姆重复着说：

“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她慢慢转过身看着外边的风景，像是着了魔似的念叨着。我们跟随着ALE的向导排成长长的队伍朝同一方向走去。太阳光在空中照得我们直出汗，使我们的绒衬

衣很快就湿透了。一台拖拉机牵着后边拉满货物的挂车把我们的包裹存放到营地。我们忙着自己整理出我们的设备，第一次在南极冰上把我们的两个明亮的红色帐篷搭起来。我们还有绿色的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标志和雪橇，看上去和南极洲的白色蓝色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我们垄断了一小片区域，除了帐篷和建筑物集中在一起，其余地方很快就被称为卡巴斯基的营地占据了。

我们带了一些酒，在第一个晚上招待了从埃斯特角城和我们一起来的朋友。不仅是为了庆祝我们抵达，今天还是史蒂芬的27岁生日。我们八个人挤进一个帐篷，用小刀切开蛋糕分享着。我们传递着塑料杯，喝着保温瓶中的红酒，沉默的大本营顿时充满了笑声。我太爱这样充满光荣与喜悦的时间和地点了。我的心将这样欢乐的场面记下来，希望在未来的几天、几周时间里，一切都像我记住的一样美好。

当凯莉宣布已经凌晨一点多了的时候，外面的太阳光仍然强得像地中海海滩上的中午。我忘记了这里24小时都会是白天，而时间的概念是多么容易完全被忽视啊。这一宣告打断了我们的小小聚会（我猜营地的其他人应该感到松了一口气），队员们三三两两地拖着脚步去往用作厕所的帐篷。我和海伦站在那，看着这群小女人们穿着巨大的夹克走过去。“她们看起来像一群红衣矮人。”她笑着。我警醒地想到，我们的队伍给人感觉太不专业了。不难想象ALE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我们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能够成功滑雪到南极的团队。如果我们想让别人相信我们对此是严肃认真的，那从现在开始就不能犯任何错误。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准备离开爱国者山去滑雪的时候，同样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闪过。队员们的准备工作进行得依旧很慢。我们的团队始终在与个人化的管理作斗争，我常常觉得自己的角色在一





个保姆与女校长之间穿梭。第一天引发的紧张让每个人都很慌乱，一些曾经被压制的坏习惯也死灰复燃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计划花一周的时间在爱国者山适应本地的气候。这样，每个人都有时间一步步来适应南极的环境。因为我们必须向ALE证明我们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所以我对团队的无组织状况格外忧心。我还记得在挪威时摄制组拍摄我们迷你探险的情景，那真是场灾难——我可不想让这种事再次发生。

每个人都站在她们的滑雪板上，大家聚集在一起，在开始滑行之前，我要检查整个队伍，任何微小的错误都可能意味着探险的终结。我拿着清单走了一圈，确保每个人都带好了富余的手套和护目镜，方便食品和水，防晒霜和保暖的夹克。我们将慢慢地开始滑雪，单个滑行并定时安排休息。每次休息时，我都鼓励队员们互相检查彼此的脸，看看有没有被冷空气冻伤的迹象，确保所有人都还能感到自己手指和脚趾的存在，确保她们补充食物和水，还能连贯地交谈。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保护欲旺盛的老母鸡，沿着队伍滑来滑去，护卫她们保持前进。开始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大约一个小时后队员们就在一起配合得很好了。我也开始放松下来。

风从昨天晚上就刮了起来，我们背对着风会感觉站不稳。风吹动整个地面上松散的雪连续流动起来。雪地表面虽不够光滑，但却被风吹成了波纹状，波形像是雕刻在雪上。锋利的、干净的线条像涟漪一样完美，更像一朵花的花瓣。它们还抓住阳光，创造出了阴影和纹理，以至于地面上出现了淡粉色、紫色及闪烁的纯白色。我们头上的天空是大片的蓝色，还有飘动着的白云。而我们的右边一直被金色的埃尔斯沃斯山脉笼罩着，我们的左边除了地平线什么也没有。

八小时后，风开始加大强度，吹动着地面上的雪在空气中卷起白细的粉末，在我们头顶上形成薄雾。队员们以得胜军队的姿态

成功返回了爱国者山，她们看上去斗志昂扬，我为她们感到骄傲。仿佛她们在一天时间里就已经征服了南极。当女孩们取暖的时候，我开始检查大家有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或出什么小事故。金姆的眼睛底下有一点轻微的冻伤，不像冻疮，但在她黝黑的皮肤上已经凸起了一个很小的苍白的水疱，并不严重。当我轻轻地挑破它时，她的手恐慌地捂着脸，好像被刺痛了。这可能是由于她的帽子和护目镜之间留有一个小缝。“它过几天就会完全愈合了，要确保把它盖好，你可以在你的护目镜上缝一块布，这样就能覆盖住裸露的地方。”我安慰她。下一次我见到金姆时，她从我们的急救箱里找到了一大块石膏覆盖她的脸颊。把一大部分的橡胶粘在了护目镜底部，她显然是不想留下任何受伤的可能。

晚上风力增大，以至于我们醒来时发现头顶的帐篷在不断飞舞，随着每阵风膨胀、扭动起来。风声不断吼叫着，甚至当我们坐在同一个小帐篷里，彼此之间不超过几英尺，也不得不大声喊叫才能听到彼此。我把我的帽子、夹克和靴子穿戴好，来到外面，整个世界好像已经完全消失了，到处是暴怒的白色。我就像是在大风大雾之间穿行。望着营地，我只能看到我们附近一个或两个帐篷轮廓的暗影，正与风抗衡着。

我们原计划在附近进行一次迷你探险，但鉴于这样的天气情况，我决定推迟一天。一方面我认为队员们需要经历这样的情况，学习应对内心的恐惧，另一方面我又担心我们在南极洲的第一个常规据点就这样暴露在时速40公里的大风中会很危险。一顶帐篷被刮起，在南极的上空乱飞的噩梦般的景像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风刮了一整天，并且越刮越猛。现在狂风肆虐，用力拉拽着帐篷，好像要把帐篷从固定它的地方扯开。我们用铁锹铲走了帐篷周围的雪，以减轻这些雪对帐篷的压力，因为这些





雪都要把帐篷埋没了。艾拉为了保护我们的两个帐篷，已经用犁雪机在两个帐篷的周围搭建了一个大大的雪墙。尽管如此，狂风仍如轰雷般在我们的帐篷上空轰鸣，好像要掀翻我们的避难所一样。看起来似乎非常结实的帐篷，此刻仿佛极度脆弱。每隔几分钟，随着帐篷外狂风声音的变化，我都要从我的睡袋中出来，提心吊胆地瞥上几眼。当外面零下20℃时，从像虫茧般包裹的温暖睡袋中出来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帐篷对我们来说就是生命。当我注意到帐篷里面凸出的一角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帐篷已经有地方损坏的想法，于是我在几秒钟内就冲到了天寒地冻的外面。

当我一到帐篷外面，马上意识到，我们之前在帐篷周围堆的雪已经被风逐渐吹走了。“快递给我一把雪铲！”我冲着帐篷大喊，让史蒂芬出来帮助我。我们两个一起往两个帐篷的固定点上铲雪，很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当我迅速地进入帐篷里寻求其他队友的帮助时，一阵狂风破坏了帐篷的好几个固定点，铲平了帐篷。我和史蒂芬在大风中踉跄地寻找着，并把帐篷固定点已经损坏的一端分离开来，以便阻止它们继续将帐篷撕裂，但是太迟了。我朝其余的队员大声叫嚷：“快出来，到这儿来！”我不清楚她们是否听到了我说的话，但我看到艾拉和索菲娅正拼命地在即将倒塌的帐篷里匆忙地穿上靴子和夹克，她们也渴望我们的帮助。与此同时，我和史蒂芬挣扎着想要按住由于狂风而不断扭动着的帐篷的任何部分。狂风每隔一段时间就袭击我们一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绷带固定住变形的帐篷，防止帐篷飞走。当我们竭尽全力对抗着狂风拉动绷带的时候，我的手指非常疼。我对着队员们大喊，寻求帮助。艾拉从帐篷中出来了，当她看到被我们拉扯着的变了形的帐篷的时候，有几秒钟被惊呆了，不知道做什么。索菲娅就在艾拉的后面，也愣在那里不知所措。索菲娅在狂风中扭动着身躯，就好像被狂风不



断拉扯的另一个帐篷，又像狂风中的一只风筝。我看到艾拉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暴风肆虐地将她击倒。

我在肆虐的狂风中不断地挣扎，这时感觉有人朝我过来。那是凯莉，紧接着来的是海伦，她们听到了我寻求帮助的声音。狂风过后，风没有原来那么猛烈了，我可以朝着队友们喊话了。“在下一个狂风过去后，我们要把帐篷的固定点都拔出来！”我在暴风的噪声中尖叫着，“但是，当大风又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牢牢地抓住帐篷。”这是在下一次飓风袭击我们之前，我能够嘱咐队友的所有的话。我们所有人都要做好准备，防止被大风刮断的呈锯齿状的固定点撕扯坏帐篷。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被破坏的、锯齿状的固定点小心地拔出来，以便不使帐篷受到更大的损坏。我们笨拙地做着这项工作，对抗着帐篷的张力，每隔几秒钟，我们就要因为变大的风力而停止工作，在这期间我们只能悬靠在帐篷上，什么都做不了。金姆和瑞娜来了，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等待着我的指令。“拔起固定端！”我冲金姆和瑞娜大声叫嚷，在我们不得被另一股突如其来的夹杂着冰雪的大风刮倒在地之前。当我发现金姆每只手各拄着一个滑雪杖直直地站在我身后等着我继续发号施令时，吃惊地看着她的大眼睛，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不是滑雪杖，”我透过大风大喊，“是帐篷的固定端，把帐篷的固定端拔起来！”

随着最后一个帐篷的固定端被拔起，我们简单地将帐篷卷起来，所有的设备还在帐篷里面，把大型的物资捆放在两个雪橇上，把我们摇摇欲坠的“避难所”举到最近的营地当作备用帐篷储存起来。这些易被固定的避难所尽管只有12米长，但是高度却足够一个人挺直身体。谢天谢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空的。通过狭窄的门，我们慢慢地卷起帐篷，八个人站在被损坏的很难看的帐篷周围，用力喘着气。我们一声不出地站了一会儿，由于用力地干活



T 带着世界去南极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儿，护目镜蒙上了一层蒸汽。我们身上被冰雪覆盖着，头发、衣服和脸上已经结了冰块。凯莉第一个说话：“这是一个多么棒的团队啊！”大家都压抑着心中的喜悦，但大多数人都感到了一种释放的感觉。我在思考着，我已经看到帐篷被破坏了，特别是固定点的破坏，而且知道这需要很大工作量的修复工作，但现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我们究竟如何度过今晚。

外面的风仍旧猛烈地刮着。尽管现在帐篷非常安全地、牢牢地固定在地面，但是风刮得帐篷颤抖着，好像备用的帐篷都变得很紧张。凯莉、海伦、金姆和瑞娜需要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帐篷，去确认我们唯一的庇护所没有任何异样，其余的成员必须待在这个备用帐篷里度过今晚，所有团队成员需要在清晨集合以评估我们可能的损失是多少。史蒂芬和索菲娅把睡袋从我们卷好的帐篷中拉出来，艾拉帮我把所有的设备堆在备用帐篷的一边。备用帐篷给我们足够的空间睡觉，我们四个最后一个接一个地在备用帐篷的一端躺下来，同时，把我们被冰雪浸湿的夹克衫挂在脚上方的位置。我躺下来，尽管可以睡着，但我却始终难以入眠。我看着我的夹克衫随着风翩翩起舞，听着外面不断咆哮着的暴风雪，好几次，我都感觉这个备用帐篷会被大风掀翻而使大家置身危险之中，我考虑是否应该去检查一下备用帐篷固定点。

维可劳（一种尼龙搭扣的商标名称）的一处裂口打断了我的思绪。备用帐篷的门被掀开，我在睡袋里坐起来。史蒂芬探头进来了，她戴着一个被冰雪包住的皮帽子。“第二个帐篷已经开始被撕裂了！”她说道。听到史蒂芬的话，所有人都起来了，尽可能快地穿好衣服。我第一个冲出了帐篷，随后大家奔向卡巴斯基营地。我迅速爬上我们用冰雪搭建的保护墙的一边，看到好几个人拼命地将设备从被撕裂的帐篷的洞中推出来。我快速走到帐篷的走廊处，疯

狂地往袋子里和箱子里装马克杯、茶壶、燃料罐和炉灶，尽可能地快速，以防止它们被风吹走或者被大雪埋起来。我们一起卷起剩下的帐篷，把它们带到我们备用帐篷中。通过另一个拥挤的夹道，我们用力把第二个帐篷挤进狭窄的门。史蒂芬夹着我的胳膊，戴着帽子的脸凑近我旁边。“去大本营里喝点茶吧！”她大声叫嚷着。我们关上备用帐篷的门，把整个团队分成两三个小分队，踉跄着前往大本营，我们紧紧抓住前面一个队员，一个接一个的，只有这样才能抵抗足以让我们走不动的呼啸的大风。

我们不是去大本营寻求庇护的唯一的难民。那里还有一些队伍的成员，他们的小帐篷也在大风中被破坏了。连随队的医生也在那里，他的帐篷被突然从储物建筑物上倒下的门砸到，他被惊醒了，幸运的是没有受伤。但这扇门差点要了他的命，并且把他的帐篷弄坏了。这让我觉得稍微安慰一些，因为我们不是唯一被暴风雪驱逐出帐篷的人。但这并没有使我们面临的严峻处境有些许好转。没有可靠的帐篷，我们无法开始我们的探险活动。我不能精确地算出具体的损坏程度，但是我能预估到破坏的严重性。

我一直在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向在大本营驻扎的其他队伍借个帐篷，或者，我们或许可以等一到两周，在下一次运送物资的飞机抵达的时候看看他们有没有多余的帐篷，但这两个选择都不是最理想的。我们是一个大的团队，所有的日常活动和体系都围绕着帐篷来进行，包括正式探险前的培训和训练。现在整个探险活动的大因素改变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混乱。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修理我们的帐篷，但看起来这不太可能。我一边喝着温热的茶，一边听女孩们讲述她们在暴风雪中的经历，觉得内心很空虚。我知道，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但是突然间，这个项目似乎变得没有吸引力了。我已经为这个团队奋





斗了如此长的时间，但现在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斗志了。我感觉自己想要就这么掉转身走开，把南极这个地方抛在脑后，再也不要想起。

我决定现在关注眼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队员需要睡眠——这个夜晚已经够她们受的了。我们蹒跚着回到备用帐篷里，在清理出足够多的空间让我们躺下来休息前，尽情地享用着我们的小饼干早餐。我发现了一个小壁龛，就在门旁边的正上方，我把头靠在帐篷门的一边。尽管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但我还是穿着衣服就马上就睡着了，一睡就是两三个小时。

一阵特别强烈的飓风把我从睡梦中震醒了。我坐起来，脑子里想着我们该怎么办，听了一会儿帐篷外面的大风，看着大家都在熟睡。我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们会有出路的，我们还没有被打败。到目前为止，女孩儿们已经都平静下来了。她们有些震惊，但是并没有因为刚才那样的暴风雪，而带来泪水和惊恐。她们都很平静，因为她们坚信我们会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我也一直在忙着做这项工作。

在帐篷的另一端，我开始心不在焉地检查着设备，看看有什么丢失了。等到我到达帐篷后面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整套的工具箱已经被奇迹般地清点完毕了，我们丢失了一个装火炉的箱子，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通信设备箱子的盖子，一些手套和一件防风夹克衫。我们最严重的损失是三个滑雪橇。当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醒来时，我派出了一个搜寻小组去卡巴斯基营地检查一下雪地，看看丢失的三个滑雪橇是否被埋在了大雪里。

剩下的团队成员被聚集在了第二个帐篷里，仔细检查损坏的帐篷。帐篷的金属杆被弯成了令人恐怖的角度。金姆跷着腿很舒服地坐在帐篷的地面上，用钳子矫正拉直金属杆，同时史蒂芬耐心地抽



去空杆里的橡皮圈，让它们变得更短。

空金属杆上多处同时被弯得啪啪作响，被弄成了多个小段。金姆和史蒂芬用被截成小段的金属杆做成新的金属杆，但我们只剩下四根完整的金属杆，而这只够一顶帐篷使用。

同时，海伦和凯莉已经展开了被损坏的帐篷。它的外部 and 内部都有一些小的裂口，但只需要进行简单的修理，就基本不会影响其承重力和可靠性。第二个帐篷则损坏得比较严重，它几乎被纵向撕扯成了两半，铺在地面的防潮布上有一个大裂缝，一直向两侧延伸到两个门口处。尽管我们可以修补这些裂缝，但是这些修复会直接影响帐篷的耐用性。如果我们再经历一次类似的大风，那么像这样的主要修补位置会再次面临破裂的风险。此外，除了篷布受到损坏之外，拉链和很多襻扣也坏掉或者丢掉了。

我安静地坐在那里，海伦和凯莉向我指出所有损坏的地方。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我们的资源很少。我们自己的工具包里包括可以修补帐篷纤维轻微裂缝的胶带、强力胶水、强力的线和弯针，但这些工具不足以完全修好帐篷。此外，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物资供给都用上的话，就没有足够的物资用于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了。我们暂时分散开，各自去向在爱国者山区工作的结构力学专家、机组人员和支持人员寻求物资和技术支持。所有人都很友善，我们很快就得到一些加固型的织物、特大号的弯针、几种型号的胶水和一些尼龙编织材料来开始修缮我们的帐篷。在狭窄的备用帐篷里，刚好容下我们六个人同时工作，同时，缝补的工作也是很艰难和耗费时间的。带着手套缝补实在太不方便，我们便摘了手套赤手缝补，可这样太冷了，所以我们只能时不时地停下来暖暖手再继续工作。外面的暴风仍然猛烈地吹着，把我们正在工作的帐篷震得嗡嗡作响，帐篷全部颤抖起来。在这样极端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导致我们



缝补时犯了很多错误，比如，错误地把帐篷的碎片缝在了一起，把里面的材料缝到了外面，或者甚至发现把旁边队员的裤子和帐篷缝在了一起。粘合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帐篷的结构需要一种特定型号的胶水，但是这种特定型号的胶水需要在一定室温下才管用。而备用帐篷的温度在零℃以下，因此，我们必须把易碎的修补工作拿到汽车修理厂去人为进行加热才行。汽车修理厂的温度也不理想，但我们只能这样了。

穿过大本营，我们走回到备用帐篷里，我发现一个黑影朝我们走来。他被大风吹着，以至于我们都要撞上了。他是史蒂夫。我们隔着风对他大喊，但风实在是太强了，以至于我们这样叫喊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迅速地进入到临近的一辆卡车中寻求临时庇护。他拉下他的面罩，我们才能进行沟通。我看着他的脸。“你们怎么样？”他问。他把他的一只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摇着，以示对我的鼓励。我给史蒂夫一个简短的总结：不间断的修补工作和遗失了三个雪橇。他同情地对我们点点头，说还会回来看望我们。然后，我们就又投身到了狂风暴雪中，任凭大风吹打。

稍后，ALE的一位成员打电话到我们的备用帐篷。他给我们带来了史蒂夫的礼物——八根完整的帐篷支柱。这些帐篷支柱来自闲置的已经做好的模型帐篷，这些模型帐篷跟我们的帐篷不完全一样，因此，跟我们损坏的帐篷支柱比起来它们显得有些短小和薄弱，但是如果把两根支柱套在一起那就坚固多了。

我们很快就又得到了慷慨的帮助。瑞娜和索菲娅及时把我叫出帐篷，有人向我们走来。他穿过飞舞的雪花，像一个摇滚明星从干冰中出场。当他走近时，阳光似乎突破了覆盖的云层，风也平息了。他拿出了我们丢失的三个雪橇！我们为此惊奇地欢呼，几乎不敢相信我们的好运气。像所有英雄一样，我们的救世主没有多作停



留，把雪橇还给我们之后挥了挥手，就快速消失在那一片风雪中。后来，我们听说他是ALE的一名员工，在暴风雪中去搜索我们的失踪设备，并奇迹般地发现了落在在一英里外的爱国者山雪脊上的雪橇。看来即使在南极，骑士精神也没有被湮没。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在探险大本营经过了为期两天的培训，比原计划晚些离开爱国者山。风渐渐平息——雪像胭脂蜜粉铺洒在蜿蜒的路上，而不是散落在空中。天空从白色变成蓝色。我带领队员们排成纵列拖着雪橇，离开爱国者山。我们向一个方向滑雪，风没有吹到我们的脸，而是吹着我们的肩膀。凯莉、瑞娜和金姆一直缝到头天深夜才修理完帐篷，尽管我们接下来两天的主要任务是测试维修的结果，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向ALE证明我们是一个安全的有能力的团队。

金灿灿的阳光照耀着，仿佛是一个回家的夏日。雪波粼粼，散落在地上像婚礼蛋糕上刻着的同心圆。我们的滑雪板在硬雪中整齐地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我的心情无比澄静空明，自由的呼吸将我围绕，我们远离了爱国者山的压力，充满了新的力量。我突然明白，这种陌生的感觉叫作喜悦，我终于开始尽情享受南极了。

我们在布置营地前，从爱国者山出发断断续续地滑了几个小时雪，差不多有几公里（原文为海里，海里比法定英里更长，在经纬度航行中用起来更容易，本书已换算为公里）。每个人都有些困了，风刮了一夜。我坐在睡袋里不止一次紧张地查看帐篷，寻找破裂的迹象或即将到来的坍塌。有几次我仿佛听到了帐篷坏掉的声音。但事实证明我的焦虑是没有必要的，第二天清晨，帐篷和我们刚扎好时一样坚固，我又仔细地查看了帐篷周围，一切看上去都很牢靠。我很自豪，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似乎是在一个无望的状况下，再次一起修补完我们的帐篷。



晚上，太阳消失得无影无踪。风依然在刮，一直吹进云层，裹住所有东西，使天与地呈现统一的灰白。地平线清晰可见阴暗的灰色，而雪的表面没有映出阴影，没有参照物，头天还清晰可见的雪脊现在仿佛都消失了。这样的情况被称为“平光”，因为地面看起来是平的，其实障碍物还在那里，然而我们无法看到。

我们稳定了一下，缓缓出发了，大约滑了一个多小时，再停下来休息。大家轮流导航，在寒风中，每一块裸露的皮肤都需要遮盖。我们戴着护目镜但感觉却很压抑，嘴巴和鼻子呼出的热气要很快驱散开，否则镜片就要被蒸汽覆盖而结冰，会影响视线。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时也令人沮丧。因此我们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既要保证全面的防护，又要让热空气尽快散开，这很不容易，甚至有很多经验丰富的探险者都觉得这很困难。

金姆遇到了一些特殊的麻烦。她的眼睛下面起了一个小水疱，因此她在脸上盖了一层布，不让一寸皮肤暴露在外，但这也意味着她呼出的气体无法散出去。我们出发时她无比绝望，她的护目镜太模糊了。虽然可以看到前面的雪橇，但视野非常狭窄，金姆并不是团队中技术最强的滑雪者，她觉得即便在她能看清楚的时候，不均匀的雪脊对她来说都具有极大的挑战。而现在，在平光的作用下，再加上不清晰的护目镜，她经常摔倒，队伍常在她的位置形成一个断口。我放慢了团队的步伐，并把金姆排在队伍最前面，但她的慢速已经到了令其他队员感到寒冷的地步，大家不得不戴上大手套，穿上额外的保暖衣。我与金姆一起滑行，试着告诉她一些控制滑雪板的技巧。她听进去并尝试了我的每一条建议，但似乎没什么改善。我能看出她很沮丧，更多的是在生自己的气，她担心会拖大家的后腿。我试图鼓励她，安慰她说只要多加练习就会好，但我心里清楚，她已经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失去了信心。



我们的第一次休息简直是场灾难。当停下来时，我沮丧地看到女孩们缓慢而笨拙地从雪橇上取下零食袋和水瓶，仿佛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穿上夹克以使自己保持温暖。这很令人难过，但是我咬紧牙关，告诉自己这还是在训练，她们会变得更棒。我们的目标是把休息时间控制在7分钟，这既能保证我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做所有的事情，又不至于让大家变得太冷。10分钟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我们准备再次移动前，已经用掉了整整20分钟。“这次的休息时间已经很长了，”出发时我大声宣告，“记住，只做你必须做的事，另外还要想想怎样才能更有效率些。脑子里要有时间概念！”正当我说话时，艾拉出列，跑到一边开始解衣服，“你在做什么？”我问她。

“我想上厕所。”她回答，并拉开她的裤子。

“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你必须等到下一次休息。”

艾拉吃惊地看着我，在她的滑雪板上跳起来，“我一定要去，我憋不住了。”我叹了口气，想让队员们都理解我的想法显然是徒劳的。我把队员们组织起来，一起等着艾拉。天空看似越来越飘渺。冷风夹杂着雪吹湿了我们的衣服，冰冷的泥浆挂在身上。厚重的积雪覆盖着灰色的条纹。地平线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了。眼前的白色一望无际。只能看到前前后后的人，一切都是推测。因为看不到任何目标，就连指南针也很难遵循一个方位。身体似乎没有了识别方位的本能，想沿着一条直线行进，却没有任何参考点，完全没有理智可以信赖。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指南针，那么走几步以后，你就会向左或向右偏离正确的路线，而往往你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我看到瑞娜带领队员们向右偏离滑行时，几个队员大喊着警告她，但她坚持认为，她是在直行滑雪。只有当她转身看到身后弯曲的队伍，她才明白她是错的，再一次拿出指南针重新



检查她的方位。

我们的步速放得很缓，能见度也明显降低，每个人都很疲倦。我想让队员们做搭帐篷的日常训练，因为考虑到，如果队伍现在停下来，等到我们再走的时候，天气可能已经放晴。我分给队员们两顶帐篷，按照程序，我把我负责的部分扎好，帐篷在风中晃动，直到其他人搭好稳固的帐杆。我能听到艾拉和史蒂芬在远处大吵。脾气似乎都很火爆。她们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我把所有人叫过来。

我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紧紧抓住帐篷，讨论我们的日常工作，“好了，每个人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吗？”她们都点点头，几分钟内，帐篷就被安好并固定在地面上。索菲娅和艾拉在帐篷里放好设备，史蒂芬已经在帐篷周围铲好了一堆雪。我看了看不远处的另一个帐篷，很惊讶它没有倾斜，因为篷布并没有拉紧。海伦和金姆跪在帐篷边，使劲拉拽极力让帐篷布稳住。我过去帮助她们，听到海伦对金姆说：“进去，金姆，如果你的手冷，就进去！”我低头看了看金姆的手，她只戴了一层薄薄的棉衬手套。

她很清楚她们所做的烦琐工作需要手很灵活，戴手套虽然会很温暖，但是会很笨拙。她的薄手套落满了雪，我知道那会湿的。我很生气，因为我们曾谈到这样的问题，可偏偏她没有听从我的建议。比起心疼她的手，我更恼火的是她不听劝告。金姆坚持留在外面帮忙。“金姆！”我喊道。她没有看到我靠近，因为我在风中的喊叫声，金姆和海伦都跳了起来。“到帐篷里去，让你的手温暖些。不戴手套就不要在这！”她走了，我跪下来帮助海伦，但是当几分钟后查看时，我看到金姆已经回来了，她的薄手套上结满了冰，她仍在继续进行。“金姆，进帐篷去，不要再出来！”我指着帐篷，这次，我真的很生气，她是如此固执和鲁莽。“去暖暖你的手！”金姆想争论，但她看到我的脸色时改变了想法，躲进了帐

篷，我确信这次她服从了我的指令。我帮瑞娜和海伦把帐篷安全搭好，最后大家都进了帐内。

我返回到我的帐篷，环顾了一下四周。天气没有显示出任何改善的迹象，但如果休息一天不行进的话，会非常令人失望，我们只好再走几公里，我们希望做更多的事情。艾拉和索菲娅干活非常棒，我们的帐篷是温暖和舒适的，每件东西都恰到好处地放在合适的位置。我脱去最外层已经结冰的衣服，返回第一个帐篷，去查看金姆的手。我滑进门廊，对比了一下两个帐篷，没有多发表意见，海伦、瑞娜和金姆蜷缩地坐着，帐篷中间的设备杂乱地堆在一起。凯莉在帐篷里点了炉子，但还是那么冷，整个帐壁感觉非常潮湿，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海伦、凯莉和瑞娜是三个最有经验的队员，她们应该做得更好，就算不考虑她们过去的经验，可我们已经培训过了，她们应该比在新西兰时做得更好。出于尊重，我一直很独断地认为海伦、凯莉和瑞娜比起其他队员应该更好。我想最后做一件事，在不打击一半队员的同时，告诉她们做事情不能草率。“好了，你需要把这个地方再重新整理一下。”我坚定地说道。我扯开那堆设备，指着确切位置告诉她们，让她们按指示摆好。“凯莉，把火炉关上，直到你在厨房做饭时才能打开。海伦，把睡垫重新摆齐，把它们都铺在地毯上面。金姆，把地上的工具箱和服装挂在绳子上。瑞娜，给每个人安排一个角落，把她们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原本杂乱无章的帐篷变得整齐而温暖，背靠炉灶，我坚持让她们脱下外层衣服放在炉子内侧，这样能彻底让身体暖和起来。金姆在睡袋里蜷缩着坐在帐篷一边，明显比平常安静很多。“你的手好些了吗？”我问她。她伸出手给我握着，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它们都很温暖。凯莉给她沏了杯热饮，金姆捧着饮





料，我们谈起她已经很冷却还不戴好手套并拒绝进帐篷的错误。她向我道了歉，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她并没有真心认识到错误。

“我知道你想帮忙，但如果你的手冻坏了你就不能再继续探险，保护好你的身体是首位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没有人会认为你是放弃了工作。”接着我们又谈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渐渐地，金姆变得健谈很多。我离开时，她正和其他人谈笑着缝补着帽子上的橡皮圈。

第二天早上，我把滑雪靴捆扎在帐篷的门廊上，突然听到瑞娜在尖叫：“金姆的手指有水疱！”她的喊声透过帐壁传来，我感到我的心脏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并感到一阵恶心，“好，我马上过来。”我回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现在，待在帐篷里。”我把靴子带绑紧，拉了拉帽子，表现得满不在乎，这样里面的队员们就不至于那么惊慌，那熟悉的恐惧再次使我的胃里翻江倒海，我想起两年前，我曾承受过那样的痛苦。在南极，一个水疱就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冻伤。

冻疮是在皮肤细胞受到冻结时，肌肉由冷变暖，在受伤处形成的肿胀和保护性水疱，它是一种淋巴细胞性血管炎。但即使如此，我仍抱着徒劳的希望，“也许，也许那是一个正常的水疱。”我心想，“拜托，拜托。”金姆还坐在她的睡袋里，向我伸出手指，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那个水疱是浅色的，边缘有一圈粉色的肿胀。我一直怀疑的事被证实了：她的手被冻伤了。我把金姆的手放回到温暖的睡袋，意识到她正看着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我不想使用冻伤这个词，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让大家感到恐慌——她或其他队员，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不想承认它。“我认为我们应该给爱国者山营地打电话，这样可以请医生来看一下。”她看着我的眼睛，过了一会，默默地点点头。海伦递给我卫星电话，我拨打了紧急号码，爱国者山立刻回答，并承诺向我们派来医生，我向他们报告了我们



的位置。我们等待着，试图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的手昨晚觉得冷吗？”我问她。

金姆低头看着她的手愣住了，摇摇头。“我不这样认为，”她说，“昨晚很温暖。我在睡袋里醒来了一次，但我的手在怀里，不冷。”

“昨晚，你看到或感觉到什么了吗？有没有任何水泡或麻木的感觉？”

“没有。”

很明显，冻伤一定是前一天感染的。显然金姆在外面冻到手并弄湿了手套，而我没注意到它们已经受伤了，但是事实上，那天晚上在帐篷里，金姆已经在用冻伤的手指缝衣服了，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

我留下海伦和瑞娜照顾金姆，叮嘱她多喝热的含糖的饮料，并让凯莉准备好。

我离开帐篷，在外面等医生。我不想让金姆看到我的脸色，让她觉出我说的和想的不一致。我不知道冻伤可能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只有医生能告诉我们。但我知道金姆可能不能继续待在探险队了。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还存在这种继续的可能性，因为她们可以照顾自己，但是金姆本就觉得探险极具挑战，所以带着冻伤上路对她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额外的负担。如果放任受伤的部位再次挨冻，那么她的手指将面临永远受损的风险。

医生到了，笑了笑，看上去不为所动。他钻进帐篷，蹲在金姆旁边，把她的手从手套中拿出来查看伤势，水气随之升了起来。

“你的手怎么这么湿？”他问，很显然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又摸了摸金姆的衣服，“她的衣服也是湿的。”他如是说，并用厌恶指责的目光看着我。其实金姆的衣服早些时候并没有被弄湿，但现在



她急于让自己暖和起来，所以穿了过多的衣服，这使她开始出汗了。我一时觉得气愤，气其他人没看住她，让她太热了，同时也气自己没有及时进行检查。医生把金姆送回大本营，以便他能采取更好的措施查看她的伤处。我们迅速把帐篷拆下装好，继续我们的滑雪。我默默地在队伍后面滑着，脑海里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我很生金姆的气，她知道最好不要把手套弄湿，可现在，仅仅短短几分钟的疏忽，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她就要回家了。我还生与她同一帐篷的队员们的气，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她？她的手套已经湿了，就没有人强迫她进去换吗？最后，我遗憾我自己没办法更好地照顾她。我分身乏术，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要多接近并安慰金姆。为什么我没有让海伦留下来处理这个帐篷杆，而让金姆进到帐篷里面去温暖她的双手？我觉得我很愚蠢，就在头天晚上，我都没有注意到她的伤处。我应该更全面地检查她的手的。

回到爱国者山，离开队员搭建的帐篷，我去找医生了解他的诊断结果，他也正准备动身来找我。“她现在有六个手指冻伤了。”他靠近我宣布着，很明显他很生气。我把我的手放在嘴里，不停地咬着。我想着金姆，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在哪儿？”我问。医生把我领到一个活动房屋做成的宿舍，金姆正在一个铺位的睡袋里蜷缩着。她坐起来，我看见她的六个手指被厚厚的绷带裹着。她的手已经无法使用了，甚至无法为自己做最简单的事情。

她一直在哭，我坐在她旁边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医生说，虽然手指会完全愈合，但是如果让它们再受冻，就可能变得更加糟糕。所以，继续探险的话风险太大了。进行一场会失去手指的远征是不值得的。”金姆沉默地点了点头。她不断地用没缠绷带的手指擦拭无声流下的眼泪，可泪水依然不停地涌出来。我给了她第二次拥抱。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觉得可怜的不只是金姆，还有其他

队员。我们从全球的各个角落通过电子邮件和面试筛选出来的队员，通过训练变得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亲密，我们牢固地结合在一起。金姆是团队中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柱，失去她将是对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打击。第一个是芭芭拉，现在是金姆。这种不公平简直太残酷了。我做了个深呼吸，慢慢地走向营地。金姆因为她的粗心大意在探险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这并不是她一个人草率的结果，自从我们抵达南极后，我们就犯了很多不必要的错误。“也许我高估了女孩们的能力？我想我是否应该一开始就不该让金姆加入。我应该用更严格的标准规范整个团队，我也为史蒂芬和瑞娜担心，我把大家召集到帐篷中开了一个会。“我不是说你们不能干，”我解释着，“但是如果大家缺乏基本的自律，你就不能待在这里。史蒂芬，我还是要提到你的装备，无论走到哪里，你的装备都散落一地，我不得不跟在你后面帮你收拾；而瑞娜，有好几次我不得不把你拦下来，因为你没有把衣服扣好，导致皮肤暴露在外。我要对你们负责，但我需要你们自己同时也承担起责任来。”队员们看上去非常震惊，因为我竟然直接点名批评个人，是时候让她们直面残酷的现实了，整个团队必须行动起来，改变现状，否则我们就哪儿都去不了。

总结完教训以后，我让队员们在帐篷里互相讨论自身存在的问题。我走过营地的一个帐篷，看到我们所有的食物和补给包还有燃料都放在里面。这个帐篷很安静，没有挡住任何道路。我把所有的包都重新摆放了一遍，实际上这也是给自己一个独处的借口。渐渐地，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愤怒地把它们擦干，但它们又不争气地流下来。我觉得我让大家失望了，最重要的是我向ALE和史蒂夫承诺：我的团队准备很充分。但现在，我带领的团队还没有走完11公里，就有队员不得不因伤离队，我知道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





瑞娜最后找到我，她进到帐篷里，和我一起默默地整理设备，我知道我让她不高兴了，因为我在整个团队面前点名批评了她，但这绝对是必要的。最后，她对我说：“费利西蒂，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能很好地照顾自己，如果我觉得自己很冷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很好，我知道了。”我看着她的脸回答道。她也快要哭了，我感到一阵悔恨。“我只是很担心你。”我说。我们又回到了设备那里，沉默了一分钟，她再次开口说。“费利西蒂，我们都很爱你，尊重你。”

她的话使我感动得泪流满面。瑞娜搂着我，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她的信任。金姆也很信任我，可现在她就要回家了。看我都做了些什么，我一定要找到前进的道路，一直走到最后。带着羞愧，我真想马上溜走，但我知道我必须留下来，尽管表面看来我们到了南极，但我要用某种方法召唤出我所有的魄力去证明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医疗帐篷里见了史蒂夫和医生。角落里的一个加热器在闪光，很快我就已经满头大汗了。史蒂夫在帐篷中间为我放了一把椅子。“你可以放松点。”他说，我笑了笑，但我并不轻松，感觉就像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而要被解雇一样。“你还好吗？”他问。

“糟透了，”我诚实地回答了，“我很苦恼。我已经令很多人在寒冷的环境中受伤，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护理过任何类型的冻伤。现在我让一个人的六个手指冻伤了。”这是我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放声大哭，眼泪掉落下来。我对自己发誓我不会让自己再哭了，可眼泪却无法停止。我转过身去，向他道歉。我恨自己哭，我觉得我是那么无助。史蒂夫很公平，他询问了有关队员的训练情况，她们知道冻伤和如何避免它吗？她们是否知道不能弄湿衣服？尽管我知道史蒂夫需要问这些问题，但我发现我仍然感到很难

受。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者，我的能力受到质疑，我的信誉度受到了重创。“鉴于刚刚发生的事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我还是想说，这个团队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我恳求着，“这一事件并不能代表团队的其他成员，她们训练得很好，她们知道如何照料自己。”尽管对于金姆的伤害，我充满了愧疚。但是我们还是要离开爱国者山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这里我们只能停滞不前，我们要重新开始。我看着史蒂夫，他和医生看起来并不信服。当我离开史蒂夫时，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学会再一次让自己放松。”他说，“好好睡一觉。”我笑了笑，走出帐篷，太阳出来了，风没有了气息。我钻进睡袋，这时我才注意到，今天的帐篷是这周以来第一次完全没有被风吹动，它静静地伫立在那儿。我心境平和地闭上眼睛，我要睡个好觉。

今天是11月21日，我们已经来到南极七天了。我们准备出发。我早早起床，走到大本营中间的通信处听了听新闻，我想让乔能在今天带我们飞到南极海岸。飞机已经装载好物品，我聚集了队员们，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我穿过营地，看到金姆，她在一架小型双引擎飞机旁边漫无目的地遛弯，她正用MP3听着音乐，太阳镜上挂满了泪珠。“我们会带着牙买加国旗一起飞的。”我告诉她，我们永远属于一个团队，她将我紧紧抱住。我与她道别，听到她正在听着《寻找方向》的曲子。是时候登机了，金姆转过身，回到医疗帐篷。她的返程航班将在一两天后从南极洲出发。史蒂夫来和我们道别：“好好享受你的人生。”他请我登机，我笑了笑，向他挥手示意：“谢谢你！史蒂夫！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引擎轰鸣，飞机压过跑道上积存的雪，我们坐在椅子上，系好安全带，盯着窗外，彼此咧开嘴笑着。噪声太吵以致我们不能听到任何人说话，只能看到彼此的笑容。飞机急剧向爱国者山倾斜，





T 带着世界去南极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最后在一片雪白之中化成一个微小的点。在未来六周，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浩瀚。地面是淡淡的银色，夹杂着淡紫色和蓝色。冰层之上可见风的烙印，就像刚刚有人穿着皮鞋走过。索菲娅独自坐在我的对面，向下凝视着。我看着她，告诉了她早上在脑海中回荡的事情。我想她正在想念她的家人，或者在思考未来几天的探险——我猜不到。但她脸上严肃的表情让我感到很担忧。对于这个团队，我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我们的能力，但我错了吗？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队员，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伤害。现在，我们离开了爱国者山营地的保障，前方的路将更加难行。

路易·威登“方便包”

第9章

“就是这儿！”我隔着我的巴拉克拉法帽子叫嚷着。“我们正在去往南极的路上。”队员们在空中摇着她们的滑雪杆，我听到她们隔着面罩传出的模糊的欢呼声。我不喜欢衣服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感觉。望着耀眼的地平线，我把指南针的线绳绕在我的脖子上，双眼跟着指南针的指向，指南针可以根据远处冰块阴影来选择最佳的路径。只要是我带队行进，我肯定行进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我在滑雪板上向前滑行，感到了雪橇的拖拽，雪橇不时顶着我的防护服，我回头查看其他的队员，以确保大家都跟上。这是我们重要的时刻，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南极海岸到南极点的九百公里的旅程。尽管我们喊着口号，但在这非比寻常的时刻，所有的呐喊都变得稀松平常，好像我们着手开始另一个训练一样。与第一周我们在南极洲的兴奋相比，此刻女孩们都变得平静下来了。飞机载着我们到达指定的着陆地点后，我们在最近的帐篷营地处缩成一团站在一起，我们向天空疯狂地挥舞着双手告别，直到飞机在空中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完全消失。我们这个特殊的团队第一次有了完全孤独的感觉。



第9章

ε
A

ε
A



觉。离我们最近的人们都是在几十万公里以外的地方。尽管我们有卫星电话，要是我们用卫星电话寻求帮助，飞机需要的不是几个小时，而是几天才能到达。在外面受伤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如果我们在外面受伤了，最好的结果是，这次探险活动告吹；最不好的结果是，生命的威胁。为了确定我们的队员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没有误解，我在营地最后一次会议上曾反复强调安全是多么重要。“想一下你们每一天每一秒的生活，想想你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如果你有了冒险走捷径的冲动，那么请想一下因你的行为而造成整个探险活动终结时，你会感到多么抱歉。”我们需要在事前谨慎，而不是事后遗憾。金姆受伤仍然历历在目。我想，最后她对大家说再见时的那张脸，一定比我的演讲更让大家印象深刻。我注意到，之后每个人都明显地更加小心谨慎了。

当我们在雪中成纵队行进时，我们眼前的世界好像被平分成两份。上面一半是天空，下面一半是雪，地平线把这两部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分开。原来在家乡的时候，天空是很容易变化的，会因为旁边建筑物的映衬而显得矮小，围绕它周围的树勾勒出了天空的轮廓。但是在南极洲，天空变成了整个世界的一半。当我们从一个地方滑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天空就成了我们注意力的主要关注点了，我们对它每一个细微变化都了然于胸。天空颜色的变化也似乎那么令人不可思议。接近地平线的天空是蓝色的，吸引了一部分从雪上反射出来的刺眼的阳光。如果我侧着头望向上面的那一块天空，天空又变成了非常深的深蓝色了，好似宇航员在大气层边缘绘制出的蓝色图画一样，在那里我们的星球与外太空相接。这里，我们世界的一半是非常坚硬的灰黑色物质，雪地上的凹陷处就是地面的坑洼处，雪突起的地方就是山脊的方位。阳光照耀下的雪地的表面就好像湿湿的沙子一样，散发着好看的银色亮光，就像洗得非常

透亮的衣服一样，使周围的景色变得暗淡。只有眯着眼睛才能看到如此光亮耀眼的世界，因为如果你顶着太阳看太久，周围事物的影子都会让你的眼睛有灼伤感。如果没有护目镜，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雪盲症。

南极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它的茫茫无际。这里没有一处脚印，在远处也没有炊烟袅袅的住所，没有山，也没有一棵树，更没有长满青苔斑点的石头，没有苍蝇，也没有一只鸟，甚至连飞机飞过天空的痕迹都没有。一眼望去，四面八方空无一物。“这里都是相同的景色。”当飞机离开我们后，瑞娜惊叹道。她在原地转身，用双眼扫视着地平线。“每一处地方都是相同的。”我微笑着看着瑞娜惊讶的表情，等着她环视完周围。“我喜欢这里！”瑞娜环视过后总结道。我非常高兴，我很期待这个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女孩对如此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能说些什么，现在我对她能够感受到这里的特殊而感到放松。她们都做到了！

我们准备从南极洲的这个“海岸”出发，但是我们看不到这里有开阔的冰面或者岩石。覆盖在南极洲表面的冰是不断地向大海漂移的。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冰与岩石之间是没有缝隙的。海岸的正确位置没有被地质学家精确地绘制出来。但是从我们站立的位置望去，所有方位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立刻从“海岸”向南边出发，而是打算向偏西方向行进，为的是避开明沙科拉山脉，明沙科拉山脉位于我们左边看不到的地方。我们需要绕开山脉行进，也因为山脉周围被冰裂缝地带环绕着，因此我们要与它们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在我们可以转向南方向极地行进之前，大概还有300公里左右的距离。不久，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次补给。尽管我们的雪橇由于满载食物和燃料被堆得呈凸起的形状，但是只能维持我们21天的生活。另外三个红色的大行李袋装着我们剩余旅行所





需要的所有供给，它们已经被飞往南极的飞机空投到了冰面上，在我们行进路线的大概中间的位置。我们已经收到了投放物资地点的精确坐标，所以到时候可以找到它们。

当我们滑行了旅程的最初几千米时，发现南极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遥远，如此长的距离让我们感到希望渺茫。如果要把我们已经完成的进程与仍然需要行进的千米数相比较的话，第一个数字听起来小得有些荒谬。在旅程的第一天去考虑40天的全部旅程是会让大家感到沮丧的。我们的挑战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我关注的是相对于整体旅程来说，在最初的阶段关注于我们到达供给处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补给物资，这样就能做到把控全局了。我计算着我们会在16天或17天后到达物资补给处，这很容易计算，因此在我的脑海中这个第一阶段就变成了我们的整个探险活动。我不能也不会让我的注意力关注在其他事情上。

在行进了最初的90分钟后，我停下来把滑雪杖在头顶交叉挥舞，让其他的队员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了。当我们滑雪的时候，我们依赖手势进行沟通，因为用语言去沟通太困难了。如果滑雪者所带领的线路一边留下一条线，它的意思是：“你还好吗？”这里的“好”包括方方面面，但最主要的意思是：“这个地方还好吗？”如果你很好，你就模仿相同的标志。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情况，我们就做出另外的回答，最常用的是挥舞着手臂，意思是“慢一点”。

我们唯一的一次真真切切的谈话机会是在简短休息的过程中，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分钟，这段时间我们会收获很多。每个人最优先办的事一般都是解决内急。我们每天为了防止脱水都会增加流体的摄入量，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调整过来，因此保持90分钟小便一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天里。尽管每个人最初都因为在人前小便而感到紧张，但慢慢地几乎所有的谦逊都会消

失殆尽，在人体要求小便的生理需求下，大家都很快不再感到尴尬了。大家要扛着一个非常沉重的雪橇，系着两个滑雪板，穿着几层厚的衣服，这使得方便这件事变得非常困难。不从队伍向外走几百步，根本就找不到有遮挡的地方（在南极洲，你要找到一个有遮挡的地方，比如大石头或者树的后面再小便的话，那你就有得等了）。然而，我们都能够很好地应付我们不得不做而且必须要快速做的这件事情。只要我们记得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外面太长时间，而且不要把自己置于大风中，那就可以免于得冻疮的危险。

在休息的间隙，我们吃东西和喝水，与排泄废弃物相比，这两件事的难度也不相上下。我们在一天当中所吃的食物都是高卡路里的小点心，我们要把它们掰成小块，但最难的是把食物放进嘴里。我们滑雪的时候，每一次呼吸所带出的水分都会冰冻在我们脸上所盖着的物体上，即使是最柔软的羊毛面罩，也会变成像石膏一样死硬死硬的东西。我们必须把覆盖在脸上的面罩弄出个开口，然后把食物投进嘴里。这是一个比较邋遢的工作，通常我们会把花生酱弄得满面罩都是，或者不小心把爆米花的硬皮掉到面罩和脸的中间。而喝水通常也是很有风险的。我们使用的是大开口的保温瓶，每次喝水的时候，几乎要把差不多半瓶水洒到我们的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子里，任何洒下来和溅出来的水都会立刻转化为冰，如果冰挨着皮肤，就很容易生冻疮。幸运的是，我们有窄口瓶，可以嵌入帽盔前面的开口处，当大口喝水的时候，瓶口就可以固定在我们的牙齿之间。但这样喝水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而且通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海伦志愿当我们的计时员。她在队伍的旁边，一放下雪橇就开始计时，约摸7分钟，她就会提醒我们休息的时间快结束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要确保没有人迟到。除非





轮到我带队，我一般都在队伍的最后面滑雪。在滑雪的时候，能够看到每一个队员都在，或者时不时地扫视检查一下，看到大家都在一起，我心里就感到非常舒适。同时，如果有人的步子落后了，我立即就能够发现，或者有人负伤了、有人一瘸一拐，我都能及时觉察。后来，我甚至可以从队员的肢体语言上看起来，她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

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滑雪风格，就像指纹一样，尽管事实上我们不能面对面地看到对方，而且我们都穿着相同的衣服，甚至隔了一段距离都认不出来谁是谁。海伦是离我最近的滑雪者，她的腿似乎只是膝盖以下在移动，配合她的胳膊优美地挥舞，当然只是肘部以下在移动。索菲娅也是一位动作非常整齐划一的滑雪者，她的步伐看起来与其说是滑雪，不如说更像是走军步。凯莉的滑雪幅度很大，大摇大摆，她在每一次滑行的时候都要摇动肩膀，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牛仔电影里的约翰·韦恩。瑞娜滑雪让人看起来永远感觉那么的精疲力竭，如果滑雪板是唯一能够使她保持立直的东西的话，那么每次看起来她都是倾斜的。史蒂芬滑雪的时候看起来缺乏节奏和一致性，她通常都是蹒跚而行，总是忙着调整她的衣服和所带的设备，以至于很少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在自己的滑雪姿态上。每隔几秒钟，当我们正在滑雪的时候，史蒂芬就要环视她的口袋，整理衣服，更换手套，调整帽子，或者调整音乐播放器的声音。在爱国者山我严厉地批评她缺乏组织性后，她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调整她的松紧带长度，来让她带的每一样工具都很好地固定在她身上，以避免松动。她这样做的结果是缠绕在一起的几米长的松紧带经常打架，不断地缠绕在她的滑雪板、指南针或者其他队员的腿上，甚至是她自己头上。能够跟上其他队员的速度，对史蒂芬的滑雪技术来说确实是一项考

验，尽管这些不利因素都是她自己造成的。艾拉是所有队员中滑雪姿势最有特点的一位。与滑行相比较，艾拉滑雪的样子更像是在冰面上快速地舞蹈，她每向前移动一步都伴随着膝盖优雅的弯曲，以及用她的滑雪板的端点优美地敲击冰面。随着每一次向前移动，她的脚和滑雪板都要很明显地抬离冰面，虽然对于滑雪来说是最无效的动作。我一直鼓励她尝试着去滑行，直到最后，艾拉声称：

“我已经尝试着用其他方式去滑行了，但是那些方法对我来说不舒服。”我不得不承认艾拉用这样的姿势和队伍的步伐保持得很好，她可以跟得上。艾拉的滑雪方式很明显不会导致她在任何方面出现纰漏或受伤，因此我允许她这样滑。现在回头来看，尽管我们的滑雪技术并非专业，但是我们以一个精英团队的形式滑雪前行，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在一起团结一致，并且在探险训练的时候一起度过了足以让我们感到挫折的一些困难。我发现，如果有人想快速地调整衣服或者携带的设备，她们就会从行进队伍的路线中走出去做她们需要调整的事情，完成后再加入到队伍的末端。我们没有训练过这一点，甚至都没有讨论过，它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队员们都在取得很大的进步，事实上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我们在行进的第一天就已经实现了我们初级阶段的目标了。我注意到，与我们最后一次训练滑雪跑步相比较，我们行进的步伐越来越快了。“我们可以悠闲一点了，”我对队员们说，“我们不用那么快地穿上衣服。”我已经看到太多的团队犯了这个实实在在的错误，因为太快，以至于在到达终点前就已经把精力消耗殆尽了。这是一个全新的队伍，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我们的休息点。我们似乎应该很谨慎地放慢速度，稳扎稳打。保持步调一致，这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任务，但对整个探险活动来说，这是最有争议的一项。

当我们停下来进行第四次休息的时候，史蒂芬宣称她需要额外





多一些休息时间。昨天她开始了她的月经周期，她需要整理一下她自己。在探险活动中来月经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如果你提前做好准备而且能够很好地收拾自己，也不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我们在这期间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宣布我们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当我们停下来时，大家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羽绒服。尽管这样，当我们出发一刻钟后，一些人开始抱怨手脚冻得实在是太冷了。艾拉决绝地换上她更厚的羽绒服。很明显，我们不能再停下来休息比七分钟更长的时间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当我们停下来再次休息的时候，艾拉和索菲娅还是说很冷，所以我决定停下来休息一天。

我们每天只能滑雪六个小时，而不是预期的八个小时，但我们已超出了第一天设定的里程目标，所以妥协似乎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完美的夜晚，刮着稍有点冷的微风，但太阳依然耀眼，我们搭好帐篷，艾拉和索菲娅钻了进去，开始在帐篷里工作。

当我们把一切工作都做好时，感到很放松，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距我们最近的大风，这样的大风我们曾经在爱国者山经历过。当我们打开雪橇的时候仍然很小心，因为要保护我们的机器设备（毕竟，一阵猛烈的大风狂卷我们睡觉的毯子和穿着的夹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现在无风的平静状况允许我们稍事休息，可以让我们关注一下与大风对抗以外的其他事情。

对于我们临时搭建的帐篷的可靠性，我还是有些紧张。对于固定帐篷我们费尽了心血，但是史蒂芬让我们重新提高警惕。史蒂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帐篷的上风口建立一堵小的防护墙。当我不经意地扫视史蒂芬正在做的工作时，发现她筑造了一个可以媲美巴士底狱的障碍物。这在筑雪工程上简直是一项壮举，包括雪块堆积的形状都很讲究，这座保护墙不仅保护了我们的帐篷，甚至保护了我们

狭窄的过道。在帐篷里，艾拉和索菲娅把它命名为“主妇”，而且她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它。艾拉不仅把我们的物品分角落放好，而且把潮湿的设备悬挂在了晾衣绳上，并且把我们的夹克衫折叠成整齐的小方块。这又是一项壮举，太令人吃惊了。

我在靠近门口的角落里让自己舒服地坐下来。这是目前为止帐篷里最大的地方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将我过粗的胳膊和大腿束在一起，但我还是比别人占用了更多的空间。索菲娅给我递过来晚餐。找了半天，我发现这还是一袋伊斯兰食品，但我没有机会把这些食物都尝遍。我在食品袋里找到了“宫保鸡丁”的标签并把它打开，蒸汽烫到了我的手指，我吃惊地倒吸了一口气。在面条的顶部，放着大块的实实在在的焙干蔬菜。我看了一眼其他人，大家都在高兴地大叫着。在探险活动中吃到真实的蔬菜是闻所未闻的，而此刻这就真实地发生着。

食物的诱惑难以抵挡，在食物还很烫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放了一个大青豆到嘴里，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兴奋地咀嚼，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呈现在我的脸上。青豆的质地让人吃起来感觉很好——当你把它吃到嘴里时，因咀嚼而发出的“咯吱”声是如此美妙。除了我们正在吃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软的，都是经过化学技术处理过的，但这些都是真实的食物。我们每天都要吃蛋白粉，蛋白粉使我们的肌肉在夜晚能恢复如初，可以为接下来的一天储备能量。可蛋白粉不像我们通常所见的那样会很均匀地溶解在水瓶里，而是凝结成块，在咽下时必须把它们嚼碎。晚餐过后，海伦跟我们一起喝蛋白粉，她大叫道：“这简直像浮动的头皮屑。太恶心啦！”

作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在探险期间，艾拉经常一天祷告五次，但是在行进中减少到三次：清早一次，傍晚两次。使用指南针找到东方（伊斯兰教徒们祈祷朝向麦加的方向为东方）是很容易





的事情，但是选择对的时间祈祷还是有点困难。因为生活在24小时白昼的南极，选择傍晚和黎明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艾拉接受了我的建议，使用最接近南美洲时区的时间祈祷。幸运的是爱国者山脉也使用南美洲的时间，所以我们也按照这个时区计时，这使得艾拉的祈祷容易些。我曾经在学校学过伊斯兰的知识，但是在此之前从未亲眼目睹信徒祈祷。由于我们四个人被局限在小小的帐篷里，当祈祷时不可能给艾拉任何隐私空间，我也不得不一起体会这件迷人的事情。

艾拉跪着，反复弯腰用头触碰地面。然后坐直，重复第一步，再接着做，同时低声轻柔地嘀咕着祈祷文。开始，这事在我们看来有些奇怪，可是我们对此都有敬意并保持有点尴尬的安静状态。不过最终，这一仪式成了第二件每天都做的事情。

毫无疑问，我们每晚最重要的事就是用卫星电话与爱国者山脉联系。打电话是为了确定我们的位置，为后一天的行程做准备。虽然很繁忙，但我们还是常常有一些时间闲谈，听听营地的趣事，有时，无线电接线员会与我们交换笑话来互相逗乐。史蒂芬第一次拨打卫星电话，已经准备好了在正事交代完毕后要讲的笑话。

“什么东西变白变黑，变白变黑，变白又变黑，变白再变黑呢？”电话线那头一片沉寂，史蒂芬继续说，“一只企鹅从山上滚下去了。”那边爆发出一片笑声，很明显有很多人站在电话旁听我们的对话。笑声渐小，接线员询问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没有了，”史蒂芬回答，“我们这里一切正常。”“你确定吗？”接线员问。“你们那里没有其他事情要说吗？”“没有了，我们都很好。”史蒂芬说。“一点儿都没有吗？”接线员又问了一次。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失望，好像我们这里没有遭遇什么灾祸，实在令他有些意外似的。令人恐惧的傍晚是电话中避免不了的有关

天气条件的话题。

大多数探险队在距离营地附近安全的位置，在雪中挖一个洞存放队伍的垃圾。但我们的决定让事情复杂些，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我们需要移走所有的固体垃圾包括人体的排泄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朋友贴心地设计了收纳的袋子，这个袋子由银色的反光塑料做成，大小和形状比照纸制垃圾袋的规格制作。

这个袋子用起来像马桶一样，用后牢牢封口，安置在雪橇下面。可以很明显地和其他物品、器材区分开来。袋子里的东西会迅速冻结，所以在使用上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糟糕。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但史蒂芬宣布她一周只需用一次。

“一周一次？”我惊讶地重复。“史蒂芬，这听起来不太健康。”她很清楚自己身体的状况，很有信心每四天领取一个袋子。但是当海伦开始抱怨，要考虑为她的腹泻吃蛋白粉时，史蒂芬有些惊慌地说：“不，我千万不能腹泻啊，我没有足够的袋子用！”

我们把每个帐篷安置好并保持一定的距离，把银色的袋子系在帐篷旁。凯莉开玩笑说，这看起来好像我们在夜晚出去带着闪光的包。“我也记得艾拉和史蒂芬在挪威穿过暴风雪的时候，还紧握着路易·威登的手包。”我笑着说。

“这些是我们的路易·威登‘方便包’。”有人回应说，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名字了。带着路易·威登“方便包”从帐篷出来可能是令人不悦的，但是比其他任何事都令我们畏惧的是我们需要“方便”。也许外面还没有一片漆黑，但这里仍然比家用冰柜还要冷。

一度舒适地被包裹在温暖的睡袋中，这个出去“方便”，把自己暴露在无情的寒冷中的主意看起来非常残酷。但是除非你愿意忍受无眠之夜，试着忽略它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这事没得选。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才会让自己戴着帽子、穿着夹克和靴子睡





了。其他人都睡着了，我看着她们的穿着，自己也能释然些。

在把我的“路易”（大便）收好，放到雪橇底下后，我会一边站着，一边把手夹在腋下取暖，欣赏风雪交加这种超现实的场景。在整个探险中，也只有此刻我可以独自欣赏美景。它们是特别的，寂静的，无人探寻的，我感到在某一时刻南极洲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只穿着入睡的衣服以及随意披着的夹克，我站着，直到我感觉双腿的皮肤快被寒冷冻伤了，才不情愿地爬回到帐篷的庇护中，又回到令人欣喜的温暖睡袋中。第二天，在美丽的南极洲阳光中醒来。

一丝清风滑过，但是我们没有冷意，大多数人穿着保暖的防风服。我们很幸运能拥有这样明媚的天气，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我偶尔听到艾拉表示过因为没有遇到更惊心动魄的天气而感到失望：“我很担心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那就太没有挑战了。”

“别急，艾拉，”我打断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我保证下面的路不会太无聊。”她想了一会儿说：“费利西蒂，我想我们应该滑得比昨天的行程更快更长。”海伦马上反应过来，申明自己的态度：“我们需要保持稳定的速度，让每一个人都跟得上。”我对于消除她们的疑虑有些倦了。“我们会找到一个适合每个人的速度。”我解释给海伦听，“我们不必这样着急，要心平气和。我们确实需要遵照昨天的行进速度，如果有特殊情况，还需要减慢速度。”

史蒂芬一马当先地引导着大家，并保持平稳合适的速度，但我还是关照着凯莉。昨晚她说起左脚踝有些疼痛，但没有在意，可第二天感觉更疼了，她试着把睡袋里的垫子剪成鞋垫，但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在结束第三天的行程后，凯莉的伤更严重了，以至于她傍晚得坐在帐篷里把衣服放在脚踝下垫着。“我的脚踝每前进一步都会在

雪橇上滑动。”她解释说。“我已经用睡袋的垫子垫在脚踝下，也把整个脚包裹得很好了，但还是没什么改善。我想可能是雪橇的粘合处有些问题吧。”

我看了看她左边的雪橇，和瑞娜的做了比较。粘合处看起来没有问题，脚踏的地方也很完好。没有地方显示有异样，但凯莉很坚定地声称是雪橇的问题，不是她的滑雪技术造成的。瑞娜同意与凯莉交换雪橇。

这样的安排让我觉得有些不安，担心这样只会让问题继续发展，而不是得到解决，但这似乎是不得已的选择。雪轻飘飘地下着，让我们的前行更像是在南极了。现在，交换雪橇似乎解决了之前的问题，那只雪橇沾了很多泥土，但瑞娜完全没有被它影响，凯莉说她的脚已经好些了。

其他队员的双脚也有些不适。“我每个脚底板都有三个水疱，还有我右脚的第四个脚趾也有。”艾拉在游记中写道。她并不是唯一出现这样问题的人。我在帐篷中开设了“水疱门诊”，确保我看到每个人的脚的情况，并且提供如何照顾伤脚的建议。

我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基于多年行走的经验，我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办法去处理这样的情况。尽管这件事看起来如此琐碎和无聊，但是没有健康的双脚，就不可能滑雪和步行。如果水疱没有被很好地照顾，它们就会感染或者伤口变大，极为疼痛。一般的水疱可以很容易在旅途中愈合。

每天傍晚，我都建议女孩们脱下袜子，让脚部保持温暖干燥。我们用放大镜在强光下把水疱晒干。经过一晚上养护，在第二天把伤脚包起来之前，水疱就会变硬。脚伤对于艾拉、史蒂芬和索菲娅来说是全新的经验，所以我让瑞娜、凯莉、海伦这些更有经验的队员多询问、照顾其他队员，然后再照顾自己。





然而，逐渐地，海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她几次提起她的水疱有些严重，但都被她解决了。直到有一天她好几次用手语通知大家减慢速度，而且我们的队伍在她那里有了缺口，她开始和大家拉开一定的距离了。

我在队伍的一侧，直到我追上她并和她摔倒在一边。“我的双脚像被撕裂了。”她说，看得出她疼得快哭了。那晚，我去看她的脚。上次纳米比亚之行后，她的脚一直还在恢复中。

她的脚踝被干燥、龟裂的皮肤包裹，脚趾上布满了粉色的旧的水疱伤疤，大脚趾的趾甲已经发黑而且变形了，很明显一段时间后就会脱落。两个新的水疱长在了两个大脚趾指关节的侧面，它们看起来会很痛，但不是很要紧。

“今晚你要把水疱弄干吗？明天就可以变硬了。”我问。“不，我要让水疱处的皮肤保持完好。”她回答说。

我很惊讶，不让水疱变干就会很疼。“你吃止痛药了吗？”“没有，过去我从不吃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吃任何药物。”我鼓励她去把水疱弄干，再吃些扑热息痛片以减轻痛苦。但是她很坚定，可以看出，我们的对话让她有些激动。

“如果我早知道要来这里，就不会去纳米比亚了。”她遗憾地说，“纳米比亚之行是很好的、不能错过的机会。”海伦为连续参加这样严苛的探险付出了代价，纳米比亚之旅对海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挑战。她显然低估了此次旅程，也付出了精神和情感的代价。

渐渐地，海伦变得不像她自己了。欢乐和积极的笑声似乎显得有些勉强，探险中她面对一些小事都会产生消极情绪。我可以看到探险对她来说有些艰难了，心理上和身体上都比她料想的困难。我也很担心她。

一个傍晚，我专门找了私下的时间去询问她的感受。“说实

话，费利西蒂，我比大多数队员年长18岁多，今天我也真的感受到年龄差距了。”我给了她一个鼓励的拥抱。“我担心，我没能做到如你期望般给你很多支持。”她继续说。

我很惊讶，探险对她也是如此的难：“别傻了，该是我关照你的时候了，你只需要保护好脚，安全到达南极，就可以了。”

海伦不是唯一在探险中遇到困难的人。凯莉通常非常骄傲，在组织里却暴露了她性格的另一面。她好像是吸引意外事件的磁铁一样。她总是很有精力，总是热心过头，而且东西总是在她身边损坏。

她在自己的帐篷管理所有的炉子，第一周她就她的睡垫、帐篷、暖瓶、水杯甚至她穿的裤子都烧着了。每一天，她把自己最新的过失和错误列成单子，还为此情不自禁地大笑。她可能对于器材是糟糕的使用者，但却是大家的开心果。

我之前就知道凯莉愿意填补空缺，能用温暖的拥抱和乐观的态度面对现状。凯莉是轻松幽默的同义词，但史蒂芬也非常有趣，也能带给队伍精神和力量。

史蒂芬对我们日复一日不平凡的生活恰到好处的观察和了解让我笑声不断，但是她也常常制造紧张的挫败气氛，也是会扰乱计划、制造危机的队员之一。

她努力执行我们的计划，加强自我训练，即使我承认她的努力，但我还是发现自己偶尔不得不对她更严厉。尤其是当她的物品洒满帐篷的一角，或是晚上当她花太多时间进睡袋，拖拖拉拉好几个小时，在别人都睡了后才慢吞吞地睡下。

史蒂芬习惯性的混乱与艾拉的洁癖性格反差强烈。艾拉很有责任感地严格按照约定进帐篷休息，如果大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作息，她常常会为此责备大家。

探险的前几日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可是我们记录下的生活中





的每一刻细节，无不历历在目。这就仿佛是我们走近一面映着宇宙的镜子，看着镜子，对比现在的状况，觉得画面都扭曲了。

时间飞逝如白驹过隙，我们讨论了90分钟关于人类行走的问题，就好像我们真的在外面走了一圈。身旁的风光为我们的结论提供着依据。这残酷的虚无一片是如此真实，仿佛天地万物都被擦拭一新，我们穿过这片上帝之手造出来的神奇土地。天空好像地平线一样没有变化，即使太阳在移动，也用完美的光晕笼罩着我们，一整天，光的颜色和光线强度都没有改变，只有云朵指示出时间的流逝。

天空是如此之大，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整片的浮云，它们缓慢地向我们飘来，平坦而均匀，像巡航的薄毯通过大气、云层的影子落在我们附近，就像日食一般会突然使天空黯然失色。史蒂芬站在我旁边，凝视着我们上方的云层，它们是如此地低，诱惑我们伸出手去触摸它们。“我从来没有看过云形成之前的样子。”她惊奇地说。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们头顶上的云氤氲弥漫，在我们眼前凝聚，一遍又一遍地聚集和分开，直到它们游离于一个单层之上。地平线上，云朵聚集在一起，一会儿透出大量的光，一会儿又变成大片阴影。在我看来，它们长得更像是游乐场里的棉花糖。

云朵的中心是黑色的三角，周围还被灰色的阴影包围着。当我继续注视眼前的美景时，它们心不在焉地扭曲和舞动着，仿佛是一幅有魔力的图画。突然，我看到远处的天际有一块空隙没有云朵聚集在一起，这是十天前我们离开海岸线后看到的第一个显著的辨别标志。我在队伍前端转过身来，兴奋地向距离我几米外的凯莉指着那座山。她滑着雪橇，抬起头，看着我的哑剧表演。“山！”我大喊道，即使我知道她可能听不清楚我的喊声。我再次伸出手用力地指着前面，她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还是感到一丝困惑，然后突然

发现什么似的向我点点头，向前转过身朝着身后的瑞娜做出和我相似的动作。我们并没有因此放慢滑雪的节奏。我的脑中想着我们的路线图，我意识到我们前方这些幽灵般的山一定是彭萨科拉山，距离我们大约有100公里的路程。

那天晚上在帐篷里，我们一起仔细地研究了地图，艾拉很认真地用黑色签字笔画了一个小十字标明我们的位置。我们从海岸边的出发点开始，穿越地图上标明的大片白色区域，一共有十个交叉线，这令我们印象深刻，最后我折起地图，告诉大家我们的整个南极路线。“四天后，我们将到达纬度85度地区。”艾拉自信地预测着。她是一名数学教师，喜欢研究数学问题特别是难题，每天晚上，她都会用小笔记本精心地绘制我们在地图上的位置并计算行驶里程。我们现在每天滑雪90分钟，每天行驶的里程达到14~26公里。我很高兴，我们步伐一致，我们已经逐渐建立起真正强大的探险队伍。然而，海伦还在焦虑。“我们可以保持缓慢的速度，我不想太快。”她说。我认为我们滑快些根本不会有任何危险，我现在怀疑是她的脚有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她的大脚趾的趾甲在纳米比亚受过伤，这次又由于滑雪而有些松动，走起路来很痛苦。当我们一起坐在帐篷里检查皮肤受损情况时，她如实地说：“晚上，在我清醒的时候，它们经常抽动。”

“吃一些止痛药，海伦，这样至少在晚上你能睡个好觉。”我安慰她，最终她被我说服吃了些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与她同一帐篷的队友们也注意保护自己的脚了。瑞娜以前常用凯莉的滑雪板，现在她发现自己的左脚踝有些疼痛。

现在，她们两个都相信是滑雪板出了问题，她们都不想用它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除了用它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必须走在松软的雪地上，如果问题真的出在滑雪板上，那么把它交换给





别人用也只能是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凯莉很不情愿地拿回她“惹麻烦”的滑雪板。“我只想确保我以后每走一步都稳稳当当的。”她说（她觉得她看起来要比我更乐观），“至少，我得想着它。”她补充道。但是，很显然，她走的每一步看起来都疲惫不堪。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解决办法。

在几米外的第二个帐篷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受伤而是卫生。“女人闻起来不应该是这种味道。”史蒂芬抱怨道：“至少11天了，我们都穿着同一件衣服，最后一次洗浴都成了遥远的回忆了。”我们每个人都尽量搞好个人日常卫生。经常擦拭脸部和手部，然后再尝试擦洗腋下和脚，但做这些和没做没什么区别。现在我们都觉得，身上的味道能让自己吓一跳。

值得庆幸的是，即使这样，我们的生活还是很和谐的，我很真诚地说，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我能忍受别人的气味，但是却受不了自己的。史蒂芬决定是时候采取积极行动了，她制订了一个洗浴计划。我们没有富余的材料，只能将冰雪融化成水再洗衣服，但是这难不倒她，她尝试着干洗。她把内衣拿到外面（像哆嗦的老鼠似的举着手臂），在有粉状雪末的地方挖一个坑，用它们摩擦衣物，直到把雪变成潮湿的，在此过程中她添加了少量的抗菌洗手液。就这样，进帐篷之前，她都是这样在小心地揉搓着衣服，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如何清洁它们。”她承认。但至少我觉得它们干净了很多。我没能和她一起分享喜悦，因为那天晚上，我一直熬夜到很晚，我睡袋上方的晾衣绳上还挂着没干的短裤，正往帐篷中间滴水呢。

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时感觉特别冷，风咆哮着。我们都穿上温暖的羊毛工作服，戴上羽绒帽护住脸部，冰冷的阵风吹过，我们已经想好了最坏的打算。我看到前一天还明显可见的雪山消失在

云层覆盖的天空，因此，我们低着头排成一队，彼此盯好前面的雪橇，偶尔扫视一下地平线，每个人都固定好自己的位置，向下凝视，只有滑雪板发出切在雪地上的滋滋声，队员们都有节奏地运动着。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脑海里浮想联翩。我的心情地从南极洲溜回了家。我仿佛看到彼得正在回家的路上，我试图记住他途中的每一个确切的细节。我看到大海，看到我们普尔湾附近的小公寓和它洁白的墙壁。我想象着他用力地关上房门，抵挡住冬天的冷风。他放下包，走进厨房，打开暖气和收音机。又走进浴室冲个澡，然后做好饭，坐在沙发上享受着美味佳肴。那一刻的生活是那么简单而又舒适。我们温暖的房间似乎就是世界给予我们的最美妙的礼物。

脚下一颠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南极。我的雪橇撞到一块冰，我没有回头，只是向前探着身子。在这孤独的一天，雪橇已经被撞了很多次，这一次，我没有拽动它们，转过身才发现我的雪橇已经翻倒在一边，边缘部位的塑料已经扎在雪脊上开裂了。我抬起头，看到探险队已经远去，她们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她们已经领先我很长一段距离了。

我大声召唤着前面的艾拉，“艾拉！停下！”我看见她没有回应我，我再次大喊。我摘下防风帽，以便能喊得更清楚。我使劲耸动肩膀，大声呼喊，可是队伍依然继续行进，她们把我遗忘了，我的呼喊被风吹向相反的方向。我们的探险训练常规的一部分就是要求排在队列前面的人定期地回头查看，以确保整个队伍都是完好的——每个人都没有掉队。

过了一会儿，看着那离我越来越远的线条，我相信排在队列最前面的瑞娜一定会在某一时刻回头查看身后的。然而，什么也没发生。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几分钟前，我被迫停了下来，而现在，





六个人的探险队已经缩小了规模，她们竟然几乎没有察觉。远远望去，她们摆动摇摇欲坠的四肢，就像一个超大号的千足虫。有时，明明腿脚正是在最佳状态下工作，而其他部位却都闲着。虽然大家都戴着绑得很安全的手套和裹得严实的袖子，双手拎着滑雪杖在雪地的两侧留下弹孔般的痕迹，但我们却各行其道。随着团队继续滑远，我意识到没有人注意到我。

我脱下马甲，迅速投入工作。我围着雪橇转了一圈，把背包移开以至于结上冰后我也能够及时地抓牢。我等待片刻，重新穿上马甲，弄好雪橇，抬头看了看，她们依然没有注意到早已落后的我。我很生气，她们本应该能做得更好。我赶紧起身，争取赶上队伍，尽管我渗出很多汗水，付出很多努力，但是我和“千足虫”之间的距离似乎没有缩短。

滑了大约15分钟之后，我注意到瑞娜正在旁边打着手势等我。“你还好吗？”我看到她环顾了一下身后的队员们，然后大吃一惊，注意到有一个失踪了。艾拉转过身，发现我的滑雪板不在她身后，然后抬起头，看到我在远处。瑞娜向我举起滑雪杖询问我是否安然无恙。我停了一下，把滑雪杖举过头顶作为答复，示意大家停下来等着我。我很快地朝她们滑去，我知道我已经赶上了。艾拉在后面拉着疲惫不堪的我缓慢行进。

“你得多看看后面，”我气喘吁吁地说，“你可以让我在后面，但是要多看后面，可能在我遇到真正的麻烦的时候，你们却没人知道。”

这次女孩们都显得很温顺，缓慢地移动着滑雪板。“你还好吗？”瑞娜关切地问道。

“我很好，”我回答，“只要记住看你的后面。”我真的很恼火，但是当我发现每走几步，瑞娜就检查一下身后时，我悄悄地

笑了。事实上，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的团队看起来好像警惕性有些过分高了，每个队员每隔几分钟就检查一下彼此的肩膀。我很高兴，我们已经接近了预定的路程。越过一片大面积的已知断裂带，在飞机从爱国者山飞到南极时，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大面积的冰洞和裂缝，也记录了坐标。

我们正朝着一个标记前进，它将引领我们到达北部的边缘地带，这个裂缝段在我们转身向南时就能看到。我们补给了一天，在旅行途中还有很多未知之事，我想知道我们所到的地方是否有可以驻扎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定期给爱国者山的史蒂夫电话咨询时，他如此回应我。“但这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想法。”他描述了他从空中看到的裂隙处的大小和范围。我感到一丝寒意爬上脊椎紧紧拽住我的胃，裂缝处唯一能保护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警惕性。

第二天当我们开始行进时，我让队员们小心查看雪地里任何可疑的裂缝，直线形特征的地表或任何不寻常的情况。我看到女孩们都在周围仔细地扫描前方的地表。私下里我还心存小小的侥幸，希望我们可以在地上探测到一些东西。我们周围的雪脊盖满白雪，很明显，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一些时日了。看着队友们在我的左右滑着雪，地面上波光点点，连绵起伏，就像平静的海面。由于光线的反射，地面上展现出来的并不是统一的白色，而是不同颜色组合而成的图画，更像是一幅笔调柔和的水彩画拼贴而成的。雪脊突出的涟漪又形成了冰的雕塑，我们很开心。对我来说，这些雪波纹就是可爱的海豚，海浪是静止不动的海怪。凯莉她们在雪面下小心翼翼地躲闪、挣扎。而史蒂芬她们就是一幅高迪创作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我们就要接近这些雪脊时，瑞娜用她的滑雪杖戳了戳地面，检查它是否毫无生息。“我好像看见有鱼在游。”她后来解释说，





“所以我眯着眼用滑雪杖试了一下。”凯莉为这个想法而高兴，她不停地笑着跟瑞娜描绘着她眼中的银鱼。我看着身后的这一切，想到在我们穿越南极的路线中记录下这些动画和影像，我被她们逗乐了。

“轰隆隆。”

原本平静的雪面之下传来阵阵雷声。我滑着雪橇躲开这雷声，觉得积雪在我的脚下移动，仿佛我站的地方马上就要沉没。大量肾上腺素仿佛电波一样要将我贯穿。我马上就要休克了，这种身体痛苦的感觉是如此突然。我心中默默地喊道：“裂缝！”我一边滑雪离开，一边期待着雷声在我的身后消失。我转过身研究这雪——一切看起来和过去完全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心跳加速，深吸了一口气。这并不是一个打开的裂缝，只是我们经过时，随着体重的增加，积雪在沉降。在我前面的史蒂芬听到了同样的噪声。她低头看着雪，转过滑雪板看着我问：“那是什么？”我可以听到她声音里的恐慌。“只是雪沉降。”我随意地说着，故意隐藏了我的恐惧。我曾警告过队员们，我们会听到这类声音，但我预计，经历它的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安的，包括我在内。20分钟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注意到史蒂芬突然向前加快速度，靠近前面的人。她一脸恐惧地回头看我，但这一次她什么也没说。我低着头，好像什么都没听到。在接下来的三天，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感觉。每次我都极力使自己的大脑平静下来，但仍有一个安静的声音令我恐惧：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积雪层上。我知道我们沿着截面行进，已经越来越接近裂缝地段了。当我踏着积雪，听到同样令人作呕的声音时，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激增的肾上腺素翻滚。我很惊讶其他队员们表现出来的平静。“你们没有感到不安吗？”我问正在休息的艾拉。

“你已经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了，所以我没事。”她简单地回

答道。

我真不知道是该为她对我的信任感到高兴还是该被她的轻描淡写吓一跳。

雪的噪声一直持续，裂隙也更大了，白昼渐短。我们已经离导航标记的点越来越近了。现在的我能感觉到，我并不期望将看到什么新的导航点，经过13天的简单旅行，这次完全是一种新奇的感觉，我们将到达的地方只是地图上任意的一个点，那里云柔光净，和白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突然，我们发现自己被看不见的障碍绊倒了。史蒂芬是第一个倒下的。她右脚的滑雪板突然离开她，她失足掉进身后一个看不见的裂缝里，伤得很重，牵拉着左边的滑雪板也一同摔到空中。然后，在她前面的队员都慌忙地想要帮助她，但是她们的雪橇却成了障碍物。艾拉接着也摔倒了，艾拉是领先的，所以队伍马上停了下来。但她很快就重新站起来，扫去帽子上的雪，让每个人都知道她并没有受伤。不久，艾拉又停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她，她摔倒时头上划了一个小十字。我朝着队伍前面滑过去，看看出了什么状况。远处，凯莉正在她的滑雪板上跳着，得意地挥舞着胳膊，“我们已经到了！”她欢呼着。

艾拉已经摆脱了她的雪橇，缓慢地移动着她的滑雪板，弯下腰拿上她的GPS装置。她停下来，抬起头看了看。“导航标记是在这里。”她宣布，然后指着她站的地方。我滑过去用戴手套的手指在雪地上打了个标记。“X标志着陆点。”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大笑着簇拥成一团，相互拍打着彼此的背。我凝视着灰色的天际，视野模糊了，难得一见的瞬间让我想到了南极。我们的目标虽然还远在600公里外，但是在那一瞬间，我们转身面对南方仰起头，第一次感到极点离我们比以往更近了。



互相指责

第 10 章

我眯着眼，斜睨着耀眼的光，试图将目光集中在远处跳动闪烁的小黑方块上。如果我盯着它看，很明显就能看到它从我的眼角旁消失。一种挫折感油然而生。也许我们冲过去就可以看到补给品了，是这样吗？我低头看看手上的GPS。通常我们靠指南针驾驶飞机，因为在寒冷的日子里，GPS导航的电池太费电了。但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的补给品距离我们还有几公里。某处的冰面上有三个红色的大行李袋和一个GPS设备，没有指南针也能引导我们直接找到它们。爱国者山的运营商前一天晚上通过卫星电话告诉我：

“那里有一个插着旗子的白雪图案的石堆纪念碑。”后来他告诉我：“再前进一公里，你就能看到它。”GPS上显示我们现在距离标志点只有800米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补给呢？

我紧握拳头，体会到一种恐惧，我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糟糕的情况。可能是我们太想得到这一切了，我担心我们的导航出现了误差。我们离实际位置还有一定距离。很可能有磁暴干扰了卫星定位，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补给仓库。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南极





洲定位查找的三个袋子未能找到，这很可笑。随后，我的眼睛看到远处一个角落里闪着黑色的光。这可能是那个标志，我加快步伐，渴望能找到它们。

我瞥了一眼后面的队员们。海伦的前面有一个裂口。我知道对于我的突然加速她有些生气了，我没有理她。如果这真的是我们的补给仓库，那么它离我们就只有300米远了。我觉得自己现在像是在赛车，大量的能量通过我的肌肉散发出来，一波快乐的感觉冲击着我。扫过肩旁，我注意到史蒂芬和瑞娜也摆脱了习惯性的单行排列，在我旁边停下，她们也看到了旗子，我冲她们咧嘴笑了笑，补给就在我的身后，我们一起挥动着巴拉克拉法帽。

在距离100米远时，我们毫无差错地看到黑点上插的旗子的是一个标志。这就是我们的补给，这里还会有其他什么吗？我带着女孩们全力滑完剩余的路程，心情紧张而又激动，大家欢呼着彼此祝贺。我们丝毫不在意正迎着风欢呼雀跃。虽然补给仓库只是一堆被冰雪覆盖的红色袋子上插了一对旗子。

旗子离地面有几英尺高，事实上，我惊奇地发现，在那么远时我就能看到它们一闪一闪的——在这洁白的宇宙中就是两个小黑点在跳动。艾拉和史蒂芬已经拉开滑雪板，互相拥抱着。史蒂芬迅速拉下帽子，露出脸颊。瑞娜也摘下她的巴拉克拉法帽，帽子周围结上了冰渣，她把帽子放在手里握着，以防伤到脸部。

平时，我们都是小心翼翼地不让队员们摘下护面用具，但是今天，抵达补给站时我们都把它们放在一边。我知道我曾经给过她们承诺，一旦到达补给站我们就给自己放假一天。经过了15天的滑雪，我们要好好享受一个完整的36小时的疲惫的幸福。海伦和凯莉稍后也到达了，很快，她们就加入到了庆祝活动中，并将活动推向一个高潮，大家把护目镜和护面具抛到一边，秀发沾满灰尘，冰湿



的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

我们在补给站前集合，趁大家休息时拿出照相机，拍了很多滑雪时的照片。现在你可以从那些照片中看出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欢快的笑容。事实上，我们到达补给站（比预期早一天到达）是一个巨大的骄傲。我们滑雪超过372公里后，还没有到达南极点的一半，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很自豪。从这一点看，在我们的旅程中，我们证明了自己是值得被南极洲记住的。尽管后来许多人对我们表示怀疑，就像我们到达补给站的庆贺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但我们还是咧开嘴得意洋洋地笑着。我们把雪橇放在距离补给站不远的地方，按照日常程序搭建了帐篷。这里的风不是很大，只觉得呼吸稍稍有些冷，我们穿着夹克，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工作起来。我能看见我们西部的泰尔山上有一些小斑点。

其实早在前一天，我们就发现它们了，它们就像仁慈的监护人一样始终陪伴着我们，在天空和白雪间像有个缺口的阴影，在水平线上不超过一个拇指的宽度，它们似乎只是在高于地面一点的地方悬停着，时而飘来飘去，把自己的影子扭曲成钻石的形状停在雪地上。

这种幻想很难把我们看到的化作真实的感觉。在这个巨大的毫无特点的平面上它已经难以确定大小和规模了。但现在甚至连光都是不可靠的，扭曲和变形改变了我们看到的形状。就好像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它已经超越了我们单调的超现实主义自然世界，就像梦想永远比钱财重要。

正如期待的那样，我们在睡袋中睡了很长时间。我渴望得到放松。我们首先脱下衣服，放下设备和雪橇上的每一个部件，把吃剩下的口粮和不必要的或没有使用的工具搁下，我不想再带着这些东西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探险中去。我们打算把留下的一切都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空的补给包里。等飞机过来后，我们将离开这个补给



站。女孩们分开整理她们的东西时，我很震惊地发现，艾拉袋子里剩下的未吃完的食物超过了十公斤。“对不起，费利西蒂。”艾拉向我道歉。她的眼睛低低地看着地面，看起来很腼腆的样子。“我试过了，但我一天里就是吃不下那么多的食品。”

我知道这对艾拉来说很难，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现在没有得到所有这些营养，以后就会有损失。“但我感觉很好。”她说。我打断她，“你现在可能感觉很好，但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效应，当你觉得能量不足时，就来不及做其他任何事了。你必须每天补充足够的能量。”

“我知道，我知道，”她不耐烦地回答说。她听到相同的训诫——事实胜于雄辩一百倍，她显得更愤怒，她继续不睬这些建议。“我可以尝试一下，但很难。”她答应了。大多数队员在日常食品方面或多或少一直在努力，所以我不能太为难艾拉——即使在我的雪橇里也还有一公斤没吃的花生，我也没办法吃掉它们——但艾拉是团队中最小的队员，在身体方面，如果她没有摄入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我担心她会感到疲惫。

史蒂芬穿着她的紧身衣和小精灵袜，第一个探进补给袋里。她的头完全消失在海绵袋里，而屁股却卡在外面，看上去像一个热情的购物者在到处讨价还价。她终于出来了，挥舞着一个密封防水袋，就像在空中用头顶着一个奖杯。“噢我的天啊，干净的内衣。”她叫道，她的声音颤抖着，透着兴奋。

她在不同的帐篷里给大家传递自己的袋子，我能听到阵阵尖叫声和喜悦的惊呼声。她们都欣然接受了，这是我们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换衣服。“可以闻到清洁剂的味道。”我听到瑞娜热情的喊叫声。她撕开她的内衣包，“嗯，这就像鲜花。”事实上，整个晚上在帐篷里，我们都可以闻到新衣服的味道，而其余的时间我们是多



么的肮脏啊。在补给包里，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了：一包干酪玉米片，一块切达干酪（英国产奶酪的一种）和一个水果蛋糕。

每一天，我们都在吃相同的食物，15天里，我们都认为只要有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最令人垂涎欲滴的佳肴。我们聚集在一个帐篷里，狼吐虎咽地吃下这些食物，就连最挑食的艾拉也吃得比以往多。我们挤在一起，嚼着、笑着，并按照日常规范给爱国者山打了电话，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已经到达补给站。“做得好，姑娘们！”祝贺的话语不绝于耳。“你们真的做得很好。这里的每个人都为你们骄傲！”听到这些赞美声，我们露出了开怀的笑容。

接线员把卫星电话递给了检查我们医疗条件的医生。海伦和他说话，她开始描述她的困惑，如何一直与她的水疱做着斗争，我能听出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可以想到她正回忆着滑雪时忍受的痛苦。突然海伦的电话从手中滑落，她捂住脸，呜咽着。我把电话递给艾拉，给了海伦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感到她的身体在颤动，她默默地流着泪。当海伦恢复过来后，经过长时间的咨询她决定服用一些抗生素。她脚上的水疱已经被感染了，我不同意这个诊断。海伦的脚趾是粉红色的新长出的皮肤，而不是红色的感染的皮肤。但我想如果海伦想服用抗生素，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伤害。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这将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电话就这样在帐篷里被大家传递着，每一个队员都详尽地描述了她们的疼痛问题。听着大家的情况汇报，好像我们都将住院治疗一样。主要描述都是肌肉酸疼比如“扭伤”，但疼痛的部位是“臀部”——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有一些担忧，”电话会议快要结束时，医生警告我，“我知道你们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你可以考虑放慢速度并且多休息几天。记住，你不必一直滑雪，没事时可以走一走。”



我很感谢医生的建议，但也反对他的暗示，我们能组成这个队伍太不容易了。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思考探险队员的健康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先步行而不是滑雪，我们休息一天，再重新分配雪橇的重量。尽管医生觉得队员们状况都很不好，但实际上她们都很重视健康。我们已经走了一定的距离，现在所有人的伤势还较轻，只有一两名队员要经常服用止痛药。我很希望大家没事但不太可能：事实上滑雪超过300公里后，没有任何伤害是不可能的。医生的电话使我意识到，我必须确保队员的健康，我要了解她们在做什么。如果医生从一开始就认为我们做不到的话，将影响女孩们的信心，也会削弱她们的士气。

那天晚上，我注意到凯莉站在帐篷外面，心不在焉地看着山。她拽了拽夹克护住她的脸，又紧紧地拉了拉帽子，使她的耳朵更温暖些，但她编的辫子仍然从两边露了出来，没能护住下巴，积雪夹杂着尘土落到地上。她看我过来后，笑了笑，我们都看到了太阳反射到山顶的光芒。“我要一瘸一拐地进帐篷了，步履蹒跚啊。”她说。

我很迷惑地发出了同情的声音。我看到凯莉滑着雪到营地，尽管她滑得很慢，但她没有一瘸一拐，不像凯莉说的那么夸张。她看起来有些压抑，我想知道她脑袋里是不是想着别的事。“一切还好吗？”我问她。“我的意思是，在帐篷里？”

凯莉看了看她的脚，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我知道她好强的天性让她什么也不说，她不愿意抱怨或大惊小怪。她抬头看了看我，我看到眼泪在她的眼睛里打转。海伦是一个很棒的女士，但她就是不说话，只是看着我，判断我的反应。

自从我们离开蓬塔阿雷纳斯，凯莉和海伦两个人已经对彼此有了很尖锐的意见。尽管她们从来没有公开地相互批评，但很明显，



她们的关系很紧张。

我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表示同情，我安慰她，看到她的身体在颤抖，仿佛在抱怨。我听她说了过去几周里所经历的痛苦，突然醒悟，我了解她的水疱一定是很严重了。我希望我们可以谈点别的。她好像试图寻找合适的词语向我解释，“我很抱歉，费利西蒂，我真的因自己感到很抱歉。”

我朝她笑了笑，搂着她的肩膀说：“没关系，我能接受。”我知道凯莉没有恶意。她并没有冲动的个性，只是由于与另一个人相处太密切了，难免有些小摩擦。“凯莉，我可以把你安排在其他队员中。”我说，“每个人在这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计划。没人会知道你跟我说的事情，我保证把你和海伦分在不同的帐篷里。”

我说完，凯莉摇了摇头，“不，我意识到自己在探险途中遇到的挑战，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对我来说，这不是滑雪、距离或寒冷的问题，而是与他人的相处问题。”我没有完全理解她的想法，只是告诉她重新分组是很自然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她态度固执，一直强调：“这是我对自己的考验。”她说，“一切都会好的。”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都要采取一个重新分组的决定了，不管凯莉是否抗议。但是，我也有些犹豫，毕竟重新分组可能会导致我们系统内部的不安和混乱，每个人都需要时间适应，而我们现在的工作很有效率，我可能要花点时间重新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在另外的帐篷里，艾拉、索菲娅和史蒂芬在一起工作真的很好，她们喜欢彼此的陪伴。我知道我有多么依赖她们的友情，这种友情让我能安心过好每一天。我只是对凯莉有些失望，她没有这样的经历。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但没有起身。我默默地看着挂在晾衣绳上的手套、护目镜和手表，它们都随微风吹动的帐篷一起舞动



着。我把睡袋拽了拽，遮住下巴，不禁凝神屏息，享受此刻的温暖，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我想，今天应该是我们休息的日子。

前一晚我给全队下了指令，让大家尽可能地多睡。我让自己完全放松。现在我们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适应我们的日常工作了，我不允许自己持续不断地睡懒觉。我听到索菲娅解开自己的睡袋，穿上靴子走出去。艾拉很快跟上她，我听到她们两个又一起返回，我也走出帐篷，尽可能地让自己清醒。磨砂般的冷风吹在我的脸颊上，很快消除了我的困意。我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眨了眨眼，刺眼的感觉就像看到一个曝光过度的照片。尽管我不情愿起床，但是感觉还不错。今天我可以不用搭帐篷，甚至可以不用看表，我们可以没有紧迫感地好好享受周围奇幻般的环境。

今天，我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时间。回到帐篷，史蒂芬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睡袋里，索菲娅习惯性地盘腿坐在帐篷远处，她在厨房区域静静地点燃炉灶，把水烧开做着早餐。索菲娅是如此高效地照看着炉子，我经常担心我们让她做的工作太多了。有时候，我问她是否想要交换一下角色，她看上去吓坏了：“不，我是在放松。我喜欢坐下来听别人聊天，我很高兴做我的工作。与在家照看孩子相比，这就是一个假期！”她笑了。

今天，艾拉坐得离索菲娅很近，她整理了食品配给袋，她们窃窃私语着。她咧着嘴兴奋地穿过帐篷向我走来，手里还举着三袋方便面。很明显，艾拉和索菲娅计划请客：比起正常的粥，她们更喜欢拿方便面来当早餐。而不喜欢喝粥的我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她们。

我嚼着亚洲式早餐，在友善的沉默中拿出我们的公共笔记本，看着我计算的里程，又在背面用铅笔潦草地算了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完成了日常的目标，预计在25天之后的元旦到达南极点。按照过去两周的行进方案，我开始设置我们剩



余旅程的每日目标，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滑得轻松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会变得更累、更缓慢。

极地旅游是一场消耗战，每天你都要在极地消耗你的身体能量。你可以减缓行程，但却不能让自己完全消除疲惫。虽然我倾向于以缓慢而稳定的方法保存体力和耐力，我也注意到我们在冰上花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疲惫。我不想匆匆忙忙的，也不想无故拖延我们的旅程。

我估计，即使允许团队放缓，我们也可以在剩下的22天里滑完剩下的距离。我让自己休息了一天，然后决定，今后无论天气有多么不好，多么不适宜滑行，或是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好，我们都要在圣诞节到达目的地。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们一起坐在被太阳晒热的帐篷里，我向整个团队解释了我的计划。其他人则心不在焉地嚼着香甜的玉米片，用枕头或睡袋架在帐篷墙边，发表着她们的判断。索菲娅看起来很严肃，她讲话时一直耸着肩，表示会遵守团队的所有决定。她说：“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趁大家体力足够强的时候尽可能多地走些路程，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索菲娅说话的时候艾拉一直在热情地频频点头。大家都希望从一开始就快点走，以便更快地完成剩下的路程，这并不奇怪，她们更愿意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艾拉拿出铅笔，挥舞着写出她自己的计算。“如果我们每天马不停蹄地行进30公里，就可以在短短的19天里到达极点。”她咧着嘴笑了笑，而其他队员都大吃一惊地张大了嘴。我认为艾拉的计算充满了热情，但也有些草率。

海伦很快给出了相反的观点。她仍然觉得我们应该设定一个较慢的速度。“有些人会比其他人快得多。当费利西蒂很快地滑过去的时候，我的脚肯定追不上。”她说。



对于她这个意外的评论，大家吃了一惊。我等待着，直到她说完，我才做出了解释，我选择了谨慎的措辞，努力地让我的声音听起来不急躁。“海伦，你的脚是在你抵达南极洲之后多久弄坏的？我肯定，你的脚在探险初期就已经是坏的了。”

“我知道，大家对该用什么速度行进是有争议的。”我把大家各种各样的手套、帽子、防护镜都集中到帐篷的中间，继续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大脑中时刻提醒自己，感觉就像无形中有一条腿在支配着我们，今天实际上是走得最慢的。我要确保我们的基本日常行程中，没有人走得太慢或是太快——这就是我的工作。现在，我们最慢要走约4.8公里，最快要走5.7公里——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差异。事实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凝聚力，我们团队的一致性是我们骄傲的，相信我。”我看了看周围的队员。海伦点头表示同意，但我更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明白我说了什么。有些人则心不在焉地低头看着她们的靴子，或者研究着其他队员的脸。

我决定在这个时候给大家鼓舞士气，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在前一天我还有过担心。“伙计们，请不要忘记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接着说，“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有一些顾虑，担心我们身上有这样或是那样的伤痛，我们还能不能滑下去，我们是不是在透支健康。在这点上，我已经为大家准备了足够的布洛芬、扑热息痛，还有足量的止痛药。我们会比预期做得更好，你们应该放心和骄傲。”帐篷里，大家的情绪有所提高，也有了一些微笑。但很明显，问题的症结在于凯莉、海伦和瑞娜。如果我没有让她们振奋起来，那么低迷的士气仍会传播到其他队员那里。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和15天前一样多的补给，感觉就像要进行最终的探险训练一样。我果断决定，我们将运用所学到的知识确



保我们探险第二阶段比我们开始进行得更好。我一天中最大的工作就是计算接下来23天里大家的食品配给量，我要确保每一个帐篷都能分到适当数量的晚餐、早餐。索菲娅把堆在帐篷里的食品配给包装分好类，我数了一遍又一遍，还请史蒂芬和艾拉再重新核对一遍，把它们装到四个雪橇上。当走到海伦、凯莉和瑞娜的帐篷时，海伦向我跑过来，她们也准备了特别的早餐和晚餐包，把它们放到每一个雪橇上。

下午，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每个人都享受着用剩下的口粮做成的午饭。然后，大家用羽绒夹克和睡袋给自己做了一个舒适的小窝，放纵地睡了个午觉。我几乎是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好好地享受这午后小憩。

帐篷里队员们的呼吸声都很均匀，我笑了，意识到自己能听到从另一个相距十米远的帐篷中传来的鼾声。然后，我又意识到，我可能还听到了别的声音——一阵低低的机器的轰鸣声。我睁开眼睛，我记得这个声音。我扔下夹克，急忙拉开帐篷的门，探出身体，伸着脖子查看天空。我眨了眨眼，低头返回帐篷里：“伙计们，醒醒！来了一架飞机！”

睡醒的队员们穿上靴子、戴上帽子从狭小的帐篷里出来，大家兴奋地欢呼着。我也摇了摇另一个帐篷，不一会儿，就有七个穿着鲜红衣服的女人聚集在一起，跳上跳下地挥舞着手臂。飞机在我们头上的低空盘旋着，螺旋桨吹动雪和冰，飞机滑出云层的阴霾，向我们滑过来，它的金属滑翔板擦过雪脊，把积雪搅起飞到空中，最后停了下来。

我们聚集在一片机翼下方，门打开了，两名飞行员跳下飞机，他们是从爱国者山来的ALE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在运送补给回来的路上，顺便在南极捡拾我们所有的垃圾和没用到的设备。我们向他



们致以问候，大家笑了笑，史蒂芬注意到他们中有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是我们在爱国者山遇到过的。他戴着飞行镜，我可以看到他的微笑，如果我能看到他的眼睛，我敢肯定他会眨眼。凯莉调侃他说：“你是两周来我见的第一个男人哦。”这两个飞行员突然被七个妇女围着，看起来有些紧张。

我们把红色补给袋、不必要的设备、垃圾和剩下的粮食装上飞机。最后需要被全部装上飞机的是一个大型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鼓鼓的——我们的大便。飞行员看起来很困惑，“那是什么呢？”他问，看起来对我们的解释不理解。“印象中‘像这样的有毒物质’是不能空运的。”他说。我们不得不换另外一种方式以便它可以安全地上飞机。我开始对他解释里面的东西是如何安全。凯莉也很支持我，最后飞行员放宽了限制，允许我们把它们装上飞机。

“等一下！”史蒂芬朝我们跑来，伸手递给我们一个银色的小包，她把小包匆忙地塞进袋子里，厚脸皮地露出牙齿笑了笑：“在你们走之前，这是最后一份财富了。”说完，飞机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我注意到还有一两个其他的队员，悄无声息地跟着她们的头儿离开了。

我们都站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它弹起地上的雪，准备加速。当飞机飞到空中后，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帐篷上面低空飞行——如此之低，我们都本能地躲开了这架飞机的影子。看着它在蔚蓝的天空中慢慢地变成一个小黑点，队员们都表现出了出奇的安静。飞机的到来提醒了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我们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帐篷和火炉还在那儿。

这种感觉就好像在深夜被人出人意料地唤醒一样。我为这种经历感到高兴，但不知何故我希望能独自待会儿。兴奋之后，孤独再次让我难以入眠，同样，我们所处的白色世界看起来似乎同样孤单。



我小心翼翼地拨着蒂姆·莫斯的电话号码，在英国她给了我们探险队一半的支持。电话响了两声之后，接通了。蒂姆的工作是每天更新我们探险网站的新闻和我们通过卫星电话发送回的播客。今天我们会安排一次访谈，回应家人、朋友和支持者们在网站上的留言。我去了每一个帐篷，将消息转告给女孩们。

当我准备公布第一个消息时，我注意到帐篷里都充满了期待。虽然在理论上，我们的卫星电话可以让我们在任何时间拨打想接通的任何一个号码，但是作为一支探险队，我们不会去联系我们的家人。虽然这很难，不能在房间里与数千英里之外所爱的人通话，但是我们赞同他们在休息的时候给我们发信息，虽然从没人谈论过这件事，但我知道每个人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只是她们都不敢承认。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将是一个情感上的考验，因此，我们集体做了一个深呼吸，我传达了第一个消息。

“这是史蒂芬的。”我开始说。史蒂芬的脸上闪过一个微笑，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正盯着我。“这是你的迪加叔叔从美国发来的。他说他们一直跟随着你前进的脚步，他非常为你自豪。”史蒂芬笑得更开心了，同时也低下头，目光望向地面，试图努力控制着不让泪水从眼中涌出。凯莉让史蒂芬搭在她的肩膀上，安慰着她，我们中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史蒂芬强烈的个人情感。

“瑞娜，”我继续说道，“你的朋友说‘快点，瑞娜！’”我们都笑了，这似乎是一个相当野蛮的消息，但瑞娜给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解释，“快点”在印度语中是一个温暖的鼓励语。

还有一个消息是凯莉的，但金姆有点困惑。“这似乎是个代码。”她说。“AB12SA4！”我重复着代码。凯莉在解释前大笑起来：“这是橄榄球比分！全黑队（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得十二分、南非队得四分。”



早晨的天空看起来就像灰色的雪。西部大山黑暗的阴影，是地平线位置唯一的指示。我站在废弃的营地上，帐篷已经卷好放在我的雪橇上，我面向南方，小心地把我的巴拉克拉法帽和护目镜戴好，确保它们一层压一层都是重叠的，不留下缝隙。风始终在我脸上轻轻吹着，我拉下巴拉克拉法帽护住我的皮肤。我感到这将是艰难的一天，其他队员也有同样的想法。

她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安静，大家把软靴绑到滑雪板上，按压结实，戴上手套，系好马甲，调整好雪橇。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喊着我们的战斗口号，大家的每一个发音都很清楚，慢慢地，在风中她们都听到：“此时此刻，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捂着嘴乐着，然后开始拉着雪橇的安全带向前移动，就像第一次拉着满载重物的新雪橇一样。

我们的雪橇上，有接下来23天里需要的口粮和燃料。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探险队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很紧张。

我们排成一线并缓慢地向黑暗移动，头顶的乌云遮蔽了雪平面中所有的参照物，使我们被雪脊绊倒。我们只能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简易的雪橇上来帮助我们判断应该向上还是向下前进。在看不见周围事物并无法彼此交流的情况下，我们迷失在各自的个人世界中并失去主张。这一天简直糟糕透顶，时间过得慢如蜗牛。

如果不是GPS显示我们实际上是在向正确的目标行进，我感觉我们几乎是一动不动，这让人感到绝望。史蒂芬强烈地想知道她走得有多快，但我假装不知道。“我只是感觉我走得真的、真的很慢！”她恳求我改变路线或是放慢速度，她滑到我旁边，俯下身子和我小声说话，不知怎么的，她猜测我知道的比流露出来的讯息要多。“真的还不到4公里吗？”她问。我笑了，什么也没说。“别告诉我比2公里还少，”她吓坏了似的叫着，“如果我比这走得还慢，



我就冲自己开一枪。”我太集中精神了没顾得上回答她的问题，史蒂芬的调查就此落下帷幕。

瑞娜带领一队队员暂停下来，看看情况是不是很好，我向她挥了挥手，告诉她我正在帮助史蒂芬处理她的脚，我查看了她的衣服的松紧带，把它弄长。我们调整好位置再次上路，其他队员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当我们看到排在前头的系着丝带的领滑者似乎在一个转弯处向右拐时，后面的队员停下来，隔着一段距离，我们看到她们好像是在讨论往何处走。

我和史蒂芬像在表演默剧，大家都保持着沉默，继续朝队伍滑去，突然，我们俩向左岔开，另外三分之一的队员继续向右。还剩下两人犹豫地看了看后，开始还坚定地向右滑行，可不久就改变主意向左了，因为她们意识到向右的人太少，所以放弃了，改变方向跟着我俩向左滑了。史蒂芬和我在表演时一起大笑起来，“看看，”史蒂芬大喊，“你只离开了她们5分钟，她们就自乱阵脚了。”

天气依然没什么大的改变，一直阴郁着。毫无特色的云围绕太阳形成乳白色的云旋，使太阳看起来更像是淡淡的月亮。结束了第五段行程，我们停下来休息七分钟，我决定让队员们停下来，告诉大家一个让我们进步的秘密。我滑到队伍前停下来，扯开我的面罩，解开雪橇上的绳子。队员们疑惑地看着我，我们至少还要再滑90分钟才可以停的啊，而我的行为很奇怪。

“伙计们，我有一些好消息和一些更好的消息。”我把GPS高地举起，它显示出来的距离是我们离开上一个营地滑行过的距离，“我们已经滑雪22.22公里了，这已经超出了我们一天的目标7.4公里。我看着索菲娅高兴地张开嘴，发出惊呼。

“哇！”瑞娜也喊起来，发出了爽朗的笑，“而更好的消息是，我认为今天可以不去更远的地方了，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地。”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欢呼着，把冰冷的面具从脸上摘下，从雪橇上取下温暖的外套。没有一个人料到，这是我们的常规步速，还感觉很慢呢。我们对自己速度的感知，我愿意也希望大家感到诧异——因为它可能是极具欺骗性的。

“一切都会好的。”我让自己松了口气。我们推出帐篷，准备为晚上的到来搭建营地，我感受到队员们朝气蓬勃的好心情。海伦终于同意在服用抗生素的同时服用作用更强的止痛药了，那是因为早上醒来时，她突然发现脚疼得厉害。现在，她在营地周围欢快地跳着舞，嘻嘻哈哈的，这才是我们认识的海伦。凯莉也走过来，早上出发前，我们还一起工作，我帮她把靴子绑在雪橇新的位置，以前绑得不对，致使她的靴子有些磨损了，还好，凯莉及时纠正了过来。这看上去就像我们已经最终解决了“邪恶的雪橇”问题，而且凯莉也很高兴。我很高兴看到凯莉和海伦手挽手地在帐篷外和瑞娜一起照相。

我突然心潮澎湃，“一切都会好的。”我轻松地对自己说。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遇到了危机。我靠着帐篷的门柱，头晕沉沉的还没有睡醒，就已经在严寒中工作了，我的手正瑟瑟发抖地系着鞋带，这时，我听到帐外传来了脚步声。随着一阵冷空气夹杂着暴风雪的冲击，凯莉迅速拉下帐篷门，站到我对面的雪橇上，把她的帽子从前额拉到脑后，神情紧张，“我想，我们可能一不小心，把食品包忘在后面了。”她小声地说着。

片刻的恐慌就像闪电向我袭来，我停下来捋了一下思绪回答她：“现在先不用担心，担心还为时过早，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我跟着凯莉走出帐篷，海伦和瑞娜已经在外面的忙弄她们的雪橇了。当我向她们走过去时，我注意到瑞娜脸上的表情。她看上去很伤心，已经快要哭了。



“我应该有所有的早餐包的，但我却丢了五个。”凯莉解释。每个包里不仅包含她们三人的早餐也有运动饮料，我们还在饮料里混合进了额外的碳水化合物和热量，还有按照日常定量分配的卫生纸。丢失五包就意味着五天中，有一半的队员在滑雪一天后无法得到食物。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这五天里，她们将减少糖类的摄入。

“没有理由找不到它们啊。”海伦打断她。“它们一直都堆在帐篷后面，凯莉把它们绑在雪橇上了。”“我整理好行囊就离开了，”凯莉迅速反驳道，“我没有在帐篷外留下任何东西，在后面也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果昨天我们知道就好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隐瞒对方。”海伦继续尖叫着说。

我看到凯莉的脸色变了，“我没有隐瞒，昨晚在帐篷里我对你说过了，我觉得在我的雪橇上没有足够的食品包了，但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检查出来。我是确定以后才说出来的。”我静静地听着，没有加入她们激烈的争论。“我并不关心这是谁的错。”我冷冷地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出解决方案。我想看到成堆放好的每一个食物包，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丢失的。”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除了早餐包，我们都有，凯莉本来是要把它们包在她的雪橇上的。”海伦回答说。“我想自己看看。”我瞪着她们三个，坚定地说。她们走到雪橇那儿，我回到我的帐篷，蹲在门廊处，请其他队员一起整理所有的食品配给包，重点关注早餐包。

瑞娜、凯莉和海伦站在一旁，就像灰头土脸的士兵，我数了数她们已经数好的食品包。“你们查清楚了吗？”我没有看她们，问道：“全在帐篷里吗？这些是否包括我们今天的口粮？”她们闷闷不乐地点点头。一共缺了五个早餐包。我快速地计算着我们最终需要的配给量是多少，我要确保在探险结束时，我们能留够足够的



T 带着世界去南极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应急食品——如果我们的进展在计划之内——但它意味着，探险队将没有任何后备物资，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压力，我们必须按计划进行，在38天之内到达南极点。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让自己不太愤怒。从一开始我就提醒过队里最有经验的队员做事情不能粗心大意，要有头脑。我转过身，面对女孩们，她们站成一排，就像犯了错误的学生。“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我很镇定，但又严厉地说，“这种粗心大意会让我们的探险付出代价。”我停下来仔细看她们的脸。很明显，她们的苦恼表情说明大家都明白这个错误很严重。

我走出帐篷，海伦坚持在收拾残局。我打断了她。“我不管，海伦，你是有责任的。你告诉我你会对它们很负责的，你却没有再三检查。更让我生气的是你们三个还站在这儿互相抱怨。”凯莉和海伦看着对方。瑞娜哭了起来。“我们很抱歉，费利西蒂。”她哽咽着说。“我不想要你的道歉，我太生气了。事后说抱歉太容易了，我需要的是不会发生这些错误。”我抿了抿嘴，停顿了一秒，很显然再对她们发牢骚也于事无补，她们已经够沮丧了。

“现在我们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最坏的结果可能是它会导致你们之间的裂痕。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你不能改变什么。既然情况已经发生了，就请你们处理好它。你们需要原谅彼此，接受这个错误，然后继续前进。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你们和我在一起。好吗？”

大家不再说话，心照不宣。海伦的肩膀一直在颤抖，我知道她一直躲在护目镜后哭泣。“看在上帝的份上，大家都小心一点。我们负担不起任何更多的失误。”

我转过身去忙着收拾我的雪橇。我想知道我刚才的做法是否合适，其实我没有道理大喊大叫的。她们知道我们会很好地解决一切。我很自责，回想这一天来我们把补给品分好类，让海伦告诉我



她们已经检查过了，但我却没有亲自检查一下。

我应该相信我看到每一个食品袋。我沮丧地叹了口气，这感觉就像我输掉比赛。一方面，我并不想成为一个完全的控制狂，因为最重要的是，每一个队员都应该为她们自己做事，我信任她们。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探险可能会提早结束，因为我没有亲自检查每一个细节。也许是我一直以来都太信任我的队员了，也许是我对探险队太漠不关心了。

当我们向下一个雾灰色的地平线出发时，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通常我都是在这个位置，静静地戴上头套，我知道我必须全神贯注地摆脱仍然笼罩在我内心的已经毫无意义的怒气。突然，一阵颤抖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仔细看了看我的手指。它们冻伤了，它们需要我的关心。

我把已经冻得发麻的手指放在手掌中，缩在胳膊里面，温暖它们，又朝空中挥击几下继续滑雪。当滑雪时，通常就能暖和了。但是现在，我感觉寒意向我的后背袭来，并且沿着后背顺势袭到大腿。

我缩小了步子，抬高脚，使我的身体更用力地滑，这样可以让自己更感到温暖，我瞥了一眼队伍，注意到凯莉与平时不同，戴上了她的连指手套，索菲娅已经不穿绒衫了，通常在滑雪结束时她总是这样。

我逐渐明白了原因，我们移动的速度非常缓慢。队员们都蜷成一团，以至于我偶尔都能听到前面队员的雪橇碰到滑雪板的声音，还有一些队员正挥着胳膊站在滑雪板上跳跃着，让自己保暖。我挥动滑雪杖给带队的海伦发了信号，让她略微加快速度。

队伍突然停下来，海伦调整好她的衣服，然后明显地加快了移动的步伐。我们滑得相当快，我很快就暖和过来，我确信在不久后我们就能解决好步速问题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我觉得肌肉



舒展开了，我奋力跟上前面的雪橇，发现队员之间拉开了差距，我自己也出了一身冷汗，步速也有明显放慢的迹象。事实上，似乎是越来越快。我们现在是在全速滑雪啊，这是从来没有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十分钟后，我们都没有放缓步速，但整个队伍开始散乱，我伸出手臂挥了挥给海伦一个放缓的信号。队伍突然停下来，我看到有人把滑雪杖扔进面前的雪中。我很震惊，我滑到队伍前面，找到处于混乱中的海伦。“我不知道你想让我怎么样？”她冲着队伍大喊。“显然，我根本不适合引领队伍。”我非常震惊。我从来没有见过海伦这么沮丧。“海伦，你怎么了？”

“首先，你说滑快点儿，后来又让我放慢速度。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她扯下手套，把它们丢到滑雪杖旁边的雪地里。她抬起遮住脸的护目镜，用手捂着脸，大哭起来。我眨了眨眼，然后转向其他在一旁看呆了的不知所措的队员们。“伙计们，让我们休息十分钟。穿好你们的外套，吃点喝点，别让自己冻着。”

我帮海伦卸掉她的雪橇，把她带到离队伍稍远的地方，让别人听不到我们说的话，她不再哭了，平静了一些，“我只是想尽力做好每个人都愿意做的事情。”她开始犯糊涂了，我打断她。她的话一出口，我就感到很失望，但不管怎样现在她需要一些安慰和同情。“海伦，这和我们的步速没有关系，你还在为早餐的事生你自己的气，你同意吗？”海伦没有回答，但她深吸了一口气，故意把目光落在我身后。

“早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是谁的错已经不重要了。那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你必须忘掉它。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我停顿了一下，然后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你今天的状况很糟糕哦，是不是？”海伦默默地点了点头，擦了擦眼

睛。我离开她，喝一些水，吃了点食物，滑到队伍后面，告诉大家静静地等一下。

“我想对我们的步速做出一个解释，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当你领队时应该设定什么样的步速，如果你想率先放慢，你要知道该怎么做才没有人会觉得太快或过慢，所以让我们继续加油吧。”我提高音量安抚队员们是为了让海伦能听清楚。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再次动身，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关于步速问题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团队凝聚力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我们终于摆脱了苦恼。



雪脊之地

第 11 章

我右眼上方的视野已经模糊到只能看见一个很小的缝隙，其余部分也因护目镜内侧渐渐结上的一层冰而变得模糊。这些天，这种感觉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即使我们再调整脸部的遮盖物或往护目镜上呼热气也无济于事——再次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上次休息时，我曾试图摘掉护目镜，用手指一点一点地除去上面冻着的冰渣，但这似乎使问题变得更麻烦。我得把头向前歪着点，才能看到前面的雪橇和滑雪队的轨道。再次休息时，我决定更换一个护目镜，我想等到第二对也结冰时，第一对护目镜应该已经变清晰了。否则，我几乎和瞎子一样。

我们每向前走一步似乎土地都凸出一块，就像一个卡通人物的头很夸张地伸出来。像没有任何特点的树和房子，给我们的感觉是，我们无从得知它们可能有多远，也不知道它们有多大。有时候，我们朝前面的一座小山走过去，走了一整天也走不到，其他的地面看起来似乎是一面有些凹进去的垂直的墙。我们面前似乎是一个海市蜃楼。当我看到眼前的高塔倾斜在天空时，我默默地祈祷





着，“这是海市蜃楼，是海市蜃楼。”

离开补给站已经有些日子了，在这之前，除了爬山，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从地图上来看，经过9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就可以从出发时的海平面到达一定的海拔高度，来到坐落在冰层厚度3000米左右的冰穹——南极，但我们不能肯定能够一次完全做到。在之前完成了一半的探险中，我们已经到达了冰层厚度达一千多米的位置，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光学错觉带来的往往比现实景观更加美轮美奂，通常只有一个现象能说明我们正在登山，那就是酸疼的大腿。我怀疑我们莫名其妙地放慢了速度，而且感觉我们的雪橇有点重。又走了一两步，我们停了下来，在一座小山顶上扎营，看着我们身后，我猜我看到的滑行脚步比平时在地面上滑行的更细微，或者是以比在雪脊上更高的脚步，向各个方向延伸，但我并不确定。

在过去几天，山露出地平线的部分覆盖着稍微带些灰暗色的积雪，俨然是一个变形的巨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就是证据，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泰尔山就蜿蜒在我们右边的地平线上。我们攀登时会拉近与山的距离，展现出新的制高点或高地，而在其他时候，它们会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以下。

我又一次扫视我的右边，发现地平线上一尘不染，山也消失了。我感到一种恐慌，就好像发现我们失去了一件至关重要的设备。

我们坐在雪橇上休息时，凯莉若有所思地对我们说：“我可以看到一个鳄鱼在吃东西。”她用滑雪杖指着山脉。“有它的头，它的背部和它的尾巴。”有些队员正摘下冰冷的面罩全神贯注地往嘴里送东西吃，还有一两个队员转过脸去望。

“是的，是的，我看到它了！”丽娜热情地表示同意。“不！这是一个人的背。看到了吗？”阴沉了一个星期的天气，终于再次

闪出了亮光。阳光猛烈地照到天空，集中成蓝色的光，并急切地把阴影从雪脊上抛出，你甚至可以看到数英里内雪表面上的每一个细节。虽然天气还有些冷，但平静的天气可以使滑雪变成一项发热的运动。

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需要自由出汗，我们的四肢（耳朵、手和脸）需要温暖和保护，因此我们要选择一些奇怪的服装。我们大多数人都穿着轻质罩衫，在上升的暖气流保护下滑雪，但索菲娅的前身还是感觉寒冷，所以她倒着穿一件羊毛夹克，她的背部完全敞开在空气中。我们打开温暖的高腰裤的长拉链，就像在一旁跑动的小丑。为我们保暖的工作裤可以通过侧面长长的拉链打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看起来像没有系好裤腿口的辛巴达水手一样，而凯莉将松散的裤腿塞进了她的腰带里。她那穿着长袖保暖内衣裤的小细腿从她那高腰裤“短裙”下伸出来，让她的装束看起来就像莎士比亚时期的演员。

明朗、平静的日子里，在冰面上扎营是一种乐趣。我们斜支着帐篷，不用担心风会把它吹走。我们可以在阳光下把帐篷顶部晒干，可以躺在冰冷的装备箱上，或者把滑雪杖自上而下悬垂着插到雪地里，就像直立的标枪。史蒂芬和我花了一些时间确保把帐篷的外部弄牢固，享受着阳光照耀羽绒夹克的温暖的感觉，我们躺在露天雪地的睡袋里，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真好，就像是我们迎着阳光走向碧海蓝天。

天空中飘着一缕缕薄薄的云，它们聚集在一起，朝着天的尽头飘去，像是要把整个宇宙都吸进地平线。天空看起来就像我们看到的一个光影旋涡的定格照，这一过程正好被我们的快门捕获。来自天空的蓝色斑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们映射到指南针上显现出四个彩色斑点，像被太阳框住的剪短成四等分的彩虹，完美地自成一





体。它们紧紧跟随着太阳，忠实地陪伴在太阳旁边，永远都围在它身旁舞动，从不太近也不太远。

史蒂芬和我仔细地注视着这以天空为主题的引人入胜的画面，最终她打破了沉默。

“谢谢你，费利西蒂。”

“为什么？”我困惑地问。

“来到南极啊。”她笑着回答。

我也忍不住笑了。对于所有的压力、困难、千篇一律的单调我们都欣然接受，她看到我们正在创造奇迹。我回想起我第一次遇到史蒂芬的情景。

她冲进面试厅，看起来就像刚刚参加完体育比赛，我很欣赏她那种满满的自信。史蒂芬附和着我的记忆，“哦，我承认，”她紧张地说，“我当时穿着田径裤，因为我那晚喝醉了，一醒过来马上就来面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时间正式地打扮。”

我们都笑了。我上当了，现在我认识了史蒂芬。这个故事绝对有意思。不知何故，这个误会恰如其分。我们第一次召开的热身会议是两年前在一个四周都是玻璃幕墙的会议室里，当时那种感觉和现在比起来就像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史蒂芬和其他女人们。当我们的思绪再次回到现实，我听到不远处的两个帐篷里传来阵阵欢笑和喋喋不休的唠叨声。

突然，我感到一股清泉滋润着我，我惊奇地发现我把一群那么优秀的妇女聚集在一起。我们不再是塞浦路斯人和新西兰人，也不是伊斯兰和印度教徒，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份信任，我为每个人感到骄傲。

享受完舒适的日光浴，我们安排好睡袋。我和史蒂芬都开始感觉有些冷了，即使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寒冷仍然会发挥它



的威力，渐渐地透过我们的衣服咬噬着我们暴露在外的皮肤。我弯下腰走进帐篷，感受到一波来自火炉的温暖。

史蒂芬也跟我一起进来，她脱掉外衣只穿一件保暖衣，坐了下来，我们都准备睡觉了，而她痴迷于所有有关减肥的方法，她仔细地检查大腿和臀部。“这太不公平了，我还没有减下去。”她抱怨着。我不同意她的说法，这么多天的滑雪我一直跟在史蒂芬身后，我注意到她的体形有了明显的变化。

她的高腰裤现在明显地挂在臀部。“相信我，史蒂芬。”我坚持说，“这些日子，我一直观察你的后背，所以我应该知道。”我自己就瘦了很多，我发现我的胸罩比以前多出了很多空间。

我经常把胸罩当作一个方便的额外的口袋，把各种电池放在里面。史蒂芬每天都会把它们分配好，用太阳能板充一晚上电，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充好了。电池需要保持温暖以便维持它们的电量，我们每个人使用的电灯和MP3都需要它。起初，我们只是很节省地在使用摄影机的时候装上电池，但是现在，我失望地发现用两块电池比较合适。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大声地对史蒂芬抱怨：给我第三块电池。

“如果我的胸罩里能装下三块摄像机电池的话，我就真的遇到麻烦了。”我抗议道。艾拉也像史蒂芬一样对我们的减肥结果感到失望，“我仍然有一个胖脸。”她伤心地说，从小镜子里看着自己（镜子是用来检查冻伤或是脸上的冻疮的，但很快就成为我们的急救箱里最受欢迎的工具，紧随其后的是镊子）。我担心这种减肥的欲望会影响到艾拉和她的“每日粮食计划”的完成。

我每天都要求她向我汇报她吃了什么，唠叨着她必须吃完她的零食。我意识到我的督促让她感到神经紧张，但是我却忽视了她穿过帐篷时的目光，我坚定地相信她一直坚持吃着。我其实是好意，



希望她能有进步，我交给凯莉的任务就是准确地检查艾拉每次在我们休息时到底吃了多少。

我不想惹恼艾拉，但她如果吃得不够多，她一定前途未卜。我注意到当其他队员都很高兴地穿着防风衣时，艾拉穿着羊毛工作服。我担心她抵抗严寒的能量水平已经开始减弱，正因为她缺乏能量，所以她比其他人更容易感觉到冷。那天晚上，我断断续续地睡着，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我听到了外面雪地里的脚步声，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心不在焉地在夜晚还四处走动。

雪对声音有着惊人的传播能力。尽管脚步可能在十几米之外，但在我听起来，就好像有人在距离几英寸的地方踩踏地面。早上，我想知道我想象中的那个神秘的流浪者是瑞娜还是海伦。我发现海伦已经在帐篷外面，专心致志地压紧雪橇。

从她耷拉的肩膀可以看出她情绪很低落。“我想可能是运动饮料让我的胃觉得不舒服。”她遗憾地说。我认为这更有可能是抗生药的作用，但海伦不确定。“我可不希望是那样，因为我又要连吃十天了。”她叹口气说。那天，每当休息时，海伦都要去厕所，最后还是服药止住了腹泻。

这本来就已经够糟糕了，她又没有时间吃东西喝水，所以很难维持身体所需的能量。没过多久，队伍就出现了问题，出现了掉队的情况，她前面的队员已经放慢了速度，但她还是很难跟上。我在后面看到她滑得非常吃力，衣服挂在肩上，看起来很虚弱，一瘸一拐的。一天下来，她明显感到精疲力尽。

完成了五次滑行后，我让队伍停下来。队员们搭起帐篷，我离开自己的帐篷去找凯莉和瑞娜，并告诉海伦不要想工作上的事，好好在睡袋里睡一觉。我的口气很严厉，我希望她坚强，早点好起来，她很顺从地在帐篷里躺下了。



第二天早上，冷空气出现了，我发现海伦已经起床走动。她说，好好地睡了一觉后她觉得好多了，但她的脸色看起来仍然很灰暗。她皱着眉，表现得还是不舒服。“我认为你真的应该考虑停止使用抗生素了。”我建议。

“但是我的脚怎么办？”

我说之前本来是有些犹豫的，但我还是说出来了，表达了我的怀疑，我觉得她的脚感染了，现在抗生素已经对她起了不好的作用。

“海伦，我不确定你的脚趾是不是已经感染了。我想如果它真的被感染了，你应该更清楚。”海伦若有所思地回答道：“那好吧，今天我再看看它们怎样。”

我点了点头，但是一整天里，每到休息时我就看到海伦去伸手拿她的“路易·威登”，我很担心。这无形中给她的身体和心理增加了压力。那天晚上，我坐在海伦的帐篷里，凝视着她起泡的大脚趾。看到胶布绷带还结实地包裹着她的趾甲，我们慢慢打开绷带，可以看到下面的皮肤，还好，没有典型感染的迹象，没有发炎的红色，没有肿胀或化脓，尽管新长出的皮肤还很娇嫩，但是已经不那么疼了。

我们查看完，海伦坐起身来，沉默地看了我一会儿。“我要停止服用抗生素。”她果断地说。“我不能再生病了，太让人心力交瘁了。”我回到帐篷，感觉松了一口气。海伦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没有抗生素她能恢复，真是一个奇迹。第二天早上她骄傲地告诉我，她花了一个晚上，用我们薄片状的南极地图的一个小角加工成一个假的脚趾甲来替代她失去的趾甲。在这个假脚趾甲上，还能看到一小片纬度线和一个冰原岛的轮廓。

我们越过南纬87°，也被别人警告过要小心那里的雪脊。那里并不缺少雪脊，通常它们都有一人多高，而且非常大，大得从太空



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在雪脊上连续滑行了四五天，我们并没有用手举着雪橇，也没有严重偏离我们习惯性的直线形路线。即便如此，每个人都有点担心前方。

开始时，只有一两个显著的大雪脊，完美地弯曲着簇成一团，层层叠叠的像静止的海浪，又像大型雕塑的屏障。有时它们又形成一个斜坡，我们能够笔直地从上面通过，像爬上了一个漂亮的拱桥，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围着它们做简单的滑雪。

接着，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看起来很大的雪脊出现在另一边，我们完全被波涛汹涌的山峰和小型山脉所包围。不仅是山顶抬高了，而且低谷中的沟槽也变深了，很难在它们之间找到路线，我们要避开粗糙的地面。

“这就像要滑过一个巨大的冰冻泡芙。”海伦在休息时评价道，这个比喻使我大笑。周围的景观给我的视觉带来了完美的冲击。“我们已经进入了雪脊的土地。”她继续说。我不禁注意到她说话的语气就像末日使者的回音，让每个人都低头审视了地平线片刻。尽管雪脊不像以前报道过的其他季节的那么大（没人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大到足以从太空可见）。在艾拉看来，它们已经是足够大了，我们站成一行围着它绕行一圈比平时要吃力得多。

我们密切注视着南方，领航员已经挑选出一条路径，我们将穿越雪脊上的无数障碍物，大多数队员都能保持一条直线紧紧跟着前面，只在通过起伏不断的地面和出现大的上坡和下坡时才发生偏离。凯莉不遗余力地带领队员们绕过每一个小山包和雪堆，所以，我们滑行的轨道更像是飞镖飞出的波形曲线。

虽然每个人都很感激她努力地找到最平滑的路线，但大家也逐渐发现我们的行程比必要的路程多滑了数英里。我看见艾拉一天都在自娱自乐，她采取果断行动，滑到第二位。她忽视了凯莉煞费苦



心绕出的路线，而是直着滑行，撞到了雪脊上。开始，队员们不确定到底跟着谁——你几乎可以听到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声音——但最终整个队伍都跟着艾拉选择了较短的路线，而不愿意花费更大精力。凯莉在前面滑行，她还不知道后面的队员已经悄无声息地背叛了她。

不幸的是，再谨慎选择的路线也不可避免地碰到完全不平的地面。我们习惯于在地形急剧下降时，在冰雕的边缘伸直雪橇跳过去，就像跳台滑雪一样，我们称之为“企鹅跳”。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轮到自己时都有些犹豫，就像企鹅跳进大海一样，最终一次跳下。这个下降并未超过一两米，但它不是直接下降的，在第二次下降后，出现了一连串的锋利的像鱼鳍一样的冰片，四面散开。

如果紧跟着的雪橇上没有装太多的东西，大家都在认真地滑着雪，企鹅跳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在之前八个月的训练中，事实说明女孩中只有很少人见过越野滑雪。我害怕万一有人脚下打滑或是伤到了骨头，甚至更严重，伤到踝关节。而事实上，每一次，她们都能果断冷静地处理好棘手的地形问题，而且，考虑到她们缺乏经验，这真的很值得骄傲。

她们还是有一定技能的，但不够优雅。我们会把雪橇挤在冰里，或从雪脊滑出，滑到意想不到的方向，我们在努力帮助对方时，又会在匆忙中将彼此的滑雪板交叉在一起，把滑雪杆戳进脚里或是将安全绳纠缠在一起。

如果有的雪橇在企鹅跳之后被卡住，要防止后面的人不要撞到上面。不久前，在一种下降的地形就发生过此类情形，史蒂芬太热情了，第一个跳了下来，结果发现她的雪橇跑到远侧的沟槽里。由于无法调整自己，她摔倒了，她的头一下撞到地面上，我们都听到了碰撞声。在另一个雪脊处，艾拉误判了下降的高度，她的滑雪板前端垂直地插进脚趾前面的雪里，离开她的掌控，她摔倒了，一



头扎进雪里。

来到雪脊之地，无疑给我们的探险增加了难度。当我们到达最后一座小山的山顶时，我们每个人都恳求自己所信奉的神明，就是爬也要爬到南极去。当又一片呈现出褐色的脏雪出现在地平线时，我们感到了失望，它预示着远方还有一座小山。

我们爬到起伏不平的山地上，急促而猛烈地拉着雪橇上的安全绳，准备再次下滑，由于外力，我们的关节已经拉得非常酸痛了。

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的身体已经累到了极限。我们开着玩笑说着我们肌肉酸痛的事实，大家都觉得我们至少变老了两倍。虽是玩笑话，但其中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隐忧。我们刚刚滑完372公里，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到达最后的小山或雪脊，那将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伤害。

瑞娜在队伍的最前面，她停下来站在那儿，在头顶上交叉着挥动滑雪杖。其余的队员慢慢地向她周围集结，把她们的雪橇连在一起，形成一个临时性的长凳。我站在索菲娅旁边，发现她正从食品袋里拿出零食来吃。

“你怎么样？索菲娅？”“我不经意地问。

她抬头一看，耸了耸肩，“不太好。我必须小心我的膝盖。”我已经忘记，去年我遇见了索菲娅时，她曾做过膝盖周围韧带的重建手术。这是个重大的手术，尽管索菲娅很少提到它，我的印象是它的重要性在她脑海里远远超过她让我们知道的。索菲娅的脸藏在她的护目镜和面具后面，但她的语气让人担忧。“在这次探险中我担心每一步都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步。”她平静地说。我想了一会儿，来理解她话语中的含义，这令人寒心。崎岖的地面给她恢复中的韧带以巨大的压力，每走一步都带着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在我们短时间的休息结束前，我要想好怎么回答她。没有时间进一步探



测了，我们要改变路线，开始下一阶段行程，我在想着索菲娅的话。我觉得很可怕，没有及早检查她的伤。索菲娅是如此独立，这很容易让我认为她状态很好。我一直注意着探险队的队员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我并不担心崎岖的地面会给队员带来什么样的危险。直到了解索菲娅近期受到的损伤，索菲娅的表达不会有错。她的话题显然是非常严重了，她脆弱的膝盖很难承受得了雪脊如此持续的惩罚。我对索菲娅很了解，她的话没有一点戏剧性的夸张，她说的都是事实。

看着她在我的前面滑雪，我知道她滑的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我对索菲娅有绝对的信心，她没有任何失误的机会，但现在我很为她担心。我计算着索菲娅的短步幅，一天至少要走三万步，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危险的，我无法想象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一定很疲惫。我踢了自己一脚，是我没有照顾好她。

那天晚上当史蒂芬和艾拉拿着她们的“路易·威登”出去时，我抓住机会与索菲娅在帐篷里深谈了一次。我们交谈时索菲娅看起来很严肃，眼睛一直看着炉灶。她正用锅泡脚。“一想到家里，我就感到很大的压力，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她承认。“如果我不去南极，总统会不高兴的。”在她探险之前，索菲娅曾会见了新加坡总统并共进晚餐，我知道，对于这次探险，她的国家对她寄予了厚望，但是我不知道她的压力会这么大。

“别担心，索菲娅。我们一定会带着你去那儿，”我安慰她，“就算我们不得不把你放在一个雪橇上拉着，我们也会把你带到南极。”她想象着笑了笑，我想着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她会同意我们这样做吗。

我对索菲娅感到巨大的钦佩。她不假思索地加入了探险队，她有着不屈不挠的心灵力量。



索菲娅静静地看了看团队中的队员。对于她的决心她没有声张，但她的内心在经受煎熬，有时，这种坚定的神情会吓到其他人，对于索菲娅而言，追寻南极显然是她的梦想。

我在帐篷外遇到了史蒂芬，我们分类整理好四个雪橇，减轻索菲娅（减少在她的膝盖上的压力）和艾拉（她的体能严重下降了）的负担。

我们只有13天的食物和剩余燃料了，史蒂芬和我把剩下的重量分担下来，这样我们两人的雪橇都不会觉得太重，我不想让其他人负载，包括我自己，太重的话我们根本坚持不了。

回到帐篷里我告诉艾拉和索菲娅我们所做的，我担心她俩会不高兴。“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你们是无能的，我只是想确保你们两个都能到达南极。如果你们非要和另外七个人来分担重量，那你们才是愚蠢的。”我等待着她俩的反应。索菲娅耸了耸肩，“没必要这样。”她说话时再次转过身看着炉具，“我不介意，你想的总是最好的。”艾拉也很务实：“当海伦不舒服时，我们也是那么做的。”我诚恳地点头表示赞同，“没错。”我说。我很高兴她们用这种方式想问题。过去我与队员们一起共事，我们都认为接受别人帮助是软弱的表现，甚至为了不给别人添负不惜牺牲自己。我希望我们的团队保持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显示集体的力量。即便如此，我并不确定减少的体重会给索菲娅的膝盖减去多少压力，这个问题比她的雪橇所能承载的重量更危险。

“至少当我滑雪的时候，我有事情要思考了。”她笑了。

一个月后，我们在冰面上的行程已经超过了749.8公里，在我们的头脑里，这样枯燥的行进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一天又一天，我们都看着不变的景观，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

我们仿佛是在同一个视频中不断地循环。衣服的保护层令我们



透不过气，长时间看着冰雪会让人失明，多亏有护目镜。

我们被迫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思考是一种能力，我们通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它使我们勉强意识到，探险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忙碌的头脑和理智的神经。

在起初的一星期，我发现抽时间思考滑雪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经过近两年为远征疯狂的准备和计划，它最终得以成行。接下来我又为探险的后勤工作考虑着计划，我要在英国准备琐碎的资料，又担心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同时还为挑选探险队成员焦虑。那天，我又想到了金姆的很多事情，她的冻伤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仔细地回忆着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片断，把它们拼凑在一起，我想有些事情，如果我采取不同的方法，做了不同的事情，也许有些不好的结果就能从中避免。我的大脑迅速分析着一系列的事情，我作了一个探险的决定，为一些事情发愁，肯定了一些人和事，我知道我必须勇敢地面对未来。

最终，我大脑的兴奋劲儿不再那么强了，我将意识转移到脚上，按照节奏一步一步滑着，我只听到了我的呼吸声和心脏跳动的声音。渐渐地，我感觉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更令人冷静的境地，我开始思考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周围看不到什么景观，因此人们就可以审视自己的内心，一下子就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灵魂。这是我与自己内心的对话，虽然这让我很为难，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回忆起生动的细节。

有时，七分钟休息的时间一到，这种飘飘然的冥想就会被打断，不过也不错，可以让自己分散一下紧张的注意力。

然后，我开始思考我生活中的关键问题。从我读过的大学到我选择的职业生涯，然后是与相伴一生的男人。我想到如果我选择了其他的生活，可能我的命运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或其他的选择。



就像艾拉说过的：“南极会让你想到生活的交叉点。”这个过程是引人入胜的，但是感情上又颇费心力。对于我的家庭，我很少让自己想得过深或过多。我想到了我的家，它就像一碗粗麦粉中一个丰满多汁的橄榄，我贪婪地享受着它。这种感觉一下子把我带回了数千英里外的家中。因此后来我不愿意再去强迫自己回忆了。想着想着，我就会感到我承受不起这种孤独和思乡。

最后，在我32年生命中几乎没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用大脑去仔细地想过，而是用其他的事情填补了时间的空白。我用MP3专心地听着抒情歌，虚构着最近看过的电影结局，编造着写了一天的小说情节，或是编个小曲作首小诗，但我还是觉得我一直徘徊在空虚的边缘。我感到无聊是一种折磨，似乎在剥我的肉，它带走了我所有的意愿，我想停下来，对着外面的冷风尖叫。有时，我们要向着另一个90分钟出发，我意识到我的大脑完全是一片空白，我无法专注地思考一件事。我惊慌失措，马上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寻找有价值的想法抓住我的想象力。困难的是，我没有想到一件事值得我思考，这种时候往往会令人绝望。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来让大脑充实。大部分人都用MP3播放器作为最基本的第一道防线。索菲娅以前在上拳击课时录制了音乐，当我们滑雪时，她的常规活动就是摇着头听它们。看着她在我前面，有时我会一下抓住她，提起膝盖快速地顶一下她的胸部。

索菲娅还受到史蒂芬的挑战，她们用我们配给的最珍贵的硬糖打赌（索菲娅赢得了她的美味，她能唱46支歌）。史蒂芬尤其坚信，没有音乐和那修长的iPad的陪伴，她无法度过一天。因此，不知怎么的，我们再次补给后，她的iPad由于过度使用，不可避免地罢工了。史蒂芬非常沮丧，“我不能没有音乐，”她哭丧着脸说，“我会发疯的。”但她别无选择。在她第一个没有音乐的日子要结



束时，她阴沉着脸，一整天都是痛苦的样子。直到第五天结束，她的态度才发生了彻底变化。

“实际上我很喜欢它。”她承认，“有时我会迷失在一个思想的隧道里，而且那天有飞机飞过。”她犹豫地添上了一句。“我真想念它。”与史蒂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娜从一开始就不爱听音乐。“我住在德里，那里噪声非常大，没有人逃脱。能有六个星期躲清静，就是我的幸福。”她重点做了解释。我担心她可能会后悔她的决定，在第四个星期时，我们移动到冰面上。她发现的雪脊的形状让她浮想联翩，“今天我在雪地里看见了仙女。”她在探险日记中写道。我们开始担心她的理智是否清晰如常，另外，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想象力可以茂盛生长的地方。

太阳周围的光晕不停地跳动着，逐渐变成了环形的好似彩虹的光圈，好像把太阳用色彩包围起来，就像要把太阳从乳白色的缓慢移动的云层中保护起来一样。有时候，光圈套着光圈，这些光圈就像潺潺的流水几乎不能察觉，它们在天空中蔓延开来，好似数不清的同心圆一般。太阳光和太阳周围的光圈在我们身旁飘浮着，好像我们的守护神。

很容易想象，神就活生生地在这里。南极是地球上唯一可以与神面对面的地方了。艾拉一定发现了南极洲是一个精神的世界，用时间去“祈祷和思考怎样成为一名更好的伊斯兰”，我们所有人都越来越喜欢真实而虔诚的艾拉。艾拉把为我们解释她所信仰的宗教视作乐趣，而且晚上在帐篷里会抓住任何机会给我们讲关于她所信仰的宗教的任何有趣的、值得关注的，或者著名的事件。结果我们发现，经常会变成我们讨论自己的想法和人生观。有时候我们讨论得非常激烈，以至于我们突然意识到已经过了睡眠时间而感到惶恐，激烈的讨论已经让我们浪费了宝贵的睡眠时间。我们开玩笑地



称自己称为“帐篷里的信徒”。听艾拉的见解是令人着迷的，因为这与我自己的生活完全脱离。我把生活视为最宝贵的礼物，我很厌恶那些轻易地粗鲁地对待生活的人。我感到艾拉已经知道她打扰到我了，艾拉把我们的讨论视为对她的信仰的一种测试。我猜想如果艾拉的观点在探险活动中没有被颠覆，那么艾拉一定认为这是她作为伊斯兰的强大力量使然。

在一段休息时间中，索菲娅沉重地坐在她的雪橇上，与在她旁边停下来的凯莉安静地聊着天。我听不到她们具体聊些什么，但是从她们的肢体语言上能看出来，肯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我朝她们滑过去的时候，索菲娅挥舞着手臂引起我的关注。“我的胸口感觉很紧。”索菲娅解释道，“就好像惊恐发作。”

“我觉得这可能是高原反应。”凯莉提示。

看来我们无休止地呈波浪形的滑雪攀登给我们带来了三千米以下的高原反应。尽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登山运动，但这里可能让我们感到两千米以下的高原反应。在上个月，我们已经逐渐地到达了这样的高度，因此我没有预料到我们能受到高原反应影响，但最近我发现自己在滑雪的时候也变得上气不接下气，很难确定这是因为精疲力竭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从一阵短促的呼吸中惊醒。我惊恐地呼吸着，担心自己就要不能呼吸了。这是我以前发生高原反应的一种感受，现在看来索菲娅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凯莉比探险团队里的其他任何一位成员都更了解高原反应，她建议我们如果感到呼吸短促的话，应集中注意力在呼气上，而不是将注意力仅集中在吸气上。当我们继续向上攀爬的时候，空气不再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达了高原的极地面，我们在南极洲中心的一个开阔的高地上——它环绕包围着南极点。我们所到达的极地高原平地让我们感到了很明显的温度下



降，而且强劲的大风径直向我们吹来，打向衣服，好像衣服已经不存在了一样。这样的变化让我感到很吃惊，我们是那样不堪一击。上个月温煦的天气已经不再，随之而来的新的天气状况暴露出我们团队薄弱的一面。史蒂芬习惯不拉她长裤上面的拉链，因为这样可以让她大腿很好地透气，没拉拉链的这段皮肤只穿了一条薄薄的保暖裹腿裤，现在她在她的大腿上发现了又红又痒的肿块。她的血管由于长时间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而循环不畅，形成了冻疮。艾拉也在她的脸上发现了一块发炎的红色突起，那是寒冷的大风由护目镜和面罩之间的空隙吹进来而造成的皮肤发炎。这给我们团队里的所有成员提了一个醒，在探险活动出发前，要格外注意检查面部防护。我发现要保持鼻子的温暖尤其困难，而且把额外填料例如羊毛料填充在面罩里面以保护鼻子免于冻伤也很困难。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发现，戴着护目镜逆风行进是非常困难的。微小的水蒸气会立刻冻住，而且越冻越大，越冻越多，在护目镜和眼睛之间慢慢向里延伸。我们已经习惯了透过结满冰晶的镜片看扭曲的世界了。

我们的面罩逐渐变得扭曲。呼吸带出的水蒸气冻结成的冰在我们的面罩里面，让我们很不舒服，而且让我们时刻面临可能得冻疮的威胁。当我们攀爬雪脊的时候，不可能腾出双手去擦脸，所以我现在已经能够很熟练地用舌头将脸上的东西移开，或者确定面罩后面的脸颊没有被冻伤。凯莉提到她也用过相同的方法，随后整个团队都开始迅速传播交流这一“技术”。瑞娜描述她是怎样将热空气向上吹的，要像一个蒸汽机一样噗噗地吹，这样可以温暖她的鼻尖，或者将护目镜上的冰层吹出一小块地方，从而看到外面清晰的世界。当有一天晚上我发现史蒂芬用小铁片伸进她的面罩中去清理冰层时，我意识到事态有些严重。“我也不想像这样把铁片放到里面去，”史蒂芬解释道，“这会把流下来的水弄得到处都是。”



冷空气似乎要把云朵也冻起来。就像一个美好的梦境清醒了一样，这一层冰晶是不可能让我们直接看到外面的世界的，它们在我们的视野里就像白色的噪声一样让人心烦不已。我们已经习惯了幻日和太阳的光晕，“这就像从天而降的祝福一样。”瑞娜说。我喜欢这样的描述，因为这会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舒适感。但是，在那天过后，我们的祝福就已经消失殆尽了。

当三个跟我同住一个帐篷的伙伴在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把双腿蜷缩在胸口以便给她们腾出空间。我坐在帐篷里，透过火炉发出的噪声，听到了朝着我们帐篷方向而来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凯莉透过帐篷喊道：“好幸运啊，你现在有时间吗？”我从她的声调中听出来：肯定有什么事不对头。凯莉在帐篷外面，她的夹克外裹了一层衣服，她把夹克拉得很紧，而且在夹克下面还戴着一个帽子。她的脸颊和鼻子都冻红了，她的手指蜷缩在手掌里。看起来，凯莉在外面已经有一会儿了。“不要惊慌，”她说，“我雪橇上的燃料漏了。”我慢慢地吸了一口气。凯莉带我绕到她的帐篷，在那里，她雪橇上的物资全都散落在雪地上。“我检查了每一样东西，燃料漏进了口粮包，但并没有对面条产生什么影响。于是我把面条拿出来，把其他的食物重新打包，然后确认再没有被污染的食物了。”凯莉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应。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所有的燃料罐都用特殊的胶带固定在螺纹线上，为的就是防止泄漏，而且都被塑料袋独立包装起来，再把它们放在一个二层塑料袋里一起携带。食品也用它们自己独立的塑料袋分开包装，而且是按照每一天的量用密封袋独立包装的。因此，应该有至少四到五层的塑料袋来进行分别保护。理论上，这种方式阻隔了任何的交叉污染。在四人帐篷小组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把食品和燃料同时放在一个雪橇上。当艾拉发现她的燃料有轻微泄漏的时候，我就要求队员们每天早上都要检



查她们的燃料罐，在此前的几天，凯莉在帐篷四人组里并不是经常携带燃料罐的那一个。“我确实检查了，”凯莉自我辩解，“我发誓今天早上它们还是好好的。”我在思考，我们今天早上穿越了很多大的凹凸不平的雪地。很有可能是，雪橇在颠簸不定的坑洼雪地上不断地撞击，所以燃料罐的盖子松了，泄漏的燃料透过不同的防护包裹层最后污染到食品上。“很幸运，正餐放在她们自己的锡箔纸密封袋里。”我边想边自言自语地说。凯莉扮了个鬼脸。“海伦已经把她一少半的面条吃了下去，”她说道，“因此她的胃里充满了燃料。”

“那可真令人恶心。”海伦从帐篷里出来说道。我没有意识到海伦和瑞娜都在听。我举起其中一袋面条，把鼻子凑过去闻，有很明显的燃料味。“每一包都是相同的，除了这两包。”凯莉说。面条通常作为我们摄入卡路里的额外补充，很不幸的是，瑞娜、海伦和凯莉失去了这个身体能量的额外补充，但是，我们会从其他帐篷拿出一些面条与她们分享，以便把她们的能量损失降到最低。这次损失是不妙的，但她们也不应该受到批评。

“好的，现在看来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够做到的一切。”我说，“只要我们能够按时到达南极点，那么你的食品就不会用完。这只不过给我们一点点压力而已。”我对她笑了笑。

留下凯莉在那里独自重新打包她的食品，我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习惯性地角落里休息，拿出团队的笔记本计算着我们的英里数。尽管损失了一部分面条，但是我们仍然有充足的食物供给，一直可以供应到第38天。如果我们继续保持上周行进的公里数，再停下来休息一天，我们将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犯错误，但现在时间是充足的。这时，一些数字不断地冒出来，某种第六感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我突然意识到在数字上我犯了错误。



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全新的纸，开始重新计算，用GPS精确地重新检查我们究竟离南极点还有多远。加上我们的目标公里数，我惊讶地发现最后的数字让人害怕。突然而来的惊恐已经刺向了我的指尖，让我措手不及，我再一次核实目标公里数，逐日地审阅活页纸上的数字以确定我并没有犯错误。我放下笔记本，受挫般地把手指插在头发中来回搅动。毫无疑问，与我计算出的公里数相比，还有额外的20公里，我们才能够到达南极洲。20公里看起来似乎不多，但是却相当于我们要滑冰一整天。我不理解这些公里数是怎么被落下的，但是它们确实是被遗落了。另外，对于受污染的食物和丢失的早餐包，还有额外多出来的滑冰天数，都让我们的行程表变得越来越紧张。

第二天，当我们在滑冰的时候，我思考着我们的选择。为了能在我们把食物消耗殆尽前到达南极点，我们需要每天滑行更多的公里数，同时减少食物供给，节省出来的食物用作多一天的食物供给，或者牺牲掉我们计划好的12月25日的休息时间，用这一天来争取多出来的20公里。这些选择里没有一个是受欢迎的。

虽然我们已经滑冰超过了一个月，我们的团队还要与每天消耗的食物供给相对抗，但是我希望她们每天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营养摄入。艾拉已经显示出了劳累的迹象，我担心海伦和索菲娅也会紧随其后。我还不甘心放弃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的斗志也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需要休息，这些都是问题。我知道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心里开始为我们十二月的圣诞节“假期”倒计时了。最主要的是，大家都想躺下来休息，享有一个完整的一天，而不用像平时一样强迫自己从温暖的睡袋中起来，去零下几℃的外面痛苦着冻着。我不确定把我们前面悬挂着的“大萝卜”作诱饵，女人们能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到底有多大。这促使我们每一天滑冰都变得很有动力。物资

补给过后，我们已经滑过了370公里，同样，距离也在我们的身体上显示出来。我现在不想太过用力，早早把身体推向极限。我们所有人都听说过几年前有个团队被营救的故事，他们在离最后的目的地只有不到185公里的地方停止行进了。我心里在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太着急。

在我们周围，阴郁的一天照进了几缕阳光，看起来像剧院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当云朵中的缝隙逐渐变大，露出靛蓝色的天空的时候，一个光环出现在了太阳周围，凶猛地放出耀眼的光，与幻日融为一体。这让我想起从玻璃建筑物上反射回来的太阳光。在这些明亮的点上，光环出现了分叉，好像在向四面八方微笑，光芒碰在一起就好像在亲吻。我为此着迷，我发现每个人的眼睛都紧紧盯住这闪耀的光芒。悬浮在空气中的冰晶再一次包围了我们。我直直地向上盯着闪光的隧道，发现了一处新的闪着太阳光芒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所有幻日和太阳光晕现在都分散开来呈七彩状，现在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光环伸展开来，与太阳呈一个平面，好像太阳变成了一枚暗淡的戒指上闪耀的钻石一般。我惊愕地盯着这一过程的实现，注意到水平面上的光晕已经镶上了白色的光圈，就好像行星。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盯着太阳看了太长时间，以至于这些映入视网膜的东西比天空中的实际景象要夸张。但是当队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问瑞娜：“你能看到那个景象吗？”

她使劲儿地点着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瑞娜充满敬畏地说。

那天晚上，整个团队硬挤进了一个帐篷里，我直截了当说出了关于我们落下的公里数的事情和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我需要你们：所有的问题完全是我的责任，包括你们是怎样的感受，以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在一个月的努力后，我们已经行进了这么





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很羞愧，让大家受到这样的打击。这种感觉让我很绝望，其实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去纠正这个错误。”

帐篷里鸦雀无声。艾拉环顾四周，看看周围是否有人想站起来说些什么。“实际上，我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跟你一起过圣诞节是个错误。圣诞节是基督徒的节日，而我是一个伊斯兰。因此，请每个人不要给我圣诞节礼物，不要祝我圣诞节快乐，或者给我特殊的食物。”

我皱着眉，这样的想法让我很吃惊。“艾拉，我们没打算在一个帐篷里开派对，而把你独自留在另外一个帐篷里。”

“我已经在想这件事了。我想如果我有摄像机的话，我会把你们都拍下来。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可以跟大家留在同一个帐篷里的理由，但是很显然，我不能留在这里庆祝圣诞节。”

我叹了口气，我不喜欢这样的主意。我不想跟大家争辩，因为这看上去似乎很不团结。讨论继续进行，问题最后似乎归结于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

“我希望提高效率。”瑞娜说，“休息一整天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没有必要的延期。我足够强壮，可以不用休息一整天而继续行进。”当每一名团队成员轮流表述她们的观点的时候，大多数人似乎同意瑞娜的观点。

最后，我转向索菲娅。多数情况下，探险队会在索菲娅的建议下变得更凝聚。我非常重视索菲娅的判断。她想了一会儿，垂下眼帘，说：“我想我们应该继续行进。”

对话仍在继续，但我的思绪已经收回了，我在想刚才自己说了什么，以及整个团队放弃一整天休息这件事。我突然意识到该轮到我了。

“好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我们可以在没有一整天

休息的情况下继续行进，但是如果我认为大家需要休息的话，我会在接下来的一天做一个简单的休整。大家觉得这样可以吗？”我轮流看着每一位队员，等着大家点头同意。

“我想要大家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匆忙，只要我们按照计划行进，就会有充足的食物。我们不需要匆忙。我们所需要关心的事情，永远都是确保大家舒适和健康。”我看了艾拉一会儿。“对于圣诞节，我认为如果不是大家都能在一起，那就不适合庆祝。我认为圣诞节对我们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一天。我认为我们可以一起吃，但是那是在我们抵达南纬89°时的庆祝活动上，无论如何，那都是艾拉能够参加的活动。艾拉，这样可以吗？”她似乎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点了点头，说道：“好的。”

当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我趁机离开帐篷。在弯腰驼背地待在帐篷里几个小时后，到帐篷外面直立起来让我感觉很好。我眯缝着眼睛，雪地上回映的光和吹来的冷风一起打在我脸上，让我的双眼立刻流出了眼泪。我看了一眼太阳，但是这一整天都让我着迷的光晕此刻已经消失殆尽。太阳在天空中是孤独的，在漫无边际的茫茫天空中显得那样孤注一掷，就像我孤独地站在极地的平原上一样。



最后的征途

第 12 章

“圣诞快乐，索菲娅。”我终于叫出声来。

“圣诞快乐！”她回应着我。

“艾拉也快乐啊。”我小心翼翼地补上一句，我没有再说别的圣诞祝福的话。她笑着说：“你也快乐啊，费利西蒂。”

“圣诞快乐，索菲娅和费利西蒂。”史蒂芬几乎是躺在睡袋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都笑了。我们都已经习惯，史蒂芬最能在早上偷懒了。帐篷里充满了明亮的橙色光，这个迹象表明今天又将是一个晴天。

我把睡袋放在一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还是有些冷，但不是那么糟，比我预期的要温暖些。到达极地高原以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天气。这时，帐篷外响起了嘎吱嘎吱的脚步声。

“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唱着熟悉的歌谣，美妙的歌声在空中回荡。

凯莉站在帐篷的厨房处，红着脸颊，甩着金色的发辫，咧嘴一笑。“现在是新西兰的圣诞节，但是已经很晚了，我能不能今天早





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而不要等到晚上？”她问。大家都同意在圣诞节就不休息一天了。我们曾经通过决议，允许在一个固定的周期内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

史蒂芬把卫星电话递到凯莉的手中，凯莉拿到电话马上消失了，她的脚步在雪中吱吱作响。

我看看表，想象着我的家人一定会聚在狭窄的厨房，为一个迟到的圣诞节计划早餐和午餐。年复一年都是重复的活动，他们会抱怨弟弟和妹妹在房间里播放嘈杂的汉德尔的音乐。

我的父亲会在厨房的尽头忙碌地检查焙烧了很长时间的火鸡，我的妈妈穿着闪亮优雅的衣服在房子里往木质餐桌上点着有香味的蜡烛，准备午餐。我渴望回家和他们在一起。

那一刻，毫无疑问，简单快乐温暖舒适的家才是最美好的地方。相比之下，我们追求的南极似乎只是一个空洞的和毫无价值的虚荣心罢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自己这种带有讽刺意义的反常心态震惊了。在家时，我就考虑着下一次冒险，南极的刺激使我不断回忆着南方的奇观。但是现在，在这里我最大的愿望却是坐在那间装满奇妙装潢设计的屋子里，围着温暖的火炉享受食物的美味，这对我很重要。

相比之下，现在我知道我正在一千英里之外进行远征，我感到寒冷、肮脏和痛苦。

“你好吗？亲爱的。”我的妈妈用温柔而又平静的声音问候着，她告诉我这个电话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她的声音激起了我所有的情绪，我下意识地抑制住胸中涌起的激动，此刻我不能说话，就像我的气息已经离我而去，我想说话，但是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咳嗽，我觉得我都快被压抑的情绪勒死了。我意识到史蒂芬、索菲娅



和艾拉还在我的帐篷中，于是，我巧妙安排她们忙着做些家务，而我则靠墙边站着，这样她们就看不到我的脸了。

我恢复了我的声音：“你好，妈妈。圣诞快乐。”我静静地擦掉不必要的眼泪，但我无法止住。“我希望我能和你们所有人在一起。”

“我知道亲爱的，我们都太想念你了。”我察觉到泪水挂在我的脸上。母亲告诉了我家人的消息，这才填补了沉默的压抑。

我的哥哥把电话接过去，用他低沉嘶哑的声音给我念了圣诞赞美诗，我的妹妹打断了他，和我激动地讲着这次探险，“我们一直关注着你们的网站，你们都做得那么好，我为你们感到骄傲，费利西蒂。”

我想回应她，但我的喉咙变得肿胀，脉搏一直疼痛，声音哽咽。泪水顺着我的脸流淌，来不及擦干。我的鼻子开始抽搐。通话结束后，我坐在一旁发了会儿呆，电话还在我的手中。我擦干脸转过身，拉上我的靴子，迈着步子走到门廊。史蒂芬凑过来，我停了一下，她问我是不是很好。我咧开嘴朝她笑了笑，感激地点了点头。

虽然现在回家是不可能的，但说到我的家庭我就充满了决心。他们提醒了我，真正的费利西蒂正在领导着一支探险队。“五天，”我对自己说，“再坚持五天。”

圣诞节那天，是我们的第34天，这原本应该是在滑雪板上度过的漫长的一天。

最后在帐篷里，队员们都沉默了，我们集中精力尽快将工作完成，急于回到温暖的地方。我们终于可以除掉口罩和衣服上的冰了，感觉就像我们在监狱待了一整天。没有人有更多的能量去庆祝，但我们还是聚在帐篷里一起吃了饭。我准备了我最喜欢的食物来款待大家——这可能是我生活中唯一一次在圣诞晚餐中吃鸡肉沙拉。



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海伦用睡袋制作了一棵圣诞树，上面还挂着深蓝色羊毛长袜，还用我们的维修工具缝上了红色的棉花。每一只长筒袜上都有一个队员名字的大写字母签名，里面还有一个小卷纸。“每个人都有一个。”海伦骄傲地说。

“你是什么时候做的？”瑞娜充满敬仰地问。海伦回答：“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袋里做一点。”

瑞娜睁大眼睛，张着嘴看着她。没有人能想象得到海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精力来保持清醒做这些不必要的事情，还要费尽心力把小片的羊毛缝制在一起。每天晚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头一着地就睡着了，几乎没有精力交谈。她做了一个非常激动的手势，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哇，看看小长筒袜！”史蒂芬喋喋不休地说。我忧虑地看着艾拉，担心这个手势会违背她有关圣诞节的规则，但她的双手使劲地鼓掌，她的脸上挂满了兴奋。“我有吗？”她问，她在树的后面，因此没有第一时间看到。

“海伦，这太棒了！”凯莉热情地说。坐在海伦身边，凯莉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注意到海伦站起来说，“嗯，我就是这次旅行中一个怪人，我只想对每个人说谢谢，感谢大家一直容忍我。”

艾拉是第一个从袜子中打开卷纸的，海伦用铅笔为她写下以下的句子，每封信的开头，都有一个以她的名字开始的字母：“艾拉，她能轻松地任何道路上滑行，能从容地滑过雪脊顶端，在她的面具、护目镜和夹克下面，永远是她那灿烂的笑容……”

我觉得我在我们友情的包围中完全放松，我被这七个超现实主义的女人震惊了。圣诞节晚上，我们坐在帐篷里，穿着40天来一直穿着的旧衣服，敷上脚部药膏，一起大笑着。尽管因海伦的礼物分散了注意力，但是一想到第二天还要继续探险，我们就急于想让自



已睡觉了。我们很快地在帐篷外围着装饰一新的圣诞树合影留念，然后钻进了睡袋。

极地高原没有辜负它的名字。我们攀过了一座座小山，尽管它的斜坡不像以前那样明显，但它那起伏不平的地面还是令艾拉愤怒。

“它们应该被叫作‘极地碗’或‘极地驼峰’！”她怒气冲冲地说。

“显然不是极地高原。”至少我们已经离开了雪脊之地，没有人清楚地记得雪脊是何时消失的。但现在它绝对是平滑的。感觉更像在颗粒状的雪制地毯上，上面散落的水晶闪着白色的光，异彩纷呈。如果斜着看过去，我几乎可以想象我们是在一个巨大的加勒比海滩上滑雪，地上散满白色的砂而不是雪。雪地中的小块晶体开始起伏不定地出现，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在一个旧羊毛毡上垂直跳动。不久，这些冰花蔓延到整片地面，这样的地面就像一只猫舌头上的纹理。

风继续吹着我们的脸，尽管我们已经很小心地做好了防护，但还是免不了开始出现冻疮。每个人都穿着探险初期刚得到的羊毛罩衫。在休息时，史蒂芬喝了点水，水溢出来，洒到脸上，结果她的面罩和嘴边结了一圈的冰。滑完几段路程后，她开始抱怨着下巴越来越冷。

排在后面的凯莉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把备用手套遮在史蒂芬的脸上，这样就把她的下巴重重围住。史蒂芬非常满意，从侧面看，她的身影就像布鲁斯·福赛斯（英国著名的电视表演艺术家）。看起来非常可笑，但她并不在乎。艾拉也在苦苦斗争着，我注意到她总是一次又一次落在后面。我滑出队伍想滑到她身旁，我累得喘不上气，突然变化的高度偶尔让我吃了一惊。

大腿使劲用力推着我慢慢赶上了艾拉，她的羊毛外套里穿着



前一天我借给她的防风衣，“我很好。”当我与她滑到同一水平处时，她回应我。“只是我有点累了。”我偷偷地从夹克里拿出GPS，查看我们的进展情况。今天进行得很慢，已经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可我们当天的目标仅完成了一半。

“如果今天要达到目标，我们就得加把劲儿。”我温柔地说，“如果你还有力气，你认为你能做得到吗？”艾拉点点头，开始缩小和前面队员的差距。

现在已经开始感到冷了，我们要做好保暖工作。当我们停止滑雪时，每个人都很担心会不会马上冻成冰人。大家都使劲地拉严羽绒服，休息时，我们不再做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工作，我们摘下面罩吃东西喝水都会觉得温度低得令人不安，最后，我们方便完，继续出发。

休息之后，手指上的关节因为寒冷而感到发麻，我们滑起雪来，我们知道我们很快会让自己温暖起来，我很高兴瑞娜带领队伍进入了一天中的最后一段行程。她比起其他人更有一种特殊的技能，她能够控制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节奏，从而让大家很轻松地滑得更远。我知道我可以依靠她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滑过3.7公里——这能使我们达到今天的目标。

瑞娜没有让我失望。当我们完成最后一阶段行程后，我瞥了一眼GPS——从我们的露营地到这里一共滑行了28.2公里。如果另外的四天我们都可以像这样，我们将会到达极点。史蒂芬放下她的雪橇在我身边停下，把胳膊和腿放倒，身体向后倾斜，转过头，一脸的疲惫。随后，当我们搭好帐篷，她拉下面罩，露出下巴和脖子，之前它们已经冻伤了，现在伤处的皮肤变成深红色。她从水瓶里倒出些水敷在伤处，皮肤没有起疱，所以冻伤不是很严重，但它的传播就像一大片胎记，她要防止它变得更糟。当史蒂芬边照镜子边仔细



地检查她的伤处，开始她吓了一跳，后来就放松了许多。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离开帐篷，经过一夜，坏天气已经离开。我帮史蒂芬把绷带包扎好。急救箱里的大部分绷带都用完了，基本上都用于覆盖水泡了，因此我们只剩下粘胶带。我用力把它们扎好，这些胶带会黏在皮肤上，“就像糊上一层黏土。”史蒂芬开玩笑说。所以在它们粘在一起前，我不得不一层层地把它们分开。

当她的脸逐渐露出一半的时候，我们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它看起来就像下巴上了锁。我们赶紧转移了注意力，突然艾拉在帐篷的另一端爆发出一声大叫：“天哪，我的面罩冻在你的脸上了。”史蒂芬和我看着彼此，吓了一跳，又一阵大笑。艾拉困惑地抬起头。

“我想我没有听到你的诅咒。”史蒂芬笑着说。

“但我们把像个战士的你送回去时，你的丈夫会想到什么？”艾拉假装威胁地笑着。“他一定看起来很生气。”

当然，理性让我知道这时放松还为时过早，但我期待着看到有证据表明南极点就在我们的前面。我忍不住看向地平线。

南极点不是一个没有标记的位置，现在南极最大的科学考察站就在那里，它是1957年美国人在南极点建立的阿蒙森—斯科特站。夏天，有超过三百人在基地工作，冬天人数会减到一百多人。尽管我们离科考站太远而无法看清，但是我们好像看到了它的边缘、建筑或是车辆的轨道。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不是唯一一个不安地看向地平线的人。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那种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如此接近却又是那么遥远”。在地图上，我们距离南极点几乎不到一个手指的宽度。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已经到那里了。

自从离开海岸，我们穿过了南纬89度线，又多滑了6.5度，最后我们似乎超过了一小点预定范围。在最后阶段，我们还要滑行一个完整的111公里。



面对这个挫折，我们现在已经很不耐烦了。我知道队员们已经做起了白日梦，我们已经到达了南纬90°以南。我们曾被警告过：作为一个不正规的非科学探险队，不允许我们使用任何科考站里的设备。但这并没有阻挡我们幻想着冲水马桶、新鲜食品，甚至洗一个淋浴。

有更实际的理由需要我们急于完成探险，那就是我们开始减少必不可少的物资供应了。我们已经开始定量配给牙膏，因为它已经快用完了，厕纸也亮起了红灯，一些人现在都用空食品袋来代替路易·威登“方便包”了，因为它们也已经用完了。

第二天感觉就像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我们每个人都抑制不住地兴奋。距离南极点只有37公里了，我们都希望在接下来十小时的滑雪后能看到一些车站的迹象。这是平静而阳光明媚的一天，这样的天气，我们通常会脱掉外套和护目镜，但这里明显比以往更冷。休息后，我几乎没有时间让自己完全变暖和就再一次停下来。滑雪时，手指有手套的保护，因此避免了冻伤的风险，我的脚趾在靴子里不停蠕动，使我能够感到它们都还在。休息时间里没有人交谈，大家聚集在一起，使彼此保持温暖。我嚼着爆米花，查看着地平线。当我意识到我看到一些东西时，我咀嚼的速度放缓了。

在离我们一定距离外的地平线上有一个暗沉的长方形，白色的圆屋顶发着亮光。在继续查看之前，我的视线移开了片刻，我安慰自己说，也许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探险过程中我们已经见过遥远的雪脊形成的各种形状。可是这个矩形太完美了，也许是影子或海市蜃楼，有时白色的圆屋顶很突出，但那不过是另一块冰。但这个长方形的形状绝对是人造的，我看到了南极点。

我之前没有对任何人说，“伙计们，还有谁能看到那边的东西？”我举着滑雪杆指着那个形状的方向问道，其他人随着我的指向



移动了视线。我的另一只手打开GPS，南极点离我们只有22公里了。

凯莉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她非常高兴地挥动着双手，拖着滑雪板向我走来，一下搂住了我的脖子。“我们成功了！”她大叫道。瑞娜感到沮丧：“在哪里？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我弯下身子搭着她的肩膀，让她的眼睛顺着我的滑雪杖的指向看去，我引领着她的目光看向右边的地平线。“噢，噢，哦，是的！我看到它了！”我们三个人试图找到这个形状附近的地标，以使其他人到最后能找到它，但直到最后她们也什么都没看到。

海伦沉默着。“在这里，这很容易让人误解成任何雪脊的阴影。”当我们滑雪时她怀疑地说。我向我们看到的形状处移动。过了一会儿它们消失了，我很担心那是我想象出来的。最终它们重新出现了，我意识到，事实上我们是正在起伏不定的山上滑行。我们站到高处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基站，但当我们越过中间的低谷时，它又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当我再次看到南极点时，注意到在长方形的远处还有个白色的形状，它应该是另外一个建筑。

我的眼睛被如此短暂的风景惊呆了，我的脖子开始发疼。我强迫自己把目光移开，每隔十分钟我就会朝基地的方向看过去。这样持续了大约30秒，然后眼睛又自动地向长方形方向扫去。它看上去更清晰了，它的边缘似乎是一个塔，或是一片在空中盘旋的云。

我们周围的黑暗的矩形已经消失了，当我们接近滑行第五天的时候，不仅有一个清晰的建筑物在我们前面，还有几个球面圆顶和至少一个附属建筑物。

“所以，还有谁看不到吗？”在我们一起休息时我大声喊道。

尽管有太阳光的照射，艾拉一整天都感觉到很寒冷。她已经戴上了我给她的大大的棉手套，这副棉手套是我们打包在雪橇里应付紧急情况。我注意到艾拉在我们休息后准备继续行进时，还是花



了足足五分钟用拳头向天空击打着，以便促进血液循环，温暖她的双手。在这一天中，海伦几次掉队。从索菲娅脆弱的肢体语言中，我读到她一直在关注她的膝盖。

在我们停下来休息之前，我考虑着我要做些什么。我们的滑雪一直以来都有第三条腿的帮助——滑雪板，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距离南极站的VHF电缆还有将近6公里的长度（VHF是整齐排列着的钢制桅杆，作为电缆，悬挂在极地高原上）。一旦我们到达电缆的末端，我们就可以进入基地，到真正的南极点了。从电缆末端到基地的距离估算尽管有一些模糊，但是爱国者山的史蒂夫说，这大概需要我们额外再滑雪7.4公里。在一天中滑雪13公里听起来并不算多，但是这需要至少额外滑雪三小时。加上本来就寒冷的天气，额外滑雪13公里看上去是我们一个不必要的压力，而且会使我们的团队精疲力竭，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探险活动来说，一点都不需要着急。我希望队员们更多地去享受我们抵达后的喜悦，而不是匆忙行进后由于精疲力竭而让最后一刻变得了无生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抵达南极点，我也不想在南极站的外面露营。我们需要坚持我们的决定。当GPS系统显示我们距离电缆的末端还有6公里时，我正在沿着直线滑冰，在史蒂芬的旁边停了下来，她正在带领队伍完成今天最后的滑雪任务。建筑物出现在地平线上，大而明显。

“我今天不想滑雪了，你们是怎么想的？这里是适合我们最后一晚停留的地方吗？”我们同时瞥了一眼在湛蓝的天空中闪着耀眼光芒的太阳，太阳被奶白色的云彩包围着。在我们的左边是站点不熟悉的颜色，右边连续映入眼帘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蓝色和白色。

“这简直太完美了。”史蒂芬回应道。

当我向团队的其他成员报告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正像平常一样



准备停下来休息，这次没有意见不合的窃窃私语声。团队成员们似乎对这个决议感到很满意。

“今天我不能再滑雪到更远的地方了。”索菲娅说，“已经够远的了。”“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度过自己的最后一晚简直是太好了。”海伦说。尽管如此，当我们像往常一样开始搭帐篷的时候，我不禁向遥远的站点瞥了一眼，考虑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向前推进。

索菲娅在写我们团队的旅行日志，这是很少有的事情，但是第37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她这种记录的动力不是来自我们即将接近目标，而是因为今天是她37岁的生日。“愿我们在滑雪的最后一天有个好天气，尽管我们都身心俱疲了，但我不能要求有个比在南极洲和一个很棒的团队去庆祝生日更好的方式了。”她记录道。在第38天，一觉醒来，我们都知道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在这个慵懒的早上，我们都若有所思。当我们收起帐篷和雪橇的时候，整个气氛都很轻松。尽管一路欢声笑语，我注意到其他人偶尔会驻足并凝视我们的目的地，我也情不自禁地像她们一样。蒸汽的云雾在上空轰鸣，我丝毫无法察觉脚下的移动。我感到胃部有一种焦虑的纠结，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如此紧张。我们打包完毕，像往常一样出发。在即将结束之际，海伦仍在导航，按照GPS箭头所指的方向在前方带路。

在左边，站房离我们渐行渐远，看起来并未变得更庞大，而我们的右面，一个大黑点出现在上空。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被我们前面的队伍竖起的雪橇，这表示我们还需要继续前进。我们都看到一个深色形状的东西缓缓向我们移来，它越来越像一个大力神，一个好似有着肥硕肚子的运货飞机就这样飞进了南极洲。当我们滑雪的时候它似乎从我们的正前方扫过，但实际上它可能已经飞到几千米开外了。它滑行得非常可笑和缓慢，在雪地上留下了一条看起来



很狭窄的蓝色带。我很想知道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否已经发现了我们，在他们飞行的下方是一串七个小黑点连成的一道线（就是我们）。当这架飞机融入至我们视野底部并消失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声微弱的机械轰鸣声。很烦的是我的护目镜雾蒙蒙的一片使我没能看清。在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的眼镜影响了我的视野之前，我还笨拙地用手指顶了一下护目镜的边缘以试图看清楚，但后来才发现其实是一片薄雾已经笼罩了视野底部。薄雾慢慢变多，蔓延到天空直到在幻日外出现，这景象就像是漫画师强调的钻石的闪耀一样。这个景象让我不自觉地微笑，我喜欢有幻日和光环一直陪伴我们度过了38天的南极之旅。

我们停下来开始休息，这时史蒂芬开始带队了。她不再需要GPS了，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明显的黑色标志，标出了我们要奔向的地方。史蒂芬在这次南极之行中给了我们清晰的指向，但是当我们接近极点的时候，史蒂芬放慢了滑行速度。我滑过去站在她的旁边，我们都拿下了护目镜以便观望到更好的美景。

在我们前方偏左的位置能清楚地看到大本营。在大本营前面是很宽广的一片雪地，貌似覆盖了整个河床。但是在我和目的地之间是一片彩色的旗帜森林。我先以一个最近的绿色旗帜作为起点，试图寻找一条路径，但总是被另外的线路打断，一片交叉的旗帜看起来总是错综交织，彼此间毫无联系。随后，我低头一看，发现旗帜中有一条前人留下的路径基本上是通往基地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方向，所以我们就按照这条路继续前行。

现在我们第一次径直冲着基地滑雪，建筑物的轮廓变得逐渐清晰，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在它们周围移动。所有的建筑物看上去都像是从事工业生产的，这些建筑物是蓝色和红色的、方方正正的，并且被看上去像脚手架的东西包围着。旧的船运集装箱在建筑物前

面呈直线排列着，大号的木质电缆卷看上去像超大的棉线轴。很明显，在我们右边的建筑物是主基地。我们越接近，建筑物在雪地上就变得越大。建筑物在地面上很夸张地凸起，看上去似乎有三层楼高，像是大写字母E。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飞机，现在正停落在离我们最近的建筑物旁边，不耐烦地嗡嗡作响。飞机在南极点从来都是开启状态的，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冷了，如果关掉，就不能保证它可以再次启动。这架飞机没有卸载物资，反而随着发动机的嗡嗡声继续装载着物资。史蒂芬停了下来，叫我到前面。“费利西蒂，我认为应该由你带我们进去，”她说，“你是我们这次探险活动的倡导者。”我看到艾拉和瑞娜也都在史蒂芬的后面停了下来。她们两人都点头表示同意。我举起了拳头做出我习惯的标志性动作，在我继续向前行进前，我要确定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一切都好。当我在滑雪的时候，我的双眼寻找着建筑物上正式的南极点的标志。我已经看了这些建筑物一百多遍了——一个银色的球面，在一个红白相间的条纹桅杆上，周围被南极洲条约国（1959年12月1日由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南极条约》，旨在确保各国对南极洲的尊重，目前共有46个国家签署该条约。）的国旗包围着。随着队伍不断地向基地行进，我注意到了那个图形，所有的一切是那么熟悉，从某处传来的航空燃料的味道和似有似无的摇滚音乐的声响。我们已经到达线路的末端，但还是没有看到明显的绿色引导线。显然，我们需要在某个时候转向右边的主建筑物，我在鼻子的指引下，有些茫然地向前滑行，几乎不能很明确地转向。这时，一位骑在雪橇后座的过路人疯狂地向我们挥动双手。我停下来，用滑雪杖支撑站立着，等待着电动雪橇连接LIS（实验室信息系统）。过路人从他的座位上跳下来，小跑着停在我面前，坚持摘下手套赤裸着手向我问候。我迟疑了一下，在把手从手套中拿出来跟他握手前，用雪杖上的手套





在空中向他挥舞了几下。这个陌生人的手非常温暖。

“祝贺你们！我是肖恩。”他自我介绍着。我之前被告知会见到肖恩，这位南极点ALE议员的工作就是当我们抵达的时候要接待照顾我们。“你们的到来已经让在这里的人都产生轰动了。”他继续说道。我迷惑地看着他，不确定我们最初到达的五分钟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混乱。“你们可以径直到科学研究大楼去，一般的旅行者是不允许接近基地大楼的那一部分的。”肖恩解释道。

在我们参观的时候，我详细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

“我们刚刚试着根据旗子的引导去到真正的南极点。”我解释道，“但是那里有很多旗子，我就有些茫然了。”

肖恩指向我们的右边。我立刻认出了它，在基地主建筑物前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旗子呈半圆形围绕在一个银色的金属球面的周围。这就是南极点！

当我们穿过滑道的时候，肖恩跟我们一起走。我们的团队在我身后成一行纵队滑雪。当我们前行的时候，肖恩很友善地跟我们聊天，但是我的目光却集中在了我们的目标上。我们离它不到一百米了，此刻我心中有一团火开始燃烧。我知道，这个时候想控制自己不哭显得有点可笑。肖恩感受到了我的想法，于是慢慢地退到后面去，他向后移动以便和团队的其他成员握手。当我们很接近旅程终点的时候，他很贴心地为团队成员记录影像。当我们完成最后的900公里的时候，我瞥了一眼身后滑雪的六名妇女，她们正在整齐灵巧地滑着冰，拖动着自己的雪橇。我习惯性地举起手臂和队员们沟通，确保大家是否一切正常，有时候感情用事一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看到团队成员的脸，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们每个人的感受。她们一个接一个地举起手臂，回应我的信号。我的嗓子感受到非常熟悉的疼痛。无一例外，女孩们的护目镜上也开始蒸腾着水蒸



气，像我一样，她们所有人都在悄悄地落泪。这种惊人的、非传统的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团队精神从我的脑中闪过，肾上腺素瞬间燃烧起来。

大步滑过最后的一百米时，我回想起我们最初的时候，在温斯顿·丘吉尔纪念馆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继续将我的回忆向前推进到加纳、印度和牙买加；我看到了在面试的时候这些女性的脸庞，以及所有慷慨地给予我时间来帮助我的人们。我还记得苦恼于敲打建议书和电子邮件的深夜，与卡巴斯基实验室第一次接触时的兴奋，那个令人绝望的早上，穿过挪威的暴风雪到路虎公司的旅程，以及新西兰盘旋的山路。有一刻，我的思绪飞到那些对我蔑视或者怀疑的人们那里，那些认为我是个笑话的人们。“看看现在的我们。”我非常满意现在的自己。

我在离银色球体一两米的地方停下来，等待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追赶上来，以便我们可以肩并肩站在一起。我伸开双臂去拥抱艾拉和史蒂芬，她们都并排跟我站在一起。我注意到凯莉挥舞着她的胳膊表示胜利，在她面罩后面是无言的喜悦。她伸开双臂去拥抱瑞娜，瑞娜举起护目镜在我们面前泣不成声。一群从南极点基地来的工作人员都出来见证我们的胜利抵达。当我们凌乱地拖着雪橇和交叉在一起的滑雪板一起走完旅程的最后一步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欢呼起来，对我们鼓掌。我们七个人围着银色的球，抱成一团，好像一个足球队向前探身去讨论比赛策略一样。我环视着同样看着我的六张脸，把面罩从脸上拿下去，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地听到我说的话。“如果在生活中，有人告诉你，你不能做一些事，”我开始说，“或者你做这件事情有风险，你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胜任这件事，想想今天，今天你已经证明你可以做到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动摇你的信念。我们到达地球的最底端了，我们



用38天征服了世界。”

我停下来看着周围团队成员的脸，“我们永远为今天的成就感到骄傲。永远。”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之后转向围在我们周围为我们拍照的、轻轻拍打着我们后背的人们。

“你们知道吗？”一位上前来庆祝我们胜利的女士说道，“这距离第一位女性登上南极点的时间正好40年。”我不记得这个周年纪念日，但我听说过这个故事。五位工作在美国麦克莫多海岸研究工作站的研究员已经出现在南极点的赫拉克勒斯过。没想到我们这些探险队的妇女已经率先抵达了。这个意外的周年纪念日让我感到欣喜。我很高兴我的队员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抵达南极点，从欧洲大陆的边缘，每一步都是我们滑雪完成的。当我们拥抱、庆祝、欢呼，尝试着去接受我们已经结束了整个旅程的事实——我们正站在南极点上，我们所有的七个人——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从这个情景慢慢地游离开。我试着从理智上去分析自己的感受。我感受到了放松，一种势不可当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放松。我似乎要从现在的场景中漂浮出去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可以漂浮，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到我们，我们是安全的。然后，当我和团队成员合影留念的时候，我意识到与这样一群鼓舞人心的妇女滑雪到南极点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情。一想到这些，我的眼里就噙满泪水，我更紧地拥抱着队员们。在这一刻，我知道，永远都不会再有跟我们一样的团队出现了，但是我们可以记住我们一起分享的生命中38天的宝贵时间，和我们的友情。就在这一刻，在南极点上。

最后，我们摆脱了滑雪板和雪橇，所有人穿着厚厚的夹克衫，向几百米以外真正的南极点奔去。银色的球形表面好像为我们准备的庆祝典礼，南纬90度的真正的南极点是随着薄冰层的稳定移动而变化的。因此，真正的南极点每年都要测量，要用黄铜作顶的瓶子



和一个大大的招牌作为标志。委员会画出了南极洲的大概轮廓，左边的标志是阿蒙森——挪威的一名探险家，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到达南极洲的人。招牌上写着“我们到达了，因此，我们把我们的旗子插到南极点上”，上面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4日。右手边的标志为罗伯特·菲尔·肯斯科特，他在阿蒙森到达一个月后抵达了南极点，并且死在了回去的路上，“这个点，是的，但是它和我们预料的简直完全不同。”

我想象肯斯科特和他的清一色的由男人组成的团队，在近一百年前就站在这个点上，想象他们与我们抵达这里的经历到底有什么不同。肯斯科特的旅程更加长一些，而且，他一到达了南极点就立刻返回。而我们不需要再滑更多雪了，我们只要简单地等在极点上，等着接我们的飞机就好了。我想象那个全部由男人组成的团队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个全部由女人组成的团队的。

我给语音信箱打电话，语音信箱可以自动上传我们的信息给探险活动的网站，这样一直关注我们探险活动进程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人都可以知晓我们的讯息了。

“你好！我是费利西蒂，我在报告，在2009年12月29日23时零9分，卡巴斯基实验室联合南极洲探险队抵达了地理位置上的南极点。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弧面上，就坐在南极点的旁边，我们被后面所有南极洲条约国的国旗包围着。站在我旁边的是艾拉，她是第一位抵达南极点的文莱人。”当我向语音信箱报告艾拉的名字的时候，我发现艾拉正在咧着嘴冲我笑，兴奋地用双手使劲地捂住自己的脸。

“在艾拉旁边的是史蒂芬，第一位抵达南极的塞浦路斯人。”当我说出名字的时候，我故意看向史蒂芬。映入我眼帘的是史蒂芬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们已经抵达南极点这件事，仍然令史蒂芬不敢相信。其他的团队成员欢呼着，艾拉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双臂。



“在史蒂芬旁边的是瑞娜，第一位滑完全程、抵达南极点的印度女性。”瑞娜眼里饱含着泪水，露出了她令人难忘的笑容。

“在瑞娜旁边的是索菲娅，第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抵达南极点的女性。”整个团队都欢呼起来，而索菲娅像往常一样镇定，丝毫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

“在索菲娅旁边的是凯莉，第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滑雪抵达南极点的女性。”凯莉欢呼着，在空中挥舞着她的双臂，像一位刚刚取得胜利的拳击手。

我发现海伦凝视着她身边的人，微笑着等待我的发言。“在凯莉旁边的是海伦，她已经实现了滑雪到南极点这个长久以来的梦想。”

当我意识到下面该轮到我的时候，我停顿了一下。“同时，我也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带领一个全部由鼓舞人心的女性组成的探险队完成所有路程，滑雪到南极点的梦想。”整个团队都默默地相互拥抱。

“我为整个团队感到骄傲，我认为，现在我们所有人在这里的感觉都是如此：如果我们抵达了南极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讯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开心。我们站在这里，七位女性面带笑容地站在地球的最底端。感谢一直支持我们、关注我们的每一个人。”

我挂断了电话，深深地吸了口气，看着周围的女孩们。她们仍然用双臂紧紧地相互拥抱着，脸上挂满幸福的泪水。

肖恩默默地带领我们离开南极点，去往50米以外的露营基地，那里有被我们弄得一团糟的帐篷。我们挤在帐篷里，坐在马蹄形的小板凳上，围坐在肖恩周围。肖恩用马克杯端出一杯杯的热茶和汤，还有味道浓郁的巧克力糕点。我们充满感激地享受着这些好吃的东西。我一边听着团队成员像专业探险家一样述说我们旅途中的



故事，一边大口咀嚼着美味。我从我的夹克衫中拿出卫星电话，把它递给了我旁边的索菲娅。她从她的雪橇中拿出备用手机，把一块温热的电池放入手机后面，转动着手机寻找信号准备打电话。再过半个小时，帐篷里就会充满着世界各国语言，队员们会打电话给她们所爱的人，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成功抵达地球的最底端。索菲娅打完了电话，把卫星电话递给凯莉。“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她告诉我，“妈妈知道我已经安全抵达，非常高兴。”

我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我知道这里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去思考：回去后为我们的赞助商做宣传活动，给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发图片，给跟进我们探险进程的记者打电话，确定带我们回家的航班，并且将我们的设备器械分类整理。但是，我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等待，此刻这里没有特别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我现在允许自己休息一下，坐下来什么都不想，好好地享受这一刻美好的时光。终于可以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了。当在帐篷里大家基本已经打完电话后，我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女孩们渐渐离去，去收拾她们的帐篷，准备睡觉。在我跟着她们去收拾帐篷之前，我把卫星电话折叠起来放在夹克衫里，独自一个人走向南极点。我站在南极点，将目光投向远处我们所经过的那些地方。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感觉，我站在这里发自肺腑地想说：这是一段旅程，而不是我们的终点，抵达不是给旅行者真正的礼物。

当我小心地拨通家里的电话，希望男朋友彼得可以接到我的电话的时候，我的手指已经快要冻僵了。我试着计算现在到底是英国的什么时间，但我的大脑无法运转，拒绝进行任何计算。我笨拙地把手机听筒在我的帽子和围住鼻子的羊毛围脖间不断转换。应对风的噪声和我自己的呼吸声，我只是听到电话的铃声。我拿着电话陷入沉默，告诉自己家里一定没有人。我留下了一条信息，当我的下巴已



经被冻得麻木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言语变得很缓慢。在结束留言之前我大口地吸着气。我用手套抹了一把鼻子，笑着在南极点给我家里的电话答录机留言，之后艰难地挪动手指给在克罗夫顿的父母拨电话。

电话马上就接起来了。我刚要说些什么，妈妈马上意识到是我打的电话，她问：“你在那里吗？你在南极点吗？”妈妈的声音充满了兴奋和激动。我描述着我们抵达时的情形，我意识到爸爸也拿起了房间里的一个分机电话。当我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我妈妈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停了一下，看着银色反光镜前的自己。透过我的眼睛，我注意到自己现在看上去是多么的疲惫。“现在全都结束了，你开心吗？”妈妈继续问。我扫视了一眼周围的旗子和头顶无尽的蓝色，努力地思考，想要寻找一个答案。现在，我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

雪波的涟漪

当我们用了很多种方法最终到达南极点时，探险的完成只是我们向自己挑战的开始，也许这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一种什么感觉的原因吧。我组建了这支探险队，就是为了让妇女们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同时也证明了一点，妇女要想享有平等的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很幸运能拥有这样的经历。现在，我们的探险队到达了南极点，我们决心向尽可能多的人分享我们的故事。

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都渴望故事的开始。但是，首先，我们想回家——结果证明这比我们预期的更困难。离开南极很简单，但是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跑道上落满了半英尺的雪，我们不得不滞留在西班牙。我们躺在马德里机场硬硬的大理石地板上，数小时过去了，没有一架飞机经过，我们越来越绝望。包括英联邦秘书长在内的100位嘉宾还要在当天晚上6点到达联邦俱乐部，听取探险队关于这次探险的汇报。

从早上等到下午，我们还幻想着我们回到家后的欢迎仪式，这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我们只能盲目地乐观着，我让队员们





写下并练习抵达机场候机楼时要讲的感言。正在这个时候，信息板上发布了最新一批的航班消息：延迟、推迟或取消。

我们最后的希望是一趟下午4点的飞机将带着我们飞到希思罗机场，不出意外的话，一小时后我们将站在伦敦中心的舞台上。女孩子们挤在门口，挥舞着她们的护照，不可阻止地强迫航空公司员工敲击她的计算机以确定飞机的状态。

“飞机很快将会起飞。”她最后宣布并交给我们登机牌。登上飞机后，我们松了一口气。但它并没有起飞，只是沿着跑道隆隆作响，直到飞到空中，我们才相信自己正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的家人都在等待我们到达。他们会向整个团队致以问候，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重逢，举着代表着我们团队颜色的大气球，并会把气球绑在我们的手腕上，兴奋地跟我们拥抱并问好。我们从候机楼一路跑向希思罗快线，这条快线可以直接让我们进入伦敦市中心。在地铁站，售票人员用只有伦敦人才有的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们。

我们解释说我们刚刚从南极点滑雪回来，售票员向我们投来意想不到的笑容，并且免费将我们升至头等舱。“这是在你们这些女孩创造奇迹后，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了。”

“你们简直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售票员在检票的时候热情地说。妈妈已经为我们在火车上准备好了一些物品：装着化妆品的化妆包；一些新的衣服，以便我们可以换下穿了48小时的衣服；以及为我们每一个人准备的足量三明治。

当我们盯着化妆镜看的时候，车厢突然变成了女孩们的睡衣派对，大家相互传递着睫毛膏和腮红，试图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包围着蒂姆，他已经准备好对我们进行评价了。“现在她们所有人都准备要进入礼堂了。”蒂姆报告着。我估计我们还有至

少半个小时。“不要担心。英联邦秘书长正在发表讲话。我已经让他再延长一些了。在你们到达前，我们会让观众有事做的。”一到站我们就跳下了火车，离开月台去往最近的一个车站，那里有一排黑色的出租车正在等候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赶往会场。”我非常镇定地指示出租车司机。他似乎感受到了这巨大的挑战，于是飞驰前往，汽车发动机在伦敦的街道上轰鸣。当我在出租车内摇摆不定的时候，我紧紧握住移动电话打给集会地点，并告诉凯特——她是一直关注探险活动的工作人员。“蒂姆刚刚在台上介绍你们呢。”凯特在礼堂的后台压低声音对着电话跟我们说。

我向出租车的窗户外面瞥了一眼，看到海军部的飞机鸣笛经过。“我们在特拉法加广场，我们就快到了。”挂了电话，凯特向可怜的蒂姆伸出了五个手指头，这个手势意味着蒂姆还要在一百人面前充实五分钟的内容。两辆黑色出租车几乎同时在英联邦的礼堂前停下来。当我们进入到建筑物里时，我听到了来自观众的热烈掌声，这预示着我们即将登上舞台。礼堂的大门拉开了，我们沿着过道进入礼堂中，在我们的手腕上还系着绿色的气球，我们带着这些气球登上了舞台。

那一晚，我们在英联邦的礼堂里进行了第一次有关我们旅行的演讲。每一位团队成员都给大家带来探险活动中不同部分的演讲。我能够感受得到，面对观众，女孩们是多么的应对自如，尽管她们事先没有经过培训或者在公众前演讲的经历。

她们充满热情，每一个词语都饱含着我们经历中的真情实感。很明显，探险活动已经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孩们正在用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向其他人传递着她们强烈的感受。在这次演讲的两天过后，我坐在了英国广播电台早间播报节目的红色沙发上，接下来要飞往纽约参加国家广播台的《今日秀》节目。





队员们面对连续的宣传活动一点都不苦恼，她们把焦点关注在自己取得的进步上，关注在希望能够听到我们故事的任何一个人上。我总是希望，当这些女孩们回到她们的国家时，能够掀起一阵狂热的旋风，这样可以给她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一个平台，但是我不认为当我们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所有人都做好准备接受等待她们的名利。

当瑞娜回到她的祖国印度的时候，她就完全被媒体、关心她的人和她的家人的热情吓到了。她在电子邮件中是这样跟我描述的：

从报刊、广播和电视媒体，到我的邻居、朋友、家人和许多来自我丈夫家乡的邻居，都拿着鲜花和横幅出现在了 my 面前，迎接我的到来，还有传统乐队的演奏。在我的家，很多妇女和小孩子聚集在大门口欢迎我。在回家的整个路途中，我一直被热情的人们包围着，我的邻居们向天空抛洒花瓣来迎接我。

我认为我需要出访大吉岭（位于印度的东北部地区），这是我从小成长的地方。我还受邀到我的母校——洛雷托修道院去做一次演讲。我站在讲台上感到大吃一惊。我原来习惯于满怀敬畏地看着我的同学和其他的女孩们在舞台上辩论或者演出舞台剧，并且幻想着有一天我也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做相同的事情。现在我作为名人站在舞台上，向大家讲述我的探险经历，并且鼓舞其他的女孩们：“教育给了你们一双翅膀。你们可以用它去做任何你们想去做的事情，如果你去追随自己的梦想，那么这双翅膀就会变成你内在的最大力量。”

像瑞娜一样，当艾拉回到文莱的时候，她也遇到了许多记者。她的故事刊登在了文莱主流报刊的头版。不久她受邀参加了一个给予她最高荣耀的晚餐，文莱女王储也参与其中。而且最大的喜悦也

随之降临，现在艾拉正准备迎接她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人感到惊奇。因为在探险活动中，艾拉经常在帐篷中跟我们讲述她新成立的家庭和对第一个宝宝的期待。我们对此不感到惊奇，我们所有人对艾拉的这一好消息都感到激动不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是这个孩子遥远的姨妈呢。

索菲娅一回到新加坡，没过多久就接到来自总统办公室的联系电话。总统非常希望为她安排一次晚宴，索菲娅可以面对面地与总统分享她这次的探险经历。当几天后，总统把索菲娅回国与大家团聚放入他的演讲中，并把这段与她有关的讲话作为新年标志的时候，索菲娅还是感到了震惊。

凯莉没有受到国家元首的接见，但她的同胞给予了她新西兰人民最独特的荣耀。在探险活动中，她抱怨冰天雪地的寒冷，希望有一大锅热汤和发酵面包，当这段话在播客上播出后，凯莉回家发现很多汤锅和面包堆在她家门口的台阶上，这些包裹是全新西兰所有关注这次探险活动的热心的人们邮寄给凯莉的。凯莉欣喜万分。不久之后，埃德蒙·希拉里阁下阿尔卑斯山中心联系了她，问凯莉是否愿意捐赠在这次探险活动中使用过的滑雪板和雪地靴给国家展览馆。它们将被陈列在埃德蒙·希拉里阁下使用过的冰镐旁边，这一荣耀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骄傲。在我们回国后不久，我听到了金姆的消息。她的伤恢复得很好，而且手指已经有感觉了，在家里被朋友们环绕着，她已经找到了应对沮丧的方式。我们在南极点上都认为金姆也抵达了，我把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她，飘扬的牙买加旗帜代表着金姆，也完成了之前我对她的承诺。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已经向人们讲述了成千上万次有关我们探险的故事，而且通过媒体、新闻刊物和网络接触到了更多的人。作为结果之一，这次探险活动已经收到了绵延不绝的电子邮件，这些





电子邮件来自被我们的故事鼓舞着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下了更大的决心。不管这些决定是什么，事实是，我们的行动已经给其他人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震撼和影响，这就是我感受到的探险活动带来的真正意义。

在南极点，我的妈妈问我：“你感觉怎么样？觉得高兴吗？”现在回想这次探险活动，我仍然不确定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感到自豪。我为团队中的女孩们感到自豪，我也为自己把大家一起带去南极而感到自豪。但是我高兴吗？我最后感到满足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当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一位攀上过珠穆朗玛峰的女性到我们学校来做演讲。对于她的演讲我记不下太多的东西，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有两条路，那条走起来比较艰难的路带领她走向了最终的成功。就在当时，我决定要沿着我自己那条“难走的路”走下去。我认为，当时她的那段话从那时到现在，或多或少对我产生了影响。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新的探险活动的想法浮现在我脑海中，周而复始。如果它们不能很快消逝，那么我就要把它们付诸行动。所以，你看到啦，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条“艰难的路”，而且我想我会一直走在这样的路上。